



反对家庭暴力理论与实践丛书
中国法学会《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

妇女受暴口述实录

宋美娅 薛宁兰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国妇联 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妇女受暴口述实录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反对家庭暴力理论与实践丛书
中国法学会《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

D669.1
S774

妇女受暴口述实录

宋美娅 薛宁兰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BI700/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妇女受暴口述实录/宋美娅, 薛宁兰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11

(反对家庭暴力理论与实践丛书)

ISBN 7-5004-3988-1

I. 妇… II. ①宋…②薛… III. ①家庭问题—暴
力—中国②妇女—问题—中国 IV. ①D669.1②D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5408 号

图书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875

插 页 2

字 数 383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家庭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问题，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目前世界上已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颁布了禁止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并对家庭暴力理论与干预对策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

在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特别是'95 世妇会以后，家庭暴力问题逐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2001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婚姻法修正案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并在法律责任一章中规定了相关机构的责任和应对的救济措施。

中国法学会《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应运而生。自 2000 年 6 月至 2002 年初，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组织和个人参加到反家暴项目和网络中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该项目从理论到实践，从调查研究、媒体宣传、提高公众认识到反家暴社区综合干预试验，开展了十多个分项目的实证研究。该项目第一阶段将于 2003 年 5 月结束。从 2002 年 8 月开始至 2003 年 5 月，《反对家庭暴力理论与实践》丛书将陆续与读者见面。这十余本系列丛书，就是该项目的研究成果。

中国法学会《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是由京内外的法学、社会学、妇女学、社工学、医学、哲学、新闻学、心理学的专家、学者和妇女工作者、妇女活动家、律师以及人大和公、检、法、司等实际部门工作者共同参与进行

的。该项目的系列研究成果，揭示了家庭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危害，提出了干预对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政府对策、部门执法、国家立法，包括社区工作和医务、律师、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的社会救助等各个方面。这对进一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研究，深入开展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及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的工作，将是有益处的。

反对家庭暴力，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让我们行动起来，为促进男女平等国策的实现，为共同呵护我们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余孟孝
2002年6月

前 言

“给妇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这是 1999 年 3 月 8 日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召开的全球电视盛会的口号。针对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针对妇女暴力的状况，1999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 11 月 25 日定为“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决议呼吁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实施《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提高公众对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的认识。因为，对妇女的暴力，是侵犯妇女人权、摧毁妇女的自信心和尊严、阻碍其发展进步的最重要障碍之一。

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必须行动！时间本身不会产生质的飞跃，在走向 21 世纪的进程中，反对家庭暴力，特别是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维护妇女权益仍然任重道远。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是'95 世妇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承诺国，我们应该行动！

基于上述基本认识，我们——一群来自法学、社会学、妇女学、社工学、医学、哲学、新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教学工作者，以及妇女工作者、妇女活动家，律师、公、检、法、司、人大等执法和立法部门的实际工作者，集结在《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之下，于 2000 年 6 月开始，从“家庭暴力问题”入手，进行了在中国消除对妇女暴力的理论研究与具体对策措施的探讨。自 2000 年 6 月开始，该项目从事了对我国家庭暴力现状（主要是人们的认识）、司法干预

现状的调查和基础理论及立法探讨；开展了媒体宣传、社会性别培训等对策研究，旨在提高公众认识；进行了创建反家暴城市、农村社区多机构合作试验区的实证研究。在总项目下，设立了反对家庭暴力资料中心、反对家庭暴力网站、社会性别培训、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行为状况调查研究、家庭暴力司法干预状况调查研究、热线咨询家庭暴力个案研究、反家暴媒体宣传、受暴妇女口述实录、反家暴培训教材、对受暴妇女的法律援助、城市反家暴社区干预、反家暴医疗干预、农村反家暴社区干预以及反家暴国内研讨会、反家暴国际研讨会等 15 个分项目。与此同时，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建立了自愿参加、信息资源共享的京内外反家暴网络。

所有项目参与者，除总项目办公室有二三位专职工作人员外，均是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参与项目的研究及实践活动。目前，该项目已建立了一个资料中心，拥有各种中外文图书、资料、报刊千余册，并定期向网络成员传发国内外信息资料；此外，项目还创建了自己的网站（www.stopdv.org.cn）。

该项目基础理论研究的 3 个调查研究分项目工作已经完成，不仅有近 7000 份问卷的结论提供给大家，而且附有焦点访谈小组分析结果，同时还有北京红枫妇女热线 100 个个案研究的结论。该项目还将向大家提供一本受暴妇女口述实录专著，受暴妇女将以自己血和泪的叙述告诉大家“家庭暴力”不是私事，是社会公害，家庭暴力是不可容忍的，只有全社会——包括妇女自身行动起来才能将之消除。同时，该项目还将提供给大家一本由法律援助分项目律师亲自办理的对受暴妇女进行法律援助、探讨法律干预对策的典型案例分析报告；该项目将会为社会各阶层，包括立法者、警察、律师、社会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受暴者和施暴者提供一套反家暴培训教材（共 9 种），以提高公众的反家暴意识和能力。最后，该项目还会为大家提供城市、医疗、农村社

区干预试验的报告以及总项目的总结报告和一份反家暴立法建议书。约计 16 本书。

这些成果是北京近百名科研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妇女工作者、妇女活动家及实际部门干部辛勤研究 3 年的结晶；也是向给予项目研究者和工作人员支持的机关、单位、组织，向所有参与我们调查研究小组活动并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机构、组织、个人，向一直关心我们项目进展的广大公众的汇报。

当然，这么大型的关于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研究项目，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不可避免会有很多不足之处，具体到每一个成果，肯定也会有很多令人遗憾的地方。因此，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导。为了“给妇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为了人类的平等和谐发展，让我们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共同做出努力！

这个项目的进行，这套丛书的出版，凝结了很多人的辛勤劳动。

作为中国法学会研究部的一个大型实证研究项目，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反家暴项目从立项、开展调查研究，到出成果，都得到了中国法学会领导的支持与指导，得到了法学会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可以说我们的成果也有他们的一份辛苦在其中。在此，我们所有论著作者、项目全体成员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能得以立项和开展，要特别感谢福特基金会、荷兰 Novib、瑞典 SIDA 和挪威奥斯陆大学人权中心对我们的资金支持。感谢张乐伦、高夫蔓、刘晓堤、李文晶、米沙、克拉瑞塔、索菲娅、海欧莎、丽萨、奥托、马蒂斯等各基金会项目官员的帮助、支持和辛苦工作。同时，我们也要感谢英国文化教育委员会出资帮助我们进行了反家暴专业培训以及培训者的培训，并资助项目人员赴英参加反家暴研讨会；感谢英国文化教育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葛兰梯及余

莉、路海荣等项目官员的支持；感谢香港乐施会出资协助我们召开反家暴国内研讨会及开展有关活动；还要感谢香港乐施会北京办事处负责人王云仙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这套丛书得以出版，我们还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该出版社第四编辑室主任任明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充分理解我们项目的公益性质，以最优惠的条件、最高的效率，协助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在此我们谨表谢意。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每一位项目成员及论著作者的配偶和家庭成员，是他们的支持和理解，给了我们勇气和力量，鼓励我们去探索，去创新。让我们高举双手，擎起没有暴力的蓝天！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
《反对家庭暴力理论与实践》丛书编委会
2002年6月

导 言

一、妇女受暴口述的意义

本书收录了 28 位受暴妇女的口述访谈个案，每一例个案都详细叙述了受害人经历的家庭暴力事件，28 例个案汇集在一起，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中国家庭暴力的现状；描述了家庭暴力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施暴者的暴力手段，以及受暴者应对暴力的态度；展示了社会各界，包括公检法机构对待家庭暴力的态度。我们希望这些真实的案例能够加深公众对家庭暴力危害的认识，提高公众反对家庭暴力的意识，并为政府及公检法机构制定反对家庭暴力策略提供第一手资料。

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对它的研究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热切关注。妇女受暴口述对中国研究家庭暴力具有重要意义。'95 世妇会之后，中国各种组织开始关注家庭暴力，相关的学科如妇女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纷纷把对家庭暴力的研究纳入视野。但由于中国对此社会问题研究的时间较短，现有的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资料主要是关于家庭暴力发生比例的调查，是量的研究，着眼点在家庭暴力“有多少”。而妇女口述的方法，着重在对家庭暴力质的研究，关注的是家庭暴力“是怎么样的”，质的研究提供对事物实质的认识，它与量的研究形成互补，共同说明家庭暴力在中国的现状。由于我们的访谈资料来

自于受暴妇女的亲身经历，28个案例提供给我们的是生活的原生态，它描绘出了家庭暴力的全息图，这些鲜活的资料包含了有关家庭暴力的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对研究配偶暴力具有丰富的可开掘的潜力，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多角度、多层面、多课题地分析研究与家庭暴力相关的各种问题，如性别权力关系如何体现在家庭暴力中；中国的家族力量在家庭暴力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如何建立社会支持系统等等，这些研究将有助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反家庭暴力理论，并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防预系统。

同时，本研究向公众揭示了家庭暴力的真实面目。在中国，家庭暴力作为家庭私事长期以来秘而不宣，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许多人怀疑中国有没有家庭暴力。采录妇女受暴口述，以第一手资料的形式把家庭暴力的本来面目展现出来，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家庭暴力发生发展的过程，还可以从中分析了解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看到家庭暴力中多重的、复杂的性别权力结构；它可以帮助公众真实地了解家庭暴力，理解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害等有关家庭暴力的基本概念，并唤起公众反对家庭暴力的社会责任感。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

采录口述是西方史学最古老的研究方法之一，据记载，西方的历史撰写始于口述。后来，口述方法广泛地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它不仅是研究者获取研究资料的手段，也是学者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方法。口述也服务于文学，如人物传记中常用口述实录的方法。20世纪90年代，口述又大量地被运用到纪实文学之中，这种方法有利于洞悉人物的内心世界，它比新闻采访有更可信的真实感。本书将口述访谈运用到家庭暴力的研究之中，是一次新的尝试。

妇女口述在家庭暴力研究中有着独特价值。首先，家庭暴力发生在私人空间里，尤其是发生在夫妻两个人之间，许多事件有很强的私密性，受害者受“家丑不可外传”观念的束缚，一般不向外人诉说。这种情况下，采录当事人的口述是获取真实材料的惟一可靠来源。国外有研究认为：“受虐妇女对自己受到的人身伤害的陈述，通常是关于犯罪人暴力行为严重程度的最可靠和最准确的消息来源。通过谨慎的程序获得此类信息，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害者需要克服相当程度的胁迫才能吐露真情。”其次，暴力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暴力对受暴妇女内心造成的伤害是怎样的，受暴妇女如何评价自己所遭受的暴力，她们在遭受暴力之后有什么行为来应对等等，口述访谈是获得这些信息最有效的方法。

本书在口述访谈这一质的研究方法中，注入了女性主义的实质。因此，女性主义的口述访谈方法，应当是本书的特有研究方法。对家庭暴力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支持点，那就是社会性别意识。家庭暴力是两性权力结构不平等的结果，在口述访谈中，不同的性别理论观念得出的访谈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研究方法贯穿研究行为的始终，不同的性别理论导致不同的研究行为。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妇女口述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而且是一种政治手段，即通过对妇女经历的肯定，增强妇女的信心，从而赋权于妇女。女性主义注重通过重现一向被忽视的妇女的声音和视角，以及她们在历史上一贯的主观能动性，来揭示形成社会性别的历史过程。^① 在家庭暴力事件中，妇女是事件的主体，是暴力的承受者，依照女性主义口述访谈的观点，访谈不仅要了解客观上发生了什么，访谈对象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对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看法如

^①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初探”，《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

何，感受如何。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它能反映男女价值观的不同。

遵循女性主义口述访谈的原则，作为访谈对象的受暴妇女是被尊重的主体，每一次访谈之前，我们都要将本项目的目的、意义向她们一一介绍清楚。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得到她们的同意，更是为了让叙述人知晓她们为什么要讲述自己受暴的经历，讲述的意义是什么。通过这些细致的工作，访谈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在访谈中建立起平等互动的关系，受暴妇女不是被动地被访问，而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是她们和我们一起共同完成每一次访谈。

访谈过程中，访谈人对于叙述人讲述的事件，并不只是冷静地记录，而是认真倾听，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深切体会受暴妇女的境遇，从她们的处境中认识她们的视角，体验她们的感受，这样的访谈自然和叙述人有情感上的共鸣。在这样的访谈气氛中，叙述人得到肯定和鼓励，有助于她们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就使得本书的大部分案例材料丰富翔实。依照女性主义的观点，在理解与肯定中，让叙述人尽情地倾诉，本身就是一个赋权的过程。她们在叙述往事中重新发现自己的力量，在重新梳理过去的生活中发现不曾留意过的细节，重新认识自己，对生活重新做出评价。每次访谈结束时，访谈人和叙述人已经成了朋友。

三、28例个案的总体情况

28位叙述人中，年龄最小的27岁，最大的62岁，以40岁左右的为多。她们的职业有：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护士、警察、编辑、公司职员等。

文化程度：文盲4人，小学6人，初中4人，高中（中专）4人，大专4人，大学3人，硕士研究生1人。28例个案的发生地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湖北、湖南、河北、内蒙古

自治区 8 个省市自治区。家庭状况：5 个案例的施暴者（丈夫）被判刑，14 位叙述人人入狱，8 人已离婚，1 人家庭生活正常。

选案的标准主要是，尽可能访谈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受暴妇女。访谈到不同类型的家庭暴力个案和暴力造成不同后果的个案，意在使访谈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反映出中国家庭暴力现状中的多层面、多角度。选择访谈案例时，我们并不在暴力的严重程度刻意要求，没有选择大案要案，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样本的选择越是随机的，越具有普遍性。

在实际工作中，选择案源有一定的难度，这是我们工作中必须克服的一个困难。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往往因种种原因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受暴经历，有的认为对自己面子不好看，有的害怕丈夫知道了报复，还有的受害人对婚姻抱有期望，怕引起夫妻关系纠纷。如 2002 年 3 月，某省发生一起家庭暴力伤害案，受害妇女的鼻子被丈夫割掉，医生诊断已不能缝合。这位 40 多岁的妇女一直遭受丈夫打骂，我们联系访谈时她拒绝了，她认为丈夫已经认错，她就知足了，不想说以前的事了。不仅是当事人，有些基层组织同样认为家庭暴力是阴暗面，是当地的“隐私”，并不希望外人了解，这样的认识也使我们的案源调查受到一些局限。家庭暴力就是这样在人们的不经意间被层层包裹着。

28 个案例中，有 14 位叙述人是“以暴抗暴”被判刑的妇女，占了所有案例的一半。我们共访问了 6 所监狱，有北京女监、辽宁女监、天津女监、内蒙古女监、湖南女监和湖南茶陵的男监（访问一位施暴者），另外，还有普兰店公安局拘留大队。访谈中我们发现，这些妇女原本都是善良、勤劳的，她们大多是长期遭受暴力，在受暴的过程中，她们中有些人曾经多方求助，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救助，面对丈夫的暴力，她们无能为力，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走到犯罪这一步。应该说这些妇女都

具有“受虐妇女综合征”的特征，“受虐妇女综合征是指长期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妇女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①。在国外，受虐妇女综合征已经成为一个法律概念用于司法实践中，这些理论与实践，对我们是很好的借鉴。我国的妇女犯罪中，“以暴抗暴”占了相当的比例，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据辽宁省女监、内蒙古自治区女监的不完全统计，那里大约有50%左右，这种现象值得关注。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以暴抗暴”在所有家庭暴力事件中仅占相当小的比例，绝大多数受暴妇女并没有因保护自己的权益而逾越法律，本书适当增加这种案例，一方面是因为这类暴力案件都有一个暴力发展的完整过程；另一方面，这种案例能够较多地反映出司法介入的情况，为我们今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提供较丰富的资料。

读者会发现，28个案例中婚姻关系存续的很少，这与我们访谈的案源有关。如果叙述人的婚姻关系已经结束，就比较容易接受访谈（婚姻关系结束的方式可以是离婚，也可能是施暴者或受暴者一方入狱），如果妇女还在婚姻关系中，尚无离婚的准备时，她们接受访谈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我们分析，不愿影响家庭关系固然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妇女在脱离了家庭暴力之后，会对家庭暴力有重新的评价，她们更有勇气控诉暴力。

按照口述访谈方法的要求，我们对每一次访谈都做了完整的录音。整理录音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稿的过程中，每个访谈人本着忠实地记录当事人叙说的原则，对每个个案的全部事实和细节做了完整的转写，有些地方保留了叙述人的方言和特有的叙事方式。在后期编辑时，文稿中不清楚的地

^① 陈敏：“关注绝望的抗争”，《中国妇女报》2000年11月2日。

方，编辑者又反复听录音，直至使事件的顺序和逻辑关系都比较清楚。另外，对一些篇幅较长的个案还进行了必要的删减，使文稿更精练。因此，真实，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四、28 例个案告诉了我们什么？

收录本书的 28 例个案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家庭暴力在当今中国的现状。这个现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暴力的种类；暴力发生时的一般情形；暴力造成的后果；受害妇女在遭遇暴力时的反应，以及她们如何评价自己所遭受的暴力；施暴者的心态；暴力发生时的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受暴妇女是否求助，求助的过程和结果如何；社会支持系统在面对家庭暴力时的态度和反应，这个支持系统包括受暴妇女的娘家和婆家；公检法部门如何对待受暴妇女的求助，如何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等等。

（一）暴力的类型

我们知道，家庭暴力通常分为 3 种类型：身体的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现在，有研究者把经济控制也作为暴力的一种类型。从本书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种暴力的表现形式，每一种暴力的手段都是多种多样的。身体暴力中拳打脚踢只是基础形式，针扎、火烧、刀砍、油烫这些极端的事例也不鲜见；精神暴力中常见的有恶骂、训斥、羞辱、冷漠、过度役使，同时还有各种手法的心理虐待和情感虐待。另外，几乎所有的暴力案件中都伴有恐吓，施暴者威胁要杀死受暴人，杀死她的全家，以此来掌控她的行为。性暴力是一个更加隐秘的话题，即使在访谈中也不便于直接问及，从案例中可以看出，性暴力可能更加普遍，它像是一条潜藏的河，被其他形式的暴力所掩盖。经济控制在许多案例中都有所体现。

对暴力进行分类是理论上认识家庭暴力的需要，但在暴力发生时，很难截然地将几种类型的暴力分开。在本书收录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施暴者常常是几种暴力同时并施，殴打时伴有辱骂、恐吓，强迫性生活时又有殴打和谩骂，同时还有经济控制、人身自由控制等等，每一个案例都是多种暴力手段交织在一起。

（二）暴力发生发展的过程

统观 28 例个案，家庭暴力具有如下几个规律性特点：

其一，婚后丈夫是否施暴，与婚姻基础没有明显关系，自由恋爱结婚的丈夫仍然可能施暴。这个发现打破了暴力是发生在婚姻基础不好或关系不和的夫妻之间的习惯认识，不恰当的爱有可能演化为更激烈的暴力。希望这个发现能够提醒未来的青年女性及早识别对方的暴力倾向。

其二，家庭暴力几乎和婚姻关系的建立同时发生。28 个案例中，大部分第一次暴力行为在婚后半年之内发生，还有些妇女婚后三四天开始挨打，甚至有婚前就开始受暴的。由此可见，配偶间的权力关系在婚姻初始即已建立。从男性施暴的动机看，施暴者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女性，而不是让她离开自己。所以，一旦妇女表示要离婚，施暴者就会认为是对其权威的挑战，从而施以更严厉的暴力，包括威胁恐吓。但在男方有了婚外恋，以离婚为目的的情况下，暴力发生发展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如本书中“解脱之后我很幸福”和“离了反而好了”）。这时的暴力是以离婚为目的，实质仍是控制受暴人，依照施暴者的意志行事。

其三，家庭暴力很难自行结束。28 例个案中结束暴力的方式是：14 例中的受暴妇女杀死了施暴者而入狱；4 例中的施暴者被判刑；8 例已离婚；只有 1 例婚姻还在延续，此案例的受暴妇女外出打工。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所做的访谈中，婚姻继续存续的家庭暴力案例较少，原因有二：第一，如果妇女没有打算离

婚，她对自己受暴的事实更加避讳，或是怕丈夫报复，或是顾及面子，她们接受访谈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在访谈中我们逐步了解到，妇女在脱离暴力的控制之后，会对家庭暴力有新的觉悟，她们更有勇气控诉暴力。本书的 28 例个案中的受暴妇女绝大部分已经脱离了暴力，可是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家庭暴力还在继续。在这类家庭暴力中，男女权力关系暂时达到了某种平衡，暴力还没有激发出尖锐的冲突，但暴力并没有消失或结束，它只是被掩盖着。观察分析本书的 28 个案例，可以提供这样的认识：家庭暴力必须干预，妇女一味地忍耐，不可能制止家庭暴力，只会纵容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恐。

（三）家庭暴力对妇女的伤害

28 例个案中，14 位妇女入狱，最短的刑期是 3 年，大部分是死缓改判无期徒刑，她们要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岁月。虽然她们犯了罪，但祸凶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仅让她们身心备受摧残，还彻底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轨迹。其他几位妇女中，7 位有程度不同的伤残，如童春花、向敏华是 8 级伤残，王菊芬脾破裂，杨玲美耳膜穿孔……从她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暴力对她们躯体的伤害是看得见的，而对她们精神和心灵的伤害更加深刻和久远。在 28 个案例中，有 6 位受暴妇女明确表示她们有过自杀的行为或念头，有的曾多次自杀。而且，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相信会和我们有着同样的认识，那就是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对妇女的伤害将延续至她们的一生。

家庭暴力伤害的不仅仅是受暴妇女，它对儿童的伤害、对家庭的破坏性非常严重。本书中有两个案例是由于丈夫对妻子施暴引起家庭成员集体犯罪，导致一家数人入狱（侯春树案和文佳玉案）。孩子是家庭暴力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施暴者在对妻子施暴时，往往也对孩子施暴。本书的案例中，有 9 个案例中孩子和母

亲一样直接受暴，所有在家庭暴力中成长的孩子在精神和心灵上都有严重的创伤，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还将影响他们的一生。在那些妇女“以暴抗暴”入狱的案例中，由于家庭破裂，子女往往陷入无人抚养、照料的艰难困境。

（四）社会支持系统的现状

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受暴妇女的法律救助和社会援助比较全面和及时，我国是最早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对全世界做出了保护妇女权利的庄严承诺。’95世妇会之后，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日益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视，1995年8月，作为国家法规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把“有效遏制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坚决制止家庭暴力”确定为妇女发展的目标之一。继1996年1月10日湖南省长沙市出台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之后，至今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颁布了有关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

但是，中国毕竟有着长期的封建文化积淀，“丈夫打老婆天经地义”的观念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仅是普通民众，作为执法机构的公检法部门对于家庭暴力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政策法规要落实到实际生活中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从本书妇女受暴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前我国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还非常薄弱。

首先看公检法机关对待家庭暴力的态度。在传统的认识里，家庭被归为私领域，而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主要是为公领域服务的，所以家庭暴力被排除在司法机关服务的范围之外。从本书的28个案例中看，警察仍然认为家庭暴力是个人私事，警察不应该管。如“我要讨回做人的尊严”案中，王菊芬到派出所求救，警察说：“好像你丈夫打你是应该的。”“两口子打架没法管。”甚至她到派出所避难还被赶出来。这种观点在警察中很普遍，其他

案例中都有类似的描述。我们知道，有些国家规定，警察对家庭暴力报案的出警要优先于普通的社会案件，因为家庭暴力对人身安全的威胁更大，它发生在家庭里，隐秘性强，受害人往往得不到他人的援助，而且，家庭暴力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施暴人对同一受害人反复施暴，受害人有特殊的恐惧心理，更需要警察的及时救助。在反对家庭暴力的世界潮流中，家庭暴力是公害，对妇女的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的理念，已经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认同。

我们在分析本书的案例时观察到，在中国，不仅警察对家庭暴力比较漠视，有些妇女受暴后也没想到向警察报警，本书将近一半的案例中，妇女从未报警，有些施暴者根本不相信打了自己的老婆警察还会管。

妇女在长期的受暴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救助和庇护，而当她们忍无可忍，“以暴抗暴”时，却触犯了法律。本书案例中，法院和检察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基本上没有考虑她们是由于长期受暴才导致的犯罪。如“只把我当做了生育机器”一案中，薛金花想向检察官说说“这十几年是咋过的”，检察官呵斥道：“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杀人这一段！”受暴妇女在这个时候极度的孤独、无助，她们在长期受暴之后还要经历监牢的囚禁。如此的现实使我们思考，如何将社会性别视角运用于反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实践之中，给受暴妇女以公平合理的支持，将是留给司法界的一个课题。

事实上，随着全社会反对家庭暴力意识的增强，我国的司法机构已经率先有了实际行动，如湖南长沙、辽宁锦州、山东青岛等地的公安机关，已经制定了干预家庭暴力的实施办法和行为规范。此外，“下半生我就是残疾人了”一案中警察接到向敏华的报案后，迅速对施暴者实施拘捕；“现在我很幸福”一案中，周笑音离婚时得到了赔偿。

社会支持系统中，妇联、社区、施暴人和受暴者所在的单位，都是重要的支持和干预体系，“我要讨回做人的尊严”中的王菊芬、“离了反而好了”中的胡凤玲、“解脱之后我很幸福”中的周笑音，她们之所以最终能够摆脱暴力，并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条件，当地政府、妇联功不可没，这些案例鼓励我们，家庭暴力是可以干预的，如果相关部门积极为受暴妇女提供帮助和支持，她们的命运可以改变。但是，统观本书的全部案例，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力量表现出明显的缺失和不足。

在分析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时，我们注意到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受暴妇女的娘家和婆家对待妇女受暴的态度耐人寻味。娘家对施暴者的施暴都是容忍、沉默、劝和的态度，即使在明确知道了施暴者的罪行之后，也表现得无可奈何。28个案例中没有一例受害者的亲属主动反抗或者报警。有不少妇女怕给家人添麻烦，并不把自己受暴的情况告诉娘家人。而婆家一方大多是支持、纵容、协助儿子施暴，有的公婆和其他家庭成员直接参与对妇女施暴。两方鲜明的态度差异表明了公众对男权的一致认可，家庭暴力在人们认可、默许、支持的社会大环境中恣意肆虐。就社会支持体系来说，双方亲属都难以向受暴妇女提供必要的保护，妇女可资利用的支持系统之缺乏，由此可见一斑。

（五）妇女不是被动的受害者

很多人在面对一个家庭暴力案件时会问：“她为什么挨打？”（而不是问“他为什么打人？”）人们会列举种种女人该挨打的理由，如懒、嘴不好等等，还会归结为她不自强自立，或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28个案例告诉我们，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实际上，妇女是否受暴，与她们的能力大小没有必然的关系。本书中的王菊芬、杨玲美、于小霞，薛金花，她们原本很勤劳，很聪明，很有勇气，能干出一般人干不出来的事业，是家庭

暴力摧毁了她们的自信，破坏了她们的能力。而彻底摧毁一个妇女的自信，让她变成一个俯首帖耳的工具正是施暴者施暴的目的，也是家庭暴力的必然后果。也就是说，受暴妇女的软弱、怯懦，是家庭暴力的结果，而不是她们受暴的原因。

在暴力摧残中，妇女们仍然没有丧失她们的个人能动性，她们用各种方式反抗，求助、提出离婚，都是反抗的方式，她们最终能够脱离暴力，都是自救的有效结果，她们不仅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还是家庭暴力的幸存者。一旦脱离了暴力，在得到适当援助的情况下，她们的能力会渐渐恢复，她们还会是一个能干的人，或者还能够帮助别人，本书中不乏这样的事例。

妇女们的反抗是艰难的，这涉及产生家庭暴力的社会根源。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绝不是妇女个人造成的，它是社会机制、性别文化机制下的产物。作为个体的受暴妇女，她们没有力量来与存在了数千年的整个社会机制和性别文化机制相抗衡，由社会而产生的问题，必须由社会的力量来解决。家庭暴力是由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和性别文化机制造成的，在家庭暴力的背后，是庞大的社会机制的庇护和支持，妇女的一己之力很难与之抗衡。所以，反对家庭暴力必须有司法的介入，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必须改变传统的两性权力关系，改变传统文化对男女两性的塑造，寻求和建设更适合男女两性健康和谐发展的新的社会机制。

五、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

（一）在访谈的操作过程中，我们根据口述访谈的国际通用规则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原则，其中一项是获得叙述人对她们所述资料使用的授权许可，还有姓名的使用权，不少叙述者表示愿意在本书出版时使用真实姓名，但是，为了避免给她们的子女和

亲属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在最后的编辑中一律改为化名。

(二) 为了帮助读者更全面地认识家庭暴力，我们在每个案例后面加了点评，虽然每个案例都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涉及多处家庭暴力的理论点，但每个点评集中在某一点上，全部点评汇在一起，可以互相补充。

(三) 我们要郑重地向所有接受访谈的妇女表示真挚的感谢。没有她们，就没有这本书。回忆痛苦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叙述自己的受暴经历，无论对多么坚强的女性都是一次精神的历练。正是她们的泣泪诉说，公众才有可能读到书中展示的内容，她们以自己特殊的实际行动为中国的反家暴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宋美娅 薛宁兰
2003年6月

目 录

总序	余孟孝	(1)
前言	《反对家庭暴力理论与实践》丛书编委会	(3)
导言	宋美娅 薛宁兰	(7)

一 “以暴抗暴”，不仅仅是妇女的悲剧

1. 出狱后我能去哪里		(3)
点评：一个被发现的事实		(10)
2. 我对他的心已经死了		(13)
点评：维护男权利益的旧观念太害人		(27)
3. 只把我当做了生育机器		(29)
点评：家庭暴力是男女不平等的极端表现		(54)
4. 我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		(56)
点评：受暴妇女为什么会走上杀夫之路		(64)
5. 忍到最后还是杀了他		(66)
点评：冲出传统父系思想的禁锢，提高社会性别意识		(79)
6. 杀了他我就没想活		(81)
点评：暴力初期，离婚是摆脱受暴的有效途径		(92)
7. 我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94)
点评：丈夫为什么要对妻子施暴		(111)
8. 真不知道我挨了多少打		(113)
点评：家庭暴力的循环周期与受虐妇女的正当		

- 防卫 (129)
9. 要是现在，我就不会杀他了 (132)
- 点评：社区，是遏制暴力的第一道防线 (138)

二 离婚，是摆脱受暴的有效途径

10. 离了反而好了 (143)
- 点评：生活可以重建 (162)
11. 我失去的只是锁链 (165)
- 点评：家庭暴力，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家庭 (175)
12. 没想到教授也施暴 (177)
- 点评：男人为什么要施暴 (190)
13. 地狱里走了一趟 (193)
- 点评：发现所爱之人有施暴特征，要快快离开 (206)
14. 最终还是了断了一切 (208)
- 点评：曾相爱的婚姻也会出现暴力 (216)
15. 房子与尊严 (218)
- 点评：你可以这样解决房子问题 (228)
16. 解脱之后我很幸福 (230)
- 点评：一个成功的干预案例 (238)
17. 他到底是个甚人哩 (241)
- 点评：家庭暴力不会因离婚而停止 (250)
18. 从暴力和伤感中挣脱 (252)
- 点评：家庭暴力离我们并不遥远 (261)

三 暴力还会摧毁整个家庭

19. 让我的牺牲给他人一个警醒 (269)
- 点评：不该由他们付出代价 (278)
20. 就因为我生的是女孩 (280)

- 点评：警察干预家庭暴力至关重要 (288)
21. 活着受罪就想死 (290)
- 点评：暴力是诱使妇女自杀的重要因素 (297)
22. 咋遇上这么个姑爷 (300)
- 点评：政府机构的失职 (309)
23. 儿子，再婚不是你打我的理由 (311)
- 点评：法律保障父母再婚的权利 (319)

四 站起来，创造美好生活

24. 我要讨回做人的尊严 (325)
- 点评：妇女权利与能力增长的内在和外动力 (348)
25. 一忍就是三十六年 (350)
- 点评：她为什么忍耐 (368)
26. 发生在警察身上的家庭暴力 (370)
- 点评：暴力有其自身的规律 (397)
27. 后半生我就是残疾人了 (400)
- 附：他为什么对妻子下毒手 (409)
- 点评：施暴者的悲剧 (420)
28. 在焚烧中幸存 (423)
- 点评：暴力对妇女的伤害究竟有多大 (442)
- 专家评估意见列表 (444)
- 后记 (446)
- 反对家庭暴力理论与实践丛书目录 (448)

—

**“以暴抗暴”，不仅仅
是妇女的悲剧**

1. 出狱后我能去哪里

叙述人 肖平
访谈人 宋美娅
访谈时间 2002年3月8日
访谈地点 湖南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 宋美娅
文稿编辑 宋美娅

肖平，1953年出生，湖南湘乡县的一位农民，小学五年级文化。1988年12月24日，她用一把割猪草的刀杀死了丈夫，1989年初，当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她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在我去访问她的时候，她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13年。湖南女子监狱教育科的田科长陪同我会见她。

“报告！”这个声音很响亮，感觉训练有素，我和田科长同时转向房门的方向，“进来”，田科长说。门被推开，一个穿着犯人服装的女人规规矩矩地站在了门口，腰板儿尽量挺得很直，她的头发花白，脸上皱纹纵横，饱经风霜似的。“她就是肖平。”田科长向我介绍。初眼看，我以为她是位老年人，后来才知道她还不到50岁，岁月在这个女人身上留下了太多的辛酸和磨砺。她说的是浓重的湖南地方方言，我努力倾听。

问：我很想知道你和你丈夫之间发生的一切，你能给我讲点儿什么吗？

肖：我到这里面来已经 13 年了，好多事情都忘记了。我丈夫叫周克明，是我外婆家的邻居给我介绍的，我们 1975 年 8 月第一次见面，3 个月后就结婚了。当时不了解，也没什么感情。结婚后知道他懒，什么也不干，一天就是喝酒、出去赌博，回来就骂，他骂我不做声，还不高兴就要打我，我看他拿刀就跑，往邻居家跑，邻居赶快把门关上，把我藏起来。有时候邻居拉他，拉不赢，他蛮狠的。

问：他就是对你一个人这么狠吗？

肖：不是，他也打细伢子。我的大妹子（女儿）3 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地里干活儿，天快黑了，还差一点儿没有干完，我想干完了再回去。这时候，邻居跑来叫我：“你快回去吧，你家细伢子跪着，她爸爸要杀了她。”我急忙跑回去，孩子见到我哭都哭不出声了。就是她爸爸让她去择菜，她还没有来得赢去，她爸爸就打她了。孩子好怕他，大妹子 11 岁时，不小心割破了手，我把衣服撕破给她包手，孩子都不敢回家。

问：你在生孩子的时候他照料你吗？

肖：没有，一点儿没有，他没有烧过一碗饭，也没有倒过一杯茶，他从来不做事，什么都不做，反正一天就是吃喝玩乐。我坐月子都是娘家来人伺候，他心里好不喜欢。

问：他是不是嫌弃你生的是女孩子？

肖：生大妹子时没有明确说，就是不让我们吃喝。怀第二个孩子时，都要生了，他还打我，我都跑不动了，他追着我打，拿一块大石头打破了我的脸。我想，这个孩子我不生了，怕生下来又是妹子，我就不得了了，我好担心啊。我不吃饭，想把孩子弄掉，他不肯，他让我生。我去找村长，让村长给讲一下，不要让我生了。村长说：“不管是什么，你都要生下来。”我说：“我跟他没有好日子过，不想生了。”村长说：“他们家几代都是一个崽，你还是要生下来。”我只好听了，没办法，生下来又是个妹

子。我生了两个妹子，他从来不抱。二妹子一岁多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分田到户，也是要出工的。妹子得了病，不吃饭，我要出工，就把孩子放在邻居家，邻居不给我看，她说：“你孩子有病，要去看，不然她会死的。”我回家和丈夫商量，他说：“看什么病？不要管她，她是来讨债的。”孩子才一岁多呀，我没有办法，把孩子抱到我娘家，那里有个好大夫，蛮会治这个病。大妹子5岁多的时候，有一次在院子里玩儿，一不小心把腿摔断了，70年代经济困难，他说：“随她去，不要管她。”我只好又到娘家去，借点儿钱请医生帮着看。他从来不顾家的，家里有一点点粮食就去兑酒，每次喝完酒就打人，我们没饭吃就东借西借。

问：二妹子他也打？

肖：打！都是一样，要不我也不会到这个地步。离婚离不脱，我所有的亲戚都让我离，我自己拿不定主意，一个是舍不得细伢子，怕细伢子遭孽（罪）；二是在我们那个时候，硬是要几年几年才能离得脱！

他从来不抱孩子，每年回娘家要走七八里路才有车坐，只有我一人抱。有一次，春节期间回娘家，那一年好冷好冷啊，我们等车，把细伢子（二妹子）冻得好冰好冰，我看一个房子里有炉火，我想让孩子去烤一下，他又骂我，从后面赶上来把我摔在地上，一把抢走孩子，像扔一个东西一样扔走了。我爬着过去抱起来孩子，孩子满脸流血，他还是骂。每次我说给孩子看病他都骂，说这样的孩子他养不起。大妹子6岁时，把手摔断了，她说：“妈妈，我要去看病。”他说：“看个鬼！”孩子摔坏了，他还骂她。我只好向邻居借钱。回家他又吵，问我哪里来的钱，“你的钱没地方花了”？我说：“你讲点良心好不好，医生说她摔断了骨头，是不是要去看？”他说：“你自己去想办法，我不会给你钱的。”我们的钱都是他拿着。

二女儿一生下来他就说是讨债的，他不管。生下来二女儿8

个月，他去参加修铁路，几个月不回来，我自己也病了，几天没吃饭，奶干掉了，以后就给她喂面糊，所以孩子总是有病。

问：他把你打伤过吗？

肖：打伤过。1976年，刚生下来大女儿不久，他把我的手打断，动都不能动。那一天要下雨了，我说稻草干了，要把它担回家，他不去，说了他两句，他拿起扁担打在我手上。他打人都要拿东西。有一次他打我，我躲在邻居家，我的大妹子跑过来说：“妈妈、妈妈，你快跑，我爸爸在家磨刀，要杀你！”我赶紧跑，这时下午5点多，天都黑了，我跑到娘家屋里去躲，这是又逃掉一次。

都几十年了，事情都记不太清了。还有一次，为什么事记不清了，他打我，口口声声要杀死我。我跑到村长家，他赶到村长家，他说：“今天不是她死，就是我死。”村上的人都来了，他父亲也来了，骂他儿子。当时我躲在村长家的厕所里，好怕呀！

问：你这次出事也是和他打人有关系吧？

肖：这次出事是在1988年12月24日，他在外面玩了几天几夜没有回来。

那时，我们公社出了一件事，有两口子打架，丈夫把妻子打死了，男的自己也自杀了。我丈夫他去看热闹了，几天没回。看完热闹回来是这天夜里十一二点了，我没有睡，听见单车铃响就晓得是他回来了，我心里有气，他叫门我就没有开，他一脚把门踹开，一进来好大的脾气，他骂着：“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老子今天要杀掉你。”我怕得要死，不敢做声，怕惹怒了他，不做声他会消些气，他却照样骂：“老子今晚就是要杀掉你，我不怕王延枝——王延枝是公社管政法的，别人杀得堂客，我也杀得你。”他在屋里转了两圈，又说：“我的刀不快，我去杀猪的家借一把来。”我们邻居有一个杀猪的。说着，他就出去了。

我想，我往哪里跑呢？别人都睡了（平时都往邻居家跑），

我看看外面，外面没有亮灯的。这一天停电，我想开灯，也没亮。我赶紧跑到厨房，想把菜刀藏起来，我怕他拿走了。怎么没摸着呢？晚上切完菜明明就放在那里了，我记得明白，怎么到处摸没摸到。我突然想起来睡房的柜子上放了一把割猪草的刀，我又赶紧回去，伸手摸到了。正在这个时候，他又进来了，还是骂骂咧咧，他向我走过来，我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刀，看他走近过来，我就伸手砍了一刀，砍完就跑了。

跑到田埂上，我藏在田坝下，想看他是不是追上来，躲了半个小时，看没有什么动静，我就明白只怕是出事了。我又悄悄回家，偷偷把我的单车推出来，我晓得我要坐牢了。到了乡政府，这时是半夜，我喊开了门，告诉说“我杀人了！”乡政府说：“你坐着说。”又问我话。

这一天半夜里离开家，我就没有再回去过。

问：你走的时候，你的孩子们是个什么情况？

肖：大妹子那时 13 岁，二的 10 岁，三的是儿子，才 3 岁，儿子是 1985 年生的。我好牵挂他们啊，晚上睡不着觉，挂念他们，怕他们受欺侮，想起来他们心好疼！

问：生下儿子的时候你丈夫高兴吗？

肖：高兴是高兴，还是不做事，一样的，到外面赌博，家里的事一样不干。儿子他还是蛮喜欢的。

问：你走了之后，你的孩子谁照料呢，你有婆婆吗？

肖：我没有婆婆。我丈夫 17 岁的时候他妈妈就去世了，他只有父亲，从小娇惯坏了，他和我闹脾气时，我就想他从小没妈，就不和他计较。他和他父亲关系也不好，20 岁上就和他父亲打打闹闹，也是扯皮吵架，不听他爸爸的话，他爸爸叫他他都不去。我走了之后，村上给孩子们吃了幼保，随他们爷爷过。他们爷爷 1994 年死的，我丈夫的妹妹就嫁在本村，孩子就到她屋里住。我娘家远，我的父亲是继父，虽然继父好，但我不想丢负

担给他们。

问：你进来之后，你的孩子是不是常来看你？

肖：1994年时看到过一次，二妹子来的；1997年的时候大妹子来了；前年3月，三姐弟都来了，就看见过这么3次。

问：他们见到你的时候叫你妈妈了吗？

肖：没有，不叫。我都不认识他们了，离开时儿子3岁，再见时他15岁了，长好高的个子。连二妹子都不认识了，他们也不认识我，认都认不得，不会叫我妈妈的。我也不怪他们，难受是难受，可我没有抚养他们，怪不得他们。我出事之后，大妹子就没再上学，二妹子当时读三年级，只上了一年学就不上了。儿子好可惜，成绩好，一直读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二名。初中以后抚养不起了，就不上了。这是他爷爷写信来说的。

问：孩子的爷爷怪你杀了他儿子吗？

肖：没有，他不怪我。我在湘乡看守所的时候，他去了一次。1988年12月24日那天晚上我报了案，第二天就把我送到湘乡看守所。一审给我定了故意杀人罪，判的是死刑。看守所的干部晓得我的案子，他们让我上诉、写材料。我说不晓得写（不会写的意思）。他们说，就把你结婚之后的经过写一写，首长挺好的，你写了让首长看一看。我就写了，交给了看守，他们给了首长。后来他爷爷来看我时，说我的案子有改变，不会判死刑了，二审改成了死缓，判完我就到这里来了。

问：你在这里13年了，这13年是怎么过来的？

肖：政府关心犯人，三餐饭有吃的，我娘家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几年来一次，叫我好好改造，早点儿回去。我在这里面平时不给人多讲话，妇女们在一起总是说些家常话，别人问起来你家里怎么样，我说起来心里不好受，提起来伤心，我就不和她们说蛮多话。

问：为什么伤心；是把他杀了伤心吗？

肖：不是为他，是为我自己。在这里面这么多年，在这里也受气，这里面的人思想蛮复杂的。也为细伢子伤心，小小年纪没了爹妈，没有家。

问：13年中你都不多讲话？

肖：这里的人出出进进的，各有各的事，不讲话她们也不注意你。

问：你的刑期还有多长？

肖：到2006年。想到这里也伤心，我不晓得回去该怎么办，我不想再回到那块土地上了，没得意思。哎！不敢面对那些人了，孩子们倒没有怪我，女儿原来写信说不怪我，但究竟还是我的过错，是我造成的，还是我的过错！

女儿对我也不是蛮亲，去年我娘家大妹妹来，说大女儿在闹离婚，我听了心里好难受啊，想写信去叫她们来一趟，又不晓得她们的地址。

问：等你出狱的时候快到老年了，你准备怎么生活呢？

肖：我没有家了，没有地方住。我的房子是泥房子，十几年没人住，早就不行了，儿子现在在外面流浪，不晓得在哪里。爷爷的房子也是泥房子，也不行了，他没学上之后就四处流浪。我老了不会靠他，我没有抚养他。想到这些，我经常睡不着觉。

问：那你靠谁呢？

肖：我不知道。如果从这里出去，我都不知道往哪里走，我这样的情况（杀了丈夫），是没有法子再回去了……

（肖平的眼睛盲无目标地投向外面，眼光茫然、无奈、迟钝，又夹杂着疼痛已久后的木然，好像是看到了她飘零无所依的晚年。一缕白发滑落下来，斜在她眼前。）

问：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么多。

肖：谢谢你们，还关心我。

点评：

一个被发现的事实

宋美娅

肖平的案子，使我想起台湾一本著名的中篇小说，小说的名字叫《杀夫》。

《杀夫》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40多岁的杀猪屠夫陈江水，娶了20多岁的女子陈林市为妻。新婚之夜，陈江水就开始了在林市残酷的凌虐，从此，陈江水随时随地都会把林市摁倒，施行性虐待，日日不放过。林市尝试过反抗，但只会招来陈江水更极力、更持久的折磨。有一日，林市买了10只小鸭子养，她想用鸭蛋去换米，以免去饥饿的恐惧，陈江水把这些小鸭子碎尸在鸭笼。不久，陈江水果真不再给她带任何食物回来了，不给她饭吃。为了有饭吃，林市到处找活儿做，但人人都怕陈江水，不敢用她。陈江水强行把她带到了杀猪灶，说那里有活儿做。林市怕杀生，直挺挺昏倒在猪灶。在一个月光明朗的夜晚，陈江水又一次对林市施暴，并说要杀死她。林市用她在猪灶上看到的杀猪的方法，杀死了陈江水。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它描写出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给读者一种特别的印象。

这篇小说1983年发表在台湾《联合早报》上，当时引起了正反两方面的极度争议。这篇小说获得了1983年《联合早报》中篇小说金奖，女作家李昂由此成为当时台湾最受瞩目的小说家。

当时争议的内容今天已不知晓，推想大概是围绕着对妇人杀夫事件的不同评价。实际上，针对妇女的暴力久已有之，而且还非常严重。李昂在《杀夫》的前言中说，小说的素材来源，是她

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妇人杀夫的新闻。但是，人们对丈夫打老婆的事视为自然，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对妇女施暴是被允许的。有关打老婆的民谚各地都有流传，“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等等，广为人知。所以，尽管家庭暴力就发生在人们的身边，但人们已经习焉不察。小说通篇没有暴力的字眼，包括后来的评论，如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评价：“《杀夫》非常复杂，写人性的不可捉摸。”可见家庭暴力的概念当时还不被人们所熟悉。

肖平的事件正是发生在这段时间，我们从文中看到，有一位妇女死于丈夫的毒打，虽然男的自杀了，但改变不了他对妻子施暴的事实，但没有人制止他，也没有人为此报警。肖平在恐惧的心理中对丈夫挥刀，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在当时，丈夫杀死妻子，并不被人们认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肖平的丈夫口口声声要杀死她，肖平相信他说得出，做得到，站在国际背景中来看反对家庭暴力的历程，其他国家也经历了对家庭暴力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比如在瑞典，有人称家庭暴力是一个“被发现的事实”，它本来就在那里存在着，但需要我们发现，而发现需要新的视角和新的评价。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社会逐步掀起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浪潮，对妇女的暴力问题，成为国际人权领域后来居上的关注事项。’95世妇会，把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列入到12个关切领域之中，此后，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日益受到中国政府各级组织的关注，并引起妇女学界、法学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的逐步重视。

现在，涉及家庭暴力的国际公约有：

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

1991年《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

1995年《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肖平，这个像小草一样不为人知的受暴妇女，恰恰经历了这段时间，这正是她受暴、入狱并在狱中默默度过十几年的时期。狱中不知外界事，对于妇女来说，这十几年的发展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再也不会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沉默。

2. 我对他的心已经死了

叙述人 刘惠兰
访谈人 张捷明
访谈时间 2002年3月8日
访谈地点 湖南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 张捷明
文稿编辑 王涛

刘惠兰，28岁，农民，小学文化程度。婚后1年多的时间，被丈夫残暴地殴打5次。两次怀孕都被丈夫用皮鞋踢流产。绝望中，用菜刀等凶器将丈夫砍伤。被当地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我生在农村。16岁时，初中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出去打工了。那时我在广东打工。厂子效益不好，不太理想，我就跳槽，去了几个地方。我们那里一般都是招工去的，一招工，就是几十个姐妹一起去。21岁的时候，自己谈了恋爱。父母也没反对，后来还是因感情不太和分开了。分开后，我的感情还是受到一点儿挫折，有三四年再没有接触情感的事。我是家里最小的，哥哥姐姐都成家了。妈妈那时到处为我找婆家。一直到24岁那年，我妈妈经媒人介绍帮我找了一个婆家，让我回来看一下。这个男的高高瘦瘦的。我妈妈说：“你身体比较单薄，农村重活比较多，找一个高大一点儿的比较好。”我说：“妈妈你看着同意了，我也就同意了。”我只是初次见面看了这个人，对他的秉性一点儿都

不了解。我又回到厂里去做工，以后我们就通信。

媒人介绍的时候讲，他十四五岁时父母就双亡了，没有什么更好的家教，人还是聪明。我妈妈讲：“在农村，暂时困难一点儿不要紧，只要人聪明，能赚到钱就要得了。”我从小到大就听我爸爸妈妈的，好乖的，是一个乖女儿。我说：“妈妈，你和姐姐帮看的，如意了，我也就那个了（指同意）。你们是过来的（人），有眼光，我相信你们。”后来他和媒人（都）只是讲，在1990年的时候，他与人打群架在看守所呆了两个月。那时我就想：那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他在里面也受到了教育。我不在乎他以前，以后能好好做人，就要得了，不要像以前到处流浪啊。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骗了我。他并不是打群架的事，他是抢劫。后来结了婚才知道，他被判了7年。1990年坐牢，坐满7年，27岁回来的。我领了结婚证回去时，听他二嫂讲，才知道他坐过牢。因为那时我很少去他家里，邻居也不会对我讲这样的事。我妈妈也不知道。媒人跟我姐姐很熟，就相信媒人说的话了。

我那时25岁，他28岁。后来我就（从广东）回来了。我们恋爱有四五个月的时间。恋爱期间，他表现得很好。比如：我帮我妈妈做事，他就抢着做，让我休息。没有感觉他有什么恶习。他打牌赢了钱就买点儿东西，就是这样的。我妈妈心急，说：“你们都到了已婚年龄了，不拿了结婚证，到时候怀了孕，还要去流产。”我妈妈心疼我，怕我痛苦。

那个媒人跟我妈妈讲：他爸爸妈妈以前也是吃国家粮（指城镇户口），有工资的，他们去世的时候留了六七千块钱给他安家。那时我就想，两个人也没有好大的负担。我打工时我妈妈又没有用过我一分钱。我从16岁就出去打工，虽然厂子有时效益好，有时效益不好，但是我也存了三四万元钱。这在农村比不得上，比下还是说得过去了。当时我就对他说：“不要按一般农村订婚、结婚前那些手续，反正你也没父母了。”媒人也讲：“你们两个人

只要同意了，就不要讲那些场面了。以后有钱也是你们两个人的，没钱还账也是你们两个的事。”我也是这样想的，就简简单单的。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一分钱也没有。而且他在外面还欠钱。媒人跟我讲他有一栋房子，后来（知道）还是跟他哥哥分的。他哥哥他们建了房子，我们还要出钱买他哥哥这边的房子。

那时已经领了结婚证，买家具呀什么的都是我掏钱。没办法，看（他）拿（指买）这个也没钱，拿那个也没钱。而且，还有人来家讨账的，那是以前他在外面赌钱，欠了别人好多账。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刘惠兰几乎一直在流泪）

（他）第一次打我，是在定了婚期装修房子的时候。（装修房子）也是我自己拿的钱，不就是为自己争面子嘛。我们那儿的女孩子结婚好幸福的，女的要买什么，男的就拿钱。我这样想：命运让我找了这样一个人，我不能让人看笑话，自己吃点儿亏。别人问起来，我也说（钱）是我老公的，不能给我自己丢面子，也不能给我爸爸妈妈丢面子。那时，我就拿了千把块钱让他去装修房子。把这房子装修一新，虽然婚礼简简单单的，但还是要把房子刷得白一点，漂亮一些嘛。可他就拿了这千把块钱不清工，拿去赌钱了。

那天我就问他：“搞装修的怎么还没有进屋哩？”他说：“快了。”后来一拖再拖，我没办法就自己去问那个（装修的）人，那装修的人说：你丈夫没跟我讲（装修的事）。他一天到晚打牌到半夜三更都不回来。我就问他：“钱到哪儿去了？”他说：“你嫌我穷啊，嫌我无能啊，去找个有钱的啦。”两个人就这样争吵起来，他用凳子从我的头上砸下来，血就流下来了，我就昏倒过去，不省人事了。

打了之后，他也不理（管）我，后来他嫂子进来了，我也不知道。我醒过来的时候，头已经包扎好了。我好伤心，好绝望。

事后，他搬动他姐姐、姐夫、哥哥、嫂子都来做我的工作，说了好久。那时，他也跪在我面前，（让我）给他一次机会，说以后永远不再去赌，也不会对我再动武力了。他还写了保证书给我妈妈。农村有一说法：“好女不嫁二男”，我就这样想：已领了结婚证了，我命运让我得到这样一个人……

我是自尊心害了我自己，为自己的面子害了我自己。当时，我还是一心地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我就（又）拿我的几万块钱，去买摩托车、彩电、音响、组合家具、床上用品，全都是用我自己的钱。别人结婚热热闹闹，又敲锣又打鼓，请好多客人。可是我们为了节省钱，他那边也没有父母操办，简简单单地把我的嫁妆拖过去了。我也想就是两个人嘛，简单一点儿，也不要讲那个太大的排场了。

我第二次被打，是在结婚（办完结婚仪式）后。

结婚前他也是在一个乡镇企业里上班，结了婚他就不去了。我们是住他爸爸的房子，但是和他哥哥一家住一半。他们住两间房子。结婚后，他老是在家里租碟子（影碟）看，唱卡拉OK，要不就是出去打牌。我毕竟是一个女人，老是为家里着想，想让他到外面赚点儿钱。手头的死钱不经用吧，以后我还要生小孩子，小孩生下来就又多一个人的开支。他老说外面找不到事做。我说：“你连出去都不出去，人家找事（给）你来做？现在找饭吃的人多的是。”他嫌我啰嗦，天天跟我吵：“你现在才晓得我无能啊？你现在才晓得我找不到钱啊？你去找个有钱的大老板啊。我没有强求你，你远走啊。”我说：“你怎么这样，我也是为这个家好。”那时候我已怀有三四个月的身孕了。生活也不是很好，一日三餐就是清淡的菜。心里就着急了。

后来，他哥哥搬出去了，等于我们还要出钱买他哥哥这一半的房子。他哥哥两间房子要5000块钱，他也同意。实际上他没

钱，还做出很大方的样子。我就插了一句：“这两间房是好老好老的瓦房，哪值 5000 块钱？”他就因为我插了一句，又打起来了。揪我的头发，拳打脚踢，他一个大男人……当时我怀孕了也不敢太（挣扎），他穿着皮鞋，一脚踢在我肚子上，当时就出血，孩子就流下来了。

（此时，刘惠兰已哽咽得无法继续叙述。我默默地递给她纸巾，真有些不忍再让她说下去……短暂的沉默后，她叹了口气，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不管在家受多大的苦，有多大的委屈，回去（娘家）也不敢对我妈妈讲。他打得我这里青一块，那里肿一坨，全身都是青肿的。我在家里把这些伤养好了，青肿都消除了，我才回我妈妈那里住两天，但是我不敢对她讲我在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多大的苦。我妈妈很心疼我们这些孩子的，舍不得我们在外面受一点儿苦、一点儿委屈。我从小到大她没有说过我一句重话，一向晓得我很乖，挺听她的话。我也很疼我妈妈。我姊妹 4 个，我最小。

我也从来不敢对别人讲我老公怎样虐待我。因为我很爱面子，怕别人笑话我。好像自己好无能，自己命很贱，嫁一个这样的老公。再一方面是我嫂子嘴很厉害，经常和我妈妈吵，说我怎样怎样。我第一次有过一个男朋友，她就说我今天这个野老公，明天那个野老公。其实，那时我已 21 岁了，也是正当谈恋爱的年龄。但她硬要这样说我，我也没办法。就因为我嫂子这样的脾气，我才一忍再忍的。我就一个哥哥，下面是 3 个女孩子，我爸爸妈妈也很疼他。她是嫂子，对小孩子来讲她是舅妈。我们都去了（指回娘家）以后办酒席啊，都要求她，都要靠她，她好像高高在上一样的。我们处处都要让着她。在农村里就是这样的。嫁到婆家，有时婆家出什么事，可以搬动娘家的人。农村里娘家人雄壮一点儿，嫁出去的女人也好过一点儿。我从小到大自尊心很

强，不想让别人看笑话。

（所以）我受多大的委屈，多大的苦都不对任何人讲，全部压在心理面。我也不到家里哭，也不到家里闹，受伤了就躺在床上自己休息一段时间。但还要做事，不做事他说我好吃懒做。他出去打牌，一日三餐要给他做，要洗衣服。我们是农村还要种菜。他们（家）有田地，种点儿蔬菜，饭还是有得吃。地是我（管理），他一天出去，上哪里找人？找都找不到。（这些活儿）反正挑不起来也要挑啊。

那次他打得我流了产之后，还说我是因为以前在外面与男人搞多了，怀不了孕了，到他身边装什么可怜相啦。我说：“你也不出去赚点儿钱，全部让我去。”他说：“你去赚钱，你赚的什么钱还不晓得哩？到外边搞多了，来到我身边，连怀孕都怀不起来了，你还好意思讲，你去死。”我说：“我赚的什么钱，你不晓得，你去调查。”

我当然气不过了，我从16岁就出去一直到24岁，我们那时是在服装厂，明明是从流水线上一针一针的，天天加班加到（夜里）十一二点钟，一点儿一点儿赚的钱啊。要是到外面去卖淫，搞什么不正当的，也不止挣这三四万块钱。我用这点儿钱也不会心痛的了。我们那儿是邻居挨邻居的一个村庄，自己老公都这样讲，别人还不知怎样讲。我以后还做的了人吗？

他又一次打我，可能是打牌打输了，心情不好，我说了他两句。

那天是中午，当时他拿刀去切菜。我看见他那样心里也不舒服，很有气。我在那儿喂猪，告诉他，猪好像生病了。我就讲了几句，他本来心情烦躁，我往外走，当时他也没做声，就把刀扫过来，一下那个刀就落在我的腿上，我就跪下去了，血从腿上流下来。他说：“你还讲，老子砍死你！”我就不敢哭，不敢说了。

我知道我拼不过他的，自己心里流血。他这样的人，也没有人敢进来劝他。我平时怕刺猪草时伤了手，自己买的云南白药。我自己用布搽云南白药，止不住血。后来他嫂子进来就把我带到医院里了。有五六寸长的口子，缝了五六针。

（有人）悄悄告诉我妈妈：“你么女两口子又打架了。”我妈妈着急得饭都没吃就赶过来，看见我腿上一道口子好深的，就说他。他（对我妈妈）说：“你出去，凭什么跟老子说？”“你养的好女儿，你女儿是什么样的人？”我妈妈说：“我女儿哪里不好了？她16岁就出去赚钱，我都舍不得用她一分钱。只要她过得幸福，我吃点儿苦也没关系。我这个女儿为谁养的？”他就把我妈妈一推说：“你出去！你给我出去！不要坐在我家里。”就把我妈妈推出去了，我妈妈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后来，邻居也看不过了，他哥哥嫂子也过来说他了。好多人说他。村上的人都来了，做他的思想工作。村委会也来做他的思想工作。

那时，他们（指村上的人）让我到妇女协会去讲，我想是家庭的事，没有去。他买些东西到医院里来看护我，（显得）诚意的样子（每次他打了我都向我保证），又当着医生的面，跪在我床边哭，哭得好伤心，说：“我后悔了，是一时冲动，我打牌输了，心情不好。如果以后还对你动武力，就随便你怎么样。没有这个权利去勉强你了。我只有你了，除了你我没有什么依靠，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很伤心，（开始）我也没理他。他一个人在那儿说了好久好久。我又一次心软了。毕竟是一个家庭，没必要把他搞得怎么样，我自己也没面子。我还没想到和他离婚，我想我作为一个妻子，是不是做得还不够。我没有说服力，说服他从一个浪子变成一个正常的生产者（即劳动者），去赚钱，去为家，去照顾妻子、照顾孩子。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虽然口才不好，但我希望用我的实际行动去感化他。

自从他砍了我腿之后，他也变了好多。在家里什么事也不用我做。

我不想再出去打工，干得太辛苦了，老在外面漂泊的生活。有了家，就想在家里和睦温暖地生活。他这次变了好多，我又一次被他感化了，以为他是不是真的变好了。既然两个人都不喜欢出去打工，就想在家里搞养殖业。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乌鸡的医药价值很高，就跟他商量，家里有一块空地，（能）养殖乌鸡。他那时也很少出去打牌了。他答应了，有心与我合作。我取出1000多元钱，又把金项链、戒指卖了800多元钱，建了院子，买了100多只鸡苗回来。（但）两个人没有什么文化，不懂得药物配制，慢慢鸡苗死了一半多了。当时我们进了150多只鸡，就剩下四五十只鸡了，再后来就剩下三四十只了，也没找出原因。亏得太多了，我就丧失信心了，换养土鸡，成活率有70%。虽然很辛苦，心里还是感到欣慰。后来销路不好，又泄气了。

我们的关系缓和过，就是共同养鸡的这段时间。从结婚到养鸡这段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打过我四次。

我第五次被打，是在共同养鸡这段时间过后。

这时，我手头还剩万把块钱，我就与他商量在空地上建两间平房。我们住的是他爸爸留下的老房子，他哥哥那边的房子没有要。我想，盖两间新房子，把钱花完了，他也就想着出去打工了。建房，我手头的钱不够，还欠几千块钱。我妈妈看我自己能建房了，很支持我，把她的1000多元养老钱给了我。我还在我姐姐那儿借了几千块钱。我让他到他家兄妹那儿借点钱，他说这个姐姐生活困难，那个哥哥孩子要读书。我也不勉强他了，只有靠我们家这边帮忙。当时，钱付得基本上差不多了，还差几百块钱的（盖房人）工资。其他就是还欠我妈妈、我姐姐的。我们家是看我能做大事，建房子了，就鼎力相助。

那一年我妈妈刚好 60 岁。我以前也没孝敬父母，我打工时往家寄钱，他们也没舍得用。她说：“你过得幸福，我心里就舒服了，你幸福我们也幸福嘛。”我妈妈 60 岁做大寿，我想我妈妈养我也不容易，毕竟还帮我这么多，她也没有享受过我的什么。人生有几个 60 岁？她不需要我买什么，只要我们俩高兴地去就行了。但我做女儿的不可能空着手去，我觉得欠我妈妈太多了，就跟他商量，给我妈妈买一套衣服。他不答应。那次，我就拿出主动来了。我说：“你愿不愿意，反正我跟你说了，跟你商量了，就是尊重你了。”我就拿了 300 块钱，到县城里去给我爸爸妈妈一人买了一套衣服，还买了床电热毯，老人家冬天冷。我不敢拿回去，我知道我老公性格，免得两个人吵架，就直接送到我妈妈家里去了。后来他问我这钱哪儿去了，我告诉他，我给我爸妈一人买了一套衣服和一床电热毯。他就发脾气了。真是凑巧，我那时又是怀孕 3 个月了，都是我妈妈给我买营养品给我调养身体。就因为这个事又打一次啊。

因为我给我妈妈去祝寿，就是给我妈妈买了一套衣服，他就不高兴，在家里发脾气。我毕竟是一个人，我也有脾气。我全心全意地为这个家付出。这次是我妈妈 60 岁大寿，亲戚朋友都去祝寿，何况我是她的亲生女儿。他说：“现在家里困难，尽孝心也不在这一时三刻了。以后日子还长，现在又是借来的钱，讲什么排场，尽什么孝道哩？借来的钱还这么浪费。”我顶他：“这算什么浪费了？你说清楚了，给我爸爸妈妈花，怎么浪费了，你不穿衣服了？”

这样我们就吵起来了，他又打了我。他一动就出手好重的哩。他说我越来越嚣张了。以前他叫我不哭，我就不敢哭了。这次我顶他了，他就气不过。那时我一向喜欢留长发，他就抓起我的头发，从房里一直拖到客厅（当时新房刚刚建好，还没有装修），他一向穿着皮鞋对我拳打脚踢。我也不晓得他是什么样的

人，从来不知道心疼我。（这会儿）他明明晓得我怀孕了，我肚子里怀的毕竟是他的骨肉啊。一脚就踢我肚子，打我的脑袋，好像要致我的命。我好伤心，我流血流了几天，他对我不闻、不问、不管。我肚子疼，他自己搞（做）饭吃了就出去了。第三天小孩子又流下来了。那时我就很生气。他这么不注重我，不注重小孩子，不注重我的劳动成果，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他说我赚的钱不是干净的钱，把我小孩打下来，还说我在外面搞（男人）多了，怀不起了。我觉得好气啊！也没去理我身上的小孩子，让血随便地流。（直到）血流得我自己受不了了，自己到医院里去清（刮）宫，我这条命不知道是自己怎么挺过来的。

那天我清（刮）宫后回来，他也不问去哪里，不问我怎么样。我回来后自己炒点儿米粉吃，他做他的（饭）吃了。我也没有和他讲话。他还是不问我去哪儿了，就是不问。我也懒得告诉他了，我对他彻底绝望了。不知道是不是身体不好的原因，我吃了碗粉不到两三分钟就大吐特吐。他也不管我，在那里看电视。后来他看我吐得很厉害，实在过意不去，拿毛巾、倒一杯开水给我漱口，我也没理他，就躺在床上。他看完电视可能有晚上11点多钟吧，也不问我，一下子（就）睡着了。我一直睡不着。我想我这样地为他付出，老是想用我的行动去感化他，他是铁石心肠也（应该）会感化。我怀两次小孩子，他就这样打下来，一点儿都不留情。我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睡不着。我心里很烦躁，想起从谈恋爱到现在，我对他的点点滴滴，我每次被打的心情……我总想感化他，一次一次给他机会，他一次一次得寸进尺，根本不把我当人看。每次打了我之后都写保证书，一点儿不心疼我。我彻底失去信心了，绝望了。

我心里这么痛苦，他（竟）能心安理得地呼呼大睡，一点儿都不感觉我的痛苦，我就好气。我觉得我活得好累、好辛苦。看着别人好幸福，丈夫都是很关心、好体贴的。生小孩子，做什么

事都怕老婆吃亏了。给老婆买东西，把老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身体一向就很差，平时饮食方面也不是很全面的，就吃点儿青菜，别人一日三餐都买肉。但是我从来不羡慕别人过得好。那时我有时出去上街，跟哪个男的同学或朋友说说话，他看到了，回来肯定会刨根问底的。有时我一个人上县城，他要问：“你今天出去，跟哪些人讲话了？”好小心眼儿。我说：“我这样一心为你，这样付出，我要有二心的话，不可能把家搞得这么好，买了家具还建房。给你买了衣服裤子，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那我自己打扮我自己，花枝招展地出去，我又不是少腿、少眼。不是很漂亮，也是说得过去的。”

可我把他打扮得潇洒漂亮，还这样对我。我这样付出，他一点儿不在乎我的感情。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绝望地想，干脆死了算了。我本来是想一个人去死，想自己吃老鼠药。（白天）我买了一包老鼠药回来，下午我写好了遗书：“我对不起我爸爸妈妈，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我打工的时候，我妈妈就希望我找一个好婆家、好老公，过得幸福。但我没想到，我的命运这么差，找个这样的老公。人死不能复活，我这一辈子没有尽了孝道，下一辈子吧。我不希望把事情搞大，是我自己命运不好，让我爸爸妈妈不要太为难他了。”（其实）这是写的违心的话，我是恨他！恨他！想把他碎尸万段！有这种恨了，写好遗书，我就想，不能我一个人去死。我不甘心！死也不瞑目！我没有对错他，我把家里搞得这么好，我死了，他把我简简单单埋了，又找个老婆回来了。我凭什么给他去享受？我爸爸妈妈都没有享受过我的一分钱。我就想：要死两个人死。我就把遗书给撕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我跟他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的付出得到的就是辱骂，就是挨打。我失去控制力了，我不能自己了。心情平静不下来，我不晓得是哪儿来的力量，想也

该让他痛一次了。一开始，我对我的想法很怕。可能是（夜里）一两点钟了，我就跑到里面（他睡觉的屋子），拿起红砖，（想到以往）他动不动就打我头上，打得我疼得不得了，我就朝着他头上打。当时，我打他一下他就醒过来了，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他就“哎哟”（一声），他叫我的名字，抱着头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很激动，不管他啦，又打了他第二下。后来他就坐起来了，没有跑出去，跑到里面去了。当时，我已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我手上砖打掉了，就到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天黑没开灯，我就乱砍，看到一个黑影就砍。他就这里躲一下，那里躲一下，也不敢阻止我了。后来他一扒，我就倒下去了。我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把刀压住了，反过身来把我压在下面，整个身体压在我上面。我动不了，他就喊他的哥、嫂进来了。他哥、嫂就捡起地上那把刀，到派出所报案了。就这样，我被抓起来了。

收监以后，我就到了看守所。

一开始，他感觉我的行为超乎他想象了。他心里会想：“平时我那样虐待她，她都不敢说一句反抗的话。”那天晚上没有争吵，只是我心里那个……他不能接受，就想把我压倒，让我在这里（看守所）呆久一点儿。后来，他感到心里有愧。办案的人到我们当地调查了解过，第二次询问他时，对他说：“你们那儿的父老乡亲对她的评价都不错，都说你生活作风、性格方面都有点儿偏激。”他也感觉对不起自己良心，哭着跟办案的人讲：“她今天走到这步完全是我逼的，也不能怪她啦，这一切的错全部归过于我自己。”他又向政府写了求情报告。第三次（询问他时），他帮我说了话：“她这样的行为是我逼的，不能怪她。请法院给她一次机会，她本来是个好女人，是没办法才走到这一步的。”但提审我的时候，我情绪很消沉。办案人员都很同情我，说：“你可以替自己辩护。我们调查过，知道你是个受害者。你自己要争

取，毕竟里面（监狱）的日子不好过。”我没为自己狡辩，我就照直说：“我就是想让他痛一下。我活得好辛苦。他从来没有在乎过我的劳动成果，没有在乎过我的骨肉，本来我想一个人死，但是，我觉得我不甘心。”后来就定我故意杀人罪。当时我根本不想出来，在里面还平静一些，过几年平静的生活。我也不愿去面对他了。提审的时候，我说：“我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也不会为自己狡辩，你们判几年，我就服几年。里面的日子再不好过，也比我在家经常挨打好。”检察院、法院的（办案人）对我的遭遇都很同情，虽然定了故意杀人罪，按最轻的判了3年。

进来（监狱）之后，他也来看过两次。他讲，经过这件事，他彻底醒悟过来了，一个人不能得寸进尺，他知道自己是在福中不知福；发生这样的事，他不会怪我，也不会恨我，希望我给他一次机会。去年他就去矿上打工了。（说是）觉得一个人在家里好无聊。以前我在家里，虽然性格合不来，但毕竟是两个人进进出出。我进了看守所，他很无聊，就出去打牌，把摩托车、电视机、音响全部输掉了。家里面空空荡荡的，就一套组合家具在里面。他看到我的衣物等感到心里好惭愧。他说：“我这一生最亏欠的就是你了。”去年下半年寄来几百元钱给我做零花钱用。我真是前世欠他的，（这会儿）我还是想，只要他能回心转意我还是跟着他。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婚。当时，开庭的时候他帮我说了很多好话，那时我就感动了。

其实，现在他还一直骗我。

快出监的人可以在这里（指监狱）读技校，符合条件的都可以读。我还有一年零两个月刑期的时候，想读技校，他答应把3300元钱学费给我寄过来。去年我给他写信说要交这个学费，他就没回信了。我也就没有再写信给他，现在就断绝联系了。学费是我妈妈帮我借的钱，寄给我的。

以前我还有这个希望：我们毕竟年轻，还有重好的机会。过去是他对不起我，这次是我一时冲动，对不起他。但现在……

我进来这么长时间，他从来没有写一封信给我妈妈，逢年过节他也没买一分钱的东西去看过我妈妈。我们建房的时候就欠了我妈妈几千元钱的账，按理说，他要想重归于好，就应该去沟通与我妈妈的感情。我（曾）对他说：“我会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们毕竟是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打打闹闹，经过那么多挫折，经过那么多痛苦，我还会原谅你的。我不是一个贪图富贵的人，我如果嫌贫爱富，就不会这样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原来他打我的时候，我想过离婚，但是没有去。在我们农村，好女不嫁二男，我们那儿离婚的人比较少。我不想让人看笑话。我老是想把这个家搞好一些。我每次被打之后，受那么大的苦，我不敢对任何人去讲，我的血只能流在心里面。现在我想跟他离婚，他不离。我怕出去。我不晓得他现在是什么心理，虽然甜言蜜语地写信给我，但我对他的心已经死了。要是说他有这个行动，说得到做得到，帮我交了学费，我还是考虑与他重归于好的。现在我妈妈帮我交了这个学费，他还在骗我。

我快出去（指出狱）了，（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想起诉离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答复。他（曾）说，“我如果失去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有了你我还有希望，能感到家的温暖。”他十四五岁就失去父母，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关心体贴过他。我不晓得这件事怎样去解决，我脑子一片迷茫。我最担心我提出离婚，他肯定不会答应。我一想，就怕，我真的好怕。

到现在，他还骗我，我对他已经绝望了。就从这点上我坚决要离婚了，我才28岁，以后的路还长。我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老公，我就自己过。

我一想到出去，就怕。真的很怕！

点评：

维护男权利益的旧观念太害人

陈 敏

刘惠兰的悲惨遭遇，不禁让人感叹：旨在维护男权统治的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毒害有多深！男女平等的口号喊了那么多年，这种思想竟还有那么大的市场！

从刘惠兰 16 岁就离家去广东打工的经历来看，她应该是见过世面的。但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忍受缺乏人性的丈夫对自己的心灵与肉体的残酷折磨，直至忍无可忍，到了决定与他同归于尽的悲惨地步。究其原因，固然与有关部门普法宣传不到位有关，但传统文化灌输给她的那些从一而终的维护男权利益的旧观念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首先，她觉得丈夫打她是一件让她很丢脸的事，“家丑不可外扬”。即使丈夫对她的施暴行为使她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也只能忍着，因为好女不嫁二男。这些观点集中体现了极度的歧视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它使男性在家庭生活中处于绝对的优势，使女性的人身权利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刘惠兰就是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才一次又一次忍受来自丈夫的暴力。

其次，她还受着另一种大男子主义思想的误导，即：贤妻能使丈夫浪子回头。她错误地认为丈夫不学好，是自己没能力的表现。自己要是有能力，丈夫就会浪子回头金不换。这种观念体现了男权社会一方面要求让做妻子的在家里逆来顺受，另一方面又把男人的恶行归咎于对丈夫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妻子，这种观念体现了男人的极端不负责任和对女性的歧视。

所有上述观念，都是男权社会为保证男人在社会上和家庭中

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制定出来的压迫女性的清规戒律。刘惠兰每次挨打后，这些清规戒律就会“跑”出来“劝”她忍耐，“劝”她继续努力、等待这个有重罪前科的丈夫人性的回归——即使这个丈夫游手好闲穷得叮当响、毫无责任心、不知起码的知恩图报，而只会把给他带来财富和家庭温暖的老婆打得两次流产，并把她在外地几年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在牌桌上输得精光。对比一下刘惠兰婚前在娘家的生活和婚后在夫家的生活，“我嫁一个老公干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显而易见了。

刘惠兰太善良了，善良到只会替伤害自己的人着想，光知道同情他，却不知道最应该同情的是自己。但她似乎终于觉悟了，她决定出狱后就离婚，可是又担心丈夫不同意，所以她“好怕”。她的害怕非常现实。她的丈夫想必会再一次用他那毫无价值的承诺和暴力来“挽留”她。因为对他来说，“我如果失去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有了你我还有希望，能感到家的温暖”。但愿善良的刘惠兰能明白，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丈夫，使她对生活感到绝望。既然觉得在监狱失去自由都比在家挨打强，那么，即便暂时摆脱不了婚姻，也可以远走高飞，再一次外出打工。

“我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老公，我就自己过。”我为刘惠兰的觉醒喝彩。

3. 只把我当做了生育机器

叙述人 薛金花

访谈人 宋美娅 敖毅

访谈时间 2002年4月17日

访谈地点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 宋美娅

文稿编辑 宋美娅

薛金花，1962年生人，汉族，只上过8个月的学。她曾是内蒙古一个村庄里的普通农妇，但她却有着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她的丈夫为了让她生儿子，对她百般折磨，她共生了8个孩子，存活了一儿一女。她被打、被骂，经受了各种形式的暴力，终于，她不能再忍耐，1997年农历二月二十七，她杀死了对她施暴十几年的丈夫。1997年11月28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现在，她是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的一名女犯。

1997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判我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杀夫必要遭到法律的严惩，这是理所应当的事（这是她本人的认识），但我又是怎样从一个善良的农家妇女变成杀人犯的呢？我把我在田家15年所遭遇的辛酸往事讲述出来，希望天下所有的姐妹们切莫像我这样抱恨终身。

新婚之夜的不祥之兆。

我出生在伊盟准格尔旗十二连成乡二道归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6人。在我19岁的那一年，我的表姐夫给我介绍了托克托县中滩乡什四份村的田玉春。当时我们伊盟很穷，一听姐夫说田的父亲是大队书记，田玉春又有工作，他那个地方交通也便利，我们家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1981年四月份（农历。以下均为农历），我们领了结婚证。领过证后我才听村上人说，田玉春典过礼（结过婚），还有一个女儿。我就去问表姐夫，姐夫支吾着说：“倒是典过礼。”我说：“那孩子呢？”姐夫一会儿说那个孩子是田玉春姐姐的，一会儿又说是田的前妻和别的男人的。这年十月初二，我和田玉春典礼，这时他是26岁。

新婚的当天晚上，闹洞房时田玉春和他的姑姐夫打起来了，他们两家以前就不和，田玉春揪住姑姐夫的衣领，咬牙切齿，里外耳光打得他鼻口鲜血，我吓得抖成一团。我哥哥嫂嫂说：“我妹妹是新婚典礼，你们就是有天大的仇，过后再打。”田玉春吼道：“滚你妈的！不要你管！”人们离散后，田玉春拉开被子自己就睡了，根本不管我，也不安置来送亲的我的哥嫂和弟弟，后来是好心的邻居把他们叫去歇息。转过头我也想歇一会儿，一拉开被子，上面都是血迹黑污，他前妻月子里就不打算和他过了，故意祸害的。这被子我实在没法睡，我就对我婆婆说：“你们以前是典过礼的，我可是个新人哩，连床新被子也不做，对我们以后也不好。”我婆婆说：“田玉春净赌钱，没钱做。”我心里难过，就到院子的树下坐着，前思后想，别人的新婚之夜喜喜乐乐，我这是打打闹闹、一个无人过问的孤零夜。这样一个粗俗的丈夫，我不仅要把身子给他，还要和他过一辈子，以后还能有个好？我恨我的父母也不打听一下就把我许配给这样一个人家，我也是一

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赶车套车任甚都能干，十七八岁时还当过两年生产队长，老师找过，干部也找过，我就是嫌我们那个村穷，想找一个好点儿的地方，没想到找了这么一户人家，新婚夜连送亲的人都不管。我这心里难受，只觉得断了线的泪珠啊，流个不停。不知过了几时，我12岁的小弟来到我跟前，他说：“二姐，姐夫那么凶，我咋也睡不着，你咋不睡？”我姐弟俩抱头痛哭了一阵。为了不让弟弟为我担心，我进了屋。

田玉春听见动静，醒了过来，厉声呵我：“我要喝水，给我倒水。”我给他倒了一碗热水端给他，他又说：“太热了，我要喝凉水。”我又去给他舀凉水，我趁机小心地劝他，和姐夫有何仇，要在新婚之夜打成血头狼，田愤愤地说：“我爸当党支书，前几年从队上拿回来些砖瓦盖房子、打柜子，张顺才说三道四，我恨死他了，迟早会弄死他。”

田玉春在养水站上当养水工，也是他爸给安排的。十月二十六这天，田玉春发工资，45块钱里给了他爸40块钱，就为这5块钱，他们父子吵着吵着就打上了，田玉春拿起菜刀朝他父亲身上乱砍，眼见着一刀下去把他爸头上开一个大口子，忽地一下血流如注。田又从他父亲手上夺过棍子，高高举在空中，要往下打，看到这里，我突然吓得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吓成精神病了，我甚也不知道了，裤头不穿，上衣也不穿，他父子把我拿绳捆住，我这胳膊上、腿上，挖的血条条。等我清醒时，田玉春问我：“你为啥总说‘我命不好、不称心，命不好、不称心’？你说这句话甚意思？”我不知道我说过这话，其实我就是气，没找上好人家气得。后来大夫给我医好了病，大夫说我是精神病，我不相信，可是摸摸我的头发乱成一团，里面掺杂着草棍、树叶，我婆婆给我梳下好多蚤子，我才相信。十二月的一天，田玉春拿大棍子打我，说我精神病是装的。

1982年的大年初一，我公公提出要分家，我公公说那个小

女孩不是他姐姐的，“是你们的，属你们义务（照料、抚养的意思）”。这个小孩的妈叫翠丹，被田玉春打得受不了才离婚的。当初是我公公许了让她当妇女主任，给她哥安排工作，人家才嫁的田玉春。有一次，我俩一块儿出去，我看她胳膊上几个大疤，我说：“翠丹，你种花（牛痘）种这么多？”她说：“不是，是田玉春拿剪刀戳的。”田玉春拿剪刀把她的胳膊从这边扎到那边，伤着了骨头。翠丹生下女孩3个月开始跟田玉春打离婚，女孩6个月时她离婚走，我来时女孩两岁半。

田玉春一听让他要这个孩子，大怒：“死女娃，少给我往过打发，我不要！”我公公说：“你不要，800块钱我就卖，找下买主了。”我说：“不能卖，娶回我来你要卖小孩，让外人看是后娘见不得小孩啊，孩子我义务，我供她上学。”我公公说：“孩子你养着，她的地还在我这儿，将来收了彩礼，你一少半我一大半。”我说：“我就是因为村里头偏僻，没念上书，我父母重男轻女，就没让我读成书。这个闺女虽说不是我亲生的，我要让她读书，如果读成功了，倒贴了，也是你一多半我一少半。”我公公说：“世界上闺女还有倒贴的？我不给你讲这个条件。”我就给大伙儿说：“我就是要让我的闺女读书，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要让我闺女念书。”在村上，我的名誉可好了。

这时，田玉春因为在养水站跟同事打架，让单位给开除了，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去耍钱，整天游手好闲。

田家父子弄卖我的女儿。

第二年的正月我就有了胎。一天晚上，田玉春喝了酒回来吐在炕上，我侧身给他收拾脏东西，他一脚把我从炕上踹到地下，这时候我怀孕有4个多月了，当下我就腰疼肚疼，血流不止，我小产了，还没小产利索，村接生员又给我清宫，头一个孩子就没有留住。

1982年六月二十三，生下了我的大女儿。生之前，接生员说是男孩，生了五六天生不下来，胎位不对。说是送医院吧，又说医院太远，就叫来一个大夫，两个大夫接生。我公公说：“是男孩，不要离人。”我丈夫、婆婆都在跟前坐着，公公蹲门口等着。生下来是个女孩，我婆婆说了一句：“哎呀，女孩！”我公公说：“过来做饭吧。”我丈夫也走了，剩下我一人，我就光穿了件背心，折腾了几天，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接生员说我丈夫：“你咋地也把你媳妇给盖着呀。”他就过来随便一拉给我盖上，说：“女孩我不要，你给我掐死她。”我说这是我的头生子，头一个不保住以后就不好养。一家人不再理我，我公公就没来看这个孩子，我还是高兴地给她起名叫艳芳。

在我们那儿，生下男孩婆婆伺候，生下女孩没人管。生下男孩红布挂着，生下女孩什么也不给你挂。我妈来伺候我月子，整个月子就打闹得呀，做的饭多了，我丈夫说祸害他的东西了；做得少了，又说饿着他了。公公也吵，反正我妈怎么也是个不对。我说：“我既然能养下闺女，就能给你养下小子，你们不要对我妈这样，我妈也是一身病。”田玉春还更凶地骂我妈，骂得那难听。我妈哭着说：“金花，妈妈回呀，不能伺候你了。”我妈在院里跪下磕了三个头：“老天呀，保佑我闺女顺顺利利过了这个月子。”我说我也走啊，我公公婆婆也不拉，没人管。村上人说：“月子还没坐完你咋能回哩？”20多里路，我妈就一个人回了……（薛金花朗朗的声音逐渐哽咽，然后变成了哀哀的哭泣。）剩下我就自己伺候自己，每天给自己做完饭，给丈夫做，他回来做不好饭就打我。

孩子还不满4个月，他不让我给孩子喂奶了：“你不能再喂奶，赶快生男孩，解开奶才能再怀。”晚上，女孩在奶奶那边哭得没了气，我这里奶胀得难受，痛得我几次拿头往墙上撞，孩子饿呀！听着孩子哭，我痛断寸肠，求人家也不行，你要是把奶给

孩子吃下了，他回来就打我。后来就硬生生给回了奶。孩子4个多月时，我就又有了胎了，人家就把女娃给我送回来了，我给她喂面糊糊，可她一天天软弱，我父亲看外孙女可怜，给了我100块钱，我买了一头奶羊，孩子才活下来。

女儿1岁零4个月的一天，突然浑身抽搐，我吓得赶快给田玉春10块钱，叫他去买药，他却去了赌场，一走4天没进家门。孩子抽得厉害，我就问我公公该怎么办，公公上赌场找了他，他们父子在赌场就打起来了。我丈夫一进门，冲脸就打起我：“你敢叫我老子和我闹事，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这就把我可打了一顿，血流得满头满脸。他把我打倒在地，又上来用膝盖跪着我的肚子，我痛得“啊”地大叫了一声，这时候我怀孕7个多月。

到晚上肚子疼得不行，村医生就给打黄体酮。怀到9个月零3天，生了，接生员说：“薛金花，你生下个大胖小子。”我就起来要抱，她说：“别抱了，是个死的！”我伤心得哭，我公公说：“哭甚哭，你是个女人，死了再生。”后来我看孩子的头盖骨塌下去一块，就是我丈夫打我时膝盖压的。我公公说：“不能说是打得你早产，就说你是喂猪累的。”打成甚他们也不叫说。月子里我躺下动不了，我丈夫甚也不管，我喂的猪多，一到早上猪饿得就把门拱开了，冷风直吹，我就得了病，浑身疼得不行，叫大夫看，大夫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小产刚满月，我丈夫就要和我睡，我说：“我这身体还不行呀。”那人家不管。自从孩子死在肚子里，这血就归不了位，一个劲地倒血，又去清宫。我生了8个孩子，清宫就不知道清了多少回，那罪受得就没法说了！头一回清宫不行，说过7天再来，清了还是不行，一下子清了三次。后来有个大夫高明，说：“不能清宫，清得子宫薄了，拿药打吧。”我也觉得每次清宫我这小肚子疼得很，不能走路，只能抱着肚子弯腰挪。就这我丈夫硬要和我睡：“赶快有，给我生男孩。”但是两年我都没怀上。

1984年的正月，艳芳病得厉害，我抱她到我娘家，找我姐夫给我们娘儿俩看病，二月初小弟送我们回来。一进家，只见我丈夫招了一群人在赌博，他嫌我在娘家住的时间长，上来就要打，小弟急忙上前拉，我丈夫操起刀就朝小弟头上砍去，幸有村民贺军夺下了刀，救下小弟一命。小弟哭着走了，我丈夫转身把家里的东西砸了，我气得抱上孩子又要回娘家。田掂着菜刀追到我娘家，又打又砸，要杀死我。我父亲吓得跪下求他：“我叫你田爷爷，田爷爷！”没有办法，我哥哥只好跑着把我公公叫来，我公公说：“你们薛家的人联合起来，把这牲口打死，扔到河里喂鱼，我肯定不怪怨你们。”无论谁说，我丈夫都不能停止打闹，我哥只好用自行车往回去送我，走到了个河塘边，我连气带病，人就从自行车上滑下来，昏倒在地上，我哥无奈地看着我。那天晚上，我丈夫不顾我的心情和病体，粗暴地折磨了我一夜。

第三年五月初六，我又生下了二闺女，哎呀，这就怎么也不让要了！我说：“不让要也不能弄死，要不咱就给人。”3天后，相了一家，二女儿就给人了，卖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来抱孩子时我哭得死了过去，我实在是亲得不行。

一年后，也就是1987年四月十四，我又生下了三女儿。田玉春一看是女孩，对接生的说：“给你200块钱，你赶快给我弄死。不能叫她务义，一叫她务义，再给人，她一个月都不吃不睡。”二闺女给人后我就老哭，吃得可少，不能睡，一睡，就觉得二闺女在我脚底下哭，要不就觉得她的小手摸我的脸，不由得……（哽咽着，她习惯性地用手擦拭眼泪。）一听他的话，我一下子坐起，血就呼呼地流，我说：“不能弄死，你要是把她弄死，我就一天也不活了。我生下多少女孩你都不能弄死。”这就留下了。我丈夫说：“你不能给她吃奶，不能看她。”我妈来看我，告诉我说：“娃娃要是饿了，你拿筷子头蘸点儿糖放她嘴里，她就饿不死。”3天后，我实在累得受不了了，就睡着了。迷糊

里就听着娃娃说哭不是哭，说吐不是吐。我一睁眼，他父亲端着一大瓢凉水，田玉春掰着娃娃的嘴，正给她灌水哩，褥子上、被子上都是水。我一把护过孩子哭着说：“你把我弄死也不能弄死孩子，她才刚出生你就想害死她。”我丈夫从我怀里夺过孩子，一扬手，扔起老高，把孩子摔在墙上，孩子又顺着墙掉在地下，我就哭着要去抢孩子，他过来摁住我：“不让看、不让看。”我看娃娃没有动静，说：“看看娃娃是死是活。”他去看娃娃，我一头撞到墙上，昏得啥也不知道了。慢慢醒过来时听见婆婆说：“咋也是顾大人吧，她要是死了还能给你生下个小子来？”我醒过来了，娃也醒过来了，我抱起她说：“你们要是把这个娃娃留下，我就是给你们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他们就不再弄死孩子了。以后我这懂事的娃娃就再也没哭过。

第七天里，他们又要把娃娃给卖了，我说：“你们把娃娃送人也不找个精明的。”他们说：“有人要就不错了。”他们给人从不跟我说给在哪儿了，我后来都跑去看，这个孩子到现在都是个傻子，让我丈夫给摔成傻子了！

月子28天头上，我丈夫就要和我同房，我听老人说，血不干净同房容易得病。吓得我抱上女儿就跑回娘家，我妈说：“田玉春又打你了吧？”一家人哭成一团，那个情景像万箭穿我胸膛。8天后，田玉春叫我回去，那天夜里，他用火烤着，抽上一纸白粉，兴奋得一夜不睡，把我折磨到半夜，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就拒绝他，他一脚把我从炕上踢到地下，问我：“你不是说给我当牛做马吗，怎么变了？”等我醒过来，他又开始折磨我。

1988年三月十二，又生下了第四个女孩子。没等生下，我丈夫就拿个筐扔在地上，一看是女孩，掂着就扔到筐里了，筐里的棍棍，扎得孩子“哇”地哭了。我就坐起来，说：“快抱给我，你把她弄死，我就自杀。”我婆婆听我这话，就说：“先抱起来再说。”他们不让给孩子断脐带，不断脐带孩子死得快，我说：

“赶快断了。”孩子抱上炕，我就又昏得什么也不知道了。等醒过来我就给我丈夫商量：“我叔伯弟弟头一胎生了个男孩，二胎又生了个男孩，别人咱换不上，我自己娘家弟弟会跟咱换。”我丈夫说：“我要钱去呀，你留下她，一顿饭也不给你做。”

过了有一个月，我妹妹来了，说：“人家不给你们换，给别人家换也不给你们换，怕我姐夫给整死了。”我丈夫回来听见了，就骂：“你他妈的，谁给你换了？这回你非自己亲手把她整死不可，你不把她整死，我就把你整死。”我说：“我母女俩一块儿死了也好，我死了做鬼也能保护她。”他就过来抓住孩子的腿又要摔，我说：“你要摔，我就真死了。”这时候他父亲过来骂他：“你要钱一要一个月，要弄早弄死，她都奶了一个月了，再弄死她又犯精神病。”我丈夫就骂我：“你不是说能换哩，谁给你换了？”我公公就说话了：“换？谷要自种，儿要自生，娶个老婆为啥了，她才生几个，就不能生了？死你也要生个儿子。”我说：“大，不是说叫计划生育嘛，你是共产党员，咋不带头哩？”我公公说：“计划生育，那是给城里人计划的，你不生个儿子谁给你下地干活，老了谁养活你？”我说：“要是这么说，我母女俩就一起去跳河。”我抱起孩子往外走，我公公拦住说：“不能走，我再去看下个人家。”过天我公公回来说：“找下人家了。”200块钱把孩子卖了。

几天过后，我偷偷找到了四女子（四女儿），孩子睡在屎尿堆里，没人管，她妈是个精神病，回四川江油老家了，我给她爸商量：我给孩子洗屎洗尿，叫我来看看孩子。人家说：“你想看就来吧。”不几天，田玉春回家没看见我，问二女子，二女子说我去看四女子了，田玉春就打我呀，往死里打。后来婆婆过来说：“别打死了，打死了谁给你生儿子？”我丈夫说：“再去看就打死你！”后来生下儿子后，我丈夫打死我公婆也不管，你死就死，打得我在外面躺几天也不管，没生儿子之前我还不能死。

我就又犯了精神病，看见天上的星星，是我的四女子眨眼；听见公鸡叫，是我四女子喊妈；看见树，是我的四女子，上前就抱，额头上磕得一层层的血。听见二女子喊妈头疼得呀，要裂了一样，受不了，赶快往外跑，几十里路地跑，鞋跑丢了，光着脚在石头上跑，脚底板全是血，也不知道疼，晚上叫狗咬住，以为是我四女子，裤子咬破了，还抱住狗使劲亲：“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黑夜间摔到水沟里就睡着了，睡起来浑身是水，慢慢地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产后风、妇女病。为了不让我疯跑，田玉春给我吃各种安眠药，一天给我吃 15 片强力安眠药也睡不着觉，又请原来的大夫给我扎针，这才慢慢好过来。

我刚清白过来，田又摠住我折磨我不放，夜夜是我的鬼门关，吸了白粉的人跟常人不一样，整宿整宿地折磨我。1988 年的八月，我又怀了孕。十一月里，丽丽——就是我丈夫前妻留下的那个女孩，上学没钱，我把口粮卖了给孩子买点儿本和笔。田玉春知道了，拿起个大棍子打我，谁知棍子上有个钉子，把我的头打了个大窟窿，血顺头顺脸往下流，不知多会儿，我又晕倒在地上。到了晚上，我流产了。

流产不到半个月，田玉春就要和我睡，说他年纪大了，等不得了，赶紧让我生儿子，步步紧逼我。我们家粮房里有一口给我公公准备的棺材，我吓得天一黑就躲到棺材里，他想不起来去那儿找我。晚上我听见他躺在炕上喊：“薛金花、薛金花！”我一声气不敢吭。那时候正是十冬腊月，冷得很啊！每天晚上冻得受不了，听他不叫了，我就从棺材里出来，在地上跺脚，脚上的冻疮又疼又痒。没几天，我得了气鼓病，肚子像扣了盆一样鼓起来，疼得坐不住。我妈听说了，给我送了 300 块钱，让我瞧病，还让我妹妹来伺候我。那一年，我妹妹 19 岁。有一晚上，我扎针回来，看见我妹妹坐在炕沿上哭。我问她：“跟你姐夫吵架了？”她说没有。晚饭她也没有动筷子，过天她就要回去。我又扎针、吃

药，整整看了一年病。

虽然有了儿子，我的苦难没有到头。

1990年五月，我又怀孕了，可是身体不行了，瘫了一样躺在炕上，侧着身还能起来，平躺就起不来。我丈夫照样整天出去耍钱，没人管我。下午二女儿回来，把我的胳膊拉到侧边，再扶我起来，女儿不回来，我只能在炕上躺着拉尿。我娘家看我太可怜，就用个车把我拉回娘家去伺候。我这次一怀孕，我父亲就用砖修了个小庙，里面供上个牌位，每月初一、十五，我父母就去磕头：“保佑我女儿生个男孩吧。”每天早晨太阳出来时，只要我还能动，我妈就把我扶起来，让我跪在炕上，冲太阳磕三个头，我说：“快保佑我生个男孩吧，再生不活我就活不成了。”天天头磕得“咚咚”响，前额上磕出血，干了，再磕出血。

1991年三月初一晚上，我肚子疼，第二天，我妈和我弟弟就把我送回田家。一进家门，一对小猫卧在我家门口，我们那儿说见一对猫就要生男孩，老天开眼了，我抱着小猫高兴得流泪，不住地说：“我要有儿子了，要有儿子了。”村里人听说我回来就来看我，我就听水缸里面有响动，侧身一看，里面有一只好大的青蛙，哪来的青蛙哩？我们家三面是墙，门也不靠水。邻居们说：“这是老天可怜你了，给你送子来了，快把它放高处供起来。”我拿瓢一舀，青蛙蹦走了，这时候，娃娃的一只脚下来了。

田玉春找了一伙人在家打牌，屋里有男有女，我只说肚子疼，要生哩。我妈就叫田玉春去请大夫，他说：“等着吧，打满8圈。”这时候才打4圈。同桌一个年纪大的说：“老婆生孩子还能等？不要了。”人家走了，他也走了，直到天黑还没回来。我妈出去找他，我又怕我妈路不熟，还有狗咬，我拄了根棍，又去找我妈。肚子疼得很，就歇一下。田玉春又在别人家里耍钱，找着他回来一路走他在后面一路骂：“哪一次不得生个五六天，回

去生不下来打死你。”大夫来了一看，孩子的小脚都干了，大夫先用热水把小脚泡软了，又送进去，找另一只脚。

我生这几个孩子全是难产，都是折腾几天。儿子出来时就听见说：“孩子死了。”我就昏死过去了。大夫拿热水泡，儿子才缓过一口气。我妈把儿子抱过来，把我的胳膊拉过来，说：“这是你儿子，摸摸你儿子吧。”我一看，咋那么小呢，才3斤多。我抱着儿子高兴得流泪，我说：“我生下儿子了，我有儿子了。”田玉春过来一看，又骂：“妈的，生丫头生那个大，生儿子咋这么小，跟只鸡似的，能活吗？”我妈赶快说：“小也是儿子，能长大的。”

原来想，生个儿子我就能熬出来，谁知道我以后的日子更惨。儿子身体虚，总有病，田玉春要我再给他生个强壮的儿子。这个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田家父子把我当成一个不能停止运转的生孩子机器，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得不停地为他们生儿子。1992年，我听村里大婶们的指点，吃上了避孕药。我在水缸下面挖了一个洞，把药藏在里面，外面拿土掩上，再用一块砖盖上。1994年的一天中午，我刚拿了药，还没来得及往水缸下放，田玉春偷人家的鱼回来了，我说不要偷人家的东西，他听了不高兴，抬手把我打倒在地上，口袋里的药掉了出来，哎呀，这一回真要把我打死呀，他说：“难怪这两年没怀上。”打了我两天，这一次打得我实在受不了，我找了药，正要一了百了，村里一个叫吉女的年轻女子发现了，她劝我死了还不如跑了。我连夜跑到托县，一个老大娘留我住夜，听了我的事，她说：“你上法院离婚呀。”我说：“法院在甚地方，法院的人也是和咱一样的人？”去了法院，一说，人家说：“知道，前些年他打媳妇打得狠，那个媳妇离了。这个媳妇还打，给她离呀！”我离家的第九天，我弟弟进城找上我了，说：“姐，快回吧，二姐夫拿刀要杀咱大。”我一听，算了，这婚我是离不了。只好回来了。一进家门，田玉春拿起刀，一刀砍在我手上：“这就是你要离婚的下场，这回是砍

手，下一回就是咔嚓——”他拿手划了一下脖子。我手上的鲜血流了一大摊，他扔下刀就出去了。他父亲还说：“就那么一下你就制住她了？她这回找到法院了，还要离的。”我公公给田玉春出主意说：“不杀他们家大人，杀小的，女孩不杀，杀男孩。”

我父亲也不让我离，他对我说：“杀了我好说，可薛家有一二十个孩子哩，不能让咱断后啊！”我没有离婚的余地，只有死路一条。我就上吊，还没等死，就被二女子发现了。我寻死过好多次，都让人给救了。1995年初，我抱着儿子去跳河，让一个老汉给捞上来。四女子送人后，我吃了60多片安眠药，喝下后难受，流口水，田玉春发现了叫了大夫，我不给他们说我喝药了，不让他们救，大夫还是把我给救了。我就这么死不了，活着受罪。

自从生了儿子，田玉春打我都是往死里打，有一次他拿刀背砍了我20多刀，死在外面的树林里，后半夜冷风一吹，醒过来了，我自己爬回来，我不回娘家了，不给娘家添事。这样的打太多了，我公公还出坏主意：“你得防着她，看她装药了没有。”为了逼我再生，我公公对我丈夫说：“儿子不是你的。”田玉春一打孩子就骂他是野种。

这里面还有一段话。我生不下儿子病得厉害时，我婆婆悄悄说我：“你不能外面找个人混？我儿就没有生儿子的籽。”我婆婆也是受我公公一辈子的打，一次我去她家，公公正打她，把她的手指头打断了，也不给她接。我婆婆瘫痪了6年去世的，死也不是正常死的。（薛说到这里欲言又止。）

我就找了那么一个人。我丈夫可精了，例假完10天里，必须跟他睡，他说这时候怀孩子。有了我儿子以后，我就拒绝跟那人来往，他说：“我给你治病。”我说：“我不为治病，只为生儿子。”后来，我丈夫用自行车驮着儿子到托县去验血，回来跟他爸说，儿子是他的，还说我是个正派女人，这才不打儿子了。

田玉春害死了我妹妹，祸害乡邻。

那年妹妹从我这儿回去后就病了，四月里我回娘家，一进门，妹看见我就哭，随后她做饭去了，我妈问我：“你妹妹是不是和田玉春吵架了？自从你家回来，每天哭个不停，到底是怎么了？”我拉着妹妹的手，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得下病了，经常肚子痛，例假止不住。那年七月，我妹妹就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为了给妹妹看病，我父母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后来实在没什么可卖的，我小弟就把他的血输给妹妹，我们一家人都给她输过血，慢慢的，妹妹的病才有点儿好转。

1996年三月份，我们这儿唱戏，我心疼妹妹每天躺在炕上，什么也见不到，就把妹妹接来看戏，田出去胡混，经常不在家。没想到我妹妹来了不到10天，田就从外面赌回来了。妹妹来时带了200块钱，怕田发现，就让我放在破烂的柜子里。这一天，二女儿说要买字典，得40元钱，家里没钱，小妹就让拿她的钱。我去柜子里一找，柜子破了，钱也没有了。儿子说：“我看见爸爸拿走了，还给我买了一包方便面。”一听这话，我丈夫抬手就打儿子，打得儿子鼻口鲜血，我上去拉，被他打了几个耳光，我妹妹看不下去，就伸出拐杖挡我丈夫，他伸手去夺妹妹手里的拐杖。我吓得抱着他的腿说：“她不能摔倒，摔倒她就完了，我叫你爷爷！”人家不管，硬是从我妹妹手里夺过拐杖扔到外面。我妹妹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尾骨摔裂了，血流不止，怎么也站不起来。我哭着把妹妹抱到床上，小妹痛苦地要马上离开我家。我出去借钱，回来时妹妹不在了，田玉春把她赶出去了：“爬你也要爬走。”我骑上自行车就去寻她，两个小孩儿告诉我小妹往东走了，拄着拐一边走一边哭，手里还拎着衣服。我顺路走到邻村打听，妹妹被一户好心人家收留，我们姐妹俩抱头痛哭。晚上10点，我丈夫找来了，一进门就说：“今儿要把你薛金花打死。”上

来就冲我打来。人家夫妻俩急忙跳下炕拦住他：“不能打，要打回你家打，不能在我家打。”田拖住我往外走，乡亲们再三劝说，田才放话，让我把妹妹也带回去，我把妹妹放到自行车上往回推，田竟然骂了一路！

第二天，妹妹的病重了，我请了大夫来给妹妹看病，田玉春一看见大夫就说：“你赶快离开我家，别勾引我女人。”大夫气得跳下炕就要走。我上前劝说，田又打我。我妹妹说：“不要打了，我走呀。”田玉春堵住我，不让我送我妹妹，把我的自行车的气放了，要让我妹妹爬着走，大夫安慰我说，他正好要到我娘家村上，他送我妹妹回家。当天他们住在外村乡亲马俊家，晚上我偷偷跑来看妹妹，11点多又被田拧回来。临走，我内疚地对妹妹说：“姐明天一定来送你上车，姐要把你抱上车。”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做好饭，哀求田能让我去送小妹，田把门堵上，不让我出门，直到11点多有事他才走。我赶紧找上自行车去马家，到了那儿，人家告我说：“你妹妹对司机说：‘司机哥哥你再等一等，我想看二姐一面，她一定会来的。’等到9点多，你妹妹说：‘肯定姐夫又打她了，她来不了了。’这才走了。”我淌着泪跪下，给老天磕了3个头：保佑我妹妹平安到家。

八月里，我妹妹不行了，我趁田不在家时跑了回去，还没住几天，田就捎话：“让薛金花回来收秋，不回，拿刀去杀了薛家后代。”我弟弟说：“姐你回吧，别让他来家闹。”我小妹知道见不上我了，临走前，小妹流着泪给我讲了她被田糟蹋的经过。

1989年春，她来伺候我的第二天，我去扎针，妹妹正在做饭，田玉春回来了，他对妹妹说：“你姐不行了，不能给我生儿子了，你给我生个儿子吧。”妹妹吓得抖成一团，直央告他，田玉春根本不听，硬是把带着例假的妹妹奸污了。他泄了兽欲，我妹妹却从此得下了病。这一次，又是他抢走了妹妹的拐棍，让妹妹摔成致命伤。

听了这些，就像是五雷轰顶，轰得我支撑不了了，我对田玉春充满仇恨，我觉得我们的日子到了尽头，早晚一天会出事。妹妹拉着我的手说：“你回去把手术做了吧，别再给他生了。”我八月二十二日回到家，3天后，我自作主张去做了皮埋手术，别人做了手术胳膊都挎着，我不挎，不叫他看出来。晚上睡觉时，他按了一下我的胳膊，我不由地“啊”了一声，他扯起我的胳膊一看：“你做的啥？”黑夜间可把我打得呀，叫我明天就去取了，要不天天打。打我也不去取。皮埋之后，我天天流血，那我也不取，田真是每天打，不是打就是骂。后来我身体不行了，田说：“你去找计划生育办要钱，把你的老病也治了。”人家还真是给了300元，我舍不得治病，给娃娃们买书了。

我回来还不到10天的时间，八月二十六日晚上，我妹妹离开了人世。妹妹死时25岁，没有结过婚。是田害死了我妹妹！妹妹死后，我烦得就像个疯子，不能看见田，也不想呆在家里，天天起来就想大哭一场，夜夜跑出去找妹妹。

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心里的悲痛，就想去舅舅家散散心，走到把寨村，看见8年前被田用水灌、往墙上摔的三女子，正被一群孩子追打，这孩子傻得屎尿不知，连屎都吃哩。我把别的孩子轰散，心疼得抱着她一场痛哭，我恨自己不能保护亲生骨肉，怜惜小女被她亲生父亲残害到这种地步，一生都活得不像个人。我也不去舅舅家了，返回来把家里一头大羊卖了310块钱，我对田说：“她养父母是个傻子，咱还是她亲父母哩，得给孩子看看病。”我丈夫把钱一把手抢走，他骂我：“再去看那个孩子就打死你，她那傻爹娘，就称养傻孩子。”两天不到，310块钱输完了，他又把一只大羊牵出去输了。这些羊就是用我父亲给的100块钱买的那只羊繁殖的，是我的救命羊，我们母子没饭吃，早晚都是喝奶，所以我这身体才能恢复。自从1996年我妹妹死，这一桩桩、一件件，对我的压力太大了，我想把他弄死，又害怕流血。

1996年十一月份，村里人风言风语说，五里滩史家男人寻短见的事，跟我丈夫有关系。史家女人我认识，我丈夫把她领我家鬼混过。我丈夫跟别的女人我不管，他跟别的女人了，对我也轻些。后来史家女人被乔二霸占，乔二是我丈夫结交的朋友，他的朋友都是偷、抢、赌、骗的地痞流氓。乡亲们说：“史家男人不是寻的短见，是叫人给害的，跟你男人有关。”这件事还没完，十二月里，村里王三给丽丽介绍对象，他对我丈夫说：“对方能把你欠下的赌债全还了，还能给你盖起新房。”我丈夫在外面欠的赌债太多，他一回来，要债的坐一院子。他一听，乐意，可女儿跟那人见过面后，嫌男的罗圈腿，不同意，田就把她打个没完，闺女晕过去好几次，我只能用身体护着孩子，我得尽我做后娘的责任。我说：“闺女是我义务大的，不能要养钱。”田就又打我，说我把闺女宠坏了。因为大闺女，我没少挨他爸的打，从小念书，我再三求人转借钱，她爸就不让女孩子念书。读到初二，她怎么也不读了。为了她的前程，也为了尽我做后娘的责任，我趁丈夫不在家，用牛车送她跟上我外甥女学理发。我丈夫知道后，三番五次打骂我，说女孩子学了技术，找对象时就不好要钱了。

为了躲她爸，丽丽藏到镇上的理发店里。我背着她爸给她送吃的。有一次，我套着牛车给她送面。牛被汽车吓惊了，我死命拉住牛，差点没送命。丽丽就不让我再去送了。那年年三十夜里11点多，孩子才回。正月一过，我丈夫又逼女儿嫁人，女儿求我救她，我把她偷偷送到我姐姐家。正月二十六田从外面赌回来，一看丽丽还没回，就毒打我，我实在挨不过，就说出丽丽在我娘家，田玉春让二女子去把丽丽叫回。

1997年二月初三晚上，田又赌回来了，一进门，把两个女儿刚做好的饭菜踢翻在地，把锅碗瓢盆乱砸一顿。过后又打丽丽，孩子喊：“妈妈救我、妈妈救我！”叫个不停，我放下吓哭的儿子，伸手去拦田玉春，田玉春挥出去的大水瓶正好打在我的乳

房上，我一下子疼昏过去了。等我醒来，看见丽丽爬在地上，田玉春用脚在她背上使劲拧，孩子都没了哭的气力。我喊二女子：“快去叫你二爹！你爸要把你姐姐打死！”二女子去叫二爹，她二爹不敢来，说你去叫外面的人吧。二女子跑到外面喊：“救命啊！救命啊！”因为田凶恶，邻居听见也不敢来拉。这时，田玉春的姑姐夫进了门，他可多次救下我，把我锁在人家。因为救我，田玉春更恨他们。姐夫开口就骂：“玉春，你真不是人。”田转过头一看，又是仇人，上去里外耳光，姐夫嘴角流着血说：“好好的家，就要一次一次毁在你手里。”田出去找了一块砖头要砸姐夫，我赶紧上去死死抱住他拿砖的左胳膊，谁知他把砖倒到右手里，把他姐夫头上打了一个血窟窿，鲜血直流。孩子她二爹和随后来的3个邻居吓得不敢上前。田玉春又转身往屋里跑，我猜他就是去拿刀，紧随着他后面跑，我知道姐夫还没走，就抱着他的腿不放，他用刀背砍我的背，直到砍得手麻了，刀才松手。

他打完了，去睡了。我把女儿安置在邻居家睡觉，抱着儿子去看姐夫的伤情。村里来看的人可多了，姐夫人缘好。我对姐姐说：“姐姐，我给你做饭。”我疼得抖得厉害，大伙这个说我：“你回吧，别人打你丈夫你哭，现在你还哭。”那个说：“再有人打他你不要管，别护着他。”我不说什么，拿着血衣裳去洗，姐姐说：“不能洗，明天告他去！”我给人家做饭、滚水，招待大夫。晚上，姐姐气得病倒了，我伺候着姐夫。半夜里人又不行了，我想出去请大夫，又怕，碰上我丈夫怎么办？怕着怕着，我也把大夫请来了，又送走。早上，姐夫醒过来，说：“我听见你哭了一夜，你不容易，今天不去医院了，就在家养养吧。”姐姐说：“叫田玉春来，他打了人还凶。”田玉春来了，我说：“他黑夜间喝了酒，手下不清楚。”他说：“我才没喝酒哩，我就是来杀死他。”姐姐气得说：“叫救护车，快拿钱！”我说：“姐姐，我把大牛转给你，先借你900块钱，以后我卖牲口还你，现在先给姐

夫治病。”我把家里仅有的 200 块钱拿出来，给丽丽介绍对象的王三又借给 200 元，一共 1300 元钱交给我丈夫，让他陪姐夫一家去看病。

7 天之后，姐夫的小儿子来家说：“妗子，快拿钱接我爸出院。”我挺奇怪，说：“你舅不是跟着你们的吗？”他说：“他只呆了一天就玩儿钱去了，现在都输 4 万了。”我不由得就昏过去了。外甥拍着我说：“没输那么多。”醒过来我说：“丽丽，去寻你爸。”过午，丽丽回来了：“我爸说：‘不管，叫他们去告，检大处告。’”我只好去接姐夫，说：“你花下多少，我还你多少。”姐姐说：“以后我家地里的活也是你干啊。”我说：“行，我干。”姐夫回来后总是头疼，姐姐又要去做脑电图，来拉我家的牛，我哀求姐姐，等田玉春回来再拉，要不我会被打死。二月十四日半夜里，我丈夫回来了，问我：“手章呢，我要去贷款。”我求他贷上款给姐夫补上点儿债。听说他贷了 600 元，很快又输光了。

二月二十六日晚 11 点多，我丈夫回来了，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谁叫你做的皮埋手术？”我只好说村里的老人提醒我，再生下去我就没命了。这时，他牙咬得咯咯地响，说：“都怪老张典礼时冲了我的喜，害得我生不下儿子，这一回又欠他 1000 多元的医药费，他还要做脑电图，不如把他夫妻闹死，以前所有的债就一笔勾销了。”说着，他拿出来一瓶打枸杞的药（剧毒农药），对我说：“明天你去叫他们夫妻俩来吃饭，你把安眠药放在酒里，把毒药拌到饭里，再往他们身上拴上大石头放到河里去。做完这事我就让你走，放你一条活命。”他这话把我吓坏了，说什么我也不答应，他就骂我，就在我带着例假的情况下，凶狠地折磨了我一夜。

第二天清晨，田让我下地干活，我掀开被子让他看我被他一夜折磨流在被子上的血，他才不情愿地走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拿着一包辣椒，半瓶酒，他叫我去赊账买酒买肉，晚上叫姐姐、

姐夫来吃饭：“给他们把饭盛在有辣椒的碗里。”他在辣椒里拌了安眠药。我说我不能再去赊账了，商店的小青说我：“你拿甚账，你家穷得什么也没有，不赊给你。”他骂我没用，连酒肉都赊不来。我丈夫骂骂咧咧刚出去，姐姐带着四五个妇女要来拉我家的牛，我央求她：“等中午田玉春回来你再来拉，你家有甚活儿我给你干。”

待屋里安静下来时，我想，我丈夫跟姐夫家有仇，他为啥不自己动手，而指使我干，我要是干了，姐夫的儿女们能放过我吗？田是不是嫌我知道他的罪恶太多了，想借姐夫家人的手杀人灭口啊？我想到了田害了我的女儿、我妹妹，害死史家的男人，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恍惚中，我想反正我都是死，不如先把他弄死。

走投无路，我用田教我的方法，对他下了手。

中午田玉春回来后，我把我以前吃的安眠药放到田的饭碗里，一会儿，村民张三贵来要田还赌债；三贵刚走，又来了一个男人来要钱；姐姐也来了，又要拉牛。我丈夫烦躁得很，自言自语地说：“都是他们逼得我活不下去，又要拉牛，又要去大医院看病。”他又逼我去买酒肉。我不去，他转身想去找刀，没走几步就摔倒了。我实话告诉他，我给你吃下安眠药了。他一听喊道：“你好大的胆，等爷醒后非把你们薛家人杀光。”说着他上炕睡了。我有些害怕了，他若醒来，不仅要杀姐夫，还要杀我的亲人，只有把他除了，才能救下所有的受害者。我找了一块磨刀石，用绳子系上套在他的脖子上，我就开门出去了。不知过了多大会，乔二的弟弟乔四来小青家叫我，说：“你丈夫死了。”我跟乔四回到家，从玻璃上看见我丈夫的样子很可怕，我一下子瘫倒在门口哭起来。

这时我公公过来说：“哭甚哭，他死了你还可以好活几年。

找两个人把他扔到河里喂鱼去。”我央告公公，让我丈夫用一用公公的棺材，我公公不让用，他也恨他。村里人说情，我说：“大，他活着时，住的屋子烂得看得着天，用用你的棺木，再给他扯一身衣服，让他到阴间做个好鬼。”我公公最后同意600块钱卖给我，但不让往他们家坟地埋，说怕我丈夫做了鬼也打骂他，让我埋到我的口粮田里。公公让我说出“是谁害死的田玉春”，不说清不让埋葬。到了三月初四，我说：“是我弄死的，这能下葬了吧。”中午从坟地回来我公公就宣布，我大女儿归他了。

三月底的一天，公公来找我，让我去给他做饭，我知道他起了歹意。1995年，我治病时住在他家，一天晚上，睡梦里我觉得身上有人，醒过来一看，是我公公，我吓得喊了一声，我婆婆就在一个炕上睡，她说：“快开灯，快开灯！”我公公这才下去。村里人早就给我说：“你公公要霸占你，你注意点儿。”我说：“我不能给你去做饭。”公公说，当初他要娶老婆我不同意，现在就得跟他。我说：“哪是我不同意，是你儿子不同意。”公公说他儿子没有我精明，都是我的主意。我对公公说：“你儿子死了，还有孙子，我死也不跟你。”公公说：“不从就置你们母子死地。”我一连叫了他十几声爸，我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别让我跟你。”没两天，他又来了，说：“我在下河给你找了个主儿，把你们母子给人家，人家给我7000块钱。”我说我不想找男人，我能种地，能养活孩子。我公公说：“你要不去，你给我7000块钱，不然我就去告你杀死了我儿。限你一个月给齐钱，我当紧有用。”我没办法，只好答应了这个条件。我当时就开柜子找出400块钱给了他。我哥买了我一头牛，村里人给1300块，我哥给我1500块。还了点儿债，只有这些。我想卖掉我的牲口和粮食，我公公和小叔不让，说家里的东西都是他们的。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我正又愁又累得想睡下，小叔的二儿子过来说：“我哥给望生弟灌酒快灌死了。”我惊得往他家去，只见

儿子两眼血红，吐个不停。我问他大儿子为啥要这样做，他们都知道我儿肝肿大，不能喝酒。那孩子说：“是我爷、我爸妈叫我把弟弟灌死，说你再气疯了，两个姐姐就由他们卖。”第二天，我儿还是吐，我就央告小叔、弟媳，让我卖掉一袋玉米给孩子看病，他们还是不让。没办法，我抱上孩子去找公社白书记，白书记看我母子可怜，从身上掏出100块钱，这才救下儿子。

五月初六，我公公又来逼我要钱，我问他为甚要往死里害一个娃。他说：“一天不还清利钱，一天就往死里害你们老小，反正我73岁了，谁陪不过谁。”随后就大骂我，还说他已经买通公安局的人了，他让我死，我就得死。有的村民看不惯，提醒我不要再给公公钱了，说给他钱，他更好告你，四月二十五日，他请村民吃饭，就是让大伙帮钱告你。

我被捕入狱，幸留了一条命。

1997年七月，我公公看我还不上钱，就开始告我，七月十三，我被公安局带走了。这期间，他天天来唬我，叫我不能说我丈夫打我，不能说他赌博，不能说我生8个孩子，都不能说。公安局来开棺验尸，吃住在公公家里，他说他8000块钱买通了公安局。有一天，他碰见我父亲，他说：“公安局长是我原来的同事，总要把你女儿拉出去崩了。”

我走之前，把我的两个孩子送到我妈家。还没开庭，我弟弟来托县看守所见我，说他爷爷把两个孩子接走了。我心想：“行了，我甚也别说了，孩子在人家手里，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开庭时，我甚也不说，都是他爷爷在说。我想，我死了就算了，主要保住两个娃娃，我死了以后，两个娃娃让我弟弟义务。

在看守所里，我又犯病，小便又不由自己，看守所给我看病，把皮埋也给取了。这一天，去医院看病的路上，开车的小司机对我说：“在法庭上你得说话，把你的委屈说出来，再不说你

就是死刑。你把你的情况写给我，我给你交上去。”他们都听说我冤。我说：“我不会写。”他说：“让你同号的人帮你写。”同号里有一个女的是教师。我回去一说，她就答应：“你说，我给你写。”我给乌莲队长也说了，队长可好了，她也让我把冤情说出来，就是她让我把实情都告诉给我指定的律师，我公公交待我什么也不要跟别人说，她也说我不该全听公公的，那两天队长还给我松了松手铐，手铐、脚镣我戴了7个月零3天。

第二次又看病时，我把同号给我写的材料悄悄交给了司机娃。检察院的也来找我谈话，我对他们说：“我想把我这20多年是咋过的，细细地告给你们。”他们说：“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咋杀死你丈夫这一段。”

1997年11月28日，又开庭了。他爷爷带着我大女儿来作证。他爷爷说完，大女儿说。审判长问我大女儿：“你爸为什么打你。”大女儿说：“都是我妈挑的。”她这话一说，我“哎呀”了一声就要昏过去，两个法警用力架着我，他们在我耳边说：“坚持住，坚持住，一会儿你要说话！”我睁开眼，问审判长：“我能不能说两句？”审判长说：“可以说，可以说。”连边上打字的女娃都说：“可以说了，你赶快说。”我说：“丽丽，妈妈对你不好，你为啥跟着妈妈，不跟着你爷爷叔叔？你咋活下来的？你咋念的书，咋学的手艺，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气短得不行，说不下去，浑身抖得站不住。丽丽哭了，审判长又问她：“你妈对你咋样？”这她就改过来了，说：“我妈对我挺好的，吃穿由着我。”“那你刚才为啥不说实话？”丽丽就往她爷爷那儿看。1998年孩子来看我时哭着说：“妈妈我对不起你，我爷爷让我那么说，我没想到给你判那么重。对不起你！”

就在这个时候，我二女儿赶到了，她喊着：“我要给我妈作证！”审判长说她年龄小，不能作证，这一年她13岁。她说：“我写的有个东西能念不能？”审判长就让我的律师念，是她老师

帮她写的：“别人的家庭是幸福的家庭，我的家庭是个打打闹闹的家庭，从我记事，我母亲的眼泪就没有干过，我也是最痛苦的女孩，我父亲整天带着凶器……”听的人都哭了。这一天，来了不少记者，我公公在法庭外一个劲儿地说是我害死了他儿，法官赶他走：“出去出去，别在这个地方说。”

后来审判长宣布对我的判决，我刚听一个“死刑”就昏了过去，两个法警在我耳边叫我，告诉我说是缓期两年执行。这时，检察院抗诉，他们说我手段太恶劣，得立即执行。检察院的人拍桌子，我的律师也拍桌子，律师说：“给这样的妇女判死刑，我这律师就不当了。”我公公嚷着说，不拉出去崩了我，他要告到中央。

审判长问我服不服判决，我说：“我服呀，你们还停二年再崩我哩。”审判长说：“缓二年后，你表现得好，还可以改判无期。”我知道我能活下去了，我说：“行啊，那就把我儿也接来吧。”审判长说：“不能接你儿。”我一听就哭了，我说：“我盼星星、盼月亮，盼了10年，挨了那么多打，头都磕破了才生下这个儿子。”我就简单说了我怎样生下的这个儿子，全场的人都哭了，检察院的人也坐下来了，记者们给我照相。

审判长问我上诉不上诉，我也不懂，心里想：上树？上树就能不判我死刑了？回到看守所，同号的人说：“上诉、上诉。”乌莲队长说，已经给判死缓了，上诉怕对我不利，检察院还抗着诉呢，咱又没钱请律师。就这样，1998年4月6日，我就到监狱来了。

政府给了我新生，我想写小说。

到了监狱，我就是想我儿，他小时候带的手镯我带了来，日夜攥着，眼睛哭得看不见东西，队长分配我上机器（缝纫机），我不行。那时候我想死，为了减轻痛苦，为了不再想我儿，我就

想从三楼跳下去。那时候窗户上还没装这护栏。队长看我不正常，就找我谈话，我说：“他们家要把我儿害死怎么办呢？”队长说：“大同有个孤儿院，你把你的情况写写，我们争取把你儿送到大同孤儿院。”那时候我就开始学文化，我要把我的事写下来，把我儿送到孤儿院。别人教我10个字，晚上不睡觉我也要把这10个字学会。1998年的七月初三，队长、监狱长都联系，把我儿送到了大同孤儿院，1999年我儿来看过我一次，2000年、2001年，电视台去大同拍了电视片拿来让我看，我儿可高兴了，监狱的人都跟我一起看。我把我的经历编成小品，演给大家看。（访谈的这天下午，薛金花把她儿子的照片拿来让我看，照片上是一个咧嘴笑着的男孩，旁边放着一个新的书包，孩子很瘦，但看起来很可爱。照片是在室内照的，屋子很干净，床铺整洁，可能是孩子的宿舍。）

现在我就是想写小说，题目就叫“一个女人的经历和命运”，叫天下人都知道男女要平等，偏僻的山区也要讲计划生育，不要包办婚姻，叫别的姐妹不要走我的路。

现在我的二女儿已经结婚，生了个女孩，女儿女婿来看我时我说他们：“要好好务义她，让她上学。”在我们那儿，扔女孩的可多了，我还在田垅里拾过一个，我做说服工作，让我侄儿务义她。大女儿还在她爷爷家，她爷要的钱太高，没人出得起。我哥家的女儿找对象时，也要好多钱，侄女来看我时我说她：“不要管人家要钱，主要是看两个人合得来。”侄女听了我的话，没要钱就结了婚，我哥生我的气，不理我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发表小说。我现在还在学文化，我的身体也好了，监狱给我治病，来的时候90多斤，现在我都130斤了，政府给了我新生，以后我就是死了，也把遗体捐献给国家。

后记：2003年3月中旬，我又一次收到薛金花的来信。她说，2002年底，她被评上了劳动模范，刑期从无期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点评：

家庭暴力是男女不平等的极端表现

宋美娅

对薛金花的访谈，是我这次对受暴妇女访谈中最长的一次。尽管警官两次提醒她“不要说得太细”，使薛金花不得不把想讲的内容简化一些，我们还是从上午10点谈到下午6点。

薛金花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家庭暴力个案，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暴力的几个特点：

第一，这个案例几乎包括了家庭暴力的所有种类：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限制。对待女童的暴力也很突出，虐杀和遗弃女婴，买卖女婴，殴打女童，限制女童上学，无一不在其中。

第二，它展现了家庭暴力的一个特性，即在暴力的实施中，往往是多种暴力形式同时发生，殴打、性攻击常常伴随着对妇女恶意的辱骂和不断的羞辱等精神暴力。有些时候，精神和情感虐待对妇女的伤害比殴打还严重。薛金花的经历中，让我们记忆深刻的还不是她丈夫没完没了的暴打，而是她的女儿被她丈夫一次次遗弃，一次次迫使她与孩子生离死别，这种痛苦使她难以承受，以至于导致她发疯。访谈时，薛金花对自己是如何挨打的细节倒不太着意叙说，但每说到她那些遭受父亲残害的女儿时，她总是哭泣着，细细地描述当时的情况。

薛金花的案例，加深了人们这样一个印象，即家庭暴力是一

个长期的、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也是家庭暴力不同于社会其他暴力的一个特点，它是特定的施暴人对特定的受暴人反复的、无目的的施暴。

绝不要以为薛金花是因为无能才导致如此命运，相反，她精明强干，十七八岁时就替父亲当上了村长，庄稼地里的活儿样样能干，驾驶牲口这样一般来说由男人干的活儿她照样干得利落；她的口才非常好，讲话头头是道，思维很清晰，能把众多复杂的事情讲得纹丝不乱；她还说得上有才，没上过几天学，但她能编演小品，能长篇写东西；她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农村妇女中，她应该是有才干的。

那么，她为什么遭受如此悲惨的虐待？她的丈夫一无所长，为什么却可以对她任意宰割？这就涉及到了产生家庭暴力的一个根本性原因，那就是男女不平等，家庭暴力就是男女权利不平等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从薛金花的故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男尊女卑”，在当今仍是多么严重。薛的丈夫屡屡虐杀亲生女儿，女孩子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女性地位之低到了极点。薛的公公，还是一名党的基层干部，竟公开买卖女婴，他无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毫不顾及薛金花的生死，就是为了生一个男孩，男女的地位在这个家庭里有天壤之别，田家父子从来就没有把薛金花作为平等的人看待。

妇女应该享有生育权，但薛金花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权利，她连自己生命健康、生命安全这些最基本的权利都没有，她确实是被当做了生育的机器。国际社会在反家暴的运动中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对妇女的暴力是对女人权的侵犯。薛金花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形象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4. 我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

叙述人 杨秀秀

访谈人 薛宁兰 王 涛

访谈时间 2001年3月2日

访谈地点 北京市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 王 涛

文稿编辑 薛宁兰

杨秀秀，36岁，农民。婚内9年，遭到持续的身体和性的暴力，丈夫经常酒后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她不同意或者不配合，就招致毒打。在1996年12月3日晚，当同样的事情发生时，她用裤腰带将丈夫勒死，后投案自首。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她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现在北京市女子监狱服刑。

我和我爱人是一个村儿的，结婚前彼此都挺熟悉。那会儿，大约是1985年左右，我们家条件不好，母亲早在我13岁时就去世了，父亲有病，姐姐结婚了，哥哥身体不好，我身体也不好，在我们村办企业花瓷厂上班，弟弟妹妹又小，我们家地里的活儿没人能干，他常来帮着干，一来二去的，他提出来跟我建立恋爱关系。其实，当时我不愿在本村（找对象），我觉得一个村儿的不好，有点儿什么事，娘家都知道了。可后来我考虑到家里这情况，他又常帮我们，就答应了。差不多相处了有一年吧，到1987年12月6日我们就结婚了。到1996年12月3日，我们结婚

有9个年头。他爱喝酒，还常喝多了。一喝多了，就找茬儿打架。每回他都动手，打得挺厉害的。不能说天天打吧，但几乎就是这样。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回是在我们结婚刚刚一两个月的一个晚上，他喝了不少酒后去厂子接我下班。当时他满嘴酒气，说话特别难听。从厂里出来我说他：“你看你喝酒怎么那么没节制，一喝就喝那么多，你知道你那些话怎么说出来的吗？都带脏字。这个厂子净是大姑娘，小媳妇儿，听着多不好。”他一听就急了，嚷着我说他了，到家就打我，非让我说出来这话是厂子谁说的，还非要拽我上厂子找人对质。我印象里那是他第一次打我，打得挺厉害的，差点我都没命了。他长得挺高、挺壮的，拳打脚踢起来，我这身上粘哪儿哪儿青。最严重的时候，身上的青紫瘀伤个把月都下不去。

1988年6月我怀孕大约五六个月的时候，一天他从外面喝完酒回来在床上躺着，我做好饭叫他吃饭，他不动换。再叫他，他就烦了，我说他：“你爱吃不吃。你饿不饿啊，不饿就甬吃了。”他上来就打我，把我抓着从地上扔到床上，我爬起来就跑，那天还下小雨，我跑到二门处被他抓住，他提着我一条腿把我拖进屋去了，打得我……

（杨秀秀说不下去了。她把脸扭向窗外，眼泪顺着面颊默默地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接着说——）

我当时想，要是把孩子打坏了，罪过真大了。后来孩子生下来还好没事，我也才放心。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只要他一喝完酒，你就根本不能说他。一说他，他就打人，甚至动刀。他不止一次把家里的菜刀架在我脖子上，数落我一大堆不是：“脾气倔了”，“说话不好听了”，“今天要把你宰了”，等等。不过拿刀砍人的时候倒没有。

他打我基本都是拳打脚踢。有时我心里不高兴，为了不挨打，强装笑脸，他也看得出来，也不乐意。他还老说我在性生活方面拿着他，说我瞧不起他。其实我实在是对他这么喝酒受不了。我有气管炎，闻见酒味我呛得上不来气，再一个他喝完了酒跟不喝酒就是不一样，一喝酒就没人样了，我这身体也不行。可无论怎么跟他解释都不行。

还有一回他又喝多了，很晚才回来。他拨拉我，我不理，他就打我。其实你爱喝多了不喝多的，你睡你的觉，我睡我的觉，谁也不理谁就得了。但不理他不行，也是一种错误。他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必须得让我说话。用他的话说，“我打你不说话，骂你不说话，怎么也得让你开口。哪怕是跟我骂，也要张这个嘴”。有时我心里真的……我也没有反抗能力，打就打吧。他打起人来，随便抄东西就打，那天连他的鞋也扔得满屋都是。他又拿起暖壶要烫我，我往门口跑，他又把我拽了回来。我求他：“我走了以后，甭管我上哪儿，你不要找我了。”他说：“你想什么呢，我不找你？你生气就走，就躲开了，你甭想那事。”您们看，我连躲开的权利都没有。

他经常喝酒到半夜，回来后就强迫与我同房。我一看他喝多了，就不同意，他便打我。有时麻利点儿我能躲开，就在外面大街上躲会儿，等他睡着了，我再回去。可怜的是孩子也跟着我受罪。我若往外跑，他抓不住时，就把孩子推给我。说心里话，我不愿意深更半夜地让孩子跟我受这份儿罪。我女儿够可怜的了，我们家出事时她才8岁，现在12岁了。从她刚会走时，我就领着她满世界转。白天还好点儿，我们一打架我便马上把孩子哄走。晚上没处哄孩子，孩子常被吓得哇哇直哭。几岁的孩子刚会走就总看这种场面。出事那天，她也在跟前，都被吓傻了。

记得那会儿孩子小不懂事，我带着她在街上瞎转。她总问，妈妈，咱们去哪儿啊？我说，能上哪儿啊，没地方去啊。后来慢

慢地她也不问了。孩子今年 12 岁了，我想这些事她也许还能记得。

他这个当爸的，一喝完酒一点儿人形都没有了，连孩子也打。孩子没出满月时就挨过他的打。那会儿孩子那么点儿小，屁股还没他一个巴掌大呢。有时他让孩子给拿什么东西，孩子小又贪玩儿，忘了，他上来就劈头盖脸，也不管哪儿就打。

那会儿我经常去医院，觉得气不够用，心里憋得厉害。去医院一回医生一看就说，你生气了吧？常问我跟谁生气，为什么事。后来我也烦了，不愿去了。吃药，管什么用。这次还没好，又生一肚子气，不还是这样吗？索性不去了。但我没去医院看过身上的伤，我嫌寒碜。

因为他总打我，我也曾跟他说离婚吧。当时赶上他发脾气，他说离吧，怕什么。我想生气时不说这个。有一回，他没喝酒，我跟他说：“老这样我身体也受不了。你也知道，我们家人心脏都不好，包括我。我跟你生气，甭说你打我，你两句话就能把我气得够呛。指不定哪口气上不来，死在你手里，你想外人会怎么说呀，不成咱们就离婚吧。”他说：“唉哟，你想什么呢，离婚，你受罪受死了你也死在我手里。”我一听他这话，真的绝望了。好好说的时候没有戏，赶上他脾气不好的时候就更没戏了。我要跟他离了婚，能有我什么好呀，他天天搅和我都是小事，他得搅和我们家里。

问：你知道可以向法院起诉离婚吗？

最起码我得先跟他说，如果他这儿都通不过，就是上了法院，他硬是不同意，婚也离不了，弄得人家都知道了，再往后也没法过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考虑孩子。离了婚也不见得能找到多称心的。孩子这么小，要是再给孩子弄个后爹，我想还不如他呢。我 13 岁母亲就去世了，没妈的孩子确实是……（杨秀

秀的眼圈红了)真是挺不容易。我想我活着一天,不管我自个儿受多大委屈,我无所谓,只要孩子挺好的,让孩子健康地长大,我一点儿别的想法也就没有了。

问:这些事情你娘家人知道吗?

我从来不跟我家里人说。我父亲有哮喘病,身体不好,我就怕他知道着急,可他有时打完了我,骂完了我,自己还觉得挺占理,强迫我跟着他到我爸跟前说理。这样,我爸爸和家里也多少知道点儿。有一回他打完我,又找我爸评理去,还强迫我爸签字。我爸感到莫名其妙,问他签什么字,他说:“你签字,她(指我)死了,跟我没关系。”后来我爸就劝我:你看他这人,一喝酒就这样,也不是因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你是游手好闲,什么都不干或外头找男人了,他这样对你,我不能说什么。你也没招他没惹他,就因为他喝多了,就总这样对待你,什么时候有个完哪。不成就上公安局给他备案去得了(指控告他)。其实我爸说的这些我也想过,可又觉得说出去寒碜,再说也解决不了问题,家里的事谁管哪,所以也没去,而且我也不敢。后来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他耳朵里去了,他对我说:“好啊,我听说你爸不得了啊,你爸要给我备案去,备去吧,我看看他都有什么新鲜的。”所以说,我要真给他备了案,我也就真没了命了,把我弄死了,我自个儿无所谓,可我还有爸爸、有哥、有姐、有家里人、有孩子,所以我心里想,有什么苦都忍了得了,有眼泪往肚子里咽得了。我爸有病,我哥也那么瘦。和我们家比起来,他们家哥儿八个,你想想,我们哪个是对手?哪样我们也惹不起他们。

对家里人我不愿说这些,对外人更不愿意说了。不过我们村里人也都知道。我婆婆、大伯子、小叔子更是经常看到我挨打的镜头。那会儿我们还没单过,和我婆婆住一起,大伯子住的跟我

们隔一堵墙。有一回，他插上门打我。他哥哥听见我们这儿乒了乒唧地响，跳窗户进去拉他：“因为什么你这样，你不兴少喝点儿酒！”可他还打，还把他哥气走了。但我婆婆的态度却不同。一听说我被丈夫打了，老太太就特别高兴，跟邻里乡亲夸他儿子有出息，有能耐。

问：他不喝酒时，你们是不是过得好一点儿？

怎么说呢？凑合吧。好的时候他说得好着呢，他也知道他做得不对，一喝酒就把握不住自个儿。一天晚上他喝多了回来（一般都是晚上，出事那天也是晚上），没说两句话，又乒了乒唧地打，我就躲出去了，等他睡着了我才回来。第二天我就跟他聊这事，我说：“你这算怎么回事啊，一喝多了你就这样，你就不能少喝点儿酒？”他说：“也是，昨晚的事怪我，你没有做得不对。”到了这份儿上，就是好的时候，我脑子里也老想着今天说这么好，一打我就跟谁都不认识似的。高兴了你这样，一喝酒一不高兴，你就成那样了。一对比，我就觉得从心里一直放不开，高兴时也放不开，就觉得这心里……

1996年12月3日晚上，他又喝酒了，喝得挺多的，晚上9点多回来的吧。我记得中午他就没在家吃。他做的饭，没在家吃。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几天12点多出去喝酒，一喝就一天，差不多转天早上四五点钟才回来，那天他回来算早。他回来时，我正躺在床上看电视，孩子已睡着了，他面红耳赤地进来，走路也不稳。我说：“你又喝酒了吧。”他满不在乎地说：“我没喝多。”他总这样觉得自己挺有把握的，上床后他想和我做爱，我没同意，一方面对他这么喝酒我有些生气，觉得喘不上气来。再一个我也特别反感他喝多了以后那种粗暴的行为。他要这天喝酒了，我准没好。我当时觉得，那样我还真不如死了，就没同意。当时他搂着我脖子，说：“你不同意，我打你，你信不信？”我

说：“那怎么不信，我太信了。”大约过了10分钟，他开始用手“啪啪”地打我的脸，我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又用拳打我后背，打得特别重，从县公安局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时，已经个把月了，我身上的青瘀伤还有呢。当时我心想：还不是喝完酒就老这一套呗，跑不了这一套，我就没理他。

当时天很冷，我上身就穿一个跨栏背心，冻得直哆嗦。我想穿上衣服把孩子送到婆婆那儿去，我出去转弯，我能消消气，他也能消消气，时间长了他睡着了就没事了。可没想到那天，他就是不让我走。而且他不但打，嘴里还嘟嘟囔囔地骂人，接着他又提我们家的事。

刚才跟您们说了，我13岁就没了母亲，我们家兄弟姐妹6个，我大哥、我弟弟、我妹妹这几年先后因心脏病去世了。我妹去世时还留下一个4个月大的孩子，我父亲不久后也去世了。他说我们家人“克人”。还说：“你呀，你好不着，就你们家的死鬼全缠着你呢。你想好你都好不了。我看了，今儿你家就得死一个。”我非常气愤，我上了一天班，回来忙一堆家务，刚躺下，他回来了，我没招他没惹他，打我一溜够，完了这家还得死一个，这是从哪儿说起呀？过会儿，他又接着说：“你把我勒死了吧，我活腻了，今儿个我就活到头儿了。”

（她又一次停了下来，漠然地望着窗外。窗外干枯的树枝在微风中战栗。等了一会儿，我们试探着问她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他不是那么说了吗，我就把我裤子上系的红腰带解了下来，系在了他脖子上。当时脑子乱极了，腰带怎么系上去的我都不知道，我只记得他一动也没动。我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动。他当时要是稍微动一下，我想也不会发生现在这种后果。也许是这么多年挨打积聚在心里的愤怒太多了，真是被气疯了。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走他不让走，其实我走了，他睡着了也就没

事了。真的，很有可能就没事了。多少年，多少回，不就这么过来的吗？这回为什么就非不让走，就非得“死一个”了呢？

当时孩子吓得哇哇直哭，我让孩子把邻居叫了来，让她去报案，接着我自己也去了公安局。当时我也不想活了，但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枪毙我也好，叫我怎么也好，我得说出来这些年窝在我心里的火。我什么错也没犯被他打成这样，到最后还被逼到这一步。

后来法院判定我犯了故意杀人罪，开始我真想不通啊。在我的记忆中，我连一只鸡都没宰过，我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现在想起来我真是挺后悔，觉得自己挺窝囊的。我爸爸是一名教师，从小就教育我们最起码做个好人，不能做个坏人，不能干坏事。那会儿，我们家6个孩子，加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10口人，吃不上饭，饿得身子骨都长不开，都像我这样。生产队大片的玉米地没人看管，但我爸绝不允许我们去掰一个棒子吃。其实，挨饿的年头村里好多人都做过这种事，可我没做过。我连做梦都没想到我竟然能杀人，自己真是太不懂法，从来不知道国家法律能管这方面的事。但凡知道有这样一个制度，我也不能干这种事。所以我也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让与我有类似遭遇的姐妹，不要再走我的路，还是寻求法律的帮助来保护自己。

（访谈结束，分手时，她又一次提到了孩子——）

前几天，我们当地政府负责帮教的干部来这儿告诉我，他们准备把我女儿送到一所学校去念书，区里负责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这些年孩子一直是我婆婆带着，现在老太太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也没什么经济来源。区政府这么关心孩子，我心里真是挺感动的。我特别想孩子，尤其是刚来服刑的时候，一心就想见孩子，可婆婆不让见。现在有政府关心孩子，我也放心一些。孩子早晚有长大的一天，我也有出去的一天。在这儿，我能与家里

通信，家人也能定期来看我。平时劳动、学习，做些缝纫或做一些什么的活计，周六、周日可以看电视。我现在的身体比在家那会儿强多了。我也没别的想法，就是好好地干活，遵守规矩，争取减刑，争取早日看到孩子。

访谈后记与点评：

受暴妇女为什么会走上杀夫之路

薛宁兰

2001年3月2日这天，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我们被允许进入北京市女子监狱访问杨秀秀。她走到我们面前，单薄、弱小的身体，苍白、消瘦的面庞，使人很难将她与一个杀人者联系在一起。究竟是什么促使这样一个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竟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就连杨秀秀也在反问自己：“我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过从杨秀秀的叙述中，我们还是可以捕捉到促使她杀夫的外在的社会原因与内在的个人原因。就前者来看，对受暴妇女社会救助系统的薄弱，包括社区内部缺乏暴力投诉和咨询服务机构，以及警察对家庭暴力介入和制止的不力，等等，是发生“以暴制暴”悲剧的社会防范体制缺失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尤其是亲友）固有的对待配偶暴力的观念，以及在这种男权观念支配下对配偶暴力超常的容忍，和对受暴者处境的冷漠与不助，是围城内的暴力得以持续并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两个最能帮助杨秀秀免遭暴力的人：一个是杨秀秀的婆婆，她对儿子打媳妇，不仅感到高兴，还认为这是儿子有出息、有能耐的表现。另一个人是她的父亲，这位教师，虽然提议女儿到公安局去“备案”，但也只是

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行动。并且，他还有一个观点，如果女儿在家里游手好闲或者在外头找了别的男人，她丈夫打他，就是应该的。

就后者来说，杨秀秀本人对配偶暴力的性质，还存有模糊认识。她认为把挨丈夫打的事说出去“寒碜”，家里的事外人谁也管不了。她还把解决自己受暴的事当成了丈夫家和自己家之间的私事，简单地靠比较两家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事情最终的结果。法律知识的欠缺，也是杨秀秀错过解决问题良机、最终杀夫的一个原因。她错误地认为只要丈夫不同意离婚，就是到法院也离不了，从而轻易放弃了通过离婚结束暴力婚姻的机会；她也想过寻求公安机关帮助，但是，由于对社会和法律支持存有疑虑，以及害怕报案后解决不了问题，反遭丈夫打击报复，以致自己性命难保，她最终没有采取上述合法的借助公力的救助手段。

杨秀秀一案，再一次向社会发出警示：一味忍让，不是避免配偶暴力的良策；靠私力“以暴制暴”，更不是结束暴力的合法途径。今天，家庭暴力（包括配偶暴力）不再是“私事”，而是侵犯家庭成员基本权利和尊严的违法犯罪行为，每个人都应当及时予以制止、举报；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例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立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机构，来预防和制止暴力。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当适时开展反对家庭暴力的公众教育运动，通过各种媒体，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宣传，对典型案例予以剖析，以普及法律知识，转变公众在家庭暴力问题上所持的传统观念。这也不失为今后防止暴力升级，减少类似杨秀秀家庭悲剧重演的对策之一。

5. 忍到最后还是杀了他

叙述人 于淑芬
访谈人 张捷明
访谈时间 2001年3月15日
访谈地点 辽宁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 张捷明
文稿编辑 薛宁兰

于淑芬，32岁，农民，文化水平小学三年级。在10年的婚姻生活中，从生女孩开始，就受到丈夫歧视，多次遭到无端殴打。1996年春节期间，当丈夫到娘家寻衅滋事时，她顺手用木棒子把他砸死，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98年9月减刑至无期徒刑，2000年再次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6个月。

咱俩是自由恋爱的

1986年我17岁，他19岁的时候，咱俩结婚，开始了两人的生活。咱俩是一个村的，咱家是从黑龙江返回的，家庭挺困难，跟他处对象的时候，他人品挺好的，也能干，所以就跟他结合在一起了。结婚时，婆婆家啥也没有，婆婆给了10块钱，让买锅碗瓢盆。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家庭条件虽然说困难一些，只要人能干，什么困难都能解决。结婚没多久，咱们就从婆家搬走了。婆婆给的10块钱，做了两套行李，买了两件衣服，当时就挤住在我二大伯家，开始咱俩还挺好的，到后来家里挺困难的，没有

钱用，他就出外去打工。

打工一开始还行，他能给家一些补助。过完年，我就怀孕了，生下来是个女儿，他就挺反感的，因为农村重男轻女。这样一来二去咱俩感情就有些破裂了，后来他在外边有了外遇。他在外头胡搞，一年也就给家里几百块钱了不得了。我自己带着孩子，亲戚朋友有个头疼脑热去看望，家里油、盐、酱、醋乱七八糟的钱全都是我自己拿，咱家本身什么都没有，就这样我一直跟他过着。他有跟我离婚的想法，但是他父母不同意。

他们两个在一个砖厂里干活，他两三个月都不回家，他挣的钱跟那女的出去看电影，逛商场，吃了喝了。咱们村子里都是一小帮一小帮地出去，有些人知道了也不敢说，因为他那人脾气挺暴躁的，牲口性子。跟我关系不错的人跟我说了，还说：“你家里那个，饼干吃不了都扔鱼池里，也不拿回家里来给他女儿吃。”他跟别人谈情说爱，吃不了的东西扔鱼池里喂鱼，他都没想到家里的人，我感觉他的心态不太正常。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最起码要有个良心，没有良心都不叫人，我这人都实话实说，我没有啥文化。

（她哭了。用手去擦止不住的泪水，过了一会继续往下说——）

我（对他）说，咱俩要是生活不了，可以离婚，孩子我自己抚养，不用你抚养。你出去闯荡，要能闯荡出个人样来我也高兴，如果说你不能干，你回来，咱娘俩儿还欢迎你。除他妈以外，他家里人都清楚是我提出的离婚。他妈有那种病，好迷糊似的，经不起那种刺激。他就是怕他妈有什么后果，不敢和我离婚。他嫂子也劝我说：“等往后有个男孩的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就有个定性了。”这样，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耐他。我有了儿子之后，他还是那样式儿的，常年不在家。

他妹子，就是我小姑出外也是打工，她在饭店干活。有一天，我对象（指她丈夫）刚从厂里回家，两天的时间，他妹子回来了，她说：“哥，明天上厂子里开支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妹妹给捎的信是假的，是那个女的约他。一次他喝酒，在别人家喝酒，说出来了，就是说他俩在什么地方约会，什么地方住的，就是在旅店里住的，就讲这些过程，这样我才知道。后来我看到他有一本日记，日记里就写他对这个女人的一些幻想和这个女的长相和表情，还有他俩谈话的方式和姿势。

有一次，他要到沈阳去打工，家里没有钱，他让我到他大姑家借钱。他姑姑80多岁了，我去了，说：“大姑啊，能借我俩钱儿吗？”她说：“你借多少？”我说：“借我50块钱就行。”大姑家他老爷子就拿出45块钱，说：“孩子，就45元钱，借你。”我把钱拿回来给他了。当时他在银行贷了200块钱，他说得也挺好的，等他把这钱取出来之后，再还给人家。但是他第二天早晨走的时候，他连贷款的票和45元钱全都揣走了，当时我就说：“那票你要不给我扔家里，钱你就别揣走，过两天老爷子那钱我怎么还啊？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弄钱，我不能这么不做事儿啊！”但是他还是都拿走了，我就跟他说：“你要是拿票就别拿钱，拿钱就别拿票，总之两条道任你选一条。”当时他就骂我，他说：“钱和票我一起全拿走，你想要，没有！”我一想，我上山刨药或去干别的，累多少天我才能挣45块钱？有孩子，不可能不花，我上哪儿能挣那些钱去？就这样，我就在后边跟着要这个东西。我在他后边儿跟着他，他在前头就用个大石头狠劲儿搁我，当时我脸上被打得全都青了。我还是跟他走，他把我摁在地上打，掐我脖子，用脚往我小肚子上踹。

后来有一个老爷子走过来拉他，拉也拉不住。他大小伙子挺有劲的，能拉得了吗？当时我躺在地上，就捡起一块石头凿他大腿。凿第一下的时候，我也没想别的，凿第二下的时候，说啥我

下不去手了，就把石头扔了。我一边哭一边说：“你还打我呢，你心里想一想，你一丁点儿心肺都没有，你没有良心啊！”当时他大哥正在那边儿干活呢，这老爷子去召唤他了，他大哥转身就走了。因为什么？就因为他牲口性子，他哥要来拉他，他就反而去向他大哥发火去了。他背着包走了，钱都拿走了，我就在后边跟着他。当时就把我的鼻子打出血来了，半拉脸全青了，我一边走，一边在后边骂他，我说：“你一点心肺都没有，一点良心都没有！”到后来他就坐在地上，不走了。兴许就是我一骂他，一激他，他良心发现了，这样他拎着兜子就回他妈家里去了。我回我娘家了，那时我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因为咱家没有房子。

结婚8年后，我们在山坡上头盖了一间小房子

盖房子以前咱就买了树苗子，盖了房子后开始开荒地，栽树，苦干了3年。这3年他也出去，他出去的时候我在家整。这3年里头他对我一点儿也不好，因为他的心早已经飞了，他不能出去玩儿的时候，才在家里帮帮我。开荒主要是我的力量，在我逼迫之下，他才干一点儿。他作为父亲、作为丈夫，别人也说他：“你媳妇那样干，你一个男人不能这样子不干活。”所以说，他良心上也有一些谴责。他不喝酒的时候，还行，还能想到家里头，想到孩子。他喝完酒，打上麻将，谁也不想。

1994年春节，早晨我就上我妈家去了。当时我在洗衣服，他去跟我说：“你快点儿给我借100块钱，我上外头玩儿去。”我说：“我上哪儿给你借钱去？你能花你就自己借吧，我可不能借去，借了钱到时我用啥还人家呀？”他就骂我：“操你妈的，你借不借？你不借，给你家都平了。”就用这样的话来恐吓我，我不愿意让父母为我担心，就上邻居家去了。我对邻居说：“你借我俩钱儿吧。”她问我借多少，我说：“就借我100块钱吧。”我借了100块钱拿回来给他，他就去打麻将，他上我借钱的那家打麻

将，他说：“打一块钱的。”人家说：“打一块钱的没人跟你玩儿，借人家的钱玩儿麻将算啥呀？你那属于拿咱的钱来赢咱的。你逼你老婆上咱家借钱，完了跟咱们打，不跟你玩儿。”

他那天没玩儿成，回家就跟我干起来了。当时儿子和女儿吓得猫到墙旮旯儿去了。他们说：“爸呀，你别打我妈！妈呀，走吧，咱不跟我爸过了，跟我爸过不了，他老这么打咱们，咱能跟他过吗？”当时我就说：“儿啊，别哭啊，没事儿。”他就揪我俩孩子：“睡觉，听什么听？睡觉！”他用笤帚狠劲儿往我身上摔，拳打脚踢。当时我还不不敢跟我妈说，跟他妈我也不能说，因为他爸跟他妈身体都不好。老人也担心咱们，何苦的呢。

具体哪年吧，我也记不清了，有一次来了个卖雪糕的，我儿子跟他说：“爸，我要雪糕。”当时雪糕是两角钱一根，他说：“要什么雪糕，谁这时候吃雪糕！”那时候是八九月份，天气有点凉了。我儿子才3岁。小孩儿，看新鲜嘛。当时儿子要，他就不给，孩子就哭了，他就打儿子。打儿子时，我也拉，他妈也拉他。儿子吓得说：“爸，你别打我了，我服你不行吗。”他说：“服我，服我也打你，谁让你不听话，就打，我还没吃雪糕呢，你吃？赶快回家！”儿子吓得啊，光着脚丫就跑，连鞋都没穿。咱家在山坡上住，他奶奶家离咱家挺远的，得过条小河，孩子在前面跑着说：“妈呀，前面有水，咋整呢？”他喊：“你给我跑，搁河里过去。”当时我说：“你等着，妈抻（拉）你过去。”儿子吓得不行了，我后头追上他，把他抻（拉）过河去了。过河了，孩子还吓得直跑。咱家是在那个小山坡上头，有二层楼那么高吧，孩子就搁山道爬上去。孩子到家的时候，吓得跑到后院秫秸垛猫起来了。我就喊孩子，怎么喊也不出来，后来孩子吓得缩缩地出来了。他就说：“都是你惯的孩子，惯成这样了。”我说：“我怎么惯孩子？孩子这么听话。孩子不就要个雪糕呗，没有钱就不给他买，你也不能打孩子。”他对孩子说：“穿起鞋玩儿去，

别在屋里呆着！”我儿子说：“我不出去。”他说：“你出不出去呀？”儿子说：“我不出去！我就跟我妈呆着。”他拿起两只鞋，拿起一把刀来，对着孩子喊：“你穿不穿？不穿我把鞋割坏！”当时，我儿子也挺拧的，说：“不穿！”他说：“那你真不穿？”孩子说：“真不穿！”他把那双鞋，一只鞋尖扎一刀，那么长的口子。那是我过年刚给孩子新买的一双鞋。我说：“你这也是太没人性了，对不懂事的孩子，你都这样，还有没有良心？”他骂我：“×你妈，我有没有良心咋的？我用你教训我了？”这就冲我来了，当时我没理他，不能和他一样，然后我就出去干活儿去了。他这股气没出，就走了。

他走了一天，晚上回来了。他借了一辆自行车，扔在山底下了。我说：“车扔在山底下，谁偷去咋整啊？是谁的车，还人家。”他说：“你给我取去。”我说：“行，我推上来。”他又说：“放下边，不推了，你给我烧苞米吃。”我正在外边熬猪食，我一边熬猪食，一边给他烧苞米棒，烧好给他拿屋里去。他拿起来就掰两半，扔地下一半，然后就喊我：“掉地下了。”我又进屋给他捡起来，我将（刚）走出门口，他又扔地下了，我又给他捡起来了。捡起来之后，我就出去了。因为外边火还着着呢，咱在山坡上住，那火出来，风再一刮，就可以说是放疯（放火）了。我跑出去时，他又喊：“又掉了！”我又回屋给他捡起来了，当时我说：“纯粹你是装的，故意的，喝点酒，干啥呀，这样折腾人，一次行，两次行，哪有再三再四的？”他说：“咋的，不服啊让你捡，咋的？！就故意扔，就作践你。”当时我一听，也挺生气的，可是我也没吱声，我想算了，忍了，这些年都忍过来了，何苦呢，就差这一会儿了，忍过去，过后就拉倒呗。他又说：“下山坡底下把车给我推上来。”我说：“行，我就推去。”我走到窗根底下，他喊：“你回来，不用你推，怕你攢（脏）了我的车子。”我一听挺生气的，就回来了。回来我将进屋，屁股还没挨炕上，

他又说：“×你妈，你给我取去，给扛上来，不能推着来。”当时啊，我已经是忍无可忍了，我就出去了，到前门的时候，我手就往头上一伸，使劲一揪。我跟自己赌气。我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能耐呢，太窝囊了。我就下去给他推车去了。推车时一看，我这个手丫缝里全是头发，自己拽下来的，当时我自己差点没把自己拽倒了。

我把车推上来，他又吐了。我全给收拾了，收拾完之后，他就吐唾沫，炕上、地下、被子，不管是什么玩意儿，他到处吐。那味儿啊，给我熏的，我气得很，还不能吵，一吵就打起来了。我真忍无可忍了，说：“得了，你不是能喝吗？喊你三哥去。”当时我也生气，就没好气地喊了两声，他就出来了，拿起一大块砖头，就搥（砸）到我的大胯上，当时就起了个大包。他拳打脚踢，把我眼角给打坏了，到现在还有个疤呢。打得我鼻子的血淌在道上全是。我这一喊，大伯子和婆婆都听到了。他们合计我们这里有坏人，他三哥吓得支楞就跑过来，一看是他打我，他三哥啥也没问就打他。一会儿他妈也过来了，老太太是蹚河跑过来的，当时我就说：“妈呀，我不能跟他过了，我要走了，这日子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老婆婆哭了，说：“孩子，你看在妈的面上，听妈话啊，天都这么黑了，你上哪儿走呀？跟妈回去吧。”我婆婆就把我掖（拉）她家去了。他一直打到她妈家，到了他妈家，她妈就把他掖到屋里去了，别人把我俩分开了。我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咱也不能在别人家过夜吧，我就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看半边脸全都青了，脸上全是血。我就洗洗头，洗完头我就坐炕上呆着，他躺在炕上蒙个大被子。早上我弟弟就给我送孩子来了，一进屋就不高兴地说：“孩子扔那儿就不管了，自己在家头。”我说：“孩子就放那儿，你回去吧。”我弟弟听我说话不对劲，问：“你咋的啦？”我把头将（刚）一

抬，我弟弟看我的脸全都青了，他就说：“二姐夫，你真够意思呀。”我说：“柱儿，听二姐话，回家吧，二姐没事。”我就把我弟弟推走了。我弟弟走出去往下一看，道上落的全是血，他噌噌就回来了，进屋就说：“二姐夫，你真行呀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他就骂：“我想能咋得了，我想什么？你少管闲事！”当时他俩就僵起来了。我就推我弟弟说：“你走吧，二姐没事儿。”我弟弟含着眼泪走了。这件事情到这儿就过去了。

我唠叨唠叨我家里的生活。他出去到外边打工的收入不够他自己用的，我开荒种地，家里没钱，没粮没米，没油没盐。他啥也不管，有时家里连吃的粮食都没有。有一次我下地干活去，儿子和女儿看家。中午12点多了，我回家路上遇到弟弟，弟弟说：“咱家正好收地瓜，你回去吧。”我说：“不去了，俩孩子在家呢。”弟弟说：“二姐，没事去吧，咱家好多呢。”我就去了。我妈捡起一些地瓜，放在盘子里，我就吃了一个。我妈说：“咋不吃了呢？”我说：“给俩孩子拿家去。俩孩子在家还没饭吃呢。”我妈说：“行，那你就给孩子带回点儿去吧。”我就端了一小盆地瓜给孩子带回家。到家门口时，我就喊俩孩子，俩孩子把地瓜端过去围着小盆坐那儿吃，边吃边说：“妈呀，这地瓜真好吃！”哎哟，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说：“好吃就快吃吧。”

我跟孩子相依为命，俩孩子特别听话。我就告诉俩孩子，来卖雪糕啥的不能要，妈没钱给你们买。我儿子说：“妈，我啥也不要，雪糕我能要吗？我不要。”有时候孩子饿了，我就跟儿子说：“妈给你整点儿饭吃，别管什么吃的。”儿子说：“啥也不要，我摘俩小苹果吃就饱了。”

（回想起孩子们在这个家里受的苦，她又一次泣不成声。她抽泣着继续说——）

有一次，我偷着给女儿和儿子合着买了一根小香肠，掰开给

他们俩一人一半。我女儿懂事，说：“妈，我不吃，给我小弟吃。”就这样，他知道了还骂我：“×你妈的，你给孩子买香肠吃。”我说：“人家孩子都吃过，咱家孩子都吃不着，一块多钱，我就给孩子买了一根呗。”他说：“没有钱还给孩子买？”

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挺理智的时候问我：“你问问孩子，咱俩要离婚，孩子跟谁过？”我问我女儿，女儿说：“我跟你过，我不跟我爸过”我问：“那儿子你呢？”“妈，当然跟你过了，谁跟我爸过呀？净打俺们。”他气得踹女儿一脚说：“被子是我买的，你别盖了。”当时女儿就把被一揭：“不盖就不盖，那也跟我妈过，不能跟你过。”可想而知，在孩子心目中，对他一点儿感情都没有，孩子跟我特别亲。

有一次他喝了酒在家，我说他：“你在外边挣钱，又吃又花，又逛这儿又逛那儿，一分钱也不往家拿，还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你能对得起我吗？”他说：“你能对得起我吗？”我说：“我姓于的多咱也能对得起你，从来没背叛过你，无论多么穷，多么困难，作为一个人，就要这一张脸，就争这口气。我要不争一口气，我还叫人吗？根本不叫人。”他说：“好吧，如果你对得起我，没有背叛我，那你就把这瓶卤水喝了。”我接过来就喝下去了，我把卤水喝下去，他又害怕了，用手抠我嘴，让我吐出来，我说：“不用抠，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心里无愧，绝对不会死的。”他说：“不行。”他就抠我嘴，他一伸手我就咬。我肚里受不了，就吐了，我也没上医院。昏昏沉沉地呆了两天。第三天他跟他妈、跟他三嫂说了我喝卤水的过程，他三嫂子就骂他：“你啥事都能做呀，逼你老婆喝卤水，来证实她对你的清白！”

我俩怄气时，我有时候顶撞他两句，我想，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来说，也有性格，不能任他宰割，他做得不对就不能任他做。

我这案件，是因为他打麻将赌钱引发的

1996年春节，初六那天，他到我妈家打麻将，我妈说他：“你让媳妇给你借钱打麻将，你一天天不着家，日子过得稀里哗啦的，还打啥麻将呢？”他不听，跟我妈就吵起来了。当时我弟弟在，压下我妈火，让他回家了。他一回家就冲我们娘儿三个发脾气。我想，这咋整呢？我们又要遭罪了。正好他哥他们在，我就给他们使眼神，让他们赶紧就给他捂了捂神（压压火），让他消气。他哥、还有他那个妹妹和他妹夫也劝他：“走吧，走吧，下去玩儿去，溜达溜达。”这样他就下去溜达了一会儿，消气了。

咱家没有电视，孩子爱看电视。有天晚上，孩子他们下去上我妈家看电视，我也去了。看完就11点多钟了，闺女睡着了，我就扒拉闺女，让她起来。孩子睡得迷迷糊糊地不愿意起，我妈说：“你还是把孩子带回去吧。”我就把孩子提溜起来了，领着闺女走。孩子没睡醒，一边走，一边老揉眼睛。他抱着儿子，他一瞅闺女就生气了，不知道为什么生气，把女儿拽着就跑。他一米七八的大个子，我跟他后边都得小跑。孩子睡了半夜觉，迷迷糊糊的。他拉着孩子跑，我就在后边跟着跑。等我到家的时候，人家已经都进屋了，把门都插上了，给我关在门外了。他这是跟我来气，也不知道是哪一股气，看电视的时候还好好的。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妈没留孩子住下，他生气了。

我在门外头站着，挺冷的，女儿在屋里哪能呆下去，就要给我开门，他不让开。女儿悄悄地给我开了门，我就进屋了。他就咣咣一脚一脚地踹女儿，女儿躺在炕上，吓得不敢哭，一动也不动，任他踹。我就挡着女儿，他不让我挡。我把孩子拎起来说：“穗儿呀，你给妈开门干啥，你让妈在外边呆着呗，何苦你挨打呢？”女儿说：“妈呀，我怕你冷嘛。”女儿哭了，他还是又打又骂：“×你妈，哭啥！”当时我想这又没好了，又该遭罪了。儿子

吓得“哇”的一声就哭了，朝我扑过来了。我女儿还是没动弹，孩子挺拧的，他还是一脚一脚咣咣地踹。我一看这也没头了，天哪，没法过了，这可咋整啊？我就把孩子全都领到外头呆着去了。呆了很长时间，他在屋子里不吱声了，我才把孩子领进屋里。孩子躺下就睡了，这样就算过来了。

正月十七，小姑子让我们帮她家送粪。我到他妹家干活儿，没带女儿，带儿子去的，在她家住了两宿。正月十九那天，1点多钟吃完了中午饭，咱就赶车回来。他酒喝多了，一道上就骂骂咧咧的。我没吱声。走到公社门口的时候，他说：“我上公社看看去，他妈的，谁要牛我就宰了谁。”我拦着他，不让他去，他说：“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啦？”我儿子也说：“爸呀，别去了，咱回家吧。”他说：“儿子的话还差不离，听儿子的。”我们就往回走，他让我赶车。他又说上我大姐家去，他酒喝多了爱闹事，我怕不去又挨打，就说：“那就去吧。”他又说：“不去了。”不去了咱就往家走。他让我赶车不用靠边，一直在马路中间走。可是，那驴它能往车上撞吗？对面来车，它得往边走。他这也骂我：“×你妈，不让你靠边，你非得靠边。”我说：“我往车上撞，那牲口能往车上撞吗？是牲口要往边上走。”我就用棍子在牲口后背上敲一下，想让牲口快点走。他就骂我：“×你妈，你打牲口，不是你拉车，让它慢点走。”我就把棍子给扔了。我抱着儿子赶车，他在后边躺着，他一把就掖（拽）住我后脖梗，让我倒在车上头，他这种做法让我受不了，大马路上让人看见也不好。我扒拉他一下，他嘟嘟囔囔地骂我，我气得说：“如果我不是抱着孩子，我就钻到车底下让车轧死。”他说：“轧死你，不便宜你了？”他又说：“你让车快走！”我就在道边大树上掰了一段树杈，赶牲口，让牲口快跑。

他大哥在那边干活儿，看咱们过来，就来接车。我抱儿子下车了，也让他下车。他就给我使眼神，装听不着。他大哥说：

“你下来吧，到家了。”他还是没动，我又说：“你下来吧。”他才下来了。到我老婆婆家，我把孩子放在屋里炕上，去上厕所，将（刚）到前门口时，他也到了前门口，我出屋，他进屋，他就往我屁股上狠踹了一脚。我没吱声，我老婆婆说：“你干啥呀？”他说：“我踹她。”他妈说他没样。我上厕所回来跟儿子说：“走，回家烧炕喂猪，给你姐做饭。”他就骂我：“回家，回什么家，给我买盒烟去。”当时我手里头就有一块钱，我说：“你拿钱来，我给你买去。”他就往我娘家走，我跟在后面追，他顺手捡起一根棍子，我上去拼命抢过来。到了我娘家，他一进门就骂骂咧咧地往屋里冲。说我妈初七没让他玩儿麻将，要找我妈算账。我弟弟拦着他，不让他进屋，他抡起扁担朝我弟弟头上磕（砸），我弟弟一闪，没磕（砸）上，我弟弟跟他夺扁担，没夺下来，他又抡起扁担……我心里恨极了，手里拿着棍子朝他头上狠劲地磕（砸）下去，他倒在地上不动了。……后来我自己到派出所去了。

大队书记到派出所问我：“你兜里有没有钱？”我说没有钱，他掏出100元钱来递给我说：“你也得吃饭啊，家里的事你都不用想得那么多了，打官司的事就要靠你自己了。”我在派出所呆着，案子办得差不多了，就送我到看守所去。当时我很想回家看一眼，想看看我婆婆、看看我孩子。可我又一想，回家看见婆婆，看见孩子，都是挺伤心、挺难过的，进了院子就不那么容易出来了。一想，狠狠心吧，还是不见他们为好。我下车在街上站了一会儿，就随着车到了看守所。

被判刑以后，我的感受很多

家里两个不懂事的孩子，由我老婆婆和老公公抚养。两位老人岁数都大了，所以我心里特别内疚，也悔恨自己。如果没有我的过错，老人也能享点儿福，孩子也不能无父无母，无依无助。出事以后，4年多我没看见婆婆和孩子。去年5月份的一天（几

号记不清了)，4点半多钟收工的时候，队长喊我，狱里特批允许我接见，因为婆婆带着两个孩子，没有钱，一路上忍饥挨饿，逃票到沈阳来看我。我一进屋，看到离别4年的孩子和老人，心里不知道有多难受。

（她泣不成声。停顿很久，才断断续续地说——）

我跪在婆婆面前，只说了一句话：“妈，我对不起您！”我婆婆说：“孩子，妈都为你呀！妈为你抚养俩孩子，你在里边好好干。”当时我婆婆哭得昏了过去。我女儿和我儿子都哭了，一家人哭成一团。管教队长、科长看到那种场面，当场拿了500块钱，给我孩子和婆婆回去作路费。

记者采访过我，登过报纸。登出来以后，有很多好心人，有上海的、山东的，各地方的人，为咱家孩子寄吃的东西、寄钱、寄衣服。儿子来信告诉我，很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我心里很感动。

今年正月的时候，法院那边给我寄来了500块钱，给我个电话号码。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说：“电话费挺贵的，你什么也不用说了，你要好好干。钱，不是我给你的，是一位老人给你的，希望你好好改造，不要辜负他老人家的心愿。”

通过许许多多方面的帮助、教育，我在改造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判的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6年入监，1998年9月份改判（应当为减刑）无期徒刑，2000年改判（应当为减刑）有期徒刑17年半。今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减刑会上我又受到了局里的省级劳动奖。一次，我们监狱做棉服的车间失火，我勇敢冲向前，把火控制住了。当时我没有想自己，没有想后果会是什么。上级又给我记了功。

今后，我绝不辜负好心人对我的关照，对我孩子的关照，更不能辜负苦心帮助我、教育我的队长，我好好改造，就为了早一

天回家，孝敬我年迈的婆婆。

访谈后记与点评：

冲出传统父系思想的禁锢， 提高社会性别意识

张捷明

2001年初春，我们去沈阳女子监狱访谈。监狱管教人员向我们简要介绍了我们要访谈对象的情况，虽然她们每个人的家境各不相同，然而，她们却都采取以暴抗暴这种极端的手段解决问题，从而触犯了法律，走进了监狱，酿成了悲剧。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于淑芬是一个善良、勤奋的农村妇女。在她与丈夫10年的婚姻生活中，她因生女孩受歧视，两人感情开始产生裂痕；丈夫嗜赌成性，不顾家境；进而又有了外遇……丈夫多次无端地、毫无人性地把于淑芬打得伤痕累累，有时还殃及到孩子。而于淑芬却一直在惊恐中小心翼翼地依从着丈夫。但长期的受虐，多年的积怨，愤恨已潜在她心底。当丈夫到自己娘家寻衅滋事时，她顺手用木棒打死了丈夫。结果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走进了监狱。两个幼小的孩子只得与年迈的婆婆艰难度日。

于淑芬入狱后表现很好，政府曾两次给她减刑。在一次被服车间起火时，她奋不顾身救火，还立了功。

于淑芬案，不是惟一的“以暴抗暴”、从而触犯法律的案例。在她之前有，今后也还会有。她们本身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后她们又去杀人，受害的不仅是她们自己，还有孩子、老人以及家庭本身。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家庭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传统的、封建的男尊

女卑的父系思想仍深深植根于社会的庞大群体之中。他们认不清自己在社会中的性别角色，以传统的家庭结构定型自己的角色。诸如要求男人要高大，要拥有社会权利……对女人则要求“温顺”、“贤淑”……这样的性别定式往往被认为是“合理”的，而这种对于女人的要求，实际上是封建社会要求女人“三从四德”的翻版。在这种“合理”中隐含着诸多的不合理性，进而导致了林林总总的家庭问题。

在我们所见到的家庭问题中，存在着类型不一、轻重不同的家庭暴力。这些家庭暴力问题，并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比如，丈夫打妻子，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事情，用不着大惊小怪；而一纸婚姻契约，丈夫就可以漠视妻子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存在而为所欲为（例如丈夫不顾妻子的情绪强行要求性行为）……这些都被视为是“合理”的。更为可忧的是，这些受到家庭暴力虐待的妇女，也没有意识到自身人格价值的存在，认可了传统赋予的角色，甘愿将自己的命运依附于丈夫，于是对丈夫的暴力采取逆来顺受的容忍态度。其结果是纵容了暴力，进而又导致家庭暴力行为的升级，最终酿成悲剧。

怎样才能让这些受暴妇女认识到自身价值的存在，真正做到自尊、自强、自信、自爱？

怎样才能让施暴的男人认可与妻子地位是平等的、进而尊重她们的人格？这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的问题。

一种社会现象，如果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那么问题的症结必然植根于社会的本身，而解开这个症结的关键也应该到社会本身中去找寻。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就是如此。

6. 杀了他我就没想活

叙述人 付梅英

访谈人 宋美娅 敖毅

访谈时间 2002年4月18日

访谈地点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 宋美娅

文稿编辑 宋美娅

付梅英，1963年出生。卫校毕业后，她在包头市某家医院做护士，她的工作很出色，曾是一名优秀职工。不幸的是，当警察的丈夫婚后不久就开始对她施暴。1995年12月23日，付梅英用手枪射杀了他，事后主动投案。经法院审理，一审判处付梅英死刑。闻讯后，包头市总工会、付梅英工作的医院、居委会的400多名群众联名写信为她申辩，请求法律从宽处置。二审，她被判死缓，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服刑。两年之后，她被改判无期徒刑。2000年12月，由于她在狱中优秀的表现，减刑至18年。

当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谈起往事时，她显得很平静。

时间长了，现在再谈过去的事，爱也谈不上，恨也谈不上，和刚判下来的时候感觉大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很激愤，现在跟说别人的事似的，六七年了！

他打我，我心里特别不平衡

我工作在包头，在一机厂医院当护士，邵平是第五派出所的民警，管我们一机厂，对，就是片警。我和他认识是通过我妈单位的一个人介绍的，我妈我爸一看，挺赞成，小伙子挺精神，人也老实。他们家穷，家里4个孩子，父母靠种地供他上学，他考学考到包头市财校，毕业后分配到派出所。谈对象那会儿，他对我挺满意，我也上了中专，他家在农村，我家在城市，各方面条件都比他好。谈了不到一年，1986年年底结婚。结婚时，他们家给了我们500元钱，反过来我妈还给他做了一身新郎装。

刚开始他对我挺好，我更是对他好，虽然日子苦点儿，但两人心齐，缺什么置办什么，一心过日子。不到一年，就出现了问题，就是一些家庭琐事，大事也没有。他第一次打我，我记得可清楚了，那时刚结婚，还没有孩子。

那时，他大弟弟上师范，在我这儿吃住，他两个弟弟都在我这里住过。那一次，他出差了十几天，不知道他大弟弟跟他说什么了，到现在也是个谜。出差回来他不回家。我们就住在派出所的楼上，他们的办公室在楼道外面，我们家就在里面，比如晚上回来吧，他就没回去。我看见他很奇怪，我说：“你咋没回家？”

他说：“你还问我，你干的好事！”说着他就揪住我的头发，劈头盖脸打上了。我特别伤心，你总得问问为什么呀，为什么打，自始至终他没说什么打，我想，可能是他弟弟给他说我和其他的男的怎么怎么了。邵平有个毛病，他动不动就揪头发，往墙上撞，或是往地上一抡，“咣咣”手脚全上，最后打得他弟弟看着都不忍心了。他大弟弟现在对我好像亏欠点儿什么似的。

那天完事我就回我妈家了，我没说挨打的事。现在我爸妈觉得愧对我，因为我曾提到离婚，他们不同意，我妈说：“刚结婚就跟人家离婚，不行。”还是封建观念，觉得离婚不好。我爸是

四五十年代的人，一提离婚，根本不行，嫌丢人。邵平有个特点，打过你之后，马上能认识到自己错了，跟你说好话。咱们女同志，心软，人家一说，想想人家已经承认错误，快别了。再说，我心里爱他，挺爱人家，他说错了，以后不打了，回去吧！确确实实原谅他了。以后的日子，也不断有事，最厉害是1994、1995年的时候。他打我，我心里特别不平衡，我也有工作，不是家庭妇女，凭什么这样打？

派出所工作特殊，他说干啥去了，我从不怀疑，没那个念头。可是，他的行为可不是那么回事。有一次，我们单位去植树，我跟他说明中午不回来了，单位管饭。结果那天回来得早，中午12点多就干完了活儿，我去买了个西瓜，走到楼下看见他的摩托，我心里特高兴：“呀，他在家呢！”三步两步跑到楼上。

开了一道门，又开一道门，打开门一看，我都惊呆了，有一个女的，他俩衣冠不整，我气得一下子把西瓜摔在地上，骂了一通。那个女的我认识，是商店卖布的，长得特别漂亮，以前我们去买布，她总是多给点儿。我只想他在派出所工作，有权力，别人经常有事求他帮忙，这一看就明白是咋回事了。她挺知趣，顺着门边走了。我要去找她，问她干啥来了。邵平说：“看家具来了。”我说：“外面那么多卖家具的，跑咱家来看家具？”他也不知道这不是个理由，就说：“行了行了。”我说我要去找她老公。其实家丑不可外扬，我也就是说说，没有实际行动，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他又和派出所一个女的，再后来，不往家带了，直接不回家了，开始还打电话说一下：“我不回来了。”后来电话也不打了，只有你打电话找他：“今天你回不回来？”他不回来我就回我妈家吃饭了，人家回来得给人家做饭。再以后，他工资也不交给我了。

我对他丧失信心，是他在外面胡混。他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他这个朋友的老婆告诉我的，如果是别人说的，我还不相

信。你又不回家，又不给钱，以前我一直在争取，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我挺能跟他说的，每次他都觉得我说得对，过后该咋样还是咋样。后来灰心了，我也不争取了，现在我都想不起来他长得啥模样了。

其实现在想想，我可后悔了，一次次宽容他、原谅他，可能人家也摸透了，抓住你的脾气了，如果那个时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要闹就闹到底，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闹到底也就是离婚。

我提过离婚，找单位开离婚介绍信，结果我们单位通知他们单位了，两个单位分别给我们做调解工作，可能根源就在这里，他想，你把家丑扬出去了。他大男子主义思想特别严重，一天天事特多。他认为，我小伙儿这么棒，你还敢跟我离婚？这就更加折磨你。他爸妈也不赞成我们离婚，我对他们家一直很好，尽管他们家穷，在农村，我们年年回去过年，没有一年不回去的。有时候我值夜班，下了夜班，也得赶回去。他弟弟妹妹都在我这里住过。大弟上师范后，他又托人把小弟的户口落到我家里，他妹妹也想进城市，我给她找工作，正好我们护士长家生了孙子，想找个人，我就介绍她去。结果，她犯了病，回来说护士长家的小儿子看上了她，我觉得不可能，我小姑子长得特别高，不好看，而护士长的小儿子是个大学生，怎么能看上她呢？其实她是在发病期，医生诊断是青春期精神分裂症。我在医院工作，积极给她看病，他爸他妈都来了，说她跟上鬼了，拿上衣服，用农村的土方法，把她接回去了。为这些事，我们俩也有矛盾。

因为离婚，两家还闹矛盾。1995年，他咋也不回家，我专程去他家，把他爸他妈叫来，他弟给他打电话，说：“哥，回来吧，咱妈来了。”他正喝酒，一听这话就生气，“怎么把我妈弄来了”？回来两句话没说完，站起来就要打我。那一天，我爸我妈也在，那么多人在场，我爸一看，不干了，“打她也得看看我们

吧，我们来就是调解你们的关系的，两句话没说就打人，太嚣张、太狂妄了吧”。他骂：“滚，别进我的家门，我不要你了！”他就跟我爸吵起来了。两边家长一直不想让离婚，我开始是不想离，后来不争取了，你看谁好，快找去吧，我让位。

我们走了之后，邵平又后悔了，又让他弟弟去说，介绍人都搬出来了，去找我妈说好话：喝酒了，话说得不对，做得不对。他每一次打了我都是这一套，又是道歉，又是下保证。他这一说我妈就软了。在我的离婚问题上，我爸我妈分歧很大，我妈我姐都不主张我离，我爸我弟都同意，对，就是男的都同意，女的都不同意。我爸原来不赞成离，后来支持我，我爸说：“当着父母的面还打呢，父母不在时不知怎么收拾她呢。”我爸能想象我受的罪。出了事后（指杀邵平一事），我爸好埋怨我妈，我妈也总后悔，他们想，要是当初离了婚，就不会到今天这一步。我小妹妹就是在我出事以后离的婚，小妹妹跟妹夫不和，不喝酒时，妹夫对妹妹真好，能把妹妹捧上天。喝了酒，举着菜刀在后面追着打。原来他们不告诉我，我说，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他主要是在性生活上折磨人

我出事是在1995年12月23日。12月11日我回去的，那天天下着很大很大的雪，我回家后邵平又是道歉，又是下保证，我又回来了。这中间还有事。我俩闹事之前，有一天，我们家突然被盗了，我下班回去看家里翻得乱七八糟，但没丢什么重要东西，丢了几件皮大衣。家里的玻璃没破，门也没破，门是从里面打开的，我怀疑他是要离婚转移财产，他也怀疑我，这案子也没破。后来我发现他从保险里取了钱，也可能是他赌输了，想办法要钱，人家就说是他制造的假案。当时我一看家里这样，就给我姐夫打电话，我姐夫也是干公安的。因为被盗也有争吵，他就骂：“你给我滚！”当时我就走了，他以为我不敢走，我就走给你看

看。后来他又去求我妈，对着我妈我姐痛哭流涕，我妈就对我说：“你看人家都说出这样的话了，你还不原谅人家，快收拾东西回去。”我就收拾东西回去，过了几天平静的日子。

那个时候，家里该买的都买了，电冰箱、电视机，家具也都换了，BP机、摩托车都给他配了，孩子也大了，可以说经济比较富裕了，他却越来越不正干（不好好干活儿）。他特别爱喝酒，再一个爱打麻将，打几圈几千块钱就出去了。他经常去抓赌，有的人被抓了，给他们点儿钱，就私了了。我们家那个胆子特别大，什么都敢要，拿了钱还去赌，他去赌就是为了多赢。可是，1994年背得不行，输了两万多块钱，输得厉害时，跟我说：“别买房了，把钱拿出来。”但他没说干什么，就说是开饭馆。可能是这方面心情也不好，拿点儿钱输了，拿点儿钱输了，每天喝酒，回来拿我出气，今天我不管他没事，今天管了：“你干什么去了？”那就不行，一直以来，他都是命令的口气，“你干啥干啥”，没有商量的口气，根本跟你没有平等，不把你当妻子，说话都是命令你。

他特别反对我上夜班，因为这，也是一个矛盾。出事那天就是他不让我上夜班。我在单位是优秀护士，那个时候我刚转成干部，没有理由不好好干，家庭、事业应该有轻有重。我怀孕、喂奶，那几年都是上长白班，其实别人有愿意上夜班的，我经常跟别人换。

出事那天也是上夜班，到年底了，单位聚餐，排了我一个小夜班，下午5点钟上，孩子得他接，他就以为我是故意的，是拿孩子拴他。10点多回去，他就开始打我，揪头发，往墙上撞，要不就摞在地上，往脸上打，扇耳光，拿拳头捶。

其实，他主要是在性生活上折磨人，你不是管我吗，不是让我回家吗，我就夜夜折磨你，你没有脸去说，跟谁说？要说，别的也能忍受，这个很难忍。他经常喝酒，在性方面要求特别强

烈，这喝了酒的人吧，和正常人不一样，正常人从勃起到射精，很快，5分钟、10分钟就能完事，但他一天天喝上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完不了事，你还必须得让他达到高潮，他也想达到，但他力不从心，就逼着你手淫、口淫，最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必须按他的要求做，必须服从他，平时也是这样要求你。不服从就打，收拾你，不让你睡觉，一晚上一晚上不让睡，说来说去，这是根本原因。这比什么都厉害，白天有事打你，打完完了，这不行，每天挺盼他回来，但他回来又害怕他，每天心想，今天千万别喝酒，要不，今天你就伺候他吧。

他也不是变态，在那两年，发生了不少让他不顺心的事。一个是和他同时工作的同事都提拔起来了，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提拔，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责任心，他就爱吃喝、打麻将，要说今天有人请他吃饭，其他任何事都可以放下。他也挺想提拔起来，也曾想过走上层路线，送过礼。

还有一件事对他打击比较大。有一次他值班，送来一个人，那人喝了酒，对他说：“我难受，你给我递口水，我口袋里有药。”邵平给那人递了水，也不知那人吃了什么药，第二天死了。那家人不干了。邵平成了一个怀疑的对象，这件事对他进步有影响。再有，他和一个叫那梭的人打麻将，那人都60多岁了，他才30多岁，腰里别着枪。他赌输了，欠了那梭的钱不给，他们都是大赌，欠钱也是大数。那梭就和他争吵起来，人家报告到他单位，单位对他提出了批评，那时候正是单位整顿纪律，他又撞到枪口上。还有一件事，有一次他喝酒去了，别人骂了他的朋友，双方吵起来了，他拔出枪，朝天打了几发子弹，吓唬人家，派出所把他的枪卸了，给你枪让你干嘛呢？！这些事加在一起，都是在那一两年里发生的，他心情不好，回来就发泄，我就受不了，我那时候瘦得只有90多斤。

我要求离婚，单位调解过，民政局也去过，他一次次地打，

打过又一次次地求，听他说那些求情的话，我妈说这个女婿还不错。出事之前最后一次，我没去我妈家，我去了我姐姐那儿，他到处找我，我姐夫也是公安局的，他不敢去。他去我们家找我，看我们家人不着急，只是说“不在”，他就知道我在我姐那儿。我在我姐那儿住了两个礼拜，在单位也请了假。这次我下定决心，说什么也不回了，离婚。我妈不同意离婚，说：“为了孩子，不能离。离婚你要不要孩子？要，你以后找不到对象。不要，你也舍不了。”我妈认为夫妻还是原配好。他就一次次地找我妈，求我妈，让我妈带我回去。我妈每天往我姐这边打一个电话，她也担心我自杀，我的性子挺拧，有一次他打我打得厉害，我一拳把镜子捣碎，用碎玻璃划手腕，这样的事发生过两次。每一次他打过去之后消停那么几天，那几天对你特别好，再过几天又不行了，原来该咋样还是咋样。

当时就是想杀了他就自杀

出事的前一天，他跟我妈约好了，让我回去，那意思就是说：“我根本没说不要她，谁说要离婚了？”出事时也是上夜班。12月23日这一天，他没去上班，睡了一上午，下午一两点时，我说：“我把晚饭做好，你回来一热就行了，我还得上小夜班。”他说：“说不让你上夜班就不让你上夜班，你就是跟我对着干。”我说：“单位要求上夜班，我为什么只上白班，一天两天不上，不能总不上，没有理由呀！”他又抓住我的头发——头一天已经折磨我一夜了，早上四五点刚睡那么一会儿。他这个人特别残忍的是什么，他什么时候想来就来，管你睡没睡、身上来没来，他要想来必须来，绝对的。其实，那天上小夜班是个导火索，这些年、这些天，事太多了，我再也不想忍了，再也不能忍了。我就想，快解脱呀。那时觉得活着不如死了好，根本没考虑我妈怎么办、我儿子怎么办，只想每天我全身心的爱奉献给了这个家，对

你、对孩子，一心一意的，反过来得到这种回报，这种日子我不再忍了，也不再争取了，我现在就解脱呀。那时候就像跟上鬼了似的，一心想着快点把他闹死、快点把他闹死，不把他闹死，他就把你闹死。

他的枪别在裤子上，裤子就放在沙发上，那枪是五四式的，以前他教过我怎么打，我们每年都回农村过年，带挺多的子弹，他教我练过那种枪，子弹拉上膛之后连发连打，那手枪后坐力大，弄不好子弹就打飞了。那天，我拿起手枪先打了一枪，我们俩中间相隔好远，头一枪就打中他的致命处，中了一枪他没有倒下，还追我，追出我到门口，让我送他上医院，吓得我又打了第二枪、第三枪，当时只想如果打不死他，他夺过枪就会打死我。三枪都打中了，他捂着肚子跑到房门外头倒下了，我们家门外面还有一段走廊。现在想起来，还是该他死，那两天他就是作呀，对他好也不行，不好也不行，咋对他都不行，每天回来折磨人，他真的是该死，中间隔那么远，我还瞄得那么准！

打完三枪，掂着枪我就回来了。这时，他们单位两个人来找他，当时我头脑特别清醒，我说：“快走，没你们的事！”我当时想的是，把他打死，我就自杀了。在咱们的观念里，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根本没想到还死缓吧，争取个无期吧，到这里来坐牢，根本没想。当时举枪打自己的时候，这就一下子想起了儿子，儿子吃完午饭上学去了，哎呀，跟谁说一下呀，把他抚养这么大，就这么走了？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儿子，想交待一下儿子的事，我就拿起电话给我姐打：“姐，我把邵平给杀了！”我姐问：“是真的吗？”我说：“是。”我姐夫正要出门，我姐赶快叫他：“快！毛毛（我小名）出事了！”我姐夫拿起电话问：“你报案了吗？”我说：“报什么案？”因为当时没想到还会打官司，我姐夫懂，说我：“你赶快报案！”他的尸体就在门外面，我心里发毛，这么大的事没经历过，我给他派出所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

我姐也来了，派出所的人也来了。我把门从里面锁上，我在写遗书，枪还拿在手里，我妈在外面都给我跪下了，他们在外面轮番做我的思想工作，足足有两个小时吧，我相信他们说的话了，他们说：“你杀他是有原因的，他送去抢救了，没有死。”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吧，最后我把门打开了，谁从我手上把枪拿走的我都不知道。

一审判我死刑，所有的证词都不采纳，就是死刑。我公公家里，哎呀，怎么说呢，我总觉得，这么多年，两个小叔子在我这儿吃，在我这儿住，每年我都回家，不管农村多穷，对公婆也好，我总觉得他（公公）不会这样对待我。但人家是既要我钱，又要我命，人家要这个费那个费两万多，我死了的人就不能再给你钱了。宣布我死刑的时候，我觉得法律也不公正，那么多理由，那么多人为我说话，我还自首，还判我死刑。我在看守所里，好多人来看我，他们佩服我：“付梅英，判了死刑你还这么镇定。”我真是做好了一切死的准备，因为当时杀他时我也是要死的。如果没判死刑，我还会感谢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但是调查来调查去，还是死刑，我就觉得什么希望也没有了。宣判时一念“现在宣判如下，判处死刑”，我没有像别人那样一下就软了，我还是那么直直地站着。当时的天哪，黑压压的，又打雷，又下雨。法庭上问我：“你上诉不上诉？”我说：“不上诉。”我姐姐他们在后面坐着，急得喊：“上诉！上诉！你干嘛不上诉？”

宣判完我就回看守所了，高院来复核时，问问题我拒绝回答。那时，对死我没有恐惧，杀了人，死就死，再去监狱坐那么多年牢，长痛不如短痛。人家说：“就算你不上诉，我们也要复核。”后来他们问了几个问题，问什么我就说什么。第二天律师就来了，我们单位还有居委会的400多人写了联名信，大概意思是说，我在工作、在家庭，都是个特别好的人，生活中受他的虐待，是激愤杀人。人家说的都是具体事情，什么时候看见他打

我，邵平到单位里打过我两次，一次我在传染科，他去找我要钱，我没给，他就打；另一次我在内科，忘了是为什么，反正是让我回家，我说我正上班，不能回家，他认为，我让回你就得回。我不回，他就又揪我的头发，往外拖我，当着那么多人面打我。所以，我出事后那么多人帮我，他们都是亲眼看见的。我也是有工作的人，有工资，不是家庭妇女，他这么打我，我心里特别不平衡。

现在我最牵挂的是孩子，自从出事那天到现在，六七年了，没见过他，他爷爷把他领走了。7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城里，说啥都能满足，7岁后突然去了农村，孩子上个厕所都不习惯，他爷爷那个村还特别穷，孩子怎么能适应？

我还有17年的刑期。1996年判我死缓，两年之后改为无期，2000年12月改判为18年。我妈常来看我，我最后悔的是牵连我们家，花了他们多少钱，把我娘家害苦了。

敖毅说：他们家也够可怜的，她公公70多岁了，还得供孙子上学，在那个贫穷的地方，把孙子供到上初中，很不容易，全家人得全力以赴。敖毅往那个村子跑了好几趟了，她想把付梅英的儿子领来，让她们母子见一面，但很困难，孩子的爷爷一直告诉孩子说：“你妈死了。”敖毅说，再做做工作，争取“六一”节能让孩子来一趟。付梅英知道这个消息后买了一斤毛线，想给孩子织件毛衣：“这么多年，对他没有照顾。”说这话时，她低下了头。

监区警官白队长是付梅英的直接领导，她说，付梅英表现非常好，在我们监区是数一数二的，比较能吃苦，也能看得开。我们监区，像她这样文化程度的不多，她现在做统计，生产上的报表都是她做。2000年她获得了“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所以才给她减的刑。这个积极分子是自治区一级的，整个内蒙古第一

女监 600 多人才有 5 个名额，只有平时长期有好的表现，才能获得这个荣誉。白队长表示，若是教毅把孩子领来，她们一定积极配合，让她们母子好好团聚。

后记：教毅最终没有做通孩子爷爷的工作，付梅英和儿子见一面的愿望至今还没有实现。

点评：

暴力初期，离婚是摆脱受暴的有效途径

陈 敏

付梅英是从一个长期饱受丈夫殴打和性虐待的妻子，被逼为一个“以暴抗暴”杀死丈夫的加害人的。她的遭遇让人同情，她的经历在同类人群中具有普遍性。但她本来是可以借由离婚摆脱来自丈夫的殴打和性虐待的，但由于父母的极力反对（后来是她母亲），使她由于缺乏家人的支持而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施暴丈夫的身边。暴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严重。父母极力劝她不要离婚，一是认为离婚是一件丢脸的事，二是虽然心痛女儿挨打，但又认为女婿事后能道歉并保证不再打，还是一个好女婿。这第二个原因，依然是第一原因的延续。因为付梅英的挨打，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反反复复的，丈夫的多次道歉被证明是一钱不值的，但由于这种言而无信的行为依然符合维持婚姻的要求，因而父母，特别是母亲，一次又一次地用女婿的道歉来劝说、迫使女儿回到吃喝嫖赌打老婆样样在行的女婿身边。母亲的这种观念害了付梅英，也使母亲自己后悔莫及。

研究表明，在丈夫（或男友）动手打妻子（或女友）的初期，离婚或分手是摆脱其暴力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因为这个时

候，打妻子（或女友）是为了建立暴力统治。如果女性在挨打的初期，就对暴力说“不”，下决心离开他，那么，她不仅能使自己顺利地摆脱暴力，还很可能帮助了这个男人和他将来的妻子，因为她的行为将使这个男人明白，对妻子施暴不仅不能达到控制妻子的目的，还会使自己失去妻子。有了这样的教训，他在以后的婚姻中，就有可能不再使用暴力。否则，女性的忍让，就是给丈夫（或男友）发出这样一个信号：打妻子（女友）没关系，一道歉她会原谅你的，丈夫因此会获得在家中的绝对权威。研究也表明，女性忍受暴力的时间越长，摆脱暴力的难度就越大。这个时候，即使能离成婚，女性也不一定都能摆脱暴力。因为这个时候，暴力统治的格局已经形成，当逆来顺受的妻子突然有一天想彻底摆脱施暴丈夫（或男友）的控制，他就会觉得是对他的尊严的极大挑战。不能容忍向来驯服的“臣民”的背叛，会导致施暴丈夫（或男友）用更严重的暴力来阻止受害人离他而去或想方设法重建暴力统治的格局。悲剧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不是女性被暴力虐待致死，就是女性以暴抗暴将施暴丈夫杀死，而孩子就成了孤儿。

希望所有做父母的，当你的女儿遭受暴力想要离婚时，一定要全力支持她，在心理和物质上帮助她。在我们的社会还不理解家庭暴力的今天，家人的支持，对她来说，是最最重要的。否则，付梅英的命运，就有可能会发生在你们的女儿身上。

7. 我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叙述人 李一凡

访谈人 范爱莲

访谈时间 2002年3月8日

访谈地点 湖南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 范爱莲

文稿编辑 薛宁兰

李一凡，38岁，大专文化，原为中学教师。再婚后，不断遭丈夫殴打、性虐待以及行为控制，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帮助，未果。1995年某日晚，趁丈夫和继子熟睡之机，李将两人捆绑，先后用家中哑铃打死。事后自首，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服刑期间经过三次减刑，接受访谈时还有余刑10年。

我丈夫是被我杀死的。他性格暴躁，大男子主义，他自私，总是考虑自己，并且做事非常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是对他不了解而结婚的。我是一名教师，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教师。因为父母是老师，他们对我从小的教育都是很严厉的，我从小就认为男女之间交往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在我读中专的时候，只跟那里的男生老乡讲话。如果有哪个男生老乡向我表示爱慕之情的话，我马上就不理他了，采取很极端的做法。所以，更不可能跟别的系的男生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是很丑的事情。由于跟男性接触不多，所以就不能了解他们的另外一面。我总以为，我怎么

想别人也会怎么想，用自己的善良去看待别人。

我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

我的第一个丈夫是个医生。这次婚姻是为我父母结的。我爸爸妈妈的身体都不好，小时候我就经常看他们过节还要到医院里去打针。如果我找个医生的话，他就可以到家里来给我爸爸妈妈看病。本来我不太愿意和他结婚，因为性格不合，妈妈就说我不要只顾自己。当时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就是为了家里着想。有那么多父母之命的婚姻，不也都过得很好吗？父母很辛苦，家里的条件也不是很好，父母能供我出来读书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就同意了。

当时，我只有 20 岁。如果不离婚，一辈子都很难受，所以在结婚 5 年后，我就同他离婚了。他性格很内向，没有打过我。因为他还活着，我不想讲他什么。离婚主要是因为他的工作很忙，我在重点中学教书，也很忙。我们有了一个孩子后，我的事情就更多了。他在家里的时间很少，我对他这方面有些意见，又因为我的条件要比他好得多，他在外面就要表现出大男子主义：你们看我讨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婆，我还可以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这能充分表现出一个做男人的尊严。可是这是不可能的。我又有工作，又要顾家，又要照顾孩子，我忙不过来。所以我对他说：“你要分一点时间给这个家。”他就不干了。我跟他生的是一个男孩，去年我的一个学生来看我，跟我说，他们家里人都很后悔，都觉得我很好，很善良。我犯的是杀人罪，他们还能用“善良”这个词来形容我，我很感动。如果没有第一次婚姻的破裂，我不可能走到这一步，我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离婚时，我们为了孩子也争过，都想抚养这个孩子，男方提出孩子他带，要我每月给 35 元抚养费。我说：“你把孩子给我，我一分不要你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判归他，并且不要我出

抚养费。他们家里不让我去看孩子。那时我就对法院讲：“请你写上一条，允许我去看孩子。”法院说不用，肯定可以看孩子。实际上他们家就是不让我去看，这不仅仅伤害了我一个做母亲的心，也伤害了孩子，他是无辜的。孩子没有来看过我。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来看我，也是我所希望的。等我出去后，条件好了，我就去看他，如果不好，就不去。反正我是希望他能忘记我，希望他没有亲生母亲也能过得好。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个孩子，还有我的亲生父母。孩子的出生是没有选择权的，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就有责任给他一个快乐的环境，但是我没有给他，我欠得最多的是这个孩子。

我的第二次婚姻更不幸福

我的第二个丈夫是和我一个学校的老师。他比我大8岁，也是离了婚的，还带了一个孩子。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个小城市，一点儿小事都传得很快，因为有了第一次离婚，当时我们在当地都有了一些影响，婚后我们就打算到沿海去发展。1992年，那里要人。我们第一次去了某市教育局，人家不热情，我们就回来了。第二次去了一个学校，讲了一堂课，他们认为不错，就给我们写了接收书。一开始，我们两个人书都教得不错，可以说我喜欢他的惟一优点，就是他很聪明，业务上强。我这个人吃亏就是没有对他有深入的了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所学校对我的接收书上写的是热烈欢迎我去教书，之所以要他，也是看我的面子。第二就是他的普通话不行。他对这一点不太高兴，如果在湖南这边讲课，不存在普通话的问题。

我们又顺路到了另一所沿海城市的中学。那里的领导对我的第一印象很不错，一下就看上了我。他们看了我的学历证书和获奖证书，都是一等奖，所以非常满意，当即就同意了，既要我又要他。又是因为要我而要他。因为当时他在那里不讲话，他讲的

话人家都听不懂。而且还安排我马上讲课，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带我们去的老师就说：“你们知道吗？我们当时来这里找工作找了半年，把头发都跑黄了。”我当时就叫他回去办调动。我们两个在原籍上课还是可以的，所以教委不同意我们走，说：“你们是我们这里培养起来的。”我说：“我们同是一个中国，我们又不是跑到外国去，我们也不想呆在这里了。”当时我已在那里上了两个月的课了，教委主任的条件是，让我们把这学期的课教完再走。我觉得这样还是合理的，因为你教了一半的课谁来接呢？可是他骗我说：“教委不放。”如果教委不放，可以说我脱离这里的惟一的机会就没有了。当时我的心里真的是很不舒服。但是也只能生教委的气，没有考虑我们个人的原因，后来，我才明白是他从中捣的鬼。他为什么捣鬼呢？因为当时那里是个发展城市，比较注重经济效益，我们还是比较古板的老师，还是以教学为主，愿意把书教好，态度认真，也年轻，肯花力气，所以教的效果不错，不管是哪个年级的老师都挺喜欢我的，常和我一起吃饭。等他去那里告诉我不能留下时，我们那边的老师就对他：“你不知道，你爱人在这里教书好受大家喜欢呢！”我心里暗暗地想，糟了，这个话是不该讲的，因为讲了这句话他受不了。我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了。如果是我听到别人夸自己的爱人好，一定会高兴的，他不同，他不高兴。果真，这样一来，我们决定回去。那里的老师和校长都感到很遗憾，因为别人想进这个学校都要请客送礼，花很多的钱，人家不要我们一分钱，我也感到那里的人对我都很好。结果我们就这样回来了。

他第一次打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从南方回来，我们吵了一架。因为他觉得我一旦出去了就驾驭不了我了，我就不能成为他的笼中鸟了，那次他第一次打了我一个巴掌。他说：“我跟你讲，我就是不去那里，你到那里去就

如鱼得水，我到那里去是死路一条。某某老师告诉我，不要到那里去，我要是去了，你就不会是我老婆了。”讲这个话的是个男老师，夫权思想严重，他的老婆是个农村人，没有工作，要靠他养活。我就对他说：“我是你的老婆，不是他的老婆。”婚后，我是一心一意要搞好这个家。婚前对他不太了解，婚后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就把他的变化告诉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讲这是变态。我认为他这种变态带有虐待性质，比如说，在性虐待方面，他的身体比我好，要求比我多，在我流产后的第三天，他就要求同我发生关系，还有在我第二次流产的10天后，他又要同我发生关系，这对我是非常痛苦和伤害的事情，我就把门关起来，他就敲门，我不开，他就撬门。在我们住的那个房子里还有被撬过的痕迹，他还会撬窗子，从窗子外进来。他平白无故地就骂我打我。我很自律，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要想搞好家庭，是两个人的责任。有的男人他不喜欢那种花钱太多的女人，特别憎恨那种在外面花心的女人。我从小就想当老师，当上老师后，除了家庭之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育事业上，所以我在事业上是对的。因为书教得好，领导都很器重我，家长和学生都很喜欢我。我是教高中英语的，在事业上肯定花的时间多一点。从事业上讲，我肯定是没有给他丢面子，他那个人的虚荣心是很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他没有打我的理由；另外，我也不是那种好吃懒做的人；再有一个是我对他对孩子很好，所以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什么会造成他对我不好的原因。因为我确实是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如果说分了一点心的话，就是事业，为了教好书也是应该的。如果我的书教得不好，我也抬不起头做人，而且我也喜欢这个事业。所以，开始学校的同事不了解他打我的原因，后来他们就了解了，就对我说：“现在我们知道了，你们打架的原因不在你，而在他的那一方面。”说这个话的老师还是我们市里的人大代表。

他这样对我，我感到特别委屈。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打我也可以，如果我有一分的错，你把我讲成十分，你打我也可以，但是我从来没有错。如果他爱我，宽宏大量，为了我的发展，跟我去南方，我会感激他。如果我到了那边，有更好的人看上我了，我同他离了婚，那是我的过错。但是我从来不去想离了婚再找一个好的。我还是很要面子的，当老师还是要为人师表的嘛！这已经是我的第二次婚姻了。第一次离婚，人家会讲你年纪小，没有经验，那么第二次再离婚，人家肯定说是你不行，所以面子的事情很重。为了保全这个家，南方我不去了，这对我来讲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知道我对这个家做出的牺牲，不要他对我很好，只要能与我平平淡淡地过下去，我就满足了。

他抓住了我的弱点，好面子，怕离婚，变本加厉，开始对我经常打骂

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我学生的家长开始关心我，因为我经常被他打得遍体鳞伤。他对付我根本就不需要拿什么东西，他只要用一只手抓住我的两只手，对我就开始拳打脚踢了。有时打得我都不能去上课，我的学生就拿红花油来给我搽，一来就是几个学生，因为搽起来很疼，一个学生给我搽油，另外一个学生就在旁边给我讲笑话，吸引我的注意力，减少我的疼痛。教了许多年英语，家长和学生都了解我的水平，有的家长就给我介绍工作，让我到宾馆去工作。我没有同意。我想这样一做，我的家庭肯定就破裂了。学生家长都不理解，对我说：“你怎么这样呢？这个家庭都这样了，你还维持它干什么？”我想，当时我们两个人结婚是自愿的，现在我没有心要再找一个更好的，所以我绝对不先提出离婚。我要给他机会，让他改正，继续把日子过下去。人都有一个脸面问题，所以我就放弃了一切机会，继续和他过

下去。

从南方回来后，他打骂我成了家常便饭。我在面子的驱使下，总是对他说：“你小声一点，不要被别人听到。”当时我也知道有妇联，有派出所，但是，当时法律上还没有规定家庭暴力问题。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妇女，她丈夫是一个司机，经常打她，妇联和派出所都管不了。所以，我就决定和学校领导讲。但是领导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根本不听，他的脾气很暴躁，连校长都敢骂，他就是个这样的人，在那里称得上是个小恶霸。没有办法，我又不肯告诉我的父母，就去告诉他的家里人。他自小母亲就死了，只有一个父亲，他家是农村的，父亲是个农民。他有一个哥哥，是我们那里报社的副主编。有句老话，“长兄为父”，我就告诉了他的哥哥，请他哥哥教育他。当着我的面，他哥哥还是教育过他，但还是没有用，否则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我之所以没有去妇联，一是面子问题，我们那里是地区妇联，如果我到妇联去说，大家都会知道了。二是我觉得，妇联同志的水平和我们学校领导的差不多，学校领导说了也没有用，妇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我吃的就是重面子的亏。

他打我最厉害的那次，是在1995年的4月24日

他每次打我都没有什么原因。如果我有过错，打了我，我也没有什么话讲，因为每次打了我后，我找领导谈，他每次都是否认，不承认打了我。他在别人面前都说：“我怎么舍得打她呢？”他都是对别人讲：“是她自己撞伤的。”我们校长找过我两次，他说：“我跟你讲，如果我跟你丈夫做思想工作，他对我说，校长，我错了，我下次不打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好做他的思想工作，但是他就是讲，他根本没打你啊！你说我还怎么做他的思想工作？”我们校长只好说：“你实在是心情不好，就回家休息一段，什么时候想来上课再回来。”到了这个地步，校长也没有什

么办法。1995年4月24日是他打得最厉害的时候，我的腿虽然没断，走路却是一拐一拐的。那次他对我拳打脚踢，一直打了半个多小时。

他非常专制，根本不让我跟别人接触，男的女的都不行。我就跟坐牢一样，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我住在四楼，我们有三间房，当时我们已经分居了，孩子住一间，我们每个人各住一间。当时我的生活就是上课、备课、看书、看电视，也不跟他讲话。那天我在楼上听到别的老师要去散步，我就对人家说：“等我一下，我也来。”他马上就说：“你不许去！”又对那些老师说：“你们不要跟她去散步，你们要同她去散步，我就去砸你们家！”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人家讲：“告诉你们，女的要同她讲话，就是要拆散我们夫妻；男的要同她讲话，就是跟她有一腿！”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别人就不敢跟我讲话了。我非常痛苦，我觉得当时我比现在坐牢还不如，现在坐牢起码没有人打我骂我。

那次之前，他从来不承认打我。从那次起，我就把我的伤给校长的夫人看，通过她的口转告校长，他打我的伤在哪儿。还有我们学校的女工委，我也给她们都看了，她们也都知道了。那次他打我半个多小时，他的孩子在旁边也劝。那孩子已经10岁了，是个男孩。我对孩子说：“你赶快阻止爸爸，爸爸疯了，他会把妈妈打死的。”孩子就劝爸爸不要打了。平常他打骂我，邻居来劝过。他总是对人家恶言恶语，人家也没有这个义务，以后也就不来了，谁也不想找麻烦。这次，只有孩子在旁边劝。可是，他一个巴掌就向儿子打去，孩子的脸上马上就有了5个手掌印，耳朵也打红了。孩子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就去开门。楼下来了3位老师对他讲：“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可是，你猜他怎么说？他把他的聪明都用在整我的上头了，他对老师们说：“你们看，她打我的儿子，后妈打儿子，该不该打？”他说我打儿子，我说我没有打。儿子的脸都红了，耳朵也红了，还有手指印，我就当

着大家的面问孩子：“是妈妈打的你吗？”孩子说：“不是，是爸爸打的。”我是他的后妈，我如果对他不好，他不会站在我这一边说话。我敢讲我对孩子好，我跟孩子的关系好，因为我对继子继女的关系要超过了对一般的孩子。所以，这就说明了问题。老师们对他说：“你不要总是这样打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对大家讲：“只要是以后他不再打我了，我还是可以原谅他的。”因为打得太厉害了，我还是告诉了我们学校的领导。这次他打我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他想当官，由于我们关系（不好）的原因，他没有当上，就拿我出气。

作为我来讲，如果我们的结合是一杯苦酒的话，我已经把我的那一杯喝下去了，我毫无怨言。照理论，这本应该是杯甜蜜的酒，是因为你的原因，变成了一杯苦酒，你还这样，总是寻找机会对我发作，只能算我的运气不好。就是这样，我还是没有想到离婚。作为一个女人，最不好的是在外面找人，作为再婚的后妈后爸，最要不得的就是虐待前面的孩子。他把这两点最致命的、最能引起公愤的事情强加在我的头上。他说我在外面有人，在家里虐待继子，所以我说他的聪明才智都用在整我的上头了。他的儿子跟我们楼下司机的女儿一起上学，男孩贪玩，总是晚上7点多才回家，我都是等他回来一起吃饭，从来不自己先吃，给孩子吃剩的。因为我想，要想搞好这个家庭生活，首先要对这个孩子好，我一直做得很好，所以邻居们都认为我挺好，没有虐待孩子，孩子自己也可以作证。之后，学校的党政工团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他的哥哥也请来了，就把这个事情讲了，叫他不要打我了。我对大家讲，只要他不再打我，我们能和平共处就行。我们虽然分居了，但是他的力气很大，他还是能进我的房间，强暴我。当然，中国现在还没有婚内强奸罪，外国有，我对他的强暴完全没有办法。他对我说：“你是我的老婆啊！”我说：“但是，这是我不愿意的。”

有一次，我中午值班回来后，大约下午3点躺下休息时，我们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跟他一起回来，坐在我们家的客厅里。那位副校长就讲：“上次你们打架，好像是通过调解，没有什么用啊？”他马上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说：“你看，这是你给外面男人写的信。”这话一出来，我的气就来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说：“你是在污蔑我。”我就问校长：“这封信你看过了吗？”校长说：“我看过了。”我说：“你相信吗？”校长说：“我还要调查。”我一听这话，那就是有点儿相信了，因为你要调查了。我就对他说：“你把那封信拿着，你复印一封给我，我要找遍整个市区，看是谁写的。”我想假如我在外面有人，我不会写信，因为有什么话不可以当面讲，还写信，被你当做证据？你说对不对？如果有信，我还不会跑到收发室去等，还留机会让你去拿？因为我自己的心情不好，不想见什么人，收发室那里我根本就不去，我想他搞这种游戏也是太可笑了。当时我骂了他一句，我们就对骂起来了，校长说：“你平时挺理智的啊！”我说：“今天我不理智了，我不能再忍了。”校长看劝不住我，就走了。他把门一关，对我说：“你看，怎么样，这一招还可以吧。”我说：“你是黔驴技穷，这是你的最后一招了。”那个时候我怀孕了，我早已跟他分居了，是他强行的。这次他就要利用这个孩子来做文章，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外面男人的。开始我不知道他是这样，我认为他强迫我发生关系，致使我多次流产，是虐待我的方式之一，我如果死在产床上，他是不负一点责任的。对这个孩子的来到，我真的是很恨，因为身体原因，我不能避孕，他又不采取措施，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伤害我的身体和精神。虽然是这样，我还是不想和他离婚。

在他这次打我之前，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是不是想跟我和好？”我一听这个话，眼泪马上就出来了，我说：“是。”他说：“那你去找个人，跟你把这个孩子打掉。”以前几次怀孕流产都是

他陪我一起去的，这次他为什么要我去找个人陪我把这个孩子打掉？如果在以前我就相信他了，这次我明白了，他是想让别人看到。我平常都是足不出户，这次如果我和别人悄悄去打掉孩子，肯定是我在外面和人家有的。我知道医学上是可以经过化验证明孩子是谁的，所以马上就拆穿他，我说：“你挺聪明的。在你的折磨下，我已经成熟了。”他知道我不会上他的当了，所以，那孩子没有打掉。我知道，孩子越大流产越危险，我有思想准备，不要工作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到时候证明是你的孩子，我看你怎么样。我就对他说：“我们两个签个字好不好，一年后孩子生下来，如果不是你的，我赔你 20 万；如果是你的，你赔我 20 万。”他不敢签，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

我一生最厌恶的，就是一个女人在外头偷人，最看重的也是一个女人的名誉。一旦丈夫不惜牺牲自己妻子的名誉，达到他的某种目的的话，我对这个人就彻底地死心了。就从那一刻，他拿出那封信，污蔑我跟别人乱搞时，我的心完全地凉了。以前他怎么打我，我的心里都存着一点与他和好的希望和幻想。现在，我想离婚是必然的，我心里也做好了与他离婚的准备。但是又想，我干什么要离婚，谁提出离婚就是谁想要这个家破裂，他要是再找，就由他去提，反正离了婚我也不再找了。现在没离婚我也是一个人过，就跟独居和单身没两样。

他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女人，但是我能原谅，真的我能原谅。他有了另外一个女人，对我来讲，还是一种些许的解脱，这样我的“任务”就没有那么重了，因为他的性要求很强烈。当时，我没有想到怎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只是想证明这个家庭破裂的责任不在我，而是因为他，那么我就得向别人证明他打我，而且打得很厉害。但是他又是个很厉害的角色，学校的老师都怕他，有谁来为我讲话，证明他打过我呢？我想只有去搞法医鉴定。当时我见到法医眼泪就出来了，我对法医讲：“我要证明他打了我，

因为是要离婚，不到这个地步我是不会到这里来的。”法医讲：“要花80元钱。”我说：“我愿意花这80元钱。”可是，后来他一听我爱人和他是老乡，就不给我做了。

他打了我，又不承认，法医鉴定也没有，只有让他亲口承认。我就想到要搞录音。我要搞到他的录音，就要制服他，就要把他捆起来。我只想问他：“我到底打过孩子吗？我的作风好不好？有没有跟人家乱搞？你是不是打过我？”我想澄清这些事实。我想捆住他，可以吓他一下，让他乖乖地回答我的问题，至于这样做的后果我都没有预见，这也是自己知识贫乏。他是个大活人，我弄不住他，在他吃的东西里面放药，等他喝了酒，吃了药，睡觉了，我就捆了他，等他醒了，再问他话。就因为那次法医鉴定没做成，判刑后我去医院流产室，对门就是法医鉴定室，那个法医见到我来，马上就把门关上了。如果当时那个法医答应给我做鉴定，我就不会走这一步。

1995年6月2日晚上，我将4片安定、2片乘晕宁碾碎溶在我丈夫和继子的水里，见他们睡着了，就用尼龙绳分别将他们父子两人捆绑在各自的床上，并用胶带封住他们的嘴。等他醒了，我就问他，他不说话，他用眼睛瞪着我。平时总是他占上风，我以前都是很柔弱的，总是被欺负的，他当时的眼神我很熟悉，就是他打我打得最厉害时候的那种，好像在对我说：“你放了我，我就要你死！”他那种眼神叫我害怕了。如果是一只死老虎，你看到也会怕的。平时总是受他的恐吓，在那种害怕的境况中生活，也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问他，他就是不说话，用眼睛瞪着我，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哭，自己要坚强。我就问他：“我是个怎么样的人？我有没有打孩子？有没有偷人？你打没打过我？”最初我是把他的嘴封上的，怕他喊。可是他合作，我没了主意，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想反正都是死。

我们家住四楼，那天风很大，门被风吹得直响。我一害怕就找东西，房子里除了书就是桌子，什么也没有。我拿什么去打呢？就看到一个哑铃，是我们平时锻炼用的，我就用哑铃去打他的头。他的头出血了。在我拿起哑铃向他打去的那一刻，他一下清醒了，就想来抢我的哑铃，这样我就更害怕了，被他抢走了，我就没命了，所以，我就又打了两下，把他打死了。反正我自己也逃不过了，放了他是死，不放他也是死，而且我自己想死的念头也是很久了了。以前我也自杀过一次，割自己的手腕，但是没有割得太深，医生讲：“如果你割得再深一点，你就没命了。”我只是想用这种方法向他表示一下。等我把他杀死了以后，我就想到了死，因为我们家后面有一条河，我想跳河去死，可是我又犹豫了，我想我是去跳河呢？还是要去公安局自首？为什么要自首呢？因为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因为在他手里有一封信，别人都知道了，我要证明这孩子是他的，而不是我跟别人的。最后犹豫来犹豫去，就到了天亮了，一个晚上都没睡，后来到了天亮之后，我也不可能去自杀了，天亮就有人在河里捞沙，我又不想一跳下去就又被别人救起。

孩子醒了，喊他爸爸，我过去叫他不要喊，他不听我的，所有造成我心理压力大的就是这个孩子。因为当时他喊的时候，恰恰是我拿哑铃打他爸爸的时候，正是他爸爸头上出血的时候，但是他还没有死，这里的还没有死，那边的又喊了起来，外面马上就会知道。我当时感到是晴天霹雳，拿在手里的哑铃没有放下，就走过去向孩子的头上打去，那时我真的是丧心病狂了。如果我平时和这个孩子的关系不好，那么，现在我还好过一些。可是，我们平时关系挺好，现在我有口说不清。如果他不醒的话，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我把他也捆起来了，把他的嘴也封上了。但是孩子把纸咬断了，开始我用手打他，他不怕，我觉得这都是命中注定的。实际上我这里杀了人，我肯定是要死的。我去自首，

也是希望他们快点儿杀了我。

我决定去自首

可我不知道公安局、法院在哪儿？也不知道应该是去公安局，还是去法院？我想公安局是抓坏人的，我已经杀了人了，已经是坏人了，就不用去公安局了，那么我就去法院吧。因为是周末，法院不上班，我就问人家：“谁值班？我有事要讲。”人家说：“你有什么事，下个星期再来，我们今天休息。”后来我一想，既然是这样，我只好去公安局了。到了公安局我就说：“我是来报案的。”他们请我到里面去，我还带了些洗头洗澡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一进去就出不来了。他们也没有看出我是个杀人犯，我当时穿的衣服都是短袖的，他们看到我遍体鳞伤，因为4月份他打的我，到了6月份还没有好呢。他们问我：“你报什么案？”我说：“杀人案。”他们问：“谁杀人了？”我说：“是我。”他们问我：“在哪里杀的人？”我说：“在家里。”我把钥匙给他们，他们打开房门看的。反正我是想死的人了，我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别人讲公安局会打人，我却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只想快点儿死了算了。所以我连家里都没有告诉，什么后事也没有交代。

因为我自首了，肚子里又有孩子，所以法院没有判我死刑，给了我一次再生的机会。对家里人来讲，我没有被判死刑，是个安慰，对于我自己来讲，真的是比死了还要难受。因为我的身体很差，别人也会说：“你很坏，把别人的孩子打死了。”我被判无期徒刑，又经过了3次减刑，现在还剩10年刑期。我今年已经38岁了，从我的事情我得出了一个感觉，人做事不能太过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结合了都是要为对方着想，不能相互欺负。我的事出了后，有的人就说：“我以后要对我老婆好一些。”确实是这样。当时，我真的绝望了，精神都要崩溃了。现在我惟一负罪感很深的，就是对那个孩子的死。说句老实话，如

果我不和他结婚，我凭空想象不出男人会用什么办法来折磨自己的老婆，我绝对想象不出这些，他对我有精神上、肉体上、性生活上的种种迫害，而且最不应该的是他对我的迫害表现在让我一次次地流产。他对我说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我认为，一个女人的名声、清白超过了生命。

那一年我只有31岁。刚进来时，许多人采访我，狱里还要我上电视，我很听话，从不拒绝。后来我了解到，我也有权不讲这些，所以我也拒绝过一些人的采访，因为每一次都是在揭我的伤疤，使我再一次体验到以往的痛苦。这次你们来就不一样，你们是为了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为妇女讲话，不是猎奇，所以我愿意再讲自己的过去给你们听。我觉得，像我这样逆来顺受的人，现在真是没有几个了。我个人的条件不错，又不是找不到人，他这样欺负我，算什么呢？那时我就是觉得以诚待诚，总能换回他的真心。开庭时，法院问我是不是请个律师，我说我不请，我要自己说，我只想讲真话，他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就行了。当时，这次流产我不愿意，因为我不想死在手术台上，我说：“如果我死在手术台上，受害者的家属出不了气，你就直接把我拉去枪毙就行了。”知道我不同意流产，他们喊来了9位领导跟我谈，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们说：“你如果不流产的话，就会影响我们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我们评先进就评不上了。”我想国家和政府从没有亏待过我，就同意了。可是流产手术也没有做好，出血出了一个多月，我个人的半条命都去掉了，非常受罪。

其实，我当时根本就不懂，怀孕的妇女不判死刑。只是到了监狱，通过学习法律，我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定。但是我还背了一个黑锅，别人认为我知道有这条法律规定，利用了这一规定杀了人而不偿命。有一次，我做梦梦见了我的孩子喊我妈妈，我哭醒了。看守所的所长来看我，对我说：“你不要害怕，你是孕妇，

法律有规定是不判死刑的。”我说：“我不是怕死，法律的优待我不要，我只要快死，我可以给你写字据，是我自己要死的。我真是觉得我太愚蠢了，很多妇女被男人打，但都不会像我这样愚蠢。所以，在看守所里我一直想自杀，成了看守所的重点对象。为什么最终我没有走这一步呢？主要是想到父母亲承受不了，如果当时杀了人，自己再自杀，通知了父母亲，那么他们一下子就会受不了；二是如果我进了看守所再自杀，父母还是接受不了。因为我再婚时父母是不同意的，那么我犯罪后又是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们，是我又一次自私，只想自己不想父母。另外，看守所的所长、干警对我都很好，如果我死了，他们要受牵连，他们没有看好我，要承担责任。基于这几点考虑，我感到不能去死。别人不了解我的感受，还认为我沾了好大的光，别人杀一个人都会去偿命，而你杀了两个人还可以不死。实际上我根本就不想活，这些话我还不能讲，不然人家会说：你不以德报德，还有这种想法。实际上我这种想法一点都不牵连政府对我的关心，主要是我不想再受心灵上的折磨。我这个人好像是个双重性格的人，表面上很开朗，无所谓，实际上非常爱面子。在以前我是很唯物主义的，不相信命运，现在通过我的婚姻而导致的恶果，我觉得这些是不是命运的安排？现在我又陷入了宿命论，每次我在遭受到痛苦时，都把它归结为命运的安排。我想，命中注定我要遭受这一劫。我在监狱中看电视也好，看文章也好，如果看到哪个人在干好事，又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话，我就很伤感，一听到音乐我就流泪。第一次去大礼堂，我仿佛是在学校的礼堂里才走出来一样，恍如隔世。

现在我反复思索，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大专毕业是 1983 年，人们给我的评价是很高的，从我的相貌、我的才华，我都不应该走到这一步。我总在想，当初我应该走

哪一步，就不会让事情恶性发展下去？对我来讲，杀只鸡、杀个鸭都不敢的人，为什么最后会去杀人？还不就是给了对方一个总是折磨自己的机会吗？我觉得千万不能这样，对方已经是这样了，那么自己就不能太软。我记得曾经有一位老师对我说：“你白天打不过他，那么你晚上趁他睡着了，就不会打他吗？”他总是打我，又要强迫与我过性生活。我就曾经向学校提出过，要求学校分我一间小房子分居，这个房子不要大，只要能放下一张床就行了。但是学校不给，对我说：“我只要给你一间小房子，那么你丈夫就会说我们支持你们离婚。”学校就是怕他。后来我出了这个事，我们学校的校长给撤职了，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得不到解决，跟他们的软弱有关。他长期打我，作为校长应该从行政的角度去干预他，给我们找个能分开的地方，那么他也不可能去打我，我也就不可能干出那个杀人的事情来，真的是和他们有关系。

1997年我看报纸，是有关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报道。我真的很高兴，现在的妇女终于不会像我以前那样，遭受到了家庭暴力而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受到了虐待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自己的男人对自己不好，总是感到是自己的命不好，虽然想了许多办法，也改变不了自己遭受打骂的命运。以前，他晚上打我，我就哭，第二天早上眼睛红肿地去上课；有时我在家受了委屈，讲课时，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就在这种情况下，别人还说我的课讲得好，我带的班学生的英语水平都是很高的，现在我的脑子被这件事搞坏了，许多词（英语单词）我都忘了。我出去以后凭英语吃饭也不行了，找工作挺难，英语的发展我也跟不上了，干别的活儿我身体又不好，力气活儿我干不动。我心里很悲观，以后再走教书的路是不可能的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更富强了，对失业没有工作的人有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我们这些坐过牢的人都能吃苦，对生活的要求很低，承受能力也强。本来我在外面就是那种不看重钱的人，不是那种贪

图享受的人，所以出去对生活的要求也是很低的。

点评：

丈夫为什么要对妻子施暴

薛宁兰

李一凡，这个曾为人师表、在教学上取得过优良成绩的职业女性，与其他口述个案中的受暴妇女一样，最终也走上了杀夫、甚至杀子之路，其背后隐藏着许多这类案件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在本书其他口述个案的点评中已经提到的，“家庭暴力会出现在任何家庭，它与施暴人、受暴人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没有必然联系”；“在暴力发生的初期，离婚是摆脱暴力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受暴妇女一味地忍让，只能使暴力升级”，等等。

李一凡的受暴经历，还向我们展示了家庭暴力（配偶暴力）这个跨国界、不分民族的世界现象在当今各国依然存在的一个根本原因。

对于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或者说丈夫为什么要对妻子施暴，人们有很多解释：有的人说，那是因为女方有过错，或好吃懒做，或太唠叨，甚或在外面有了情夫；还有的人认为，是因为男方“天生脾气不好，发起火来控制不住”；更有人认为，施暴男性从小生活在暴力的家庭中，长大后就用他所习惯的方式解决家庭问题；等等。针对男性施暴的原因，瑞典社会学家艾娃·拉登格雷恩认为，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才能找到更为深刻的原因^①。她所设定的问题是：“男人通过对妇女的暴力得到了什

^① 刘敏：《她看家庭暴力（下）》，《中国妇女报》2001年12月17日，第3版。

么？”结果发现，丈夫们从对妻子的暴力中获得了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暴力控制了妻子的行为和情感，控制了她们的交往，从而使自己成为具有“男子汉气概”的人。通过控制女性，来完成男性气质的建立，这是当今许多文化所赞扬、肯定和崇尚的。因此，家庭暴力的实质，就是一种控制，是男性为了达到对女性的控制而采取的手段。可见，正是男权的社会性别关系模式（包括家庭关系）促使了暴力的发生。

李一凡第一次挨丈夫打的起因，恰恰说明了这点。与她同为教师的丈夫，不但不为妻子精湛的业务技能自豪，而且害怕妻子比自己强，怕她一旦到了南方就驾驭不了她，当不了他的老婆。所以，他不但阻止她到那里工作，而且，开始了对她的殴打、性虐待，以及社会交往的限制。在南下不成后，李一凡就应当有所醒悟，而不应为了落个“好名声”，一味地忍让，努力维持这种无爱的、充满暴力与算计的婚姻；对方也正是抓住了她好面子、怕离婚的弱点，开始变本加厉，经常打骂她，对她进行性虐待，以至于有恃无恐地编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

面对铁窗，李一凡除了以泪洗面，也反复思考着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用她自己的话说，“还不就是给了对方一个总是折磨自己的机会吗”？现在，她对这场暴力悲剧一步步升级的个人原因，对待再次离婚的态度，以及对如何建立平等夫妻关系的看法，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她在成长，在进步。但是，这种收获是用两个人的生命和她自己的幸福、自由换来的。这个代价太大了！为了不让李一凡的悲剧重演，除了依法防止家庭暴力事件，建立系统、有效的社会救助机制外，认识家庭暴力存在的社会文化原因，打破千年男权文化建立起来的男女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模式，也是我们应当关注和着手的。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艰辛的过程。

8. 真不知道我挨了多少打

叙述人 李彦平
访谈人 范爱莲
访谈时间 2001年3月15日
访谈地点 辽宁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 范爱莲
文稿编辑 丁宁

李彦平，40岁，初中文化程度，入狱前是某钢铁厂工人。刚一结婚她就发现丈夫打人，她想离婚。她找过自己与丈夫的领导，找过居委会，求助过家人；她曾向法院递交过离婚起诉书，曾带着孩子出走过。但是她始终走不出暴力的阴影。婚后第13年，她终于不堪忍受丈夫残暴的殴打，奋起反抗，用西瓜刀捅了丈夫21下，结束了她久久不想忍受的婚姻生活。她很惦记在孤儿学校读书的两个儿子，只恨自己以前不懂法，造成了千古遗恨。

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我跟我丈夫是1983年4月经过自由恋爱结婚的，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单位的，都是钢厂工人。我跟他搞对象时，岁数小，才19岁。毕业出了校门刚走入社会，也不太懂得什么。参加工作了，父母也说，太小，别过早就谈恋爱。因为家里兄弟姊妹也挺多，一共6个，女孩多，姐妹5个。我父母对女孩管得挺严。但是，自己还是冲动了，过早地谈了恋爱。我觉得过早地谈恋爱跟

以后发生的事有关。因为毕竟还是孩子，心理还不健全，所以我挺草率的吧。那会儿我丈夫没有父母，21岁那年，我就跟他登记结婚了。厂子里也挺照顾咱俩的，他是孤儿，也就同意咱俩结婚了。没有孩子那会儿，感觉还可以吧，一般吧，不算太和谐。反正结了婚，就这样过吧，一个女人结了婚，再离婚，总觉得不体面。得了，反正他就是好喝酒，别的嗜好也没有，就将就过吧。到1984年就怀孕了，（一胎）生了两个孩子，两个男孩，今年都17岁了，现在在孤儿学校。等到34岁，我们共同生活了13年，也就出了这个事了（指杀死丈夫）。到现在我也挺后悔的，不管怎么说，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就是喝酒打人，喝了酒就打人。

谈恋爱的时候，我知道他好喝酒，那会儿觉得优点能战胜缺点，还是好的地方多，但是可能还是我有孩子后，忽略了对他的感情，我也常常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说：“我怎么不爱你呢？”我说：“那你为什么喝了酒就打我？我告诉你，你每次打我，我都很伤心，我辛辛苦苦给你拉扯两个孩子，我自己带两个孩子，你可想而知，你工作那么忙，你只能是下班以后帮我抱抱孩子。”我一天到晚地忙，我妹妹都停学了，帮我带孩子，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人帮助，我经常觉得心里不平衡。我要把全身心的爱给孩子，就不能说像没有孩子时那样照顾他，夫妻之间的那种感情也就随之淡忘了。

记得他第一次打我的时候

记得咱俩（指她和丈夫）第一次争吵，那时还没有孩子呢，因为什么我也记不住了，我就给你讲大概吧。反正是那天下班我们俩生气，因为我加班回来晚了，就发生了争吵，反正总是因为这点儿事。我自己觉得我没有错，他还是觉得我错了，这样一来咱俩人就吵了起来。在家我父母都没有那样说过我，骂过

我，打过我。他伸手就打我，打了我一个乌眼青，还说：“你还敢跟我顶嘴？”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伤心得掉眼泪，心想，这刚结婚，他就打我，我想我不能跟他过了。第二天，我揣上结婚证就去了我干妈家。（注：这里隐去干妈家所在地名。）她家在另一座城市，我在那儿呆了两天。可是一个女孩家兜里也没有几个钱，上哪里去呢？我又回来了。这事又不能和自己的爸妈说，因为我们结婚这事爸妈就不乐意，所以自己的苦就只好自己往肚里咽了。我到了厂子里，跟我们那儿一位姓谢的工友说：“你看，我们家的那位，喝酒就来脾气，都不让我说话。”就因为我跟人家讲了这话，下班回来后，他又把我打了一顿。他问我：“你干什么去了？”我说：“我去辽阳干妈家了。”他说：“你是不是有人了？”我总觉得，这男人小心眼儿，的的确确存在。我本来挺委屈，他打我，我没处躲，我走了两天，又回来了。他应该给我一点儿温暖，或者安慰安慰我，我要是遇到坏人该怎么办？他没有，反而说我骗他，我为什么要骗你啊？他就又揍了我一顿。这次我不敢走了，忍着吧！

像这种情况咱俩人经常发生，偶尔一句话不合就打。就拿一件最小的事情为例：我是工程建筑公司的气焊工，一天上班活儿挺忙，家务活儿挺多，孩子的功课也要管。我也没有多少文化，孩子的语文我能辅导，算术有的我不会。他什么都不管，还对我说：“你就不能把孩子的书包收拾收拾？”我说：“你看我下班回来，做饭、洗衣服、收拾卫生，还要照顾孩子，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家务事是咱俩人的事，你有时间也帮我料理一下。”他说：“我娶了你，这家务事你都得干。”我说：“我是你家买来的奴隶吗？”咱俩人为这话就得打。他一打我就是青一块，紫一块。每次他把我打得都很重，不能上班，只能去医院看病。我这腿上、腰上都是他用铁锹砍的，都成了死肉了。他还用刀扎，这都是经常的事。那会儿我也不懂这是虐待，是伤害，他对我使用暴力，

每次在我心里积压，产生了恨，这个恨一次比一次强烈。我想，既然你能一次一次用刀扎我，我为什么不能用刀扎你？离婚又办不到，反正这家也完了，散了。你扎我，我就用刀扎死你算。咱俩为了什么？就为了一串钥匙。两口子你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我说你生活作风有问题，毕竟分心了。这次是白天上班，晚上就出这样的事了。我有时晚上睡不着觉就想，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自己都说不清楚。人生对我真不公道，心里很苦，又不能对父母、对姐妹说。每次父母来看我，我能说什么呢？我看到他们的头发都白了，挺痛苦的。我想我真是傻，就是不懂法，有时候想，不如那时候拿起身份证远走他乡得了。可是舍不得那两个孩子，自己生的，从生下一直带到11岁。对我的丈夫没有什么舍不得的，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也谈不上恨他什么的，只恨我自己不懂法，不会保护自己。

他喝了酒打我，打了多少次我也记不住了

一点儿小事他就打我，因为他没有文化。他一本书都没有读过，他不会讲道理。那会儿搞对象的时候，我妈就说：“他一天书没读过，又没有父母，你的脾气也不好，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一个文盲，没有父爱、没有母爱的人，反正我的将来就是这样，好不了。他就是爱喝酒，每天晚上喝一顿，一天都不落，少则半斤，多则两大碗，双沟白酒一顿能喝两瓶，还得喝几瓶啤酒，究竟能喝多少，我也不知道。就是好喝酒，喝了酒就发脾气，就打人。酒醒了也说不喝了，再不打你了。可是记不住，还是喝。

他还老怀疑我跟别人好

我不能跟人家男的讲话。一讲话，（他就说）“就是你俩人好了，是不是你俩白天又约会了？”就是这样小心眼，婚前婚后都是这样，总是认为你有人了，跟别人好了。平常我要去我妈家，

他还不去，我去了，他就要问：“你妈又给你出什么主意了？是不是又要咱俩离婚？”你说哪会有这样的丈夫啊？你说怎么能不恨他呀，无中生有！

我生完孩子后，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照顾他了，冷落了他。我做的剖腹产手术生下的孩子，一口奶都没有。手术中输了600CC血，我真的不容易！不过他干活还行，人死了，也不能都说他坏话。那时住那个小房，帮我生火什么的，就是一喝酒就打你（指她自己）。每次有个请客吃饭的事，我都得像对小孩子一样嘱咐他：“多吃菜，少喝酒，别每次都是自行车放在出租车上让人家拉回来，花着钱，你还遭着罪。”可是每次都是那样。开门晚了，还给你两拳，这都是常事。我说他就是变态，他要把你管的叫你端盆，你就得端盆；说那鸡蛋是扁的，你就不能说是圆的。有时他喝酒喝多了，不能去上班，还不让我去上班，就得在家陪着他，他说：“你别去上班了，在家陪我。”我呢，上着班也不放心，怕他喝酒喝死了，喝了酒就渴，没人给倒水喝，不放心，就往回跑，还是得管他。我这样讲是说我们还是有感情的，就是一打我，我就恨他。我自己算了，一个星期一小打，一个月一大打。小打是他感觉他来气了，就得打我两下，往头上打两拳，再不就是踹我两脚。大打就是流血了。你看这头上这包，这胳膊上都是用刀扎的，这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五六块。

他不光打我，还打他妹妹。他妹妹跟人家有妻之人好上了，他抓着他妹妹，把手指头放在床头上，用大木头砸。他不仅那样打我，打他妹妹也那样打，毕竟是一奶同胞，打得很厉害。说明这个人很凶的。我们结婚13年，他就打了我13年！

我也闹过离婚

我也想过离婚，记得最清楚的是孩子6岁那年，那天一早上我把家里收拾干净，他也在家休息，因为他爱吃馒头，我就

(把)和的面，放在那儿，天凉也不能一下就发起来，我收拾好就放在那儿。我对他说：“我去看看我姥姥，你去吗？”他说：“我不去，你去吧，你几点回来？”我说：“下午3点到4点就能回来，回来我还得蒸馒头呢！冰箱里有吃的，你乐意喝就喝点儿，吃点儿，自己拿。”我领着孩子走了。到了我姥姥家，我姥姥说：“你怎么来了？”我说：“姥姥，我可想你了。”我从小是我姥姥带大的，能不想我姥姥吗？我就给我姥姥洗洗、收拾收拾。我姥姥说：“你吃了饭再走吧。”我说：“不了。家里还有一口人呢，回去晚了那不得说啊！那就超时间了。”我5点到家就做饭。我问：“面到哪儿去了？”他就骂我，都是些难听的话，我说：“你骂我我也得做饭，我和孩子都没吃饭呢！”他说：“我把面倒了。”你看，我和了一盆面都让他给我倒了，倒了我也没吱声，又淘米，用电饭锅做米饭。他不让我做，他说：“走还没走出饭来，还回来吃饭？”我说：“怎么着由你，我也得回来做饭。”他说：“你一走出去就什么都不管了。”我说：“你少管我，我也没干别的，你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我带两个孩子去看姥姥，有什么不对？叫你去你不去，你要是多想呢，那是你自己瞎想，我没做什么事，我就带孩子走的，你要是不相信我，以后咱俩干什么一块儿出去。”他说：“你越来越行了，你还敢犟嘴？”我说：“那我总是忍气吞声的，不能犟吗？”就这样他过来打我，打我时我也跟他撕扯，我也打不过他啊。他就又进里屋去取了一把水果刀，好长的一把刀，照我胳膊上就扎，你看，就是现在胳膊上的这块疤痕。我一瞧，出血了，我也没吱声。他可能挺懂的，拿过一根鞋带就给我胳膊绑上了，就拽我往外跑，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领到我妈妈家去。我想，你不带我去医院，到我妈妈家干吗？我就不上楼，他把我拽到上头，我爸妈都起来了，问：“这是怎么了？”他说：“我把彦平扎了，领她看病。”这时，我下楼就走，打了车回家，孩子还在家睡着，家门也没锁。我跑回家，

给孩子穿上衣服，说：“儿子，走，妈带你们走。”我就把这两个孩子送他朋友家去了。因为他的朋友那家两口子都挺好，我管他那朋友的妻子叫二嫂。二嫂一看就问：“这是怎么了？”我说：“胖子给我扎的。”我丈夫的小名叫胖子，我说：“我可不能活了。”胳膊肿得那么粗，到医院以后连系的鞋带都拿不出来了。二哥二嫂一看，说：“赶紧上医院。”他家有车，就拿车给我拉医院去了，缝了3针。之后，我没等伤好就离开医院，离家出走了。我把孩子扔在那里（指家里），不管了。

我觉得活着跟死了没什么两样，我就到我三舅家呆着。我三舅说：“送你回家，不能留你，将来要出什么事呢？”我说：“你留我吧，呆几天我就上法院去起诉离婚，不能跟他过了。你要送我回去，我就去死，你要让我呆几天，我就去跟他离婚。”这是1992年5月份的事。6月份我就去法院起诉跟他离婚。我舅说：“这事你要考虑好。”我说：“我想好了，我不能跟他过了，如果是原则上的问题离了婚，丢人，这样打我骂我，因为啥事啊？”后来我就去了法院起诉跟他离婚。之后，我又回到三舅家，因为我不能回我妈家，我如果在我妈家，我妹妹、我姐姐都会挨他的打。我姐姐有一次给我买了一双鞋，也是不对，他砸、打我姐姐。就这样我也不敢回家。7月份，法庭开庭，我得到庭。那天咱俩人都到庭了。在法院门口，我妈、他弟弟还有他的朋友（都来了）。他还领着两个孩子。我一下车，眼泪就掉下来了。一合计，两个孩子6岁了，没有妈，能行吗？扔都扔了两个月了，瘦得不像样了。眼泪流着，心里还是挺恨的，宁可我不要这两个孩子，我也要和他离婚。这时，他就在法院门口当着这些亲戚朋友的面给我跪下了，他说：“老三，我求你，你看在两个孩子的面上，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我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不能跟你过了，过也没有意思了，一天到晚非打即骂的，啥事啊？给邻居也吵得四邻不安的。”他说：“我求你了，我以后肯定不喝酒

了。也不打你了。”其实，他那喝酒都成癮了，不喝也不成。我就是看那两个孩子的份儿上，还有我妈，我妈也不能让我离婚，谁的父母也不能那样。我妈说：“那就将就着过吧。”这样，到庭后，法庭给我们俩人调解，认为我们也没什么实质的事，性质也不严重，就是夫妻打架，他在法庭上求饶，表示以后不打了。当时我想，别说是夫妻打架，就是杀人了，也得给他机会，为了两个孩子，我就跟他回去了。等于我接受了调解，撤诉了。就这样又过起了日子。有3个多月他没喝酒，没打人，没吵架。

以后反反复复的，我也就不想提离婚了。自己精神上受到刺激，经济上受到损失，光起诉费就100多元，我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心想忍了吧！我儿子去年来看我，跟我说：“妈，现在我爸要打你，咱哥儿俩不就把他收拾了。”他打我时孩子都在，吓得够呛，孩子都哭着说：“爸呀，求你别打我妈了，我妈对你多好啊。”他不但不听，还一脚把儿子踹一边去了。孩子都怕他，跟他一点都不亲。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跟他熬了这么十多年的。我这个人就是犟，就是认死理，你打我，打死我也不服。不能说他全都不对，我上来那劲儿时也有缺点。两口子打架我就离家出走，这样影响不好，好像你外头有人了似的，他总是这样看我。我年轻的时候人也挺漂亮，不像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他总是怕我外面有人。我也不能和人家一样，也不能像社会上那些小姐三陪，咱也不会跳舞、搓麻，24岁带两个孩子，一天哪有时间、精力？一天到晚累得要死，晚上忙完，八九点钟就想睡觉，啥都不想干。

我在性生活上不能满足他，他就怀疑我跟别人好了

咱俩人的性生活也不和谐，马马虎虎。他要求得多，喝酒的人一说那事是没完没了的，我气得把被子全扔了，一脚把他踹地上去。你瞧这日子都过成这样，他天天喝、顿顿喝，天天要求跟

我过性生活。他身体也好，跟他结婚这几年他就没生过病。他心情好的时候，他要跟你好，就求你，问：“行吗？”我说：“行。”有时我累了，想睡觉，他就不高兴。如果我不满足他，他就会起疑心，就问我：“你白天是不是跟别人好了？晚上你不搭理我。”我说：“你不看我一天到晚带两个孩子这么累，什么都得我干。”我不能满足他，他就生气。没办法，就将就过吧。但是他倒是个过日子的人，买米、买菜，什么都给你买，冰箱里总是买得满满的，什么都不缺。也不是就自己喝酒，你们没吃的、没穿的。你要给他 50 块钱，他也不花，你问他：“还有钱吗？”他就拿出来：“有，你给我的 50 块钱我还没花呢！”就是人的脾气暴躁，没文化，就是我得听他的，我的脾气又犟点，所以咱俩的矛盾一天天就大了。

最后那次我杀了他

头两天他把家门钥匙丢了。那天下班他回来早，他把孩子接回来了。我下班一看，爷儿三个全都站在外头，俩孩子在一边玩儿，他骑在车上抽烟呢。我问：“怎么了？”他说：“我钥匙丢了。”我打开门，进屋就做饭，他也帮着洗菜。他也着急，我吃完饭，收拾完屋子，孩子作业我也看着写完了。他看电视，我就睡觉了。迷迷糊糊听他说：“老三哪，明天把你的钥匙给我，我配把钥匙，我下班早，回家帮你干点儿什么的。”我说：“行，明早起来给你拿。”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好早饭，送孩子上学，家里离学校远，我就把钥匙交给他了。他说：“你上午去取去。”我说：“好。”上午我就坐咱们公司的车去取了。他又帮别人搬家去了。他不在，我也没取成。下午快 3 点，他班上的刘二哥把钥匙给我送来了。下班我就回家了，他一看到我就骂我：“取钥匙你也不吱一声？”我说：“你看你也不在，屋里的男的都在睡觉，中午都休息，我扒门口往里一看，没有你，出门看见你弟弟了，你

弟弟说你帮着搬家去了，我一合计，你帮助搬家，一喝酒就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了，我还得干活儿呢！”他说：“那你问一问，你还能累死啊？”就因为我没问，咱俩就干起来了。打，开始打，他那也是喝了酒回来的，打了我，我就往外跑，跑到门外遇见邻居，他拿板凳打我，邻居见到说：“小王，你要干什么？”就把板凳抢下来了，咱家的板凳是铝合金做的。邻居张大哥把他拉屋里呆了一个多小时。

他回到家，见到我就说：“你给我炒俩菜，我要喝酒！”我不能违背他的意思，让他满意吧，赶紧给他炒菜，就让他喝吧，心想喝死拉倒，咱也管不了。他开始喝上了，喝完都晚上8点多了，他又把（白天）打架的事捡起来了，又开始吵闹。我拉起孩子就走了，就上咱二大姑姐家去了。我进屋就掉眼泪，说：“二姐，这日子没法过了，喝上酒就打。”二姐说：“这么多年了，你就将就着过吧。”人家是一个妈养的，弟弟再不好，也不能说是弟弟不好，也是我不好。二姐说：“叫你二姑姐夫送你们回家吧。”我心里还挺烦的，我想你不送，还让姐夫送，我就没让他送，自己领孩子就走了。我领孩子去那大排档，问孩子：“儿啊，你们饿吗？”儿子说：“饿。”我们就在大排档坐下吃点儿东西。我心里也挺闹，就来了一瓶啤酒喝起来，玩儿到（凌晨）1点多才回家。回家敲门，他不开。邻居说：“别敲了，喝酒睡过去了。”我就领孩子去了邻居家，在邻居家住下了。刚躺下，孩子睡了，我睡不着。这会儿他起来了，又非让咱娘儿仨回家睡去，我们只好又回了家。孩子睡着了，我就跟那儿躺着，他喝成那样，也没有精力和我打了。可是睡到3点，他又醒了，又和我干起来了，把我打了一顿。邻居也起来了，都来拉架，我就又跑了出去。

也不知是哪来的那么大的劲，我跳下大墙，躲在墙后的菜地里。邻居拉着他找我，找不到。等了一会儿，我听见没有动静

了，就顺墙回来，到了我们邻居李婶家。李婶问：“又打架了？”我说：“是。”李婶说：“别管他，咱们睡觉。”说着，给我收拾了一个床铺，我就躺下了。我也不知睡到了什么时间，李婶做好了饭，叫我说：“你饿了就吃，一会儿你李叔就回来了。”我答应着，还是睡，困得要命。一会儿，李叔回来了，对我说：“小张，我看见你俩儿子在那边玩儿沙子呢。”我就说：“麻烦你李叔，把我那俩孩子给我叫过来。”李叔正好也要去小铺买烟，就把俩孩子叫来了。咱家孩子看见他爸爸还在家睡呢，就跑出来了。孩子们见到我就哭了，说：“妈，你哪儿去了，我们到处找你找不到！”我问孩子：“你俩人是跟妈走，还是跟爸爸过？”儿子当然愿意跟我，从小他们是我带大的，我说：“儿啊，你们回家从你爸睡觉的褥子底下给我拿400块钱来。”他俩人偷偷地进去，把钱拿了出来。我说：“就这样吧，咱们走吧。”

可是举目无亲，能上哪儿去呢？我也不能回我妈那儿，我要去了那里，他就去砸我妈家，搞得我妈家鸡犬不宁的。我就上沈阳来了，沈阳有他一个从小就要好的朋友，是个男的，开了一个小笼包子馆。去了以后，一进门他就问我：“你俩打架了？”我想跟他说，看他那么忙，我没说出口。我说：“没有，我领孩子上市场，买衣服。”他问：“没什么事吧？”我说：“没什么事，顺便来你这儿看看。”说完我就走了，这都是下午3点多了，上哪儿去啊？又坐火车去了营口，大约是6点多了。那时住店，我什么都没带，身份证也没有，到了一个个体的小旅店，我就跟她说：“大婶，你看，我带着两个孩子，我又不偷不摸，我只是在这儿住两天。”她说：“行吧，看这两个孩子你也不像那种不守规矩的女人。”于是，我带着孩子就在那儿住了3天，又带着孩子回来了。

回来后一想，外婆死的时候也没看上，就上外婆的坟上去看看。就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心情也不好，完后又到我大舅母

家，大舅母说：“这也不是星期天的你来干什么？”我又不能说打架的事，只好编假话，说想我姥姥了，想给我姥姥上坟，就在那儿住了两天。这样一共在外边呆了7天。

我回来了，就（在车站）给他弟弟打电话。我说：“你跟你哥哥说，这日子维持不下去了，我也不想活了，你跟你哥把这两孩子带走吧。”他弟弟说：“哎呀，嫂子，我求你了，你在哪儿呢？我等你！”我说：“等什么等，你要不来，我就把孩子给扔了。”我嘴上这么说，我能扔吗？我可不舍得。我说：“这样吧，我有事再跟你联系。”他弟弟说：“1点钟，我去车站前找你。”其实我就在车站前打的电话，我说：“再说吧。”我就放下电话。我想：你哥哥来了，我回家还是走不了，孩子呢，你也不能领，还不是像上次闹离婚时一样，把我和孩子一起领回家去了。得了，我也不跟你联系了，下午我回厂子里睡了一觉。一早上，领导就来了，问我：“上哪去了，一走就是七八天？”我就哭了，他说：“这里都找疯了，恨不得地缝里都找了，你上哪儿去了？”我就把事情经过讲了，我说：“你看，为这一串钥匙，就把我打成这样，你看这些个伤疤。”于是我就给他看那些个伤疤。我给我们领导看后，就去找他厂子的书记，这两位领导关系很好，每次他打人，书记都管。在厂子里是不能再闹了，已经是新闻人物了，都不像话了。

这样就只好又回家了。我想，回家后不行我再跑吧。很多人都在我家吃饭，一直闹到11点钟，都走了。他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我说：“四海为家，想上哪儿就上哪儿，马路、火车站。”他说：“都和谁啊？”我说：“你不是问过孩子了吗？就是我们娘儿三个。”他还是不相信，他就认为这回有人领我走的，有人给我钱，有人给我出主意。总而言之，就是疑神疑鬼，总是怀疑我，有人跟我好了。你说可能吗？我这两孩子跟着我，我哪有时间出去啊！我说：“这个家呢，你要想过呢，就还像以前那样维

持，你乐意打，你就打，你乐意骂，你就骂，我不爱搭理你，我也没有精力。你不乐意过，咱们就散伙。”他是不同意散的，他说：“你跟我离婚，你家老少，尤其是你弟弟，你家不就是一个儿子吗？干死他！”那时，我老实，我就这一个弟弟，咱妈都38岁了才有这么个男孩。我说：“以后咱俩别吵架，就是为了这个家，就是为了孩子，说白了。”他一听，拿出200块钱说：“你这是有外心，你打车回家问你妈，咱俩是过还是不过？”我说：“这是咱俩的事，不是我妈让咱俩办的手续，咱俩能过就过，不能过咱俩就心平气和的，也用不着打闹。”他说：“我是不能跟你离。”他还是坚决不离。我说：“你不离我也要和你离。”他说：“你不是想离吗？你豁出去死，我就豁出去埋，孩子顶多到孤儿院去。”

就这样，咱俩人就又打起来了，打得难解难分。他喝的酒也不老少，喝了一瓶半白酒，6瓶啤酒。我一口饭也没吃，就坐在那儿看他喝，他就像个审判员似的，坐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问我，他问一句我答一句，到后来不是没顺他说吗，就吵起来了，他就拿啤酒瓶子照我脑袋给我一下，我也没吱声，我想打吧，反正也不得好了，早晚得死在你手里，打吧！没想到他一下又一下，还打我。我也来气了，我就站起来了，和他厮打起来。我把他摁在床上，桌子也翻了，电视也差点儿掉在地上，咱俩人丁丁冬冬地摔，浑身抓，抓得乱七八糟的，那儿都破了。一会儿，他不打我了，出去了。我想，这一仗是打完了，可能他是去上厕所了，我坐在床上也不吱声，我心里那个气啊！咱家有个切西瓜的刀，挺老长的一把刀，咱家的刀全是不锈钢的，都是他自己做的。他这人有能耐，手艺好。

他进来后拿出那把刀就来扎我，我等他扎我，我就把刀抢了过来，放在缝纫机上。我想，这是不想好了。他看我抢回去了，就又出去了。这次去拿回一把炉钩子、铁锹和铁铲子，他用一样东西打，我就抢过一样。抢下铁锹放一边，用炉钩子打，我抢下

藏在床底下。我看这是想好了，咱俩人就干吧，活也是干，死了也是干，咱俩儿子在床上吓得直哭，大叫：“妈妈！爸爸！”我把他摁住，对儿子说：“儿子，来，用铁锹拍你爸爸的脑袋！”我儿子还行，那会儿都急了，总是瞧着他爸爸打我，把我打得都不行了，就是你死我活了。这俩孩子就用菜刀，那会儿也不知是用了什么东西，就是咱娘儿三个一顿乱砍啊，就给他砍了。那会儿他还没死呢，他拉过我的胳膊就咬了我一口，临死他还咬了我一口呢！我心里一合计，这要是半死不活的就剩下遭罪了，就一下子打死得了，早晚都是个死，一不做二不休，我把刀从缝纫机上拿下来，不管是脑袋还是屁股，一顿乱扎！这会儿脑袋里一片空白，就是扎死得了。后来开庭时问我扎了他多少刀，我记得就扎了他3刀，实际上在宣判时说我扎了他21刀，就是说一个致命伤都没有，都是扎在肚子上。我当时心里就是气，谁知道是脑袋还是身体的，反正就是扎！后来是流血过多，休克性死亡。

一串钥匙造成一条人命，值吗？太不值了！那会儿咱俩打仗不到9点，从动手到死15分钟，后来是邻居把他送到医院，第二天告诉我：“你丈夫死了。”当时我就像是傻了一样，也不知道吃饭，也不知道睡觉，就一个心眼合计昨天那个场面，怎么打的。浑身也没有力气，躺了半个多月，一点一点回忆起来。

后来提审我时，我将前因后果从结婚到发生的事，怎么一次一次地打我，我都说了。反正他们也比较同情我，我这方面受害的人证物证都挺好，因为他总是对我起疑心，但我不是那种人，证人证言，左右邻居，领导都问到了，证实我不是那种人。在法律上判了我12年，对我挺公正的，毕竟我扎了他21刀，太多了。我的公诉人和律师说：“她没什么别的事，就是手段太残忍了。”我把他杀了，我是为了什么？挨了这么多年的打，我找过他家人，找过领导。咱俩人是一个大单位的，双方领导都知道我们两个人打架，他打我，领导每次都是劝劝说：“你们别打了。”

把我们两个人送回家去就完事了。那会儿我不懂啊，也不知道他把我打成那样，去派出所报案。我自己认为派出所是抓坏人的地方，两口子打仗都不是坏人不能到那儿去告。既不知找派出所，也不知去找妇联。进了监狱才知道，还有什么妇女合法权益。昨天看报纸才知道这法（指婚姻法）又修订了，反对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当时我不懂，我们打架，街道居委会也知道，他们也管，就是当时给你拉开了，说：“你看你们的俩儿子，家里什么都有，啥也不缺，你看这过得多好，以后别打架了。”他再给点上烟，唠了一会儿就走了。现在我市也成立了妇女儿童服务中心，你要是受到暴力了，可以到那儿，可以留宿，叫你在那里住。那会儿也没有这些措施，如果那会儿有现在这么多的帮助，这么多关心咱们的措施，我就不可能杀他，起码我可以找到“娘家”的人，她能管我，我也不怕我会被谁伤害，起码可以保护我，我自个儿能有出路。那会儿什么也没有，又不能离婚，离婚他就整死你（指她），整死你全家。

孩子们不恨我，恨他们死去的爸

我受了13年的罪。谈恋爱将近两年，那会儿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没发现什么，要不我也不会和他结婚。刚开始发现他不好，也觉得能原谅他，觉得他就是年龄小，好胜，将来一点点过日子也就好了。如果我不是逆来顺受，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以后的事情了。就是将来我服满了刑，回到家，我也不准备再嫁人了。孩子是好孩子，托生在这个家庭受了罪了。爸爸死了，妈妈坐牢，现在两个孩子在孤儿学校里，我爸妈都70多岁了，没有精力抚养他们。孩子恨他们的爸爸，来看我时，我就问他们：“你们恨妈妈吗？”他们说：“不恨，妈，这不怨你，怨爸爸，他一喝酒就打你，你从小带我们长大，你多累啊！”我说：“是啊，你们从小一人两个奶瓶，两个孩子4个奶瓶。要不是你姨帮我，

我根本带不了。”我妹妹没来时，我一个人抱俩孩子，一个胳膊上放一个孩子，给孩子喂奶，那会儿就是年轻，把我累成啥样了。那年我爸爸还做直肠癌手术。那会儿还指着他那点儿工资，俩孩子买奶粉就买60袋，光靠喂，我是一口奶都没有。我们俩人打架也不是为钱，日子还过得去，家里啥都有，冰箱、彩电、洗衣机都有，生活上也没受过苦，你说他不关心我吧，家里什么都不缺，我们那儿的派出所的人就说：“就这样的家还打架？家里应有尽有，谁趁呢？俩儿子！”就是打架，有时我也忍不住，就和他打。其实我对他够好的了，他每天上三班，半夜回家，我不睡觉等着他，给他做饭。哪个妻子能做到这样？吃完了饭，收拾好，热热乎乎地睡觉。所以，我觉得他欠我的太多，我不欠他的，杀他应该！但是我还是吃亏，12年的刑期，多苦啊！

现在孩子都17岁了。我一直在想，十六七岁的孩子性格是最不稳定的，是躁动的年龄，我担心他们认识什么坏人，再抽点儿烟什么的，学坏了！我很担心！有时我想给孤儿学校写封信，跟学校说说，等他们毕了业就让他们去当兵，当4年兵，就到了二十一二岁的年龄，也就过了危险期。我也不知道我的愿望能不能实现，我宁可让他们吃苦，也不愿他们学坏。我也不知道我这犯罪的事会不会牵连到他们俩人，我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

我恨我以前不懂法，是个法盲

这十几年我真不知道是挨了多少打！以前我是一点儿也不懂法，是个法盲。以前邻居、姐妹都不管两口子打架的事，也不知道他打我就是犯法，可以报案，把他抓起来。如果街道居委会能发些法律的书，使自己能懂法，就不会干犯法的事了。来到监狱，学了不少的法律知识，也看了不少的法律书，最近还接受了帮教，那会儿上哪去找这些书？就知道挣钱过日子，反正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挨打就忍着，打急了就跑，到了实在无法忍受

的地步，就干了犯法的事，造成了千古遗恨。我觉得政府对我很公正，判了我12年有期徒刑，真是充分考虑到我以前是受害人的经历，我那年是公开开庭，来了那么多人。今后我要好好服刑，争取早日出狱。

点评：

家庭暴力的循环周期与 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

陈 敏

李彦平的受暴经历催人泪下。在15年的暴力婚姻中，她曾多次离家出走以示反抗，但每一次都以屈服告终。她最后没能继续忍下去，是因为她的忍辱负重并没有换来自己的生命安全。她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以暴抗暴”的女性在暴力婚姻中艰难而无望的挣扎，以及我国立法上的滞后使得像她这样的受虐妇女得不到公正的审判。

一、李彦平具有典型的家庭暴力受害女性的特征

1. 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家庭暴力有3个周期。施暴丈夫在暴力的第一周期里，拼命找茬儿，妻子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无论怎么百依百顺，都不能让他满意，丈夫动辄对妻子谩骂、侮辱甚至拳打脚踢；在第二周期里，施暴丈夫频频将无辜的妻子往死里打，常常使妻子受伤、致残；在第三周期里，施暴人后悔自己的暴力行为而向妻子道歉，保证永不再犯。然而暴力的发生依照其内在规律不断地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李彦平的丈夫就总是借口喝醉了打她，酒醒了就说不再喝酒了，再不打她了，但他从不守信。李彦平的身上至今伤痕累累。

2. 随着暴力周期的不断循环，受暴人从无数次的挨打和屡

次无效的反抗中“认识”到，自己无力对抗来自配偶的暴力，因而从心理上产生无助感，渐渐地放弃了反抗。李彦平就是在多次挨打和无效的反抗后，对施暴丈夫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在离婚无望、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为尽量使自己少挨打，她对丈夫的暴力行为采取了极度的忍耐态度。在悲剧发生前的那个晚上，她还在对丈夫说：“这个家，你要想过呢，就还像以前那样维持，你乐意打，你就打，你乐意骂，你就骂，我不爱搭理你……”

3. 受暴妇女往往在自己或家人的性命受到死亡威胁时，才会奋起反抗，杀死施暴人。李彦平是在丈夫企图杀死她的时候，实在是忍无可忍，15年受暴的心酸和怨恨一下子爆发，才杀死丈夫的。

二、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与法律改革

像李彦平这样的受虐妇女，虽然长期忍受家庭暴力，但是，一旦她的委曲求全和忍辱负重换来的依然是死亡威胁时，其中的一些女性很可能会以死相拼，杀死丈夫。在国外，这种杀人行为被称为“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

“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与传统刑法意义上的正当防卫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意义上的正当防卫是建立在对抗双方力量对比势均力敌的基础上的，而“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理论充分考虑了受暴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殊的生理因素（体力上的悬殊）和心理因素（长期挨打造成不同于常人的特殊心理状态）。

国外的司法实践很重视施暴人发出的死亡威胁，认为受暴女性经过长期的受暴，最了解施暴人，最善于准确接收施暴人发出的信号。因此，她对施暴人将死亡威胁付诸实施的行为的极度恐惧，是合理的，因而在这种极度恐惧之下发生的杀夫行为，属于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同时认为，如果受虐女性等到施暴丈夫（或男友）将其死亡威胁付诸实施时再反抗，显然不会有多少胜

算。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等发达国家都已通过判例或立法成为有效的可采证据。

我国法律界尚未认识到受虐妇女的这种特殊心理，因而还没有在立法上承认这种杀夫行为是受虐妇女采取的正当防卫。妇女界正在极力呼吁社会和法律界关注这种立法上的不平等现象……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也一定会吸收并采纳这种国际上通行的立法规定和做法，使类似李彦平这样的受虐妇女，得到公正的审判，以体现我国对妇女的人权保障。

9. 要是现在，我就不会杀他了

叙述人 翟玉琴
访谈人 薛宁兰
访谈时间 2001年3月15日
访谈地点 辽宁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 王知理 薛宁兰
文稿编辑 薛宁兰

翟玉琴，45岁，农民，文盲。婚后因为生了女孩，开始受到丈夫多次殴打谩骂。在离婚不成、又得不到必要社区支持的情况下，1985年某日凌晨用镢头将熟睡中的丈夫打死。她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入狱后多次减刑，将于2003年刑满出狱。

因生女孩，开始遭丈夫毒打

我俩是自由恋爱，经人介绍认识的。我们交往了一个多月，1978年2月份就结婚了。刚结婚时我们的感情还可以，他对我挺好的，直到1979年2月份我生了第一个孩子。因为生的是女孩子，他不满意，开始虐待我。他经常在外边喝酒，一回来就喊着开门，有时一边哭一边闹，砸东西。什么都砸，家里的东西都砸坏了，没东西可砸了，他就找茬儿打人。他晚上出去喝酒，不管多晚回来，一叫门就得立刻给他开门，动作慢一点儿就开打，我就这样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不回来，我们娘儿俩就不敢睡觉，等他回来，要不打了才敢睡。不知他什么时候回家。他一

回来就扔砖头，从外面窗户往屋里扔，把玻璃都打碎了。

我打不过他，次数多了，就只能往山上跑，我们那儿是山区。一开始也往别人家跑，但我跑到谁家谁家就倒霉，谁管他就跟谁打，连他自己的妈和哥都打。时间长了，我也不好老跑到别人家去。他经常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心想，他年纪大了，脾气可能会小些，现在能维持一天就算一天吧。但他脾气越来越大。我也几乎每天都挨打，我就上我们村书记家说。大队书记劝我也劝过他。我丈夫有半年对我好些，过后他还是老样子。

过了3年，他想要第二胎。那时，我们那儿一对夫妻只能要一个孩子。我就跟他说：“算了，别要了。生了还得罚款，我们家条件不好。”他还是要生，我怀孕的时候搞计划生育的人来动员我不要这个孩子，但是，我丈夫不让，说我们认罚。他们要是来找我，村里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躲起来。第二胎生下来又是个女孩，我丈夫和婆婆都不满意。为生二胎罚了我们800元钱。

孩子出生后，我只休息了两天。到第三天我丈夫感冒了，我还得起来伺候他。我婆婆家离我们不远，她很少过来帮忙。我挨打时，她不管她儿子，还说：“就怨你！你要是生个小子，哪有这事儿？”她说是我的责任，我也不敢吱声。我丈夫的哥家都有男孩，他们家的人都希望我生男孩。我不能和婆婆吵，要不丈夫又得打我。一个月子里，就我自个儿管自个儿，小叔子有时过来给我挑点儿水。后来，我的胳膊腿受风了，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

二女儿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要我把孩子扔到山上。我家后边是座山。当时是冬天，要是把孩子扔到山上，还不给冻死？他又要用自来水把她灌死，我不同意。我让他把二女儿送到城里给人，他又不肯。孩子一个月零一天时，他喝了酒，朝我扔酒杯，我怕他打着大孩子，背着她就往外跑。我把老大送到他奶奶家时，就听见他把家里的东西砸得直响。那天，外面下着大雪，小

的还在炕上睡着。我一进门发现小女儿不见了，是他把她扔到外面雪地里了。我叫上他嫂子到外面找到孩子，发现还有气，抱回到我婆婆家。他那时挨家找我，在他妈家见到我，追着我就打。别人都在那里劝。后来我在别人家住了，孩子一天一宿都没吃奶。我寻思着孩子不死也得傻。过了一天多孩子恢复了。

这件事过后，他还经常跟我打仗。那时候我们那里的计划生育政策变了，如果第一胎是个女的，还可以生二胎。我寻思着把小的给人，再生一个小子，他就不能这么虐待我了。在小的3个月的时候，政府号召我们绝育。乡政府来人给做工作，我就做了绝育手术，这孩子也就没给人。我做回来以后，他对我更不好了，更是经常跟我打仗，砸家里的东西。他还是喜欢男孩，就喜欢他哥家孩子。

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过日子，提出要跟他离婚，家产都归他，我只要孩子，但他不肯，不跟我办手续。从那时候起，我就想过要杀他。1982年，我们村里有一个女的精神不正常，被她丈夫杀了。也有夫妻关系不好妻子自杀的。有这些事发生时，我丈夫会待我好一点，但也不长久。他又打我。我想，我把他杀了，像我们农村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判个死刑，孩子给人也行，送孤儿院也行。他如果对我好一点我就不杀他，这样的婚姻能维持就维持下去。

他虐待我的事，我也曾跟娘家人说过。我娘家和他家不是一个村的，相隔有5里地左右。我姊妹6个，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我排行老四。我妈妈也是重男轻女的，我小时候，有吃的和穿的都先给男孩子，老让我们女孩子干活儿，那时我就想早点离开娘家。当时我23岁，他对我挺好，挺关心我的。我妈因为他家出身不好，一直反对我和他处对象。在我要离婚时，我妈就说：“该呀，不要你和他处对象，你偏要。”所以，后来的事我就瞒着她。我们再打架，我也不回娘家了，宁愿去别人家。

选择杀夫，摆脱受暴命运

我们家条件不好。生第二胎时就罚了钱，盖房子花的2000块钱都是借的。家里没什么收入，主要是靠种地。我们村里有些人家在外面搞副业，日子过得还宽裕。但我们不和睦，就没办法搞。

我们那儿的风俗，每年初二回娘家拜年。那年大年初二，我丈夫带着孩子上我母亲家拜年，我没有去。后来听我妈讲，他在我家喝酒，跟我姐夫打架。他那天回来就说我和我姐夫好上了，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开始砸东西，打我。

一个星期后，我们家就出事了。1982年他想把小女儿冻死时，我就想到要杀他了。后来，我把家里刨地的镢头收了起来，那个好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在家喝了酒，又哭又闹，还说我和我姐夫有问题，打得我哭天喊地。他打累了，就躺下睡了。我想，这样的日子实在没办法过了，我也不想要命了。在凌晨3点的时候，我拿起早已藏好的镢头在他头上砸了3下，把他砸死了。杀他的时候，大女儿醒了，问我在干什么。以前我老早就跟她说了我的想法，她说：“妈，你别那样。把我爸打死了，你也不在了，我们不会做饭，会饿死的。以后我爸再打你，我们就跑。”杀他那年，大女儿还不到6岁，她没有哭，她也恨她爸爸。然后，我把他的尸体拖到菜园里用东西盖住。我当时一点儿不害怕，我也不想要自己的命了，把孩子留住就得了，孩子还小。

我去告诉了我婆婆和孩子她大伯们，他们说：“死了就死了，别让人家知道就行了。”我丈夫也打他妈和他哥。出事那天晚上，他妈到过我家劝我们，和他吵了几句。他妈那晚没敢在自家睡，我是在别人家找到她的。因为死的是大人，按村里的习俗，要办丧事，大家都来帮忙，吃丧饭。我就跑到大队书记家报了案。当天公安局就来人了。我当时不觉得我是犯罪，我只知道有男监

狱，不知道有女监狱。

派出所的人是当天晚上来的。警车来时，我以为是直接上刑场。那时只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到了公安局以后，下了车就给我带上了手铐。当天晚上就提审，问我怎样杀人的，第二天又提审，一天问好几回。在派出所我呆了3个月。后来，我丈夫的家人要求给我重判。我婆婆说她儿子只是喜欢喝酒，并不能怪她儿子。说我早有杀他的想法，因为以前我是跟她说过。他们要求重判我。

1985年，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给判了无期徒刑。那时，有人告诉可以请律师辩护，但请律师得花钱。我姐经常病，家里没钱；我哥哥的家庭条件也不好，就没请律师。法院也没有给指定律师。我没上诉，判决书上说我丈夫重男轻女，酒后哭闹打人。我挺感谢法院为我留了一条活路。

近20年的狱中生活

我进监狱的时候不到30岁，只有29岁。入狱后情绪不稳定，我想，无期徒刑那么长时间，我身体又不好，干活儿挺吃力的，连一点活的信心也没有。后来这里的领导找我谈心，慢慢就好点儿了。我在1988年被改判（应为减刑）为17年有期徒刑。后来又减了两次刑，第一次是6个月，第二次减1年零3个月。可能是因为我表现还可以吧。

在监狱里，我弟弟和妹妹来看过我。我弟弟成家以后，我缺钱用就给他挂电话，我弟弟或弟妹就给送来。我还有一个妹妹，我现在就全靠他们两个人。我的两个小孩很少来，婆家人不让她们来，我让我姐去看她们，我姐说：“我给你们小孩买东西或给她们钱，你婆婆不要。也让我下次别去，我又不能跟她吵。我没法去了。”后来，我姐就不怎么去了。我姐还说，孩子很少提我，她们和我姐的关系也不好。我入狱时两个孩子跟她奶奶家呆了半

年，后来就到她大伯家过，一家一个。她们都没怎么上学，大的念到小学五年级，小的8岁上学，9岁就休学了，没有人给交学费。听说现在俩孩子都结婚了，是她大伯做的主，没和我商量。大姑娘嫁得不远，就在我们一个村。小姑娘不是一个村，她才16岁，我猜是不是给卖给人家的。

我2003年12月9日出狱。出狱后也没有什么打算。我现在有病，老犯病，是眩晕症。在监狱里得的，我听说两个孩子上不了学，我身体不好干活儿又吃力，就得了这个毛病。现在我一上火就犯病，一个月犯一两次，犯的时候站不稳，老摔倒。吃点儿药一两天就好了。但我干活儿慢，手脚不好使。是坐月子时得的风湿病，我生了孩子以后家里又没人帮我忙，全靠自己，就着风了。那时也没有去医院看过，到五月节用艾蒿水洗一下。在监狱里贴了风湿膏，也没见怎么好。

现在我在这儿干的活儿是包香皂盒。我包得比别人慢，有一只手没什么知觉，理解我的就照顾我，不理解的就说我。我也着急。我现在最大的为难是，孩子叫她奶奶说得也不给我来信。我出狱后没人养我，我女儿又不和我走动。我自己又有病，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婆婆家人对我有偏见，我不能住他们那儿了。我正愁呢，我想让我小女儿养我，又怕给她添麻烦。我是她母亲，她不能不养我，养了我又怕人笑话。她现在也不敢来看我。

我当时也不懂法律，丈夫不和我离婚，我也没办法。我找过妇女组织调解，但没有用，只有杀了他。如果是现在，我就不会杀他了，我会找妇联解决的。

点评：

社区，是遏制暴力的第一道防线

薛宁兰

2001年3月中旬，沈阳的天气乍暖还寒。在女子监狱管教大队的会见室里，穿着厚厚的呢子大衣坐久了，还会感到寒气向周身袭来。已经在这所监狱服刑15年的翟玉琴被管教干部带来，很规矩地站在我的面前。当我们面对面坐下开始谈话时，我发现她不那么善谈，常常是问一句说一句。对当年杀夫的情境，她清楚地记着，却仍然是用简短的话语带过。或许多年的劳动改造，让十几年前受虐、杀夫的许多细节在记忆深处变得模糊、概念化了？

不过，在她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还是捕捉到了十几年前那场家庭“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以及今天它带给人们的警示。

翟玉琴生活的地方，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闭塞的山村。80年代初期，村里经常有夫妻打架或者妻子不堪虐待自杀的事件发生。在这里，丈夫打妻子被人们习以为常。如果妻子一连生了几个女孩，对丈夫来说，是一件很不光彩，有损他在整个社区中男性尊严和地位的事。因此，将所有怨恨与不满发泄到妻子、女儿身上，是惟一能证明他男性威严的方式。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包括夫家人、娘家人以及邻居）不认为丈夫打妻子、虐杀女婴是侵犯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而是将妻子挨打的原因归咎于她生了女孩。就连受暴妇女本人也渐渐觉得自己有过错，幻想着为丈夫生一个男孩，来改变自己受暴的命运。

翟玉琴生活的山村，还是一个奉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古老法则的传统社区。面对丈夫多年的持续性暴力，翟玉琴

寻求过离婚，但那只是许多受暴已婚妇女通常采取的无谓反抗。施暴的丈夫们不会轻易地让妻子摆脱他们的控制，当时的法律——1980年婚姻法，也没有在离婚问题上给予受暴一方必要的法律支持和救助。另一方面，80年代初期，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系统几乎没有建立。在家庭暴力问题上，当国际人权保护思想还没有广泛普及之前，整个社会的观念还深深受着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一个弱女子，她惟一能做的就是在这种依旧男尊女卑的社会和家庭结构中“忍”。当她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她又会去寻求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时，社区中人们通常的解决办法对她起着巨大的启示和指引作用。要么自杀，要么杀他。翟玉琴选择了后者。促使并支持她这样做的信念就是“杀人偿命”。

用暴力的方法解决暴力问题，绝不是当代法制社会崇尚的法则。杀夫的妇女将面临法律的惩罚，面对多年的牢狱。审理这类刑事案件的法官们，同情这些妇女的遭遇，但通常会说：“再怎么着，也不能杀人啊！”的确，在常人眼里，受暴妇女，你可以在第一次受暴后就离开施暴者，回到娘家；你还可以离婚，毕竟我们实行着婚姻自由的法律制度，妇女在法律上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婚姻自主权，等等。但是，在相当多的人还不认为丈夫打妻子是违法犯罪，对受害者的社区支持系统还十分薄弱，相关的法律措施及制度还未建立的社会环境下，将妇女“以暴抗暴”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她们本人，是极其不公平的。我们应当在现有的社会法律结构中寻找妇女“以暴抗暴”现象的深层原因，从而构筑起反对家庭暴力的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使“暴力”不再成为男性寻求解决家庭矛盾和女性维护个人尊严的惟一手段。

二

**离婚，是摆脱受暴
的有效途径**



10. 离了反而好了

叙述人 胡凤玲
访谈人 宋美娅 徐翠香
访谈时间 2001年8月25日
访谈地点 延庆县城胡凤玲家
录音整理 宋美娅 徐翠香
文稿编辑 宋美娅

我站在延庆县汽车站门口，等候县妇联李自平副主席。这时，一辆人力平板车拐了个弯停在我面前。愣怔间，李主席过来抓住了我的手，在她身后，一位满脸笑容的中年妇女热情地对我摆着手：“上车吧，上车吧。”“她就是你要找的胡凤玲。”李主席给我介绍。

胡凤玲，39岁，江苏人，从小没有上过学，现在经营小餐馆。她于1984年随夫来到延庆县，1992年开始遭受丈夫的暴力，1995年离婚。现在的她，白白胖胖的，一对半月形的金耳环很醒目，映着她红润的脸庞更加喜庆。她总是笑着，在她身上，一点儿看不到曾经受虐的痕迹。她和李主席闲聊中说，她新近刚买了一套商品房，正装修，她经营的小餐馆生意一直很好，都是回头客。可见胡凤玲的精神状态和经济状况都是挺不错的，这在我访问的受虐妇女中可是不多见。但胡凤玲走到今天，也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访谈时，胡凤玲16岁的女儿王晶和李自平副主席也一起交谈。

胡：说实在的，我跟她爸爸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挺伤心的。

我是江苏人，跟着她爸爸嫁到延庆来。我和我妈妈，母女两代人都是一样的命运，我妈妈就是受我爸爸的打，我们那时候不敢拉架，我爸爸特厉害，把我妈的头皮都揪掉了，到现在也没长上头发。我9岁时，我爸爸妈妈离了婚，我、我哥哥和我妹妹三个判给我爸爸，我姐姐和我弟弟判给我妈妈。后妈上我们家没多久，又生了两个小弟弟，我就整天哄小孩，洗衣服做饭，一天书都没念过，能吃顿饭就不容易了，念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那个年代，离婚的很少，我们那一条街只有两家，一个是我叔辈的一个叔叔，再就是我爸爸。我们这些孩子出去都抬不起头，后来大了，老是干活儿、劳动，受点累其实都不算什么，主要是精神压力很大，我就是在这种压力下长大的。

1979年，我18岁那年，后妈让别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介绍到安徽，那个地方比我们江苏还穷，所以我不同意。到了阴历八月十六那天，我从江苏老家拿上钱上福建去了，我在福建有个二爷，跟我家里那爷爷是亲兄弟，在部队当兵，原来是孩子她爸爸那个部队的师长。我到那儿想当兵，爷爷说我没文化，就把我介绍到一个军工厂打工去了。

（孩子）她爸爸1981年上那边当兵，1982年我认识了他，也算是自由恋爱吧。他在部队是志愿兵，开车的。1984年跟他结婚就到这边来了。跟他结婚到了这边，那时候我在龙庆峡倒菜，卖点水果挣点钱，我们一直都过得挺好的，后来谁知道感情会发生变化。

结了婚我就留在这边，他还在部队，1985年生了王晶，他在外边当兵，我和婆婆一起住了5年，分家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分了380块钱外债。他家里兄弟姐妹多，一共有9个，他排行

老六，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是1989年调回来的，在二道河部队炮团待了一年多，跟人家打架，然后就调到延庆武装部预备役团，呆了两年多，这才转业。1993年转业到了财政局，1993年3月去的，7月办成手续，到年底他就变了，也不回家了，我下班回来，孩子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还开着。后来我就说：“你不管我的事，也得管管孩子，你看孩子多可怜。小的时候，你不在家，现在你回来了，能照顾就尽量照顾，实在照顾不了，在不影响你工作的情况下，关心关心孩子。”这就成了我说的不对了，“老子还让你教育，你滚”！从此就经常不断地打我，从部队预备役团带回来的两个大凳子打我都打散了，冰箱上全都是坑，都是他用烟灰缸给砸的，还有那门。1994年小年二十四，人家外边放鞭炮，我们家也“叮咣”响，门整个给踹烂了。因为他晚上不回家，早晨三四点钟才回来，我们在服装厂上夜班，一上上到11点多12点，累了一天，回来洗洗也就睡了。有时敲门听不着，他就踹，他有钥匙不用钥匙开门，说他钥匙丢了。我们年也没法过，就敞着门过了3天，后来还是妇联李大姐、阎大姐她们找的财政局管妇女工作的让他给修的，腊月二十七才把门修好。

访：你在福建是怎么和他认识的？

胡：主要是家属来回说，谁跟谁很般配的，还有人问：“你们俩是不是搞对象呢？”那时候他为伙房买菜，我们有时候不愿上街，就让他给捎点儿回来，那时部队在山区小镇子里，像我们这样的大姑娘很少，这样来回接触多了，也就认识了。人家这么一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就开始追我。当时他家穷，我想有两只手，穷也不算什么，自己多努点儿力就行了，将来不会像我妈那样。我爸跟我妈结婚的时候，家庭条件不错，才华也比我妈强，我爸原来是地质队的，后来回到地方上，当过水泥厂厂长，当过大队书记。

虽然王晶她爸是初中文化水平，而我没文化，但是，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他的智商还不如我，所以我觉得不会出现这些危机。表面上看，他很老实，没想到会是这样。变了以后他就嫌我没文化，没工作了。老打我，用皮带抽，扇耳光，舌头都咬破了。

访：他第一次打你，你还有印象吗？

胡：就是因为不管孩子，我说了他。他说：“老子还用你管！”我说：“你这人是咋了，你是受过教育的人，说话没一点分寸，你给谁当老子？”说了就打呗，我又打不过他。他拿脚踢我，我的脚都肿了，走不了路，躺在床上，他把我揪起来就打，好几天我都上不了班。开始的时候，我不敢吭声，也不敢哭，一是怕吵了人家，二是怕人家笑话，所以就忍呀。到1994年年底，闹了一年了才开始反抗，才知道找妇联。因为小时候看我妈也是干挨打，没有这些法律部门或妇联管你，所以我也就没想到这些。

我妈挨打没有人管，我妈比我差远了，我很幸运，碰上了这么多大姐向着我说话，替我做主，全都站在我这边。

他第一次打我时，我有点儿吃惊，我说：“你还敢抬手打人？”“打你怎么了，打的就是你！”我问他为什么，“你想想你自己吧。”他说。我说：“我做错什么了，下班回来给你做饭、洗衣服，洗完拿到服装厂给你熨，我做错什么了？”我开始没想这么多，孩子也都这么大了，他一直在外当兵，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他在外边也容易和别人发生冲突，他脾气很暴躁，还爱出手打人，但是，他以前在外边这样，在家里不会，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到1993年一直就没打过我。两人还行，对孩子也可以，后来就不行了，他一打我，孩子向着我，他就连孩子也一块儿打。有一回把我闺女从楼下踢到了楼上。

那一次是这样的：腊月二十七他把门修好了之后，三十放

假，他就直接上北京找他姐姐过春节了。正月初一，我就去找了他和他相好的那个女的，我央求她：“你就看在我比你大两岁的份儿上，大老远的到这儿来，你看我那孩子多可怜，只要你不跟他了，让他回心转意，不跟我离婚，你怎么着都可以。”她父亲当时答应了。

正月初四那天，她又上我家来了。刚好那天我给他战友拜年去了，孩子小，不懂，她要懂就该下楼接我去了。我把车锁在楼道，就上来了，一进门，那个女的和她妈也在，沏着茶喝，我把外衣脱了，出来招呼她们喝水。他就说：“你赶紧说，给拿钱，人家说了，跟我不能白跟，你得给钱才行。”他让我拿钱给这女的。他说这话是因为我以前说过，我同意他们俩在一块儿，只要他不跟我离婚就行。

当时他要钱，我说：“钱你挣的多，你又没给我钱，我上哪给你钱，你得讲理才行。”那个女的说：“既然你说我跟他，你逮着我了吗？”我说：“是你自己承认的。”正月初一上她们家的时候，我大衣口袋里装了录音机，我就给他放，他急了，一下就把录音机给摔了，那女的上来就要打我，他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摁到地上就打，拿脚踹，对门邻居出来拉架，他连人家也打。人家走了，他还不敞开来打？我往外跑，他还继续打，打楼道去了，三楼四楼的邻居都出来拉架，我闺女跑出来拉他，他把她从三楼踢到了四楼，后来三楼大爷给拉开了。他一直把我追到楼下，摁下又打，我喊“救命”，人家只是开着窗户看看，小两口打架，谁也没出来，我也不敢回家了，有人跟我说：“没法子了，你赶紧跑吧。”跑哪儿去呀？妇联又下班了，结果跑他们单位值班室过了一夜。他们局长也不管，初五我又带上孩子上妇联去了，妇联又找他，开始他不去，后来找了他们单位管妇女工作的通知他，不来停他工作，他才去的。

访：这个时候他向你提出过离婚吗？

胡：起诉过一次。由妇联出面，还有法院、法庭的法官也比较公正，把他给驳回了。他第一次提出离婚是在1993年年底。我不同意。我、我姐姐、我妹妹没念过书，都是家庭造成的，所以我不想给孩子造成这种后果，我想给她个完整的家，多忍一点儿，打就让他打两下，所以一开始我不知道反抗。

刚开始他打我的次数还不算多，1994年不离了才打的厉害。有一次，我实在想不开，吃了一大把安眠药，也不知道睡了几天几夜。还有一回，我站在六楼阳台上就想往下跳。

他打你说也没地方说，后来我找了妇联，几个大姐一直帮我，实在没办法了，都找到县长、县委书记了。1995年打得少了，因为妇联干涉得厉害，他一般就不怎么敢动手了。

访：他打你多的时候，多到什么程度？

胡：不好说，无数次，有时候天天回来都打，不回来还好，只要回来就非得三更半夜回来，门全都被他踢坏了，你不跟他一块儿住还不行，又不愿要你，还要跟你过夫妻生活，心里很烦，不愿意就打你。有一次最毒的是，他两三点钟回来，把煤气灶给拧开了，差点把我们呛死。

他那时候打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离婚，当时想不开，不愿离，怕人家歧视，一个妇女带着孩子怎么办？想想自己的母亲当时那样，带孩子多不容易。

我爸爸和我妈离婚之后，还有好几次要上门打我妈，我舅舅他们不干了，说：“你都离婚了，再打可不行。”我妈也是不敢惹他，她一见我爸就哆嗦，现在提起我爸还哆嗦，打怕了，我妈当时不像我，我有妇联出面，找她爸爸谈话。

（这时，李主席插话）

李：当时和他谈了半天，他走了以后，我告诉胡风玲：“这种人不值得跟他过了，他讲了很多客观理由，根本不成立，把责任全推到你身上。他要是还有丝毫感情的话，就不会把一切责任

都推给对方，一点儿责任都不承担。这种情况下你甭跟他过了，离了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行我给你介绍到法院去。”

胡：后来几个大姐给我做工作，“你没法维持了，你再维持下去，生命都有危险了，我们不能天天看着你，我们的权力也是有限的，离了吧，离了你也解脱了。”我先想不开，后来确实也想通了。

离婚很容易，很痛快，只要我愿意就行，他当时着急离婚。离婚好离，就是财产各方面他都要一半，甚至要把我们从这房子里撵出去，不让我们住。最后妇联出面，从各方面呼吁，当时法院判的是由我继续居住，这屋里财产都没动。当时妇联这样说：第一，孩子归女方；第二，男方付抚养费；第三，财产偏向女方；第四，房子必须让住。

李：到了法院，我们跟法院提出要求，必须照顾女方利益，而且她在这里举目无亲，没地方去，我们跟法院商量，在财产处理问题上要作为特殊情况来处理。

1995年刚过了春节，我找王金成谈了半天，本来想让他们和好，可怎么说都不行，最后我对他说：“我对你不抱任何希望，你要敢再动你媳妇一个指头，我不会饶了你，不信你就试试。”从那以后他打的就少了。

胡：当初他打我的时候我也去找过派出所，谁管你呀。说伤轻，不够，每一次找都不管事，只有妇联管，找他单位，找他本人，听你诉说。

派出所我是1994年去过一次，1993年年底去过一次。他把门踹坏了，派出所人说：“踹坏了，你找人修不就得了吗？”让他们出证明也不给出，说伤不够，到现在也没出。

我找派出所就是为了制止他，他老打我，我是无辜的，第一，我没做错什么；第二，这个家能维持就维持，离婚今年不离明年离，你只有等待做工作，不能老打我，我也是个人，不能像

个牲口似的让你抽来抽去。但是去找了也根本不管事儿。你看，我们到法院，法院说：“平时打你都是人家的错？你一点儿错都没有吗？”我们到妇联可就不一样了，你听听她们是怎么说的：“你不要哭了，哪儿打伤了，哪儿疼呀？”陪着你掉眼泪，帮着你说话，劝你想开点儿。我特感激我们延庆妇联，我在顺义认识的那个姐姐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她被她男的打得，都神经了。

访：你那次想跳楼是因为什么事情？

胡：因为头一次起诉被撤了，法院、妇联本来想挽回这个家，让他有个改过的机会，希望回来能好好过，可他还是不好好过，你上班挣点儿，他全都给你拿走了，你都没法生活了。把你钱拿走不说，他还侮辱你，更让人难受。头一次起诉，在法院他说我有外遇，回家他还这样说，骂我、骂我妈，我妈是无辜的受害者，他还侮辱我妈。

我妈来的那次，他把我提到我妈面前说：“你看你养的好闺女。”我妈说：“我闺女怎么了，给你破了名誉了还是怎么着？！你半夜把我闺女打成这样，我闺女来就是靠你来的，你这样可不对！”后来，我妈看这样也住不下去了。

访：他那天揪着你的头发打你是因为什么？

胡：不让我妈来呀。1994年清明的时候，我也是想不开，想回老家看看邻居，看看家人，回来就想死了。我妈也是农村妇女，没出过远门，把我妈带来看看，再把她送走，结果没等我妈走，就嫌住的长了，他骂我妈，我妈又听不懂他说的话。他说：“你看那老太太，从长相各方面都跟你一样，没男人要你，你爹不要你妈就对了，老子也不要你。”他羞辱你，实在是难受。

一开始还不能让我妈看出来，骂你就得忍着，我这床反正也是弹簧床，他一脚就把你踹到地上去了，我就拿被子铺在地上睡，他又要你上床睡去，他说：“你躺地上睡，让你妈看见以为我欺负你了，你给老子上床睡去。”听他这样说也是，不能让我

妈知道呀，还没等你睡着他又踹你，折腾你，说：“你打呼噜了，你出气了，吵得老子睡不着，滚！”一脚又把你踢下去，把你当球踢。

后来我说你要再这样，我跟你没完。我是一直忍着，而且这么多邻居，我不想把事情闹大，如果你要是再这样，我明天就找你单位去，看你单位管不管。结果我去找他们单位的时候，局长说：“打轻了有妇联，打重了有法院，我是财政局长，不是公安局长，滚出去！”

没有人管你！我妈知道我挨打后，一个劲儿哭，“看在孩子的份儿上，咋打也不能离婚。”我妈这样说。她的意思是说，怕人家笑话，妈妈离婚，女儿还离婚，她有这个顾虑，她比较封建，她带着我们姐弟一辈子没再嫁。晚年她跟着我弟弟，儿女对她也都挺好，惟一的不足就是这辈子再也没找，她伤心呀。我现在也是，我离婚7年了，妇联大姐也没少给我介绍，不是说条件高，看不上，真的是太伤心了。

访：他那时强迫你过夫妻生活吗？

胡：强迫，不愿意也不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你不跟他过，他就打你，你跟他过了，过完他还打你、骂你，过完就说，“你给老子滚，死皮赖脸的，不要脸，像你们这种女人就像狗似的，离了男人你都活不了。”反正他就是怎么难听怎么骂你，说出那话真是没法听，所以说没法忍受，光打你还好说，羞辱你真是难受。

就这也不愿离婚。他在外边有了女人，我这么跟他说的：“你要真觉得我们不好，你就把我们娘儿俩留下，每月付200块钱生活费，家给我留下，你自己走，你将来要是觉得她比我好，你再回来跟我离婚，要觉得不好呢，你再回来。”他说：“你想得倒美！”我说：“那等你以后跟那女的生了小孩，回来我给你哄小孩，反正我也没正式工作。”就这样都不成，他说：“我怕你把我

孩子掐死了，你是什么东西，谁不知道，母老虎！”就这么骂我。

还有一次，我和妇联大姐找他们单位去，走到劳动局门口，他就揪着我的头发往回拉，大马路上就往回拉，好不容易别人给拉开了，手撒开了，就揪住裤腰带，裤子都拽坏了。

我找他们领导，还是不想离婚，想挽回这个家，好好找找他们领导，看能不能说说这事，给他做做工作，不离婚。别人说不管事，局长说或许会有用。找局长也不起作用。

访：你怎么知道他在外边有女人？

胡：她净往家里打电话。我回江苏老家的时候，孩子在家，他就把那女的领家里来了。他们是同一个单位的，他病的时候，那个女的上我们家看他，我也没想那么多。别人风言风语，我都不信，老往好处想。那个女的我认识，一开始我不想揭穿她，给她留个脸，后来装傻实在不行了，1994年正月初一，我带着闺女一块儿去的她家，她爸爸也在那个单位，还是个科长。我把事情经过讲了一下，我说：“你们作为父母，也不希望你女儿这样，她做的事你们不一定知道，既然我把这话说出了，你们就做做工作，如果能给我一个完整的家那更好，实在不行，到时给你们丢脸的是你女儿。”

后来跟他结婚的还不是这个女的，当时妇联说了：“你老不承认你有第三者，结婚离婚都是法律容许的，但是第三者拆了人家的家，你把这个家庭破坏了，如果你们俩结婚了，我们到时就得问问你。”她就不敢结婚了，从那回那么说过之后她就不敢了。我也说过她，我胆子也大了，离婚的时候，妇联帮我要房子，妇联不行，人大也拉上，两家一块儿出面。

访：你去找的人大呀？

胡：妇联找的，先是妇联找的人大政法委，我都不知道有这个机构。妇联找了以后，县委为我这房子的事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

李：因为这房子是单位分给王金成的，产权是单位的，在这种情况下，离了婚以后，职工不住这房子，是不是应该由单位收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找的法院、县委办公室主任、当时的县委书记，把她的情况汇报了，说要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就这么一句话，最后县委办公室主任召开了专门会议，引起了法院的高度重视，以后在财产处理上倾向她的利益，允许她居住。当时争下这房子真是不容易，王金成走的时候，就只把他自己随身的衣服带走了。

胡：这房1998年他们单位卖的时候，我也享受职工待遇卖给了我。

当时孩子也判给我了，但户口还在龙庆峡，户口跟着他能变成非农业，她在这边念书，没户口得多交好几千的学费。后来我怕承担不起，就想让他给转过来，打她就是那一次。

（胡凤玲的女儿王晶接过来）

王：我小学六年级毕业了，因为户口不在延庆县，我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外地上学，要他帮我转到延庆这边来，可他就是不给我转，我妈就让我到他家住一段时间。那天在我妈这儿玩，回去比较晚，我看到我小妹（后妈的女儿）在玩儿我的铅笔盒，我想要过来，阿姨就生气了，后来就吵起来了，我爸就打我，还用脚踢，朝我肚子上踢，腿上踢。后来我也急了，他打我，我就打他。（王晶说着就哭了。）

胡：她小妹拿文具盒没拿住，掉地上给摔坏了，这孩子就哭，她爸爸进去说：“你哭什么，这么大了还哭，没出息！”她说：“小妹妹把我文具盒摔坏了。”他说：“你就欠揍，这么大了还哭，你就不知道让着她点儿！”这孩子急了：“你不说给我买一个，你还骂我，她也是你闺女，我也是你闺女，你赔我！”她爸爸没赔她文具盒就赔她巴掌了，打得鼻子嘴巴全都流血了，鼻梁骨都打骨折了，留下了后遗症，现在还经常会头疼、流鼻血，头

一疼起来，她就气得咬牙切齿，哭啊，“我的头疼都是他给打的。”给孩子心灵上造成多大的伤害！

回来之后，我把她带到派出所去了，他们说，这闺女是我和她爸爸两个人的，她爸爸打的是他的那一半。我说：“左边是他的呢，还是右边是他的？他左右都打了，他连我的那一半也打了，这怎么处理？”可是派出所就是不处理。平时她也不过去，只是暑假在那边，他不是老不给办户口吗，我说：“你过去催催他，他是你爸爸嘛，你好好央告央告他。”谁想适得其反。后来妇联又找他，孩子跟他上了一趟法院，经过法院再判一次，把孩子判给他，才把户口办了。1995年6月离了婚以后，我又跟王金成打了一场官司。他没跟我们商量，把我地里的庄稼收了，我回去跟他要，他不给。我就上妇联去，妇联又找法庭，赔了500块钱。我跟他打了6场官司，他一场也没赢过：离婚一场，要玉米一场，打孩子一场，弄户口两场，要抚养费一场。

访：户口怎么还打了两场？

胡：户口跟了他后，他是监护人，实际上孩子还是跟着我，可没法要抚养费呀，后来又把户口要过来了，我是监护人，他就得给抚养费，每月给230块。

访：派出所你去了几次？

胡：我挨揍的时候去了3次，我闺女挨打的时候，头一次去没说正经的，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我就上新华门去了。有个便衣把我叫开了，说：“你这是家务事，回到地方上处理。”然后就给延庆公安局打电话，下午把我给接回来了，处理的结果就是拿了医药费，别的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后来派出所都不处理了，说妇联胡搅蛮缠。妇联的呼吁很管事，后来警长就是因为处理这事不力给调走了。

访：第三者出现之前他强迫你过夫妻生活吗？

胡：不，后来他是成心折腾你，你要不跟他，他就打你，跟

你完了，他又踹你，那种生活实在是受够了。现在我都发愁，我不知道会再碰上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也算是自己谈的，千里迢迢跟他到这里来，会跟他过到这个份儿上，真的是特别寒心，再想相信一个人，走进我的生活，真的是很不容易了。我觉得自己现在也挺潇洒的。这孩子也都这么说：“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的，前车之鉴，我姥姥是这个下场，我妈是这个下场，难道我也要走你们这一步吗？”

访：妇联的大姐帮你把房子要回来了，接着你是怎么想到要去做小买卖的？

胡：我觉得我在服装厂上班不行了，我说我要开个早点铺，我们挨着学校，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想法，是王金成不让我开，嫌我给他丢人。妇联李大姐说：“你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就尽量帮助你。”1995年6月离婚那会儿，外面还可以，不冷。到了冬天就不行了，我就跟她们说我想盖个活动房，妇联大姐说：“你要盖活动房我们可没这权力，也不能批给你，我给你问问，你自己再去找找。”后来，她们先找的县长，我后找的，等第二天下午我再找他的时候就给我答复了，1995年10月县长给特批了，一直到现在。

访：你现在的的生活来源都是靠这个小棚吗？

胡：是的，要不怎么说买房都有妇联的功劳呢！批下来以后我一年到头可以营业，她们也都很热心。那次有个学生，父亲不在了，母亲有病在农村，生活比较困难，考上学校念不起，老跟她们哭，当时她们也没考虑到我，说我们娘儿俩过日子，不忍心，后来我是自愿的，你诚心帮助过我，我有能力再帮别人。

访：离婚之后他找过你吗，有没有想过要复婚？

胡：6月离婚，9月18日回来敲门，说拿衣服来了，其实该拿的衣服他都拿走了，我说：“我们娘儿俩是人，不是足球，让你踢来踢去，这球还要有裁判呢，你别想进我们这门！”后来又

安了防盗门，就是防他。这孩子特别灵敏，说：“妈，千万别让他进门，这种人改不了的，回来再打你怎么办？到时再找妇联，人家可不理你了，两句好话就把你哄得溜溜的。”

王：以前他要跟我妈闹别扭了，说两句甜言蜜语，我妈就老是想算了，老是忍呀，让呀，我爸动不动就下跪央求我妈，我妈真受不了他。真要离婚的时候，他也后悔，那个女的又不跟他了。我爸现在特后悔，我向他要抚养费的时候，他经常说：“要是没有你呀，你妈还不跟我离婚呢！”说我是小间谍，小特务，老给他泄底。

胡：他没法赖了，就老赖我闺女，他跟任何人都说是我跟他离婚，“那老娘儿们够狠的，一脚把我踢出来，什么东西都没给我，我想回去拿衣服，她也不让。”以前净骂我，这几回也不骂了，对闺女说：“你妈生意还挺好的。”

王：以前老是骂我妈，现在想起我妈的好来了，他现在都没钱，领工资的时候都被拿走了。我买电脑跟他要钱，他说：“我没钱，好不容易攒点钱都给你付抚养费了，现在你后妈管得严，我要给你钱，她该跟我闹离婚了。”他说我该体谅他，后来我也没硬跟他要，可能他又觉得怕我起诉他，又主动给我了。

访：看起来，你现在生活得很不错。

胡：还可以，现在家里兄弟姐妹也经常来看我，家里这回也可以指望一下我，以前指望不上，因为我没钱，也不做主，有什么事还得跟他商量。现在不一样了，我自己有钱了，1998年买房两万多，新买的这房17万多，加起来就是20万，还要供我闺女上学，买电脑，这电视也是新换的。我们老家来人都要给我妈带点儿钱回去，我弟弟买房，给了他5000块，这些都不在话下。等我闺女到北京念书，我再给她买辆车。

离婚不是一件好事，也未必是什么坏事，离了也解脱了，如果不离婚，老跟他在一起，我也不会有今天。你看我现在多好，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娘儿俩现在惟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家庭不完整。

那天孩子头疼，哭了，我对她说：“对不起，妈妈不好，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家，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她说：“妈，我已经习惯了，你严厉的时候是爸爸，温柔的时候是妈妈，没有他我们过得很好，要是不跟他离婚，你怎么能接触到这么多好人，怎么知道天下还有这么多好人帮助咱们。”她有时候说的一些话我都想不到。

王：其实我从小到大，家里边有他这人跟没他这人都一样，就是他在家，早晨吃饭也是我妈给他盛，他吃完了饭就往床上躺。不管我妈上班有多忙，早晨都要给他做饭，我有时候吃不上饭就出去买点儿吃，我妈都会给他做合口的，他吃完之后连碗也不洗，往床下一搁就算了。

胡：他就躺在床上吃，他不起来我就给送床上，吃完往地上一搁，要是周六、周日，你回来他还躺床上，反正他就是懒。我理解的是当兵在外，吃的都是大锅饭，北方人在南方又不习惯，回家就尽量给他做点可口的饭菜。那天孩子还说我：“妈，你太傻了，煮方便面，三个鸡蛋，我吃一个，他吃两个，你一个也不吃，你给他吃他净打你。”我们还是那种传统妇女，以丈夫为主，这个家还得靠他来支撑，后来离了他我不是照样活。

访：后来你妈对你离婚怎么看？

胡：离就离了，说：“孩子不能给他呀！”我们在家受后娘的气都受怕了，我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爸打就打，骂就骂，根本不敢吭声。我小的时候挨无数揍，我恨打人的男人就是因为这样。打我妈的时候，我们小，一打就跑了，他打不着我们。等到后妈进来以后，净打我跟我妹妹，我哥跟着我爷爷奶奶，打不着他。

访：你爸爸打你后妈吗？

胡：打，先不打，后来可能也后悔了，她比我亲妈差远了，她就是比我亲妈年轻漂亮点。他打她可没人拉架，人人都说：“活该”，都是因为她我爸才跟我妈离婚，她有3个孩子，她离婚不要了，到我们家又生了两个小弟弟，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挨揍呢。

访：你从小到大都挨打，小的时候挨爸爸的打，大了又挨丈夫的打。

胡：对，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是一个很好的家，姊妹5个，我爸有文化，有工作能力，我妈贤惠能干，在我们那儿算是一个很好的家庭。谁知这么一闹腾，我妈他们闹了五六年才离婚，我妈也是被打得实在没办法了才离的婚。自从后妈一进门，我是三天挨一大揍，天天挨一小揍，都打惯了，尤其是我妹，到现在她也没长多高。那时我继母在家打我，我爸有时出差回来，不知为什么就打我们。有一次，他拿着一根粗棍把我追出了5里地，我拼命地跑，跑到河边过不去了，他就在那儿打我，把棍子打成了3截，胳膊、腿上全都肿了。村里人都骂他，他才把手里那截断的棍子丢了。我不敢回家，钻在芦苇地的坟墓旁躺了3天，不吃也不喝，在那等死。后来我妹告诉我妈，才找到了我，最后都起不来了，身上全都肿了，一拧一拧的棍伤。

访：你后来和你父亲还保持联系吗？

胡：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来往，没给过他一分钱，没写过一封信，也没打过一个电话。我们姊妹5个跟他都没联系，谁都不理他，不管他。

访：你是怎么看男人打女人这事的？

胡：特不人道，我特恨我爸，如果没有他，我不会落到今天，我怎么会到福建，又怎么会认识他（前夫），我又怎么会挨打？

访：他（前夫）怎么看待他打你的事？

胡：他认为他打我是应该的，“你就欠揍，就是看你不顺眼”。就那样我还给他做饭吃，他还怕我给他下药，看到你端哪个碗，他就抢哪个，你说我能做那蠢事吗？我可不学我妈死挨揍，我比我妈强，我自己可以上班，能挣钱。

访：什么方法能使自己不死挨揍？

胡：没办法，离婚呗。

王：我妈刚开始怎么着也不跟他离婚，你爱打不打。他就想，你越这样，我越欺负你，我想打你就打你，他就老打我妈。

胡：后来我跟他反抗了，跟他对打，打不过他，我就挖他、咬他。他这人也真够黑的，净打看不见的地方，用皮带抽，凳子打，那烟灰缸一不留神就砸过去了。最后下决心离，也是受不了，他又不给一分钱，还要回来白吃白拿，你攒点钱他都给你拿走了。

访：从你自己的经历来看，你觉得一般的妇女要是遇到挨男人打的情况，应该怎么办才好？

胡：一般呀，女人最好不要做错事，其实女人挨打都坏在女人手里。如果没有这个女人插足，他也不会打我。一般地说，女人要是有一点良知，就不该做这种事，一旦遇到这种情况，避免不了，那也只好离婚了，那是一种解脱。我现在不也挺好吗？因为我没有工作，当时妇联大姐还给我争生活费，我主动不要的，我说我自食其力，不用他。

访：你婆婆知道你挨打的事吗？

胡：知道，她不管，孩子她爷爷还行，孩子奶奶和几个姑姑从来没看过她，面对面走到一块，她姑姑都不理她。

访：因为什么呀？

王：她们都觉得我爸爸和我妈离婚都是因为我们的错，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对我妈特仇视，我妈被我爸打了，她们就幸灾乐祸，还劝我爸：“跟这种女人有什么好过的？”她们说我妈胡搅蛮

缠，其实根本没有，我妈就是老好人，老被人家欺负也不言语，她们就老欺负我妈。

胡：现在我比她们谁都过得好，我就是争这口气。我每天早上4:30起来，卖肉饼、粥、茶鸡蛋等等。一开始雇一个人，现在我侄女来了，又雇了一个，我们三人一块儿干。

访：6年的工夫，你从被人往外赶，到现在有房，还能买车。

胡：我就是争这口气，人家有的我也有，人家没有的我还要有，女人嘛，不是说离了男人就活不了，只要你肯出力，走正道。现在周围的人都很羡慕我。

访：王晶现在和爸爸关系怎么样？

胡：不说话，我老是教她，你见他不叫他可不行，我要是不教她，他们父女俩都成仇人了。

王：我妈说：“毕竟他是你爸爸，离了婚也是你爸爸。”可是我觉得不能原谅他，他这人还是太坏了，我叫他爸爸都特别不愿意。我就是气不过嘛，老是说我妈这不好，那不好，跟人家都说，我妈那么厉害，让他有家没法过了。

胡：他说我抬手就打他，张口就骂他，控制他花钱。就那样，1994年清明回家，我还给他买了一件夹克，38块钱。他打我无数次，反说我打他。1994年下半年，把俩凳子全都给打散了。楼下上来拉架，还说是我胖，一屁股坐坏的，一句句刺我的心哪，可想不到会从他嘴里说出来。

访：那你干吗还给他买衣服？

胡：还让我姐姐给他做鞋垫（叹气），当时是这样想，夫妻一场，不成也就得了，反正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访：他打你，你恨他不恨他？

胡：恨呀，咋不恨他。当时我回江苏一共住了19天，一眨眼，孩子就在眼前，“妈妈，你喝水吧”，因为有时候他打得我动

不了，一翻身哪儿都疼，凳子扔的，哪儿都是肿块，孩子饿了就给点儿钱买方便面，我就饿着。

王：我给我妈泡的方便面，她都没法吃。

胡：一是不想吃，再一个就是让他打得脸都肿了，舌头都让牙给磕破了，吃不了。

王：而且我妈还吃安眠药，还想死，别的什么也不吃。

胡：就是到医院去买安眠药，老是失眠，睡不着，10片，20片，30片那样买，攒着，想死，没法过了。

访：王晶，你妈妈刚才说你想上法律学校，为什么呀？

王：我从小看我妈被我爸欺负，我就想将来要是能当个律师的话，就能伸张正义了，省得那些坏人老欺负好人。

胡：这段时间，她爸对她又可以了。

王：他特后悔了，现在他跟我继母过得也不是很好，继母比他岁数小，都是继母管着他。以前在我们家，我妈特紧着他，吃东西，我妈好的都不吃，全都留给他吃。现在跟我继母在一起，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他们俩谁都不顾谁，有时连吃条鱼都吵架。现在他想起我妈的好处了，他跟人家说，我妈其实挺好的。

我爸现在有时也挺可怜的，手上的皮都掉了。回来跟我诉苦，让我帮他做饭，那个女的都没回来，他满手都是小口子，看着觉得挺可怜的，不管怎么说也是我爸。

胡：他老丈人家的地都要他去种，去收，城里人就说：“要跟胡凤玲，哪有这些事。”

离婚之后，李大姐她们都说我自强不息，老鼓励我，1996年就把我评为先进人物，还给我发了一个荣誉证书。

李：那时她已经创收了，一个月纯收入1500块钱，那次在维权总结会上，让她做了一个发言，“如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我们妇联有一个“双学双比”活动，很多情况下是拿她做典型，让她做报告，也是鼓励她，她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

访：你从央告男人不离婚，到现在扬眉吐气，短短的6年，真的是很大的变化。

胡：是一个转折，那时候只要你不离婚，怎么都行。就是受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老是怕给孩子带来伤害。我们在家的時候，老挨打，我做错什么了？还没明白呢，他又开始打我。

好不容易过上几天好日子，他又开始打我，他骂我闺女：“你跟你妈，到时你跟她一样要去讨吃。”谁去讨吃了？真离了也没觉得可怕，离了反而好了。

后记：2003年3月中旬，我又一次见到胡凤玲，她显得年轻了，生意也很红火。她告诉我，她出租了一套商品房，每年又有一笔稳定的收入。她对我说：“等以后女儿上了大学，我就不干了，跟着你当志愿者去，用我的现身说法，让受家庭暴力的姐妹们挺起腰杆。”她果然很热心地帮助身边受虐的姐妹。

说到她的母亲，她说母亲晚年挺幸福，儿女孝顺。父亲却凄凉孤寂，又有病在身，儿女们连个电话都不给他打，“不过去年回老家，我去看了他一趟，给了他500块钱。”她说。

胡凤玲一切都挺好的。

点评：

生活可以重建

宋美娅

胡凤玲母女两代都是配偶暴力的受害者，从她的母亲到她，几十年光阴流逝，男人对女人的暴力依然如故。但时代毕竟在变迁，胡凤玲比母亲幸运，她得到了县妇联、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从一个哭哭啼啼的弱女子，变成了致富能手。她现在经

济独立，衣食无忧，这是她当初难以想象的。

家庭暴力除了让受暴妇女一次次遍体鳞伤，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之外，它还会对受暴妇女造成另外一个严重的恶果，那就是摧毁她们的自信，使她们觉得自己毫无价值。自信心的损坏是和暴力的发展相伴而来的，一方面，一个人被殴打，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人格的尊严被降到最低点；另一方面，施暴者通常都会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辱骂妻子，他们会说出各种贬损人、侮辱人的语言，胡凤玲就多次谈到：“反正他是怎么难听怎么骂你，羞辱你真是难受。”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被施暴者一遍遍“洗脑”，妇女们渐渐地会认同施暴者的观点，她们逐渐相信，是自己的无能和失败造成自己受虐。她们慢慢相信，除了依靠这个对她施暴的男人之外，她没有任何别的生存能力。她们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胆小，越来越不自信。所以，受虐妇女大多数并不想离婚，只想让丈夫别再打她。有时，我们还会觉得她们碎碎叨叨，做事犹豫不决，有人会以此认为“难怪她挨打”。事实上，她的“无能”，不是她受虐的原因，而是她受虐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家庭暴力把一个原本很能干的女人变得一切都很糟糕。

胡凤玲的经历让我们相信，被毁坏的生活可以重建，自信心可以重新树立。

还有一点应该提及，那就是家庭暴力对儿童的伤害。胡凤玲在一个有暴力的家庭中长大，她不仅看到父亲狠狠地打母亲，她也曾被父亲的棍棒抽打，而她的女儿又重蹈她童年的覆辙。有多种文献资料报告，家庭暴力对儿童身体和精神的成长极为有害，亲眼目睹母亲被父亲殴打，对孩子的心灵是极大的刺激，从本书中的其他案例中也可以看到，有的孩子被吓得躲在角落里发抖，有的试图帮助母亲反抗。一般来说，殴打妻子的男人，也会殴打他的子女，童年受暴的经历将影响儿童的一生。美国的一个研究显示，暴力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发生自杀现象的可能性要高出6

倍，犯性袭击罪的高出 24 倍，犯罪机会高出 74 倍，吸毒、酗酒高出 50 倍。^①

还有文献报告，暴力中长大的男孩子将来对自己妻儿施暴的可能性要高，而女孩子有可能对暴力的容忍度比较高，他们都有可能认为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有些受暴母亲总是说为了孩子宁肯忍受丈夫的暴力也不离婚，实际上，暴力的生活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害，哪怕是让孩子生活在有爱的单亲家庭，也比让孩子生活在时时发生暴力的家中要好得多。胡凤玲的女儿一定觉得现在的生活更幸福。

^① 摘自：《Domestic Violence: The criminal justice response》/authors, Eve S. Buzawa and Carl G. Buzawa (1996 年)。

11. 我失去的只是锁链

叙述人 易安
访谈人 丁宁
访谈地点 北京某出版社
访谈时间 2001年6月16日
录音整理 丁宁
文稿编辑 薛宁兰

易安，46岁，大学文化，高级编辑。婚后，不能忍受丈夫的殴打与谩骂，先后两次提出离婚。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摆脱了前夫对她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在她以下的叙述中，既有对自己受暴经历的描述，又有一个知识女性对婚姻的理解，对丈夫施暴原因的分析，以及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和感受。

说起来我很幸运。我是1971年初中毕业的，赶上“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批恢复高中，我读了两年高中。但幸运中又有不幸，我又插了两年队，然后回到工厂当了3年工人。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大学。我是1978年入学的，毕业以后进了杂志社。我觉得社会与家庭从小都给我一种奋斗教育。父亲给我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大夫，是我国有名的专家，后来到联合国做医疗官员。他一生都在奋斗，他把生命填到每一个时间的格子里，一天一天积累起来。我父母都很努力。我们家可以说是一个模范家庭，整个家充满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我有很多男孩子

的性格，比如换煤气上楼，搬不动，我会一层一层往上拖。（我家）什么事都大家齐动手。我父亲是全家最忙的一个人，不能什么事都推给他。我们总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父母的负担。我父亲做事很有条理性，我们也受他的影响，就连谁洗碗都轮流安排。吃饭的时候一家人总是交流得很热烈，吃完饭以后就各忙各的。从小父母就不让我们玩牌、坐在马路上聊天儿什么的，只让我们看书。“文化大革命”中没书看，就看字典、看地图，家里什么书都让我们看。

我小时候很喜欢写东西，不管写什么，父母都让我写，说这是正经事。正是因为养成了这种习惯，使我后来做成了不少事。比如我生下女儿才100天，就开始研究晚清史。我已经写了不少专著，差不多有6本了。我还发表了许多报告文学，大概有二三百万字吧。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过得不后悔。在我写作过程中，无论采访谁，传主多有名，我都觉得和他们人格平等，并不仰视当然也不俯视他们。我一直做名人专访，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我非常注重人格平等，这也是我不能容忍家庭暴力的一个原因。虽然我并没有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即便是精神虐待我也受不了，我不能接受对人格的伤害。尤其是我并没有错。

我是在北京一个医院宿舍大院中长大的。父母之间的感情非常融洽，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一个大夫一个护士的组合被人们认为是最理想的。我们家被公认为是个模范家庭。父亲比母亲大6岁，他对我母亲非常好。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他不但承担着家里的生计开销，家务事上还很能干。他是上海人，甚至还会做衣服。我父亲绝对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很有主见，同时又很顾家。我和我妹妹从小就认为，当丈夫的当然就应该是这样一种模式。我们从来没想过会有其他类型的男人，而我丈夫和我父亲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有家庭暴力这种丑陋现象。

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打你的？

我们结婚后，一开始还好，他只是动嘴，到后来他居然动起手来打我。第一次动手是1994年。当时我的一个朋友约我写一个电视剧脚本。我拿到大纲之后想，我约谁写都是约，不如让我先生来参与。他平时懒散惯了，这十几年也是没有什么成果，评高级职称有困难。我当时已经是高级职称了，而他还是中级职称。我想，能拉他一把就拉他一把。其实，以前我也给他创造过机会，我甚至通过朋友把版面都给他留好了，让他写东西。可他总是一拖再拖，直到拖黄了算。情愿有时间喝酒、看影碟、看电视、找朋友聊大天儿，就不肯做这些正经事。这次让他干，我每天都在催他，告诉他该动手了。他说：“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我说：“还有一个星期就要交稿了，你有3集要写呢。”我怕多了他写不了，少了评职称又不管用，就给了他3集。平时家务都是我做，像做饭、收拾房间之类。孩子睡了我再写东西。我一个劲儿地工作，而他就是不动。只剩1天了，第二天要交稿了，他说：“没问题，没问题，今天晚上我都给你赶出来。”你想想，这一个晚上如何能赶出3集来？我事先想到有可能会是这种结局，就预先做了准备。

第二天我就问他稿子完成了没有，他不理我。他实际上连1集也没写完。我让他都给我，我去开会，开完会再去交稿。他拿给了我，告诉我：“你看吧，就这么多！”我当然不开心，我说：“跟你说了多少回，前十几天我就催你。你如果写不了，我可以找别人，不一定非你写不可。”他一听这话，急了，上来就要抢我手里的稿子，我不给。因为这不光有他写的东西，还有写作提纲，我找别人补窟窿也得用，得照这个体例、风格来写。他上手抢，我不给他，他就动手了。我当时梳着一个马尾辫子，他上来一把就给揪住了，并且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接着又一擦，我

左臂撞到了书柜角上，当时就青了一块儿。他冲上来掐住我脖子，要跟我抢稿子，我就不给他。我当时都不知道生气了，我根本就反应不过来了，要知道还有一个编辑会等着我主持呢。作为一个单位领导，我如果不到会，这太说不过去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让他先让我走，他说我不能走，并且使劲掐住我脖子，我都喘不过气来。我说：“你要再不松手，我可要还手了。”他说：“你还哪！”他知道他抓住我双手，我没法还手。我急了，就咬了他一口。我咬他左手虎口的地方，他“哇”的一声叫了出来，我一看出血了。趁他一叫，一松手，我从家里跑了出来。

到了单位以后，我找到领导，请他主持一下当天的编辑会，我就跑出了大门。我打电话找到我的朋友，请他赶快来一趟，我告诉他，我有要事求他。他打车就到了。我让他不要问我为什么，让他赶紧帮我把3集电视剧的脚本抢出来。我说我实在做不了了，请帮我一下。他说：“你别哭，别哭，我一定3天给弄完。”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总算没有误事。

问：你怎么看他打你这件事？

这件事情给我的打击非常大。结婚之前，我就曾和我丈夫约法三章，我说：“你碰都不能碰我一个指头。”我觉得一个男人到了打一个女人的程度，就已经没有什么爱可言了。打人就是无视一个人的尊严。他后来也知道这个事情闹大了。他打完我，我就到我父母家去了，我不回家了。他找到我娘家，通过我父母向我承认错误，父母也给我做工作。被打是一种伤害，心灵的伤害最厉害。心情不好，气滞血淤，会导致很多毛病。我的身体很不好，连我妈都说我这样下去非得癌症不可。我真是不会自卫，气出一身病来。肠息肉、子宫肌瘤、乳腺增生、肝郁，一堆毛病。我心里很清楚，要么我离开他，和他离婚，要么就原谅他一次。当时我还没有觉得到了要离婚的程度，我想维持，起码维持到孩

子上高中，所以就原谅他了。打人的丑恶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与这个时代太不相符了。男女在外面的压力是一样的，有几个女人能被当太太养起来？男人凭什么力气多一把就可以欺侮人？这太不平等了。一个人到了可以对太太以拳相向的话，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假如在社会意识上，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丑恶的现象，对此口诛笔伐就好了。让挨打的人有地方去说理，能行之有效地保护自己，这才最重要。如果警察出面干预，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遏止这种丑恶的发生。加强社会舆论的呼吁和宣传，有利于使暴力在发生之前就消解掉。

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离婚？

1994年他第一次动手打我后不久就出国了，他去的是韩国。本来他出国回来后，应该好一点，但是，我发现他酒喝得更厉害了。他每天都喝，中午喝，晚上也喝，在家喝完了还到酒馆里去喝。我后来根本不能对他做任何要求，我对他要求的最后底线是：这个家你什么也用不着管，一切都由我来，你只要别跟我吵架，让这个家还能正常运转就行。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底线没能守住。

有一次，他到他表弟家喝酒，从下午4点一直喝到晚上11点。孩子要睡了，过几天还要考试。我要和孩子先回家，他让我们坐他开的车。我说太危险，就打车带孩子回来了。哪想到，他还先我们一步回来了。他后来说他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把车开回家的。一个对自己生命都不负责的人，他怎么能对别人的生命负责呢？一个大学老师完全知道交通法规是怎么规定的。自己酒后开车上路不要命也就罢了，还想带着妻儿老小。这还不说，你上了马路，不是对别人的生命也构成威胁吗？我不坐他的车是完全正确的。我到家刚一推门，迎面就飞过来一个瓷茶杯，我一闪，瓷茶杯飞到冰箱上，把冰箱砸了一个坑，茶杯摔得粉碎。我

让孩子赶紧进了房间，什么也没说，就让她洗洗先睡觉。我对孩子说：“回来就是为了让让你休息，咱们两个赶紧睡觉。”我刚躺下，他一脚就把门踢开了，张嘴就骂。我拿了一条毯子，走了出来。我说：“你先让孩子睡觉，咱们到客厅去说。”到了客厅，他张口就骂，这时孩子从卧室冲出来，对她父亲说：“你有什么权利这么骂我妈，我从小到大，你管过我吗？”我对孩子说：“你先回去睡觉，我之所以让他这么骂，就是为了赢得一个让你睡觉的权利。”孩子说：“妈，我听着他这么骂您，我怎么睡得着啊！”没想到他居然从半夜1点40分一直骂我到3点40分，不停口地骂，什么污秽的字眼都出来了。我觉得我受到了极大的污辱。

第二天他酒醒了，知道这个事闹大了，就请他的好朋友来当说客。他的朋友让他给我下跪，否则不当这个说客。他居然真的给我跪下来了，我当时泪流满面。我对他：“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你有尊严，我也有尊严。我还是个母亲，我让你这么打，这么骂，孩子会怎么想？女儿大了以后，她是不是也是可以这么没有尊严地活着？”这是第二次，这一次是典型的精神虐待。

第三次他打我就更没有道理了。事情发生在1999年的5月7日，我记得非常清楚。孩子要参加中考了。中考比高考还激烈，我怕孩子一时发挥不好，考不上普高，就给她报了两个职高，第二天她要去面试。外事高中要看外貌，还要考口语。广告专业要考素描。头一天晚上我正在给孩子复习功课，我帮她温习政治。这时她爸吃完饭就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也没管他。我们正温习着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只听他咚地一脚把孩子的房门踢开了，嘴里骂着：“你们全是精神病！”我还挺奇怪，怎么能进门就发脾气？后来据他说，他一进门，就踩着猫屎了。他边骂边说：“我今天非把这只猫打死不可。”一边说，一边拿了一根棍子追那只猫。那只猫是孩子养的，她赶紧拦住，说：“你不能打我的猫！你不能打我的猫！”他走过来就给孩子几棍子，打

孩子头。我一看急了，上前说：“你今天要干什么！明天孩子要面试，你知道不知道！你不能打她。”他抬手就给了我几棍子，我的头上、身上、胳膊上，顿时几条青印子。我和孩子当时就急了。我对孩子说：“你快打电话叫你姑姑和姑父来！”我知道他们有车，来得快。我对孩子说：“他发疯了，咱们谁也拦不住他！”他已经没有理智了，我们必须想办法自救。我给一个当晚说好要来并且有车的朋友打电话，我叫他赶快来。为了要保护孩子，我们把卧室的门插上，我和孩子两个人抱头痛哭，哭成一团。孩子对我说：“妈，您跟他离婚吧！就是为了我，您也跟他离婚。”后来，陆陆续续劝架的人就来了，来了得先把她安抚住。我就让孩子先睡觉。孩子说，“您让我怎么睡得着！”我说：“无论怎么样你也得睡，明天的面试是改不了的。你必须冲过去，没什么退路可讲。”

我们半夜才睡着，第二天醒来一看，两个人的眼睛都肿了。没有办法。我只好起来打一个车，带孩子去面试。孩子在里面面试，我在外面就想，我的这份婚姻还能不能维持下去？我还能不能容忍他？还有没有可能再回这个家？我想不行，这次是不行了。我从第一次就跟他说，不能一而再，再而三。身上的伤痛会好的，但心灵的创痛不会好。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女人，我还有没有尊严？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实行家内分居了。我想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一个人的容忍有一个限度。夫妻之间有时无理可讲，但有个容忍度，你超过我的忍耐限度，我就不能忍了。再忍，我就不是我了。从这时开始，我就不想要这个家了。

问：你和你丈夫是如何从相识到结婚的？

在我和他结婚以前，曾经有过别的朋友，但因为两地，又碍于他的家庭背景复杂，当时有出身论的压力，我家很反对我和他好，我们就分手了。我虽然对此有点儿不满意，但现在我也做了

母亲，我很理解父母是为了我好。当时年轻，也不觉得爱有那么珍贵。我和我丈夫是同班同学，当时我们一起作论文，我们都对现当代文学比较感兴趣，这样我们就好上了。虽然我也不能说爱他爱得有多深，但是我的选择余地有限，他又追得挺紧，就跟了他。那时候交朋友的面非常窄，没有什么社交可言。男女界线还有，连跨班恋爱都很少。那时社会上大学生还少，总不能等到毕业之后，到社会上找一个学历比你低的吧。当时选择的圈子小，我不后悔我当时的选择。

问：你们的婚姻有感情基础吗？

他是一个才子，有时也挺幽默，是个不错的聊伴儿。但是他太自私了。一个人会爱别人是非常可贵的，可他不会。有一次我发烧 39 度，躺在床上，他招了一帮人到我家喝酒，跳迪斯科。我对他说：“你给我倒杯水，我渴了。”他答应得特好，但是就是不动手。第二次我又对他说：“你给我倒一杯水。”他又“哎”了一声，就不理我了。他甚至没有主动为我开过一次车门。在他这儿，爱和占有欲混在了一起。我爱过，也被爱过，我有资格谈什么是爱。我觉得人谈恋爱不能太晚，太晚就变得过于理智了，就只有一起过日子的想法了，和年轻时的心态不一样。

我们的生活态度、生活志趣、世界观都不一样，两个人之间很难协调。毕业以后，我这个人事业心比较强，而他比较懒散。这样就造成双方心理都不平衡。日积月累，两个人的反差就开始大起来了。我们这届学生全系 160 人，当时只有几个留校名额，他就是其中之一。留校以后，学校曾送他到名牌大学进修 1 年。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不在乎若干年后谁成就大谁成就小，我难以接受的是他的生活态度。他不去努力挣钱，但我挣来的钱，他花起来快极了。我们一点儿钱也攒不下，可孩子要上学啊。还要防老，我连给自己买一份保险的钱都没有。

问：你认为他为什么打你？

这其中有家族遗传的原因。他是东北人，东北人有打老婆的传统。他母亲脾气非常暴躁，居然动手打他父亲。他母亲让他父亲戒烟，他父亲戒不了。两个人一起去散步，她母亲的手随便往他父亲兜里一插，居然把烟从兜里掏出来，拽到他父亲脸上，并伸手给他父亲一个耳光。家庭暴力有因袭性。我的公公、婆婆都去世了，他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偏袒他，一致谴责他施暴，都在维护我。但是他打人的确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他的父母两个人都是再婚，同时个性都比较强，两个人打了一辈子。他母亲原来有一个女儿，他父亲分别与两个妻子有过一儿一女。我前夫是他父母惟一的亲生儿子。用我大姐姐的话：“他被我妈宠坏了。”“文化大革命”时，他父母同时受到冲击，两个人都有不满情绪，都一味地把不满情绪发泄到对方身上。他从小就是在这样一种唇枪舌剑的环境中长大的。还是在谈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经常在还不到发脾气的时候就发起脾气来了。他们家三代酗酒。他们家是明显的畸形家庭、酗酒家庭。我甚至责怪我父母，他们都是学医的，怎么没有在我们结婚之前提醒我。我父亲说他也不是搞精神病学的，没有想到。

他打我的另一个原因和他脾气不好也有关系。他的脾气很恶劣。他在常人一般还不至于发脾气时就爆发，而且是喷射出来。他了解我，专拣我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刺痛我，这是我最受不了的。我觉得他的酗酒有家族性隐性遗传，和他父亲一样，叫缺陷性人格障碍。他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很差，但是他伤害别人的能力很强。孩子小的时候，一哭，他就用一双象骨筷子敲孩子头，筷子都敲断了。这表现出一种对他人生命的不尊重。

就他的人格障碍我找过有名的专家咨询，看能不能治愈。专家认为，国内国外都很少有治愈的先例，关键在于他拒绝承认自

已有病，所以他不跟人配合。其实看心理医生很重要，国外看心理医生的现象很普遍。可是，中国人自己心理有毛病，都不知道找谁去治。

问：你害怕离婚吗？

离婚没有什么。我觉得和他过不下去了，因为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底线，我的自尊心受不了，我宁可一个人过，一个人带着孩子奋斗。我通过两年的努力，离成了婚。我上过两次法庭，这中间有一次他出国一年。在这场离婚中我失去的只是锁链，留下的是尊严。第一次提出离婚的时候法官就问我，为什么提出离婚，我说是为了尊严，为了一个做母亲、妻子、女人的尊严。法官听了半天没说话。如果我忍着，我女儿会怎么看？她母亲不顾起码的尊严，她是不是也可以不要尊严？我还怎么教育女儿？他自己没有能力自控，和他在一起连最起码的保障、最起码的安全感都没有，这日子怎么过？他在亲生女儿的重大转折点上都可以不负责，那他还会对什么负责任？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人，怎么和他在一起生活，怎么和他一起把这个家继续维持下去？！

问：打离婚官司的过程中，法院对你的态度如何？

我碰上两个女法官，人情味还是挺浓的。法庭是一个说理的地方，法官对我的同情很明显。我从家出来时拿了一些书和首饰，都是我自己用的书和我自己用的首饰。他要我把东西拿回来。法庭看了清单以后，很保护我。法律给了我一个公道。他在法庭上污蔑我，法官还严厉地制止他。我很感谢区法院。法院宣判时都有意让我们分别到庭，因为我在法庭上被他的无耻气得直哆嗦，心脏狂跳，达120下，一个劲儿地吃药，所以，法庭尽量避免我与他直接接触。我对法庭的做法非常感动。

问：请谈一谈你对女性成功与失败的理解。

我觉得女性刚开始奋斗的时候比较吃亏，但是奋斗到一定程度，女性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女人比男人更包容。女性奋斗到一定的高度，同性少了，反而占便宜了。一旦遇到问题，我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女性，就哭。而是冷静下来，自己处理。比如，汽车半路熄火，我会下车走到车前，把前盖打开，看看有什么毛病，而不会坐在车里发愁。家里的事他不管，我不干怎么办？

家庭暴力是女性弱势造成的。一个女的不可能比一个男的劲儿大，这是不可能克服的。我觉得女性自爱最重要。对孩子付出一片真诚，她也会理解你，尊敬你。我很反对为了孩子，什么都不要，连尊严都不顾了。如果我第二次择偶，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会为了孩子就不交朋友。孩子也会有自己的感情世界。

至今，我的事业是成功的，我的个人生活也不能说是一种失败。我对这个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倾注了我最多的心血，但是我没有保住这个家，我无怨无悔。我实在不能容忍了，就把这个家给毁了。谁都难免当局者迷。我不认为离婚是一种挫折，离婚是一种解脱，给了我一种自由。我好不容易摆脱了精神上的迫害，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婚是一种成功。

点评：

家庭暴力，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家庭

陈敏

家庭暴力，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家庭。它与施暴者或受害者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没有必然的联系。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凤仙副研究员，历时1年，对北京100

一个家庭暴力个案进行了研究。她发现，在她研究的个案中，遭遇家庭暴力的妇女 77% 是职业女性，受过良好教育，经济独立。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这几年审理的家庭暴力案件中，施暴人群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当事人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其中不少人是研究生毕业。

但是，暴力与一个人成长的家庭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国外的研究成果表明，大多数对妻子施暴的丈夫和长期忍受暴力摧残的妻子出身于暴力型家庭。他们从小耳濡目染，对暴力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暴力是婚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暴力是一种习得性行为，是后天学会的，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人，遇到挫折或心里不痛快时，会很容易地用对与自己最亲近的家庭成员施暴来获得心理平衡。而出身于非暴力家庭的人，对暴力的容忍度较低，一般不会长期忍受暴力，在暴力初期选择离婚作为摆脱暴力的途径的可能性比较大。2000 年 12 月底至 2001 年 2 月底，我国《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总项目“调查与研究”分项目在浙江、湖南和甘肃三省九市进行的样本数为 3692 份的抽样调查，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易安的前夫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一份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工作，但是由于他出身于暴力环境，父母之间常发生暴力冲突，因此，当他需要发泄时，很自然地就选择了暴力。而易安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从未耳闻目睹过暴力，因此她对暴力的容忍度就非常低。这就是使她在受暴初期，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受暴女性都能像易安那样对暴力说“不”，那么暴力在我们这个社会就不会那么盛行。因为施暴者施暴的目的，是要通过暴力来控制妻子，而不是要使自己妻离子散。

愿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

12. 没想到教授也施暴

叙述人 柳如棉
访谈人 宋美娅
访谈时间 2001年11月11日
访谈地点 北京市京民饭店
录音整理 宋美娅
文稿编辑 宋美娅

2001年8月，我从全国妇联权益部得到一封控诉信，一位叫柳如棉的青年女子诉北京一著名大学某教授对她骗婚、施暴，致使她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经过几番周折，我和曾免费为柳如棉做代理的李律师取得了联系，李律师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案子有难度，不好打。他介绍我和棉棉的哥哥联系。

棉棉的哥哥柳如平告诉我，此时棉棉大病初愈，已从北京回到内蒙古老家休养。直到11月份，我请棉棉和她哥哥来参加由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召开的“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研讨会”，才和他们兄妹见面。

柳如棉，1973年出生，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她1.71米的个头儿，颇长，苗条，一身牛仔装，披肩长发闪着光泽，走起路来，长发飘飘，一双大眼睛里尽管充满忧郁，但丝毫不掩她的漂亮。

我与柳如棉进行了长谈，下面是她的自述——

受骗怀孕

我生长在内蒙古一个县城里，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父亲是大学老师。1994年，我考上北京某大学经济学院，把会计念了个通，我们兄妹4人全上了大学。在学校里，也有人追求我，那时我的要求高，一般的看不上，要找就找名牌学校的，我们宿舍的几个女生都是这么想的。

刚毕业那会儿，我去国展一个招聘会，一进去，好多单位都来问：“小姐，你愿不愿意到我们单位？”我说：“我是外地生源，你们也要？”人家说主要是看竞争，3个月试用期，适合就干下去，不合适就淘汰。一家台资纸业公司要招一名会计，我就去了。刚过半个月，老板就说：“你的试用期已经过了，现在你是公司的主管会计。”我说：“哎，不是说好试用期是3个月吗？”老板笑着说：“我已经考验过你了，你完全称职。”我想起来有一次，我们老板给我两万块钱发工资，发到最后多了两张，我对老板说：“你今天给我的钱多了两张。”当时我还奇怪：“整捆的钱也有错的呀？”老板冲我伸伸大拇指，我不知道老板这是在考验我。我们公司租的写字楼，老板照顾我，我就住在办公室里。

这样从1998年干到1999年，当时追求我的人挺多，但都是普通人，我都看不起，我要找老公肯定是出众的。那时我有两个同学找的都是博士后，她们的户口也过来了。我经常回母校听讲座，跳舞。在那里上学时不觉得，出来之后我对那里特别留恋，那里怎么那么好。我就想，对象还得回母校里找。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到母校跳舞，我同学介绍我和于林认识。开始我觉得他年龄大，他38岁，比我大12岁，我同学说，年龄大更知道疼人，学校的老师好多都是年龄挺大才结婚，硕士、博士念下来可不就是这个年龄了，为事业耽误了。在我的理想中，就是想找一个年龄比我大一点的，我爸爸就比我妈大9

岁。这样，我们就算进入恋爱关系了。他请我吃饭、跳舞，对我可好了。不知道他从哪儿弄了一辆豪华轿车，上着军队的牌照，上下班车接车送，对我特别关心。他说他就喜欢高高的个子、长长的头发的女孩子，他说：“你是我寻找了十几年的梦中情人。”

没过多久，于林对我说：“我都快40岁了，我父母就我这一个儿子，我有个困惑，怕结了婚你不生育，咱们先同居吧，等你怀了孕咱再结婚。”我一听，吓了一跳，这不是耍流氓吗！当时我都翻脸了。他又给我说好话，甜言蜜语，送玫瑰花、买衣服，追求女孩子的那一套全用上了。他还带我去人民大会堂，显示他是上流社会的人，特别有地位。有一次，为了表达对我的爱，晚上他步行从中关村走到六里桥——那时我和我哥住在六里桥，走到我们那儿都夜里3点了。他说：“我是名校的教授，怎么会骗你呢？你不要把我和社会上的人相提并论。”通过1年多在外面租房的经历，我觉得也该有个家了，他又对我那么好，他也说：“都是大男大女了，不必要非得谈个三年两年。”经过他那一段猛烈的追求，我真的爱上他了，真的爱上了。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最低，以后我就对他的话言听计从。

2000年的元旦，我同学夫妻俩请我们俩吃饭，4个人一起喝了不少酒，那一天晚上，我们第一次有了性关系。反正有了第一回就有第二回吧，我们同居了。他说：“等你一怀孕，咱们就结婚。”到了腊月，他说：“我是真心爱你的，你先把结婚证明开过来吧。”春节我回家，他给我父母买了重礼，让我带回去。回到家，我对我爸说了他，我爸说：“名校的教授，素质很高嘛，还用我去看？”赶正月十五我回来，就觉得不对劲，肚子疼、腰疼，有一天还想号啕大哭。到安定医院检查，查出来是怀孕了，当时他特别高兴，说：“棉棉，给你爸爸打电话，咱们结婚吧。”我心里也特别高兴：我没看错人。

谁能想到这一切都是假的。第二天，他到单位来找我，说：

“我给你8万块钱，咱俩了断吧。”当时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我说结婚不需要钱。他说：“对不起，我不想结婚，算我把你骗了吧。”哎呀，当时我就号啕大哭，这怀着孩子可怎么办呀！我说：“你这么大了，不能这么骗我呀。”他许诺给我调工作、办户口，让我把孩子打掉。我说：“你就说一句话，你不爱我了，我回老家把孩子打掉，永远离开北京，我不要你一分钱，因为我不是为了钱才找你的，我是个好女孩。”当时，我们站在京贸花园的阳台上，他说：“你让我再想想，明天我给你答复。”后来他说他怕我把他推下去，他才不再坚持。

第二天早上5点钟他就打来电话，说：“昨天我是一时糊涂，我还是真心爱你的，咱们还是结婚吧。”有了这一次风波，我就慎重了：这个结婚证到底该不该开呀？我就一个劲儿地靠（核实、落实的意思）他：“你是不是真心爱我，你要不爱我，我打掉孩子永远离开北京，我不要你的补偿。”他说：“你这么好的工作可不能丢掉。”他又说好话，又道歉，还是要结婚。我就给我爸打电话，让我爸寄结婚证明。他开了证明，我开了证明，然后我们去医院检查身体，上民政局办证，光结婚证上的照片就照了3回，这就到了3月底。临办结婚手续前的3天里，我一劲儿地靠他：“你是不是真的爱我？不爱我，我不会和你结婚。”我对爱情和婚姻抱有特别美好的向往。

2000年4月1日，我们拿到了结婚证，这天晚上，他说：“你看，我一直是说话算话的，我娶了你，明天你去把孩子打掉吧，咱们现在不具备要孩子的条件，这一室一厅，连个孩子的小床都摆不下，书沿着四周都堆到房顶了。再说，还没办酒席，我要请很多的名人，让你成为最幸福的新娘。”又说：“要不你回内蒙古把孩子生下来，给我养个私生子。”我听了这话，犹如晴天霹雳，怎么这么快就变了呢？愣了半天，我说：“你已年近不惑，该有个孩子了，况且这是我第一次怀孕，咱们应该保住这个孩

子。”他说：“你真傻，我说什么你都信，我跟你结婚是怕你到学校闹，你跑到学校一闹，我十几年就算白干了。跟你结婚我能得到三条，第一，保住我的名声；第二，可以分上房子；第三，结了婚我再以感情不和离婚，谁也不知道。我先给你说，我把我的财产全转到我妈名下了，我什么也没有，和你没有共同财产，你什么也得不着，连房间的钥匙我都不会给你。”

我气极了，质问他：“当初为什么要说和我结婚？”他说：“你这样单纯的女孩子，不说结婚你让我睡你吗？”新婚的晚上我气得大哭。

第二天，于林对我说：“我找人算了一卦，说我今年不能要孩子，要了也是个傻子。再说，我现在正在读博士，有了孩子不方便。”他又说：“这段时间我喝了不少酒，这个孩子别要了，反正都结了婚，你还害怕什么。”我怀孕的时候正是春节前后，我也喝了点儿酒，我一想，他说得也有道理，就同意打胎了。

堕胎出险

新婚第三天，也就是4月3日，他带我上东城区的一家医院。那时候我多傻，我们住在海淀，跑到东城的医院，多远呀。当时我都没想他是为什么，后来知道了，他就是要想跑得远一点，别碰上熟人。我们结婚，他不让别人知道，我们一块儿出去，碰上校领导、同事、学生，他跟人说我是他妹妹，有时说是学生。从我们结婚的第一天，他就给了我几条规定：（1）不许和他家里通电话，更不准和他们来往，家里的电话我不能接；（2）不能把同学、朋友、熟人带回家，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结婚的事；（3）不许告诉他的父母我们结婚的事。我们新婚的那天晚上，他伤心地说：“你算是把我害了，我玩过几个女生，她们打过7次胎，没想到栽到了你手里。”好像跟我结了婚他就不是处男了似的。反复说是我害了他，以后再出去就是结过婚的人了。

住院以后，他把我扔在医院就不管了，直到4天后孩子打下来，他才第一次来看我。4月6日早上，我吃过打胎药之后高烧42度，当时我浑身发抖，肚子剧痛，他来医院后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这么娇气，装的吧。”几个小时以后，我产下了一个成形的男婴，医生说这是一个“水晶宫”，这样的孩子很聪明，又是个龙子，太可惜了。我听了以后心疼极了，失声痛哭。这时，于林可能是也后悔了，他斥责我：“你这个女人没主意，软骨头，我让你堕胎你就堕？你应该坚持保住孩子！”

我当时出血很多，忍受着剧痛，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于林一点儿也不安慰我，吵闹斥责了一顿，不问我的死活就走了。我受不了他的辱骂，4月9日凌晨3点，我想跳楼自杀，就在我上到了窗户的时候，被一个护士发现，她和另一个大夫把我拉下来。以后的几天里，于林从来不来医院照顾我，偶尔来一次，不是吵就是骂，要不就是坐在离我很远的地方，避着不和我说话，好像我是瘟疫。

4月12日，没等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他就让我出院了。中午回到家，于林跟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棉棉，咱们离婚吧。”由于我在医院期间根本没人照顾，加上他斥责我，我的精神压力大，身体很虚弱，下身出血淋漓不止，听他这么说，我非常痛苦，我说：“离婚可以，你看我身体现在这么虚弱，你总得让我恢复一下吧。”

14日晚上，他不让我在床上睡觉，说这是学校分给他的房子，我不能住。说着，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到地上，我爬起来，坐在一个小椅子上，他说椅子也是他的，不让坐。我挪到外屋坐下，他过来把我踢倒在地，然后又从地上把我拽起来打了两拳，并且说：“我看你能支撑多久。”

我像个犯人一样被他囚禁起来，他回来才给我带一点儿吃的。我就想，去上班吧，起码在班上有饭吃。我上班的地方离家

很远，打车得两个小时。于林不给我门上的钥匙，每天下班后，我都拖着疲惫虚弱的身子站在楼门口等他回来给我开门，最晚时我在门外等到夜里十一二点。4月的夜晚很冷，我还在月子里，冻得直哆嗦。就这样，他还让我给他做饭、洗衣服。我不敢跟人家抗争啊，我的身体不行，他再踢上两脚可受不了，所以不管工作多忙多累，我进门就忙着给他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当时我还在产期，洗衣服怕水冷，就说咱也买个洗衣机吧。他说：“不买，买了离婚时你分我的财产。”有一天上班时，我带着他的一大包脏衣服去单位洗，天下着雨，我说借他一把伞，他不借，说：“没有。”

我这血就是止不住，加上生气，我的身体迅速衰弱，于林根本不管我，我只好自己去医院，上午输液，下午上班。

5月14日这一天，我正做账，就动不了了，我给于林打电话，让他赶快来。他把我送到一家医院妇产科，妇产科主任于林认识，押金都没交就住了院。诊断是急性盆腔炎，宫腔里一腔血，每天输6—8瓶抗菌素。一天，一位老大夫急匆匆地来病房，说：“你们都不看看病历，她的白血球不到2000了，立即停止输液。”

由于出血不止，医院决定再次给我刮宫。上手术台的时候，我哆嗦得不行，预感着要出事。果然，手术不一会儿，我突然一阵剧痛，好像心肝肺都被拽下去了，医生“哎呀”一声，让我躺着别动，他们急忙找这个大夫不在，找那个大夫不在，我别的都不清楚，记得最深的就是巨大的痛。一会儿，觉得背上特别热，一看，我的背浸在鲜血里，子宫穿孔了，大出血！

医院问我有什么亲人，把我哥叫来了，把于林也叫来了，医生说随时有生命危险，把给要死亡的人用的药都用上了，主治大夫要给我开肚缝合，一个老大夫说：“不能开肚，她的体质太弱，一开肚就要输液，可是她的白血球不到2000（正常的是4000—

10000)了。”

逼迫离婚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这期间于林又不露面了，有一天我给他父母打电话，我说：“我是你儿媳妇，我快要死了，你们能来看看我吗？”她妈说：“我儿子没结婚呀，你是谁？”他父母、姐姐都来了，他们一来就闹，他妈说：“你是个外地的打工妹，你怎么能配上我儿子？你是骗婚，本来我儿子是未婚，挺自由的，你害了他。”他们找医生、护士闹，不让给我治疗。医生让我出院，说对我已经不能用药，回家养着去吧，多喝鸡汤，吃好的，慢慢恢复。

于林不让我回去住，说让别人看见了不方便，他让我回到大兴他父母的家。他父母像看犯人一样看守着我，晚上和他母亲睡一张床，看着我睡了她才睡，不许我打电话，我的手机一响，他们就过来。有一次我哥打了一个电话，他妈就问：“这个男人是谁？”我说是我哥，他父母和他舅舅说要核实，我只好让我哥去了一次。他父母和他姐成天给我灌输：“女人天生就是伺候男人的，你要学会忍辱负重，服从他的一切支配。”他们一天3顿让我吃咸菜喝稀饭，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住了十几天后，我穿着睡衣跑出来，打个车到了学校。

于林一见我，吃了一惊，他又提出赶快离婚，而且是无条件离婚：“以前给你8万块你不要，你不是要婚姻吗，婚姻我给你了，现在我又有别的女朋友了，你赶快跟我离婚，不离就天天打。”于林对我说：“把你打死，还能让法医认定你是自杀。”

我当时太虚弱，肚子痛得受不了，我只想着养一段时间，把身体养好再说，他真的是每天打，不是打就是骂。平时打几拳踢几脚，不计其数，邻居、保安都知道，我经常哭到天明。打得厉害时，我3次打“110”报警。

因为得买菜，于林给了我钥匙，我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想着他浪子回头。7月1日我买了辆自行车，到了晚上，他不让我的车进屋，结果第二天车丢了。我惋惜地说：“如果你让车进来，就不会丢了。”他一下子勃然大怒，一面破口大骂，一面打我，我全身都是他的手印，遍体鳞伤，嘴角肿了半个月，他命令我说：“别人问起你脸上的伤，你就说是自己撞的。”

7月9日晚上，他回来后又找茬儿打骂我，这次他下手特狠，拿一个管子打在我的左上臂，一下子毛细血管破裂，右臂有3道深度划伤的手印。夜里12点多我才逃出去，上海淀医院包扎。一个女医生问我：“你怎么三天两头受伤？”我老是哭。她挺好心的，能猜出一点儿，她悄悄告诉我：“保留好病历，以后能告。”在那以前，我没想过要告他。我也不把我受的罪告诉娘家，不告诉单位，我要面子。我只是责备我自己：谁让你没有慧眼，那么多人追求你你不选，这是自己找的。那天晚上我不敢回家，在海淀医院的椅子上睡了半宿。

第二天回家后，于林不在家，听他们院长说他出差了。为了感化他，我把他所有的脏衣服、被单都洗干净、叠好、放好；我清洗了厨房、卫生间，擦了所有的玻璃。最后，又花了3天3夜的时间，把他堆在四周的数千册书一本本擦干净、擦好。在我原来的观念里，认为离婚是一件挺丑的事，只有坏女人才离婚。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离婚，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和他好好过日子。

就在他回来的前两天，有一次电话铃老响，我就接了，一位女教师打来的。于林回来后，7月17日这一天，我说有这么一个电话，于林一听我接了电话，马上变了脸，他怒吼：“我的事你不要管，否则你出不了这个门。”他突然拿起一个铁管向我头上猛砸几下，我一下子昏倒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醒过来，发现头上有个大包，我爬到他跟前，求他带我上医院。他一脚把我从里屋踢到外屋，我挣扎着跑到门外，他抓住头发把我抓回

来，头发抓掉一把。我根本没有招架的能力，只能喊救命。对面的王老师后来说：“我们听见你喊救命，但你们是夫妻，我们也不好干涉。”邻居好多人在外面围观。这时，于林拿了一把刀，1.82米的个子，举着刀站在门口，多可怕呀！他抓住我的胳膊，站在我同一侧，一刀砍下去，我胳膊上一下子翻出白肉。他同时说：“我站在你的同侧砍，连法医也鉴定不出来是自杀还是他杀。”我拿起电话想报警，他一把把电话线扯掉：“想报警？你以为那么容易，学校派出所的人我都认识，你一个外地打工妹，谁信你的话？我是学校教授，他们相信我！”趁他上厕所的机会，我用我的手机报了警。“110”真快，一眨眼的工夫就到门口了，他马上放下手里的刀说：“我老婆要杀我，快来救命！”警察问了我们是什么关系，见被子上、床上、地上全是血，他们对于林说：“什么也别说了，赶快带她去医院包扎，然后上派出所录口供。”学校派出所的警察带我去医院，路上我给我哥打了电话，我哥飞奔来了，一见我浑身是血，我哥就哭了：“我妹妹怎么了这样了！”我们让医院给出个伤情鉴定，医院要派出所的证明，派出所说什么也不给出。

等我们到了学校派出所，于林把他父母、姐姐都叫来了，他一有事，不找同事、不找领导，就是找他父母。录口供时他反咬一口，说我是杀人犯，不能让我再住下去了。当晚，我就到我哥那儿去住了。我哥和另一个小伙子合租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很不方便。两天后我又回来了，结果，于林把门上的锁换了，我进不去家了。

流浪在外

因为我老不去上班，6月份单位就把我开除了，我就在外面流浪。晚上睡学校的草坪，睡医院的长椅，有时候就走一晚上，因为一躺那儿就有男的过来，保安逮住我，也怀疑我是坏人。我

回去过六七次，晚上我得吃药，得洗，我的伤口还在化脓，还在出血。于林把他父亲叫来，他躲起来了，他父亲不给我开门，骂我是坏女人、杀人犯，他还打“110”说：“犯罪分子回来了。”对门住的王老师看我可怜，留我在他家吃过两次饭。王老师说我每次喊救命他都听见了，但是他认为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他不好管。恰巧我哥这时出差了，也联系不上，我在同学家住过两晚，在另一学校的招待所住过两晚，没有钱了又出来流浪。那时候天气正热，可是我身体不行，晚上坐在地上还是觉得冷。

为了安全，有几次我想坐在学校派出所过夜，那里面有沙发。派出所的人不让我坐，我就在派出所门口坐一晚上。有一次，有个警察说：“你是怎么回事，你老公打电话说你失踪找不着了，要跟你离婚，你又说他不让你进家，你们哪个人说的是真实的？这样吧，明天我跟你去一趟，看看究竟怎么回事。”第二天，这个警察跟我一块儿回家，他父亲还是不开门，还是骂：“你是婊子，你的户口在内蒙古。”警察叫他开开门，我进去拿了几身换洗衣服。这个时候，单位也给我打电话，说于林对单位说我跟别的男人跑了，让单位出证明，他好离婚。

8月29日，我终于撑不住了，又一次巨大的疼，我自己抱着肚子住进了医院。医院说我的身体太虚弱，已经无法用药，建议我用中医治疗。我又转到中西医结合医院，在那儿又查出肾、肝都有病，医生还怀疑我是血癌，老天是要绝我呀！我发了疯似的哭，医生说肯定是受了刺激。每天都是喝中药、扎针、烤电、灌肠，医生把大盐粒炒得特别烫，往肚子上敷，皮肤都烫起泡了，用这种方法消炎。医生还给我扎火针，把长针烧得红红的，扎在肉上冒白烟，上午扎正面，下午扎背面，用这些方法治疗了9个月，后来我看见火针就哆嗦，看见中药就吐。

我住院的钱是我哥给我借的，于林两个月没有音讯。9月4日，学校开学了，我穿着病号服从医院跑出来，到学校去找他。

在系办公楼里遇上他，他一看见我，撒腿就跑，他说：“这个女人是疯子，我不认识她。”当时围观了好多学生和老师，后来他们的系主任也出来了，在楼梯的一个拐角处，他一脚把我踢倒，我从3楼一直滚到1楼的地上，当时口吐白沫，昏了过去。围观的人里有人打了报警电话，等我醒来时，是在“120”急救车上躺着。

那段时间，我整天在泪水中泡着，有一次我实在郁闷得受不了，用剪刀把我的衣服剪得一条条的，我觉得我的心和这一样碎。

他原来是个骗子

我在医院治着病，三天两头接到法院的电话：“你爱人起诉你离婚。”我不想提这个事，只想赶紧把病治好，越生气对病情越不利，可他就是等不及。2000年9月、10月，他两次起诉离婚都被驳回。11月份，他又起诉。这一次，由原来的派出所转到另一个派出所了。同时，我也起诉他抚养费案。

有一天，有一个法院的人到医院来看我，说来看看我的身体如何，临走时他让我签字，我问他签什么字，他说就是表示他来看过我，回去好向领导交差。我就签了。过了几天，我哥来训斥我：“你怎么能自愿离婚呢？”我说：“没有啊。”我哥说：“法官说你都签了字了！”我赶快打车找到审判官，就是上医院看我的那个人，质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写个申请吧，那个就不算数了。”我觉得法律怎么这么不严肃呢？开庭这天我们明白了，于林和这个法官熟得很，直呼他“老二”，在法庭上都不避讳我们。我起诉于林抚养费案，也转到了这个法官手下，一个离婚案，一个抚养费案，两个案子半天就审理完了。

2000年12月28日，两个判决同时出来：由于女方的身体原因，驳回于林的离婚请求。我的诉讼请求是要求于林支付我治病

期间的各项费用3万多元。但法庭只判他支付5000元的住院押金，从2001年1月起每个月给我300元生活费。我们双方都不服这个结果，向北京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在我准备打官司之初，北京一家比较有名的律师事务所答应免费为我服务。我的律师认为，我这个官司应该刑事是主体，附带民事。起诉刑事案件必须要有证据，我手上有学校8位教授的证词，他们亲眼看到过于林打我。但是学校派出所就是不给我们出具他们出警的证明，律师多次交涉都不行。有的民警很好，愿意给我作证，但他们领导不允许。所以刑事就立不了案。

于林在起诉我离婚时，说我以前流过4次产，我欺骗了他。实际上，于林才是个大骗子，他在我之前骗过好几个女学生。有一次我给他整理房间，发现一捆他和别的女人来往的信件，其中还有别人向学校党委揭发他的原信。他曾对我说：“我让4个女孩子为我打过孩子。”“给别的人1万块钱就了结了，给你8万你都不要，你非要爱情。”从那些信里面还可以看到他特别自私，和女孩子出去吃饭他都记上账，过后让人家还。我从这些信中抽出来两封，偷偷带出来了，在法庭上，交给法官，看看到底是谁在欺骗别人。

第一次是中院开庭，法官的态度很公正，这时候是2001年的4月份。我说：“哎呀，这一次可遇上了公正的法官了。”律师也说有希望。可是等到6月份案子判下来，法官和于林已经互递烟，互拍肩膀了。二审的判决还不如一审，还是支付5000元，但是连300元的生活费都没有了。律师听了这个结果之后，劝我和我哥：“你这个官司不好打了。”我想：算了，赶快把身体养好，找个工作，挣钱还外债。

可是，于林并不就此罢休，他不断给我们家打恐吓电话：“你女儿回家了吗？我是某某税务局的，她携巨款逃跑了，我们正在通缉她。”还给我哥单位打匿名电话。他在医院当着众人对

我破口大骂，说：“我要把你驱逐出北京，把你哥驱逐出北京。”他还威胁我：“我弟弟是黑社会头子，我要让他杀你、杀你哥、杀你全家。”

于林通过这次婚姻完全达到了他的目的。2001年12月，他以已婚的条件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而我是一无所有，一身伤病，落下了终生不育的残疾。

后记：2002年6月初，我接到如平的电话，他告诉我，棉棉为她的官司，经常往法院跑，“一个月里去6回。”可是，5月份，棉棉突然接到了离婚判决书，法院竟以找不到她为由，缺席判决了她的离婚案，棉棉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点评：

男人为什么要施暴

宋美娅

许多人会认为，施暴的男人大多是那些没文化的、粗鲁的，性情暴躁、社会层次不太高的人。也许很多人没想到，像于林这样的大学教授也会是一个残忍的施暴者。

实际上，家庭暴力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群中，一个农民会对妻子施暴，一个大学教授同样也会。而且，由于他们深谙社会习俗，并知道如何在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他们还会更加像一个谦谦君子。所以，从外表上我们看不出谁是施暴者。

不少专家也想弄明白男人为什么会施暴，他们对施暴者进行研究，希望找到一种典型的施暴者特征。有一种习惯上的认识，认为男人施暴是因为他们精神上有疾病，或者性格上有某些障碍。但是，对施暴者进行的心理特征方面的深层次分析，并没有

揭示出施暴男性的一致性的个性特征。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明显的群体性的疾病或障碍。瑞典社会学家艾娃教授不赞成“施暴者是那些少部分的、不正常的男人”的说法。南京晓庄学院的陶来恒教授认为：男人施暴，“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上来看，根源上都和传统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得到了某种制度和组织上的传统支撑”^①。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农民和一个教授，如果他们所受的社会文化浸染是一样的，他们对待妻子的态度就是一样的。

那么，男人为什么会施暴呢？他们从施暴中得到了什么？

艾娃教授认为：一个男人需要得到权力去控制别人，他们是通过控制女性来完成男性气质的建立。男人对妇女的暴力是维持对女人权力的一种方式。^②

加拿大“白丝带”运动的发起人霍夫曼先生把男人施暴的原因归结为7条：（1）夫权。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男性主宰的世界里，有权力的人常使用权力控制另一部分人。（2）在男性主宰的社会里，男性享有特权。（3）社会纵容。使用暴力的男人常被认为是英雄。（4）男性权力的自相矛盾，男性盼望有权力，但是很多男人并没有权力，所以他们通过暴力向人们证明：我有权力。（5）男性的心理盔甲。男人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他们用暴力来证明。（6）男人精神上的高压锅。他们不能表达内心的情感，最后高压锅会爆炸。（7）他们过去的经历。如父母可以打孩子，父亲打母亲。^③

这些原因导致男人通过暴力来体现权力，最后实现对妇女的

①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②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与干预项目通讯》，2001年第10期。

③ 引自2002年11月27日在中国法学会的演讲。

控制。

在于林的思想里，有着强烈的性别歧视，他与所有和他交往的女性之间都不是平等的关系，他可以用钱打发掉一个个被他玩弄了的年轻女性，甚至不用钱。女性于他，是玩物，是满足他的需要的物。在他的家庭里，男尊女卑的观念非常浓厚，他的母亲和姐姐告诉柳如棉，“女人要完全服从男人”。于林在这种家庭里长大，势必导致男性权力的无限膨胀。这种性别观念从小灌输，根深蒂固，即使受过高等教育也不能消除。

于林生长在农村，家庭条件不太好，他本人又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这就造成他复杂的内心——他自尊自大，又潜藏深刻的自卑。他对女性不负责的态度，一方面是他的道德问题；另一方面，反映出他的不自信，他不敢与女性建立起亲密关系，不敢为婚姻负责任。一有事就把父母搬出来的情节，特别能反映他的脆弱。有一种观点认为，施暴与男人不成熟及严重的性格缺陷有关。同时，施暴的男人往往有严重的自卑心理。

男人的权力受到妇女日益独立的挑战。由于妇女在工作中获得了管理和专业职位，在家庭中经济独立，男性或许感受到了威胁，他们便采用暴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家庭暴力不仅发生在妇女地位普遍低下的时代，也会发生在妇女地位普遍提高的时代。

13. 地狱里走了一趟

叙述人 于小霞
访谈人 宋美娅
访谈时间 2001年5月27日
访谈地点 宋美娅家中
录音整理 宋美娅
文稿编辑 宋美娅

和于小霞认识是在2000年5月。

那一天，我在“妇女热线”值班，接到一个年轻女子的电话，她说她被同居的男友打得很厉害，她有生命危险。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我感觉她在颤抖。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在做了长时间的咨询交谈之后，应她的请求，我把我的联络方法告诉了她，以便她在晚上、在最紧急的时刻，能有一个可以随时联络的人。她就是于小霞。当时她在一家报社工作，家在外地，在北京没有一个亲人。

果然，于小霞数次在夜里11点多给我打电话，每次她都处于极度的精神紧张之中，暴力不仅使她受尽折磨，也使她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每次结束电话之前她都抱歉地说：“宋大姐，你睡吧，哎，我又要睁着眼到天亮了。”我们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我开始做受暴妇女访谈之后，正式约她来做访谈（下面是她的叙述）。在她的访谈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让妇女回想她们受暴的经历，对于她们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本是干练一女孩

回头想过去，像是下了一次地狱。

我出生在1970年，我的家在内蒙古包头，爸爸妈妈都是医生，他们从没有动过手。我上大学学的是临床医学，大学毕业分到包头一家大医院，我妹妹现在医学院教书。

我不喜欢从医，是我父亲帮我选的专业。在医院工作时，我认识了一位房管科的科长。有一次，他要拆一处房子，有21栋平房，里面有不少红木，拆出来后可以买卖。我和技术人员谈过，知道一点儿情况，就交了1万块钱，把这21栋平房的红木全包了。结果我运气不错，拆出来的比预想的要多，我卖了3万多块钱。我把这3万块钱交给我妈时，我妈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从那时，我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设想有了改变，我辞职了。我是我们医院头一个停薪留职的，我想尝试更多的职业。当时我从医院出来做3份工作：我用那3万块钱投资开了一家餐馆，让我弟在那儿招呼；白天我在一家公司做销售经理，公司离我的餐馆很近，顺便就能打理，公司有事还可以去我的餐馆吃饭；下了班，晚上我就到一家夜总会做前台经理。

餐馆生意很好，但后来开不了了，因为我妈在那儿出了事。当时我非常忙，餐馆的生意又好，我妈就去帮我照顾照顾。有一天，我妈突然昏倒在餐馆里，死在我们医院急诊室了。我母亲和我像朋友，她的死对我打击非常大，我不能在我妈出事的地方招呼客人，餐馆就不开了，那是1997年。我一下子变得非常颓废，整天闷在家里，什么也不干，朋友经常拉我去吃饭，我就喝酒，强迫自己喝，就是为了麻醉自己，几乎天天喝，一喝就醉，哪怕一杯也醉。一个月后，我发现我的手抖，我突然想到，我是家里的老大，我不能废了，我要恢复精力做事情。那时我爸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在过后的两个月里，我看书、睡觉，别的什么也不

做，两个月后，朋友介绍我到包头电视台广告部。第一天上班，第二天我就到我妈坟头许了愿：我一定要把弟妹带出来，3年之内一定实现。

不久，海关招聘公务员，我去考。因英语不好刷下来了，海关刑侦处的人看我有点儿灵性，就对我说，我们可以培养你，给你发工资，你不必离开电视台，做一些边缘性工作。当时，包头进了很多韩国大宇车，海关要调查这些走私车是谁走私来的，销到哪儿去了。这个侦探的事情他们决定让我来做。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办法，很快给我办好了手续，让我到一家公司做公关部经理。3个月后，我就弄清楚了这些车放在哪儿，都销往了哪儿，一下子就破获了14辆走私车。

这件事完了之后，海关给了我一个星期的假，给我出钱，让我出去玩玩儿，然后就可以正式到海关工作了。我确实害怕，这家公司带有黑社会性质，要让他们知道是我干的我就完了，我们家也完了。我心理压力大，想去看看大海，这样，我就到北戴河去了。

偶遇一段浪漫情

到北戴河之后碰上了田涛，这就改变了我的命运。

他是从北京去北戴河的。那时他在部队一个三产公司，刚丢了7万块钱，也是心情不好去玩儿的。那天，我在海边呛了一口水，他出于好意老注意我，我往深海里游，他就跟着我。有一次，一个浪过来把我打了，我就潜水游到海边。他不知道，还在到处找我，我又游了过去，他说：“哎呀，你上哪儿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游泳呢。”这是我们第一次说话。我觉得他特别淳朴，又关心人。我本来不相信他是军人，他拿他的军官证让我看，我一看是中央军委的章，心里就踏实了，我们就在一起玩儿。

我本计划3天后到青岛，一下子在北戴河呆了7天。临走的

头一天，他把我叫到海边，谈到夜里3点，都涨潮了，他絮絮叨叨说了那么多。第二天上午10点多，我要回内蒙古了，他不让我走，我说不行，票都买好了。他说：“你要走，我跟你上你们家。”其实那时他已表现出了固执，但当时认为是另一种东西，认为是他特别爱我。他长得很漂亮，1.80米的个儿，天津一个军校毕业的，我跟他走在一起特别不般配。

他真的跟我回了家，在我家呆了两天，我爸见了挺满意。回北京后，他每天给我打电话。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半夜，我家电话突然响起来，还是他。我说：“你怎么半夜打电话？”他说：“你猜我在哪儿？”我说在北京，他说：“你把家门打开。”我开门出来一看，他的车就停在我家门前。他把车灯灭了，从车里下来了，当时我特别感动。他在我家住了3天，他对我说：“你跟我上北京吧。”我说：“去干什么？”他说：“什么也不用你干，我养着你。”我不是让别人养的人，但他的真诚让我感动。这个时候，我已经要进海关了。我想，我这一次不去海关，就得再做一次，但我还是放弃了，我决定跟他上北京。我们走的头一天，我爸拉着他的手说：“田涛啊，我把女儿交给你，你可要好好对她。”

当时他还在部队的公司干，来时说好了，我可以在他公司做会计。刚开始，他照顾我还行，我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半个月后的一天，他以前的女朋友打电话，这个女孩叫肖丽娜（化名），河北人。他们俩在一起时就互相拿刀砍，他的身上、手上全是疤，腿上也是疤，都是那个女的打的。那天我俩在外面，他的手机响了，是那个女孩，她说：“我回公司了，就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他和那个女孩分开特别不容易，他就让看门的老魏把她轰出去。老魏把她轰出去，把门锁了，她又从门上翻进去。我对他说：“你先把你自己的事处理好，我于小霞可不是那种没出息的人。”我有个同学在301医院进修，当晚，我就去我同学那儿了。田涛绕世界找我，那个女孩在公司不走他就不回去，我又找不

着，他对我同学说：“我知道小霞在你那儿，你告诉她，我住在酒店。”我不理他。一天夜里，他又打来电话，对我同学说：“你让我见见她吧，不然我就要死了。”我想，算了吧，别较劲了。那一晚，我们在301医院里见面，他又把我接到酒店，那个女孩老打电话找他，我对他说：“你把事情处理好了再说，我先回家。”我拿着东西往外走，他把宾馆的窗户打开，喊着我的名字，说我要走他就跳下去，大声喊，根本不管周围的人。我太要面子，只好回来了。后来他租了个房子，当时我认为爱情不应该有任何附加条件，我们就正式同居了。

不幸落入暴力中

同居之后他告诉我，肖丽娜骗过他，他们同居时，这个女的又跟一个有钱的人好，让田涛发现了。他就老怀疑我，好像我也在骗他。他变态到什么程度？——不让我跟任何男人说话。他第一次打我，是因为我给他战友打电话。那时肖丽娜老在公司不走，田涛上不了班。我用我的手机给他战友打电话，让他劝劝肖丽娜，让她走，田涛得上班。他回来后打开我的手机一查，有他战友的号码，二话不说，抬手就打，他打人是手边有什么拿什么。当时我都懵了，头上打的都是大包。事后觉得委屈得不行，我就要走，他跪下来猛求我，说：“你这个时候可不能离开我，你要离开我，就得出人命。”肖丽娜那时做了小姐，每出一次台就给他打一个电话。田涛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因为他那时做建材生意。她老半夜打，有时让她的姐妹打：“我是肖丽娜的姐妹，你过来吧，我们陪你！”当时我如果离开他，真要出人命，他敢拿刀把那女的给杀了。

第二次打我，他拿刀子划破了我的脸。那时，我在北大学中文，认识了一个老师，老师就介绍我去了一家公司。田涛认为：他为什么用你？因为你是一女的，他要利用你。有一次我正上

班，他去公司偷偷观察我，那天我办公室来了个客户，他从门缝里瞄了一眼就走了，晚上，他喝了酒了，又开始打我，我往门外走，他拿起一个盆子砸过来，我一闪身，盆子砸到墙上，他过来就把我的手反扭过去，又开始打我。那时，他往我身上打是经常的事了，多得太多了，我觉得拿拳头打是非常正常的。他往我身上打，用脚踢。打完了，他怕我走，又把我绑起来，骂我。这时都半夜了。那时候，我觉得他有病，不正常。绑起我来后，他拿出一把刀，逼着我问：“你办公室那个男的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客户，他不信，他拿着刀在我脸上划了一刀，说：“看谁还看得上你！”血一下子就流了我一脸。你看我脸上现在还有一个疤。

第三次是我弟弟的一个同学来看我，这次把我逼得真不想活了。那个男孩子长得挺帅，他和我弟弟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人家是出于礼貌，到北京来，说：“大姐，我来看看你。”田涛回来时正好我俩在屋里说话，男孩子见他回来站起来了，他又高又壮，一脚把人家踢到床上，拿着刀架在人家脖子上，狂吼着：“你跟于小霞干什么了，你们俩做那种事了没有？”人家吓得都哭了，我怕相互谁也不理智，会出人命，出了人命我也完了，我怎么回家，怎么跟人家父母交待？我就拿着一个水果刀架到自己脖子上，对田涛喊：“你要再动人家一下，今天先死的就是我。”他过来抢我的刀，我说：“你先放了人家。”男孩往外走，他不让走，我就用刀在脖子上划，他看见流血了，松了手，我对那孩子说：“你赶快跑吧！”人家男孩走，他又赶过去。我拿起手机报警，他害怕警察，让人家走了。男孩走了，他又跟我闹上了，打是肯定的，气得我就喝药，胡乱吃了好几种药，气急了眼了。一会儿胃里不行了，翻江倒海的，半夜里，他推我，看我不动了，吓坏了，把我送到医院，洗胃，抢救了一晚上。我在医院呆了一天，他把我接回去。我说：“我要离开你，我不能再在这间屋里呆了，我不在北京了，我要回家。”

他看我不原谅他，就用烟头烫自己，在胳膊上烫出一排泡，当着你的面烫肉，冒着烟，特别残忍。作为一个女人，逼着你看就挺残忍。我特别心疼他，又原谅了他。

从那以后，他更加肆无忌惮了，他知道你心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成了家常便饭。（我问她：“怎么打，是用拳头打吗？”她嘴角露出一丝苦笑，说：“那太小儿科了。”）打得太多了，拳打脚踢都不算什么了，很正常。他能打到后半夜，打一会儿，歇一会儿，打好几个小时。有一回，他去参加一个战友的婚礼，我一个人在家没什么事，就想出去逛逛街。下午2点多，刚走出来，他打手机，问：“你在哪呢？”我说去逛街。这就不高兴了，一会儿，他开车过来了，很平静，让我上车，看不出会发生什么。车开开，人越来越少，他开始问，为什么不在家等他，要一个人出去，他说我：“你心里没有我，要有我就哪儿都不能去，在家等着。”还说：“心里没我就出去勾引男人。”车开到石景山一个废钢厂，特别高的一个地方，他把自己的衬衣甩了，光着膀子，要把车从山上开下去，和我同归于尽。

这种事太多了，越讲越多。他发脾气就是打人，我求饶：“别打了，别打了！”他根本不听，打完了还说：“打习惯了。”有时正开着车，好好的就打上了。他拿针扎你，把胳膊拉过去，拿钉书机钉。有一次，他把我的脚绑上，手绑上，拿皮带打，不知道为什么打，他打你事先不说。打完了之后，拿皮大衣蒙住我的头，把我扔到了车上，他说：“你这种女人我不能要了，不听话，想干啥干啥。把你扔到八大处坟堆里去。”那是个冬天，特别冷，也是半夜，天特黑，他把我扔到一个坟堆里就走了。当时的心情非常不好描述，超出了害怕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特可耻可怜，特屈辱，我怎么落到这种人的手里？（她渐渐陷入到痛苦的回忆之中，叙述越来越困难，大口地喘气，长时间地沉默。）

他没有走多远，躲在一边看着我。我的手捆着，脚捆着，脑袋被蒙着，我能干什么？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又过来把我掂起来，扔到车上，带回来了。（小霞这时气短力弱，说话断断续续，人缩成一团，汗和泪一起往下流，面色变得灰白。她说，想起来我就浑身发软，让我回忆这些，我非常非常痛苦，你看我，现在又不好，好像又回到那种状态中了。）

他扔我不止一次。有一回，他说要把我卖给黑社会，他说他认识黑社会的人，把我的手脚捆上，嘴里塞上布，扔到后备箱里，我在里面拼命扳（挣扎），可能他怕警察听见，车开到苹果园，他又把我拉回来了。

他不会让我喊的，如果喊，他就拿枕头压着我，打死我我也不敢吭声，越喊打得越厉害。我们家对门住的也是一对年轻夫妻，他们肯定听见过我的叫声，但他们从来不管，他们没有开过一次门。我不是他的对手，还不了手。我没有报过警。

我不只一次地跑过，我坐着飞机跑，光坐飞机就跑过三次。我刚逃到家，第二天早上他准在你家门口站着，他坐头班飞机来追你。我们家都念过书，还不是不好的人家，我们家丢不起这个人。到今天，我父亲都不知道我经历的这些事，他还以为我在北京还不错。我内心里承受的东西，谁也不知道。我不能给家里丢人，只好跟着他回来。

他打我的惟一目的就是认为“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老婆越打越听话，自己的老婆就是要打，打得服服帖帖的，半个不字都没有，让往哪儿走往哪儿走。你要听他的话，不能顶嘴，他就是圣旨，至高无上。他是山东人，在他的概念里，打老婆没什么不对的。我说：“我去找你们领导。”他说：“我们领导是我老乡，他还打老婆哩，会管你的事？”我那时被他打麻木了，就想赶快让他死吧，离我远点儿吧。你说让我离开他？我根本就离不开

他，他说他去我们家，把我们家人全杀了。我害怕，我不能连累我们家人。我也不敢跟周围的人谈，怕人家笑话。到医院看病，对医生说了，下次再打他都会提起：“还有你这种人，自己家里打架，还跟外人说。”打得更厉害。他还盯我盯得紧。那一次我到山西采访，那时我在一家报社工作，也是北大老师介绍的，我刚到宾馆，他电话就打到楼层服务员那儿，问人家：“是一男一女吧。”人家说：“不是，就一个女的。”他说：“不对，是一男一女，你再去看看。”

我曾对他说过，两个人在一起呆烦了，我可以走，你别伤害我。你说他不爱你吧，上来劲可好了。有时候打完之后，给你买好吃的、买好衣服；打得太狠了，也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我心里想，和这个人经历过一些事，感情上有基础，存在着幻想。我想着怎么能不让他打我，我对他好，对他说好听的，从来不让他动手干活儿，想吃什么给他买什么，对他百依百顺，这些都起不了作用。

他对我的虐待我都承受下来了，那时候，快乐不在我身边。我的锁骨被他打断，现在还有裂缝，医院给我有鉴定书。他把我打得住过三次医院。他揪住我头发往墙上撞，打得我脑震荡。他拿烟头烫我的脸，我身上没有哪一天是不带伤的，太多了，身上的紫青下不去，胳膊上的去年才褪去。一年多了，我忍、忍、忍，积累下来，再也没有一点儿地方承受了，我的承受力到了极限。他最后一次打我，我再也不忍了。

惊恐逃离死亡地

1999年，别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他不让我和男的说话，他自己在外面找女人。我想，他赶快找个女人离开我吧。

2000年4月29日晚上，他很晚还没有回来，我打他的手机他也不接。那时他们公司给人家开空头支票，人家起诉了，法院

在找他们。我担心他出事，他不接电话我以为他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我就不停地打，其实他是和一个女的在一起。你说你告诉我说一声我不是就不打了吗，他嫌我打电话了，打搅他和女朋友吃饭了，一进门就打，打得特别的狠。我给他开门，他一脚踢到我心口上，把我从门口一下子踢到床上，当时我就小死过去了，没有呼吸了，特别难受。我是学医的，当时我心里还知道，我得保留那点儿真气。他冲上来，抓着我往起掂，我顺势把最底层的那一点儿气提起来，喘过来一口气，要不是学医的，那一脚就完了。他把我摔到地上，用皮带交叉着，使劲勒住我的脖子。这时候我明白了，他是想要我的命啊！我感觉到我面临死亡了，特别恐惧，真是死亡的恐惧。他打累了，歇手的工夫，我喘过气了，我不干了，这么久，我都忍让了，那一会儿，脑子一下子转过筋了，清楚了，就像那次喝酒似的，一下子明白了。我说：“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比不上跟你见一面的女人。”那一次，我还手了，以前没有还过手。他一脚把我踢到地上，拿脚踩住我的脸……像日本人一样，在地上拧……他穿着皮鞋，在地上来回拧……他拿酒瓶子砸我，酒瓶子都打碎了，他边打边说：“你不死我就不踏实。”那一次打得太狠啊，他真是想要我的命，他觉得我这个女人他得到了，他不想要了，他不能让你跟别人。这个话以前他说过，他求过好多次婚，我不同意，我说：“我不能想象跟你几十年。”他说：“你不跟我，我也不会让你跟别的男人。”他玩儿腻了，不能让你活着离开。那一晚，他给我的伤害从人格到心灵，我的自尊全部破碎了，我的心彻底碎了。

打够了，他歇了一会儿，然后把我从地上抓起来，扔到床上……撕光了我……就强奸……像畜生一样，我身上全是血。完了之后，他拿酒瓶子、扫帚把。往我下身里捅……

平时他也常有这样，把我绑起来，往下身捅东西。过性生活时，他总是把牙咬得格格响，特别可怕。

(小霞讲述这一段花了很大的气力，很长时间，她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讲。她缩在我女儿床上的一个角落里，好像在尽量地躲避着什么。她使劲抱住自己的双腿，下巴埋在膝盖里，声音颤抖，充满恐怖。汗，顺着她的脸往下流。我真是非常感谢她们，是这些受暴妇女慷慨的协助，贡献出她们真实的经历，才使我们可以记录这些在隐秘中发生的家庭暴力的真相。)

他折腾累了，睡了，那一晚，我眼睁睁地看着天一点一点地亮。

第二天早上，我洗干净身上的血，去了单位。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干了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打你白打，玩儿你白玩儿，谁也管不了。”我问他：“你道歉不？”他说：“我就是玩弄你了，现在就是不要你了，不道歉！”他就是成心欺侮你。我想到所受的所有屈辱，连句“对不起”他都不说。那时我手上还在出血，洗干净以后，我到派出所报警了。

派出所先让我做笔录，当时证据特别明显，我浑身是伤，脖子上皮带勒的印很明显。我下身出着血，出得厉害。警察又让我上医院，医生出有证明。警察给我找了个地方，让我住下。那时，我什么都顾不上了，他要把我全家都杀了，他威胁过我，我害怕，特别害怕。我说：“我今天找你们，需要勇气，找你们死我一个，不找你们，死我一家。你们如果不处理他，今天我就死在公安局门前，我没活路了，迟也是死，早也是死，让他再把我杀了？”

当时是2000年的“五一”节，警察把他抓走了，警察不知道地方，我领着警察去的。抓他时，他看着我，说：“我没想到你会告我。”后来他还说，他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没想到让我把他抓起来了。

把他抓起来后，有个女的老来找我，让我给他说明，把他放

了。他领导也帮他，他们都是山东人，一个鼻孔出气，向着他，认为打我是应该的，很正常。把他关了两个星期后，我又去把案撤了。当时我想，一是我以后也不跟他在一起了，算了；二是我觉得他是有病，是变态，是他以前女朋友留给他的；三是想他以前对我好过，对我有恩吧，一日夫妻百日恩，总得给他留条活路，真判他几年，出来什么他也没有了。他当时写了保证书，不再找我麻烦了，我就放了他一马，于人于己，我都做到位了。他也会成熟，他有一天会回过头想想这样做对不对。

警察审他，他打我的所有事情他都承认，警察对他也不客气，让他吃了点儿苦头，警察说：“你折磨一个女孩子1年多，这才几个小时，你就受不了了？”放他的时候很麻烦，找了3个人担保，我还签了字，才放了他。警察说：“以后于小霞再说你找她的麻烦了，立刻就抓起你来。”

跟他分开后，我天天做噩梦，一闭眼就是噩梦，梦见他打我，我能哭醒了，醒来浑身是汗，满脸是泪。那个时候我不敢见光，晚上也怕，白天也怕，白天都不敢拉窗帘，晚上不敢睡，心理上有种障碍，那时，如果我不给你打电话，如果不是你帮助我，我会疯的，我已经感觉到了。（小霞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数次半夜给我打电话，声音里充满惊恐，我们长时间的交谈后，她会放松一些，这时，她总是说：“宋老师，你睡吧，哎！我又要睁着眼到天亮了。”）

太可怕了，谁都想象不到，真是地狱一般！我一见他就哆嗦，根本不能见他。那一段时间，一见白色桑塔纳，连家都不敢回，浑身发软，控制不了自己，那种感觉非常痛苦。我说：“你这车是魔鬼车，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再坐。”在三环路上开着开着，往桥上撞，弄不好就下去了，这样的事，太多了！那时我的精神压力非常大，都快疯了。今天中午咱们看的那个电视，女的把男

的杀了，我也想把他杀了，然后我自杀，都不让警察抓着我。他对待我的重要的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这个痛苦要伴随我一辈子，我的每一寸肌肤都是痛的，我心里有消不掉的阴影。

撤了案子一个多月后，我还是想告他，我觉得我受的屈辱、我受的罪，太可怕了。我一定要告倒他，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犯下的罪过，知道他是怎样伤害别人的。

(2000年8月，于小霞再次给我打电话，她说她想告他，让我帮助她。我向她推荐了北大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并帮她联系好了律师。8月中旬的一天，我俩约会下午1点半见面，我带她到北大法律服务中心。8月的骄阳似火，正午的气温正高，我按照约会的时间地点等她。小霞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我觉得她一身阴冷，寒气逼人。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她穿一件深蓝色羊绒高领半袖衫，脸色灰白，她用手遮着脸，好像很不适应强烈的阳光。坐上车她告诉我，她昨晚又是一夜未睡。由于小霞自己撤了案，重新立案有一些难度，但北大妇女法律服务中心还是答应帮助她，并约她有时间再来。但是，她那天一走，就再没有去，也没有和我联系。直到2001年5月，我才又一次接到她的电话。)

我回内蒙古了。当我打消不再告他的念头时，我考虑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今年才回来。回去之后，很多事情已经改变，工作也没了，该失去的都失去了，我是彻底的一贫如洗，从精神，到经济，我回来反复想，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我要活得比任何人都坚强。

现在，我在一个公司里做公关，有一个男孩对我不错，但是我有障碍。有一个晚上他约我出去，我们俩坐在一个小土坡上，天有点儿黑，突然，我想了他，想起来他把我扔在坟地里，我一下子又回到过去的状态里了，浑身哆嗦，出汗，什么也听不见

了。他看我挺奇怪，问我：“你怎么了？”我没敢告他说。现在，我还是怕田涛找着我。他确实找过我，我们家搬家了，他找不着了，他打过几次电话，我爸说我在北京，他不敢去我们家，他怕警察。

（这时，小霞双手抱膝，自言自语似的说了这么一句话：“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打我的人，也再找不到像他那样爱我的人了。”）

后记：这次访谈后，于小霞又到单位看过我两次，那时，她在一家电视台工作，并兼职一家公司的对外宣传工作。她开始有了笑容，事业上也有了转机，我以为她会逐渐好起来。但是，2002年底，在好久没有接到她的电话之后，我打电话给她，她的手机停了，原工作单位说她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

我不断地打她的手机，希望听到她的声音，但电话里总是话务员机械的告知：“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关机。”不禁我心生牵挂。

点评：

发现所爱之人有施暴特征，要快快离开

陈 敏

于小霞受过大学教育，而且精明强干，她完全能够在受暴的初期结束与田涛的同居关系，从而摆脱暴力。但她又为什么能长时间忍受田涛对她的全身心的摧残呢？这里面除了对家庭暴力知识的缺乏了解外，与她个人对爱情和暴力的误解也不无关系——

误区一：她认为，田涛在两人恋爱期间表现出来的霸道是因为爱她。如：田涛在认识她几天后就固执地要跟她回家，半夜三更突然到她家、以跳楼自杀相求，等等。她没有认识到田涛的这

种行为是对她的不尊重，是全面控制她的开始。

误区二：她认为田涛打她、伤她、要与她同归于尽，甚至自伤，都是因为爱她的缘故。她甚至感叹“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打我的人，也再找不到像他那样爱我的人了”。其实她大错特错了。田涛打她并不是因为爱她，而是因为一种病态的控制欲。如果田涛对她有一点点爱，就不会因为她在他与新交的女友在一起时给他打电话而将她往死里打，更不会在寒冷的冬夜把她扔到坟堆里了。田涛自己不是也说“打你白打，玩儿你白玩儿”，“不道歉”吗？本书另一位被访者易安女士说得好：“一个男人到了打一个女人程度，就已经没有爱可言了。”

误区三：她认为自己受暴是件丢人的事，不能告诉别人，更不能让家人知道，这使得她始终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而使田涛有恃无恐，暴力不断升级。

如果于小霞能在发现田涛有暴力倾向时就下决心离开他，今天就不会一见田涛就浑身哆嗦，一见到白色的车就异常难受（田涛开的是一辆白色桑塔纳），天天晚上做挨打的噩梦，心灵的阴影抹不掉，也无法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不能责怪于小霞，因为我们的社会没有给我们提供过这方面的教育。但是我们可以从她的遭遇中吸取教训，在暴力发生的开始阶段，应尽快离开施暴者而决不要被其道歉和央求所迷惑，因为施暴者的道歉和央求，就是他控制受暴女性的手段之一。

14. 最终还是了断了一切

叙述人 李小云
访谈人 郑荣昌
访谈时间 2001年5月18日
访谈地点 上海市九钢大酒店
录音整理 郑荣昌
文稿编辑 宋美娅

李小云是一个很有修养、性格也很硬朗的上海女性。她36岁，受过高等教育，有比较好的工作岗位，是上海一家酒店里的财务人员。她的婚姻基础也很好，她的丈夫为什么还会动不动就打她呢，原本良好的夫妻关系是怎样发生变异的呢？

糊里糊涂的爱

我叫李小云，上海市人，今年36岁。1989年，我从职业高中毕业，来到一家搪瓷厂当工人。当工人很辛苦，工资也低。直到这时候，我才认识到好好读书的重要性。我希望通过再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人地址的信。打开一看，竟是一封情书，是同事王家成写来的。王家成和我同车间，他个头虽高，但貌不惊人。我们连话都很少说，更别说有什么交情了，他写这封信委实让我吃惊。

下午，他给我打来电话，邀我晚饭后出去一下，说有要紧事

商量。晚上我去了，一见面，我就把信还给他。我说我还小，还想读书，不想过早谈恋爱。他当时很尴尬，说我不接受他，可以把信烧掉，不必退还。为照顾他的面子，我把信留下了。

此后，他老是给我写信，打电话。无奈中，我跟他出去过几次，但我没有给他希望。父母也都不同意我和他交朋友。

后来，主管部门规定职工晋级必须有高中以上文凭。社会上办起了高中补习班，凡是进补习班并通过相关考试者，可获得高中文凭。是他首先想到去补习的，也是他邀我报的名。走得远，我们都录取了，还编在同一个班。厂里认为我们好学上进，还奖给我们每人10元钱，在车间大门上贴了大红喜报。

在频繁的接触中，我对他产生了好感。拿到高中文凭后，他又鼓励我上轻工局办的大专。那是带薪全脱产的，学制3年，单位限制报名人数。他对我说，为保证我去，他不报名，我太感动了。结果，我报上了名，通过了入学考试，圆了多年的大学梦。

读书期间，我接受了他更多的照顾，如帮我查资料、给我送食品等。那时，正是我命运的转折关头，我接受了他。得知我俩的关系之后，和我较好的同事说：“李小云，王家成刚愎自用，是个很难缠的家伙，你和他是过不到一块儿去的。”我的女同学也要给我介绍别的男朋友，她们说：“李小云，别忘记你的身份，你是大学生，他还是个工人，他配吗？”看到未来的婆婆套在我手上的金戒指，他们还开玩笑说：“你被套牢了！”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傻子。我不相信同事的话，对同学的话也不以为然——我想，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只要这个人聪明好学，我自己就是个例子，我觉得她们太世俗了。

他的命运果然发生了变化——在我读大学的第二年，他通过难度很大的考试，成了一名受人尊重、待遇好又有实权的公安人员。

大学毕业，我回到原来那家搪瓷厂当管理人员。第二年，我

们就在凤阳路租了间房子结婚了。

问：你们有很好的婚姻基础，因为你们谈了6年恋爱，还经受了許多考验。可是，你们的婚姻还是触礁了。你说，王家成后来暴露的这些缺点，是他本来就有的还是后来滋长的？

李小云：（思考片刻）本来就有这些缺点，只是婚前不容易看清。读大学的3年我是远距离看他的。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本来就有这些缺点。那是我读大学的第三年，他当着我的面和他的父母吵过一架，在争吵中，他居然用很难听的话辱骂他的父亲，还当胸打了他一拳。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尽管和我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时，我的感觉很不好：这样的人能做我的丈夫吗？他对父母都这样，对我还能怎么样？因此，一连好几天我没理他。等他弄清楚了我不理他的原因，拼命向我认错，这种感觉又改变了。

婚后他就变

我怀孕3个月的一天，王家成第一次动手打我，还踢我的肚子。孩子要不是命大，早被他踢死了，我们的婚姻也早完了。

事情还要从即将结婚时说起。那时，我父亲坚持要双方父母见面。王家成不同意，还说：“结婚是我俩的事，要他们见面干什么！”父亲得知王家成的态度，非常气恼，不肯给我户口簿。你知道，不拿户口簿是不能办结婚登记的。王家成迫于无奈，做出让步。从这时起，他就记恨我父亲了。

这天下班，他心情不错，做了好几个菜，还买了两瓶啤酒，要我和他对饮。我本来不喝酒，这天，为了凑他的兴，我破了例，喝着喝着，他就忘乎所以，问我：“你爸你姑对你有这么好吗？”我违心地说：“没有。”他得寸进尺，又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凡事都向着他们？你和你爸一样，都是寿头（傻瓜）！”

我气了，正色道：“你骂我就行了，作啥骂我阿爸？”但他不

但不知错，反而说：“我就骂！”我吼道：“你敢再骂！”他果真又骂。我气得没办法，狠狠推了他一把。他突然站起来对我拳脚相加，还故意朝我肚子上踢。我被他打得浑身疼痛，心里却是一阵冰凉。

我哭着走出屋。本想到浦东父母那里去，到了外滩又变了主意。我想，不开心的事，还是不要让父母知道！于是，我挺着个大肚子，独自在外滩徘徊。看着江边一对对的情侣，想着自己的不幸，有那么一会儿，我真想跳进滔滔的江水，一了百了。

孩子出生不久，他再次打我。原因还是那么微不足道——他一边做饭，一边和邻居聊天（在公用厨房里），直到8点多钟才做好晚饭，我说了他，也没说重，只是说：“吃了饭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做饭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聊天？”就为这，他把饭桌都掀翻了，怒骂不止。见邻居来劝，他像“人来疯”一样，骂得更欢，骂着骂着，还动起了手，我被他打得一脸乌青。

打过之后，他余怒未消，又把结婚证、结婚照还有我们谈恋爱时写的信都撕了。结婚证后来补办了，结婚照也在搬新居的时候翻拍了，最可惜的是那些无法复原的信，这是我最珍惜的东西。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他怎么会疯狂到把它都撕掉！

1995年，我们为房子的事弄得不开心。有一天，他又找茬打我——

那年夏天，政府决定拆除我父母的房子，补偿他们一套房间。我和孩子的户口在父母那儿，按规定也可以获得补偿。我和孩子的补偿面积可以是单独的一个小套，也可并入父母的补偿面积成为大套。但补偿的房子在浦东，那里刚好没有小套，而我们小家庭已经搬进王家成单位分的房间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让父母要了大套——一来让他们住得宽敞些，二来我们回娘家也有地方住。

事前，我把这个想法对王家成说了，他表示同意。没想到，

事后他反悔了，还说原先他就是不情愿的。为这事，他老是拐弯抹角地“敲打”我。我一直没有搭理他。

那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他坐在沙发上抽烟，态度很反常，见了我也不说话，电风扇开最大档，烟灰吹了一地。我说：“把电风扇调小点，烟灰吹了一地你没看见吗？”他纹丝不动，我就自己把它调小了。他“呼”地站起来，揪住我的头发大打出手。一边打一边说：“你也太不把我看在眼里了！”

我被他打懵了。过了好久，才想起打“110”。后来发现，我的脸上，身上全是乌青，头发也被扯掉一大片。我的腰也受了伤，便血，“CT”做出来居然是两个加号。

问：他为什么为很小的事，甚至不为什么事一再打你？

李小云：这个问题，我也想不明白。

问：是不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你，一心要制服你，还要让别人知道他是能制服你？

李小云：（思考片刻）好像是。他总是防着我，每搬到一个新的住处，他总是叮嘱我不要串门，不要和邻居说话。读大学的时候，他老是给我送食品，送其他生活用品，下雨天还给我送伞，现在看起来，他把我盯得也是够牢的了。

问：他打了你这么多次，你们之间还有感情吗？

李小云：好像还有，每次打完我，他总是向我道歉，说他就是脾气不好，以后一定改。为此，他向我下过跪，写过保证书。

离婚，一步三回头

1997年，他当上了刑警。从此，经常有人请他吃饭，搓麻将，泡歌舞厅。他的穿着也讲究起来，花钱手脚也大起来了。也是越来越骄傲了，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打我的次数也增加了。有时候，他还以搓麻将为名通宵不回家。顺带说明，我们家是他当家，他赚多少钱，家中攒了多少钱，我一概不知。

这时有人提醒我：“王家成会不会在外面有女人了？”连他的母亲也提醒我：“把阿成看紧点儿。”可我总是不上心。直到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写给他的情书和一张旅店的发票，我还认为这是逢场作戏，而不是移情别恋。

这两年里，他接连两次带着我和孩子去普陀山旅游。第一次游普陀山，开始玩儿得还不错，最后他还是翻了脸。那天，我们上了一辆长途汽车。按照惯例，我们没买孩子的票。但车上人少，孩子占了一个座。中途“呼啦”上来很多人，售票员要我们把孩子抱在手上，位子让给买票的乘客。王家成不干，和司乘人员大吵。为了息事宁人，我给孩子补了一张票。王家成说我吃里扒外，把攻击的矛头转向我。为这事，好长时间我们谁都不理谁。

那个女人的情书和旅店的发票，就是第一次游普陀山回来不久发现的。

第二年夏天，王家成又邀我去普陀山。我没好气地说：“我不想和你到外面去吵架！”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跟他去了。

这次出游，给我的感觉更糟糕：他一会儿撇下孩子，把我拉到夜幕下的树丛里亲热，像是重温旧梦；一会儿又为寄存行李的事对我发威；一会儿叫昂贵的菜让我吃，还说“我有的是钱”，好像我们不是一家人似的；一会儿又为买螃蟹的事和饭店老板动刀动枪，把我和女儿吓得半死。

正是在这次出游中——严格地说是螃蟹事件发生后，我第一次想到了离婚。往事历历在目。我想，怎么能和这样的人生活一辈子，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能不吵架打架吗？此念一出，我的心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平静，好像接受了神的启示。最后一晚，趁双方心情都还好，我非常平静地谈了我的想法。谈完之后，我很快就睡觉了。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一夜无眠。

回家后，我们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整夜整夜不回

家。在这期间，我病了，病得很厉害。我的病还没有好，孩子又病了。他不回家，也没有给我们留下钱。我呼过他，要他回来照顾孩子，他没理我。

1988年11月的一天晚上，在我再三的要求下，他和我在一家茶坊见面。他说出了那个女人，还介绍了她的情况。他说他愿意给我7万元和我离婚，孩子跟谁都行。谈话间，那个女人呼了他好几次。大约11点钟，他终于坐不住了。

他走后，我破天荒买了包烟，坐在那里猛抽。烟往天花板上飘，我的心却在往下坠。伤心之余，我还异常吃惊地发现——我还在等他，等他重新回到刚才坐的座位上。这是一次极其漫长而又极其无望的等待。午夜两点，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回了家。

问：你是不是没有下定离婚的决心？

李小云：从理智上讲，我是下定决心的，我知道和他离婚是一件好事。可是，从感情上讲，我似乎又没有下定决心——他只要稍稍做出一点和解的表示，我肯定会改变主意，是不是太没有出息了？我确实是很难下离婚的决心（有些害羞）。有一次，女儿刚去学校，又返回家中，抱着我号啕大哭：“妈妈，我不希望你们离婚，你答应我好吗？”我伤心极了，违心地说：“不是妈妈要离婚，是你爸要离。你可以求你爷爷奶奶，他们或许可以让他回心转意。”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尊。

最终还是了断了一切

我们的关系彻底冷却了。虽然我们还在等待，但已经不是等待和好。

他更少回家了，即使回家也睡在沙发上，到了这时候，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在乎的是——他已经很长时间不给我钱了，我的工资只有800元，养不活两个人，何况孩子还在学手风琴。他还放出风来，说离婚的时候不会给我一分钱。

1999年5月，我实在太困难了，就到他的单位要钱。他不理我，在场的领导也不肯扣他工资。我抓过他的包。从里面拿出1000元，对他们说：“看好，我拿了1000元，这是孩子的抚养费。”说完扭头就走。回家后，他又把我打得浑身是伤。我告到妇联。

妇联干部虽然表示同情，但爱莫能助。我告到他单位，单位还是没有采取得力措施。6月9日，我正式起诉离婚。

11月29日，法院做出判决，内容大致是：（1）准予两人离婚；（2）孩子归我抚养，他月付450元抚养费；（3）他单位分的房子归他，他补给我15000元；（4）家具等生活用品归我；（5）家庭积蓄查无分文。我认为法院在财产问题上调查不力，判决不公，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2000年4月，法院下达了终审判决书，基本上维持原判，只是将抚养费增加到540元。

终审判决前，也就是1999年12月26日，他再次找上门来，说我到处坏他名声，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一通。我把他的手推开，他一拳打过来。我要报警，他抓住我的头发不放，更加凶狠地打我，还不许邻居干预。他用拳头猛击我脸部，造成鼻梁骨粉碎性骨折，据上海医科大学鉴定已构成轻伤。因投诉无门，我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000年2月7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下达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这个判决书虽然判决王家成犯了故意伤害罪，但不给予刑事处罚，民事部分只赔偿医疗费、鉴定费等3906元，不赔护理费、整容费和精神损失费。我不服，又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0年5月，我接受了法院主持的调解，得到他10000元的赔偿金。

我的这段婚姻就是这样结束了。

点评：

曾相爱的婚姻也会出现暴力

宋美娅

李小云和王家成是经过自由恋爱结婚的，他们的婚姻基础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当我们听到一起家庭暴力的事件时，习惯上会想：他们的婚姻基础怎么样？是不是夫妻俩关系不好？一般人会认为，只有那些关系不好的夫妻才会打。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曾在所做的家庭暴力调查中做过统计，结果发现，婚后是不是发生暴力，与婚前的感情基础好不好并没有显示出必然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婚前两人互相爱慕的，婚后照样有可能发生暴力。如果留心的话，你在本书的其他案例中也能看到这个现象。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现象：第一，家庭暴力产生的根源，是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和文化机制，暴力是男女间的一种权力关系的表现，即使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夫妻，也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婚前的感情并不能彻底改变现行的两性关系；第二，我们对爱的感受不一定准确，比如，有些男人限制妻子或女友与其他人交往，很多女性把这种行为错以为是爱，理解为是在意自己，其实，这不是爱，而是占有或控制，是一种很危险的表现，这种占有或控制本身就含有暴力倾向。还有的人在恋爱时表现出过度依恋女友，宣称没有她就不能活，不顾对方的感受，一说分手就恐慌或要自杀。这也是占有与控制的一种表现，是暴力的表现，但痴情的青年女性往往难以把爱与这种暴力倾向区分开来。李小云的同事在她婚前曾劝她，说王“刚愎自用”，这样的

评价想来是有依据的，可惜没有引起李的重视。另外，爱情是一种容易变动的感情，有些时候，爱是会转化的。

在李小云这个个案中，还有一点应该提到，就是本案例再次证明，女人受暴并不都是因为不自立、窝囊。本案的访问者强调李小云性格“非常硬朗”，好学上进，王可能在总体素质上还不如李好。我们在研究家庭暴力时发现，施暴的男性往往有较差的自尊感。男性总是希望自己有更高的权力、更有效的控制力，如果个人的实际能力达不到这个期望，这个时候男人会用暴力来显示或是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我们会在许多案例里印证这个观点。

15. 房子与尊严

叙述人 吴明
访谈人 丁宁
访谈时间 2001年7月31日
访谈地点 北京某医院
录音整理 丁宁
文稿编辑 宋美娅

吴明，53岁，文化程度初中。她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医生，她遭受家庭暴力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因为房子引起的，但是在房子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性别不平等才是她受暴的根本原因。

问：你能否先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经历？

当然可以。我出生在一个有8个孩子的平民家庭，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我们家7个女孩，1个男孩。我哥是老五。我们家住在铁路边上，生活不富裕，我们几个孩子小的时候每天都要先捡煤核，再去上学。家里一年四季都没买过煤。我穿的衣服多是姐姐们穿剩的。我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上天安门，要衣服比较好的同学去，就没让我去。那时我一个星期写一份入团申请书，每天帮班里打扫卫生，早来晚走。第二批就让我入团了。我是我们班团支部书记。

我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在那儿干了8年。在东北的时候，因为我干得不错，仅仅两年就让我

当上了卫生员。我曾经接生了 150 多个孩子。那儿的人都对我挺好的。1975 年回的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开始我没有工作，只能干临时工作，给人家拆军衣。1977 年我到一家医院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问：你和你丈夫是如何相识结婚的？

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实在说，我们的仓促结婚，与我的错误想法有关，我也不怪别人。我丈夫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在东北的时候，我比较单纯，没太想恋爱这方面的事。回北京之后，我觉得工作不安定，没法子考虑个人问题。而等一切安定下来，我也快 30 岁了。说实在的，我一生都苦在没房上。我从东北回来之后，住在家里。我没地方住，只能住厨房。到医院上班前后的一段时间，我搬到了我舅舅家住。我当时特别看不惯我哥。我看我三姐、三姐夫回京探亲，我三姐夫特勤快，他有时还给我们家挑水。而我哥什么也不干，就在外边下棋。我看不惯，就说了一句：“瞧我三姐夫是客人还干，妈，您瞧您儿子就知道下棋。”我妈一听就不干了，她嫌我数落我哥了，她说：“我不活了。”弄得我根本不敢说我哥。我哥也知道我嫌他，就对我特别不好。我哥跟我打架，能拿刀追到我舅舅家去。那天正好我舅舅在家，我舅舅把他给推了出去，这样架才没打起来。从那以后我就不理他，躲着他。我到医院工作两个月后，我就住到了单位，住在我们下属的居委会。那会儿，我一个人住在那儿，怕人家说我闲言碎语，所以，一经人介绍男朋友，两三个月就和他结婚了，没怎么谈恋爱。

问：你们夫妻之间感情基础好吗？

实在谈不上。我当时觉得只要他不抽烟、不喝酒，有房就行了。况且那会儿我没地方住，他们单位有集体宿舍，他可以有一

间房。我想一结婚我也就有一个安身之处了，所以我就结婚了。结婚以后，我发现我和他两个人差异挺大的，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我就想离婚，可是离了婚我能往哪儿走啊，我没处走。他的家在农村，他一身大男子主义，在家什么活儿都不干，总想找一个人来伺候他。下班以后不是下棋，就是打扑克。孩子从小都是我一个人管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不能离，跟着我也没地方住，太受罪。他又不爱说话，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交流，离婚之前，我们实际已经分居5年了。我们之间已经无言了。

问：你们为什么分居？是不是他打你骂你？

那倒不是。我们之间主要是冷战。我刚结婚不久就知道我嫁错人了。我和他很不对脾气。他这个人特别抠，用水不让开水龙头，让水管子一滴一滴地漏，买菜都买处理的，一块钱买三捆菜，没法吃，把菜帮劈下来，坏了还把菜腌上，最后全倒了。家具坏了也不让扔。孩子要吃一根冰棍，他都不给买。这些还是小事。

我们分居的导火索是因为他患了肝炎。1989年，我们单位体检，我查出有澳抗阳性。我赶紧带孩子去查，一查没事儿。当时我面临着下岗的危险，我是医生，我有病就不能在岗位上呆着。我让丈夫也去检查一下，他说什么都不去。我觉得在家里一点温暖也没有，但我自己心态调整得还不错，后来搞精神卫生，还在肝炎科工作过，工作也开展得挺好的。

在夫妻生活上，我不干了，拒绝和他过性生活。我提出离婚，他说不能离，单位要分房。他托人又找这个又找那个，我说不离就不离吧。分完房就好好过吧，不行，还是过不到一块儿。分房后不久，他们单位体检，证明他的确有肝炎，而且是慢性的，挺重的。这样，我们从1989年到1999年，整整拖了10年。这10年中，我们各过各的，经济上他一人过一个人的，也不给

我们钱。1994年，他们单位分房，要交一些定金，一共交5000元，后来还要交13480元。我想一次付清，他一定要分3年付。第一年我出了一半。后来他就不要我的钱了，但是孩子他不管。我儿子上学的钱全是我的。我儿子上中专，我借了6280元，最后我自己慢慢还。他说九年义务教育，大学是少数人上的，有钱上，没钱别上。我想让儿子上学，我觉得脑瓜一满，腰包就满了。我觉得人应该读书，男人要有事业，要有家庭，要有文化。他想让儿子上班，养着他。他说：“儿子到了18岁，我养不着。”他连150元的抚养费都不肯出，为了不给抚养费，他还写了上诉状给法院，法院对他的要求驳回。现在别人家的家长两个人一起为孩子着急，可是我们家，他为孩子着过一份急没有？我们想不到一块儿，相互之间也没有什么话，真正动起手来，是离婚之后的事。

说起来还是因为房子。离婚后我前夫轰了我好多回，说这房是他的，让我们走。我儿子上中专之后就劝我，何必要这样过，离了算了。我对儿子说：“如果要离，我有个要求，我要你一定考上大学，否则离婚就没有太大价值。”孩子也真争气，的确就考上了。他帮我写了起诉书，法院判我们离婚。

婚是离了，但是房子分不开。我们一共两间，一个单元，是用我们两人的工龄买的。法院判给我一间，判给他一间。儿子跟我。孩子已经大了，我们娘儿俩没法睡在一起，我只好睡过道。我前夫老去把我床掀了。离婚以后因为我们还在一个房檐下生活，经常发生摩擦，我前后叫了6次“110”了。

离婚以后15天，判决书生效。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什么都不让我们用。我又第二次找法院，法院又给我们判了一回。刚离婚他就什么都不让我们用，孩子军训回来，洗不成澡，他又把洗衣机锁了，不让我们用。我就拿着存折去把热水器和洗衣机给买回来了。刚买回来不久，他就把电给我们卡了。他嫌我

们用电多，不肯掏电费。我一生气，我跟儿子说，咱们起诉他吧，跟他要抚养费。他说，孩子超过了18岁，不是义务教育，他可以不管。中级法院又给我们判一回，让他每月付孩子150元生活费。他也没给，我也没要。可他竟把水和电给我们断了。7月10日，正赶上孩子期末考试，考试10天，第一天就把厨房上了锁。天又热，我们没水没电，甚至3个月喝不上一口热水。我去敲他的门，我让他把锁给打开。他不打。他说：“这是我的房，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去找他们厂长，厂长让我去找法院，法院让我去执行庭，执行庭说：“你想让我们去给你撬锁，这得一个多月。”我儿子说：“妈，咱们自己撬。”我们白天把锁撬开，他晚上又把总闸给锁上了。我们又把总闸给撬了。

水电有了，他又把煤气管道上锁，水管子绑上不让我们用，不让我们娘儿俩做饭。我上街买了电饭煲、电炒锅。没想到孩子一洗澡，电表全烧了。冰箱里的东西都化了。怎么办？孩子说：“妈，咱们上大姨家吧？”我一想，孩子第二天要考试，我赶紧带他去了他大姨家。没想到，他大姨家停电。我们又赶紧返回来。谁知我连急带累一下子肠梗阻，病倒了，住了院。孩子就在我的病房里复习功课。那个学期考试，他一下子三门功课不及格，要补考，考不过去就得降级。我真是窝火极了，要知道大学五门功课不及格就毕不了业。我对儿子说，没关系的，不是你不够努力，是咱们家条件不好。你就是降级，你妈也供着你。这样的日子竟然持续了3个月，我们只好天天到外面去买方便食品来吃。我们找来电工，他把电工给轰走。没辙，我只好带儿子回去，把煤气的锁给撬开了。9月14日才达成协议，水电费各半。

10月二十几号，我前夫带了一个女人和一个16岁的姑娘回来住。11月初，他们领了结婚证。从去年11月份到今年3月份，就不知道和我们打架打多少回。不但骂，还动手打，天天打架，没一天不打架的。他早晨4点就送那个闺女出去，送完姑娘，送

媳妇，而我要8点才上班，早晨吵得我没法休息。而且，他们把我们那屋惟一的窗户用鱼缸和花盆给堵上了，我们根本无法打开。我一生气，把鱼缸、花盆给砸了。我们有个书柜放在厨房，他给搬出来，把他们的柜子给放进去，这样我就没得用了。我把柜子里的碗砸碎了，他们打电话叫来了“110”。来了6个警察，他们说，你们这事我们解决不了，叫我去找妇联。他们就走了。

前夫的意思是：“我结婚了，你就得给我腾房。”我说：“这不可能，这是我和儿子三个人分的房，这里永远有我一半。”

第二次，我前夫说他带回家的女人开不开门了，所以把锁换了。换了锁，不给我和儿子钥匙，我们进不去家。我在外边冻了半个多小时，直喘。儿子一生气，“咚咚”用脚把门踹了。他们叫来了“110”。还有一次，因为我冲（洗）空调外机，那个女孩就说我把水弄到他们那边了，又是给我照相，又是录音。我和他们论理，前夫举起墩布就朝我扎来。儿子上前护着我，和他爸打起来。那个女的出来骂人，我儿子上前论理，爸爸把儿子打了，脖子抓的都是红道，颈部软组织受伤。警察给我们开的单子，我带儿子去人民医院看了病。诊断证明还在我手里。那次是那个姑娘打电话叫来了“110”。

因为上厕所，因为用水，因为一语不和，都会冲突起来。一次一次地叫“110”，现在他们暂时搬进了一间平房，不知冬天到了，噩梦还会不会来？

我曾经四处求助。我找他们单位，希望能把这房换开，单位不管。找派出所，派出所说这事我们解决不了，你去找妇联。我找妇联，妇联说这事你得找法院。没办法，我只好把他告上了法院。为了睡觉安全，我想在过道加一下封，但是法院没答应；我想在晾台晾晒衣服，法院也没答应。这回我告到中级法院，1月份告的，现在8月份了，法院还没理我呢。

我想买房，但是银行不给50岁以上的人贷款。我当然也想

过回娘家住。我知道这样住在一起，双方都十分尴尬。假如我能有办法，我早就搬出去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了。但是可悲的是，娘家我也回不去。几年前我花钱翻修了我父亲的房子，因为当时房子已经破旧不堪。我想我的兄弟姐妹都有了自己的住房。如我实在过不去，我就回老父亲家，和他老人家生活在一起。可是没想到，为了房子的事，我哥哥居然打了我四五次。

我的父母一共生了8个孩子，7个女孩儿，只有1个是男孩儿。我哥哥从小就受溺爱，在家中从来不干活儿。他要“人人为我，我还得为我”。他是一个小学教师，特别贪财。比如学校组织学生春游，他按门票面额收钱，但是买集体票，多出来的钱他就自己要了。我母亲是1978年去世的，我妈去世以后，我哥发展到动手打我父亲、打我、打我三姐的程度。

我父亲是一个很节俭的老头儿，平时什么钱都舍不得花，有时还捡破烂。但有一点钱就给他孙子。孙子每次来，不给钱不走，连我哥都是一样，跟我爸要钱上馆子吃饭、喝酒，钱不够还要。我哥的儿子考上技校，他骗我父亲说考上了大学，我父亲把仅有的15000块钱给了他。我爸爸认为儿子是自己的，孙子也是自己的。1998年二三月份，我父亲生病住院。他把我爸的存折、工资卡、户口本、房产证都拿走了。我爸手上连一分钱也没有，向我哥借5000块钱，说以后有了钱再还给他，他居然不借。还说：“钱就在这儿，就不给你花。”他还用我父亲的口吻写信给我其他的姐姐要钱，说我父亲得了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要买进口药，让她们寄钱来。还说让我们掏钱把我爸送敬老院。

1999年，我哥得了癌症，做了手术。他跟我二姐说要打进口针，一针280元。我二姐给他寄了5000块钱来。而他收到钱以后，就打了一针。我二姐觉得被他欺骗了。我父亲要出院，我和妹妹赶紧给他收拾房子，发现房子漏，我就赶紧拿出钱来给父亲翻盖房。木料什么的都是我花的钱。没想到，我哥知道了以

后，认为我跟他抢房了。他赶过来，上手就打我。当时房子才盖了一半，他过来就骂人，上来就踩我脚，把我脚都踩肿了，还扇我耳光。我父亲上前制止他，对他说：“都是我的儿女，你这是干嘛？你把她打伤了，法院要管的。”他就说：“你甭管，要管你就是老王八蛋。”我父亲让我上法院告他去，可我心里清楚，真要是告了他，我父亲未必肯出庭给我作证，他会认为儿子就是儿子。

第二次打我，原因是因为要查户口，我向我哥把房本要过来了。我对我父亲说：“您的工资卡不应该再在我哥手里，这次生病就是个教训。”我爸出院以后，我把工资卡也向我哥要了过来，要回来发现上面少了八九百块钱。我是1999年8月份离的婚，我哥知道我离婚以后，不但骂我，还骂我爸。第二次打我，是1999年9月份的事。当时我正在那间盖的房子里看电视，他在屋子外面就骂，并要冲进屋子里和我打架，让街坊给拉开了。他简直疯了，把我爸按到床上，把所有的电线都拉了。他把我屋子前面放一辆三轮车，不让我进出。

第三次是在1999年10月20日，我回到我爸爸这儿，看看我爸生上火没有，我想来给我爸弄烟囱。那天我刚进房间，他就追进来，拿来一块砖头砸在我腿上。他嫌我不但盖房，还把房出租出去。其实，刚盖完房，我爸就要锁门。这房湿乎乎的，还不透了？让人家住，好让房干一干。我哥来找我打架，要打死我！说我就不该离婚。我爸气得骂他是“马蜂儿子！捣乱分子”！后来他来住，我爸就轰他，说你户口不在这儿，你不能在这儿住。他总是赖到半夜才走。我气得去找派出所，派出所说他们管不了，他们说：“等你父亲死后，你们上法院去裁决吧。”

为了避免发生冲突，我很少回我父亲家。我爸是2000年5月22日死的。23日我哥就把他的东西搬到我爸屋里，把我的冰箱也拿去使了。外面我盖的三间房他把锁打开，又租给了别人。

他第四次打我是2000年10月份，人口普查的时候。我想回去拿一个电暖气，因为当时我很困难。我和我儿子一起去的。我们到了那儿，他和他儿子从屋里追出100多米。我说：“我不是来打架的，我是回来取东西。”我还约了我妹妹一起陪我回去，没想到他不撒手，他20多岁的儿子也追了出来。我赶快往外跑。他举起拐棍朝我打来，边抡边说要打死我儿子，要宰了我。我只好紧紧抓住他的拐棍，僵持了半个小时，邻居韩二哥过来给拉开，我和儿子才离开。

今年，我前夫结婚了，他带着媳妇去找我哥，他们联合起来，弄得这边想轰我，那边也想轰我，让我没处呆。我没办法，只好起诉告了我哥。我爸死后，我姐说房主改成我的名。我哥想独吞这套房，其实我们8个人都有份。我离婚了，不能没地方住，就先写我的名儿。其实我哥石景山有房，宣武区也有房，他完全可以不住这儿。可他非想独吞我父亲这套房不可。法院判了，8个人一人一份，让他走。他不服，已经上诉到中级法院。还没判下来，就是判下来我也是没法住，他走，他儿子不走不是一样吗？

我哥还打我爸。他让我爸写遗嘱，我爸不肯，他就打我爸。我妹去看我爸，他说：“你别走，你看着我，你哥打我。”

我爸病了，我三姐来侍候我爸，他又跟我三姐打架，认为我三姐要占这个房。我三姐到北京来学习，他搁不下我三姐。我三姐在儿童医院，学习没满一年她就走了。我三姐被他逼得直哭。他还曾经攥住我姐的头发往墙上撞，我姐吓得直哆嗦。是邻居拉住了他。

问：你父母关系好吗？

我父亲也打我母亲，我哥和我爸一样。我父亲是旗人。他原来在一所大学工作，外国人扔铁饼，他帮助给捡。他没什么文

化，但是挺能干。他解放以后才调到铁路上工作。他特别看重孩子读书，希望我们个个成材。我哥没考上大学他伤心。我母亲家是个祖传中医，有一定的文化。

我哥打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儿子，所以他觉得房子、财产都应该是他的。如果不因为我是女的，我就不至于这么倒霉。男人仗着力气大，就打女人，我觉得这是强者欺负弱者。做女人就受人欺负，我只能忍、躲。他打人狠着呢，有一次把铲子把都给打断了。我也是有点儿怕，我让他给打伤了，我还不上班？不上班谁给钱？我要没孩子倒算了，我跟你打个你死我活了，我有儿子，我还有监护、抚养儿子的责任呢，我不能玩儿命，只能躲。

我们的房，如果变成产权房，把房拍卖了，卖40万，给我20万，我钱拿了立刻就走。我爸这个房，如果拆迁，8个人一分，不就得了。现在不拆迁，我哥就这么猖狂地用着，我盖的房我用不了，他把房出租。不过，再难，离婚我也不后悔，依我的能力我能自己生存下去，我的任务就是养儿子，他要能上研究生，我还供他。我们单位是集体单位，哪儿来的房？女人真的很难。我现在连安全都没有。但是我想我现在只不过是有点儿挫折，将来会好的。

问：您觉得什么样的女性算是成功的？

我觉得成功的女性不但要有知识，还要有智慧，机遇和能力都很重要。作为女人要独立，就要有文化，有文化很重要。女人要有事业，也要有家庭。还是有家庭安乐最好，女人才有安全感。心情好了，休息好了，上班才有精力，精神状态就不一样。像我们这样的人，想得开还好，还算幸运。有张床就是幸运。我不满足这样的生活，但是我没房，也没有钱，现在我一个月1000多块钱，我都不敢花，只敢动那点奖金。我现在找律师都

找不起，孩子的抚养费都得到执行庭去拿。目前我没有办法。女人要成功需要许多因素，社会的因素、家庭的因素和本人的素质。心理状态要好，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男人和女人有区别，男人一门心思搞好工作就行，而女人要承担双重责任，要管好家庭，管孩子，还要有自己的事业。女人更伟大。但是女人活得更难。男人随便交往，而女人就不行，容易被人说闲话。要不因为是女人，我不至于活得这么惨。

点评：

你可以这样解决房子问题

陈 敏

吴明显然是一位有主见、有维权意识的女性。与本书中其他家庭暴力受害人不一样的，她的权益受侵害，全是房子惹的祸。而房子之所以能惹祸，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

首先，她的婚姻是那个年代造成的。由于是返城知青，既没有住处又没有正式工作。她能靠自己的努力，进了一家医院，已经很不简单了。这家医院不是国有的，其职工不论男女，自然也就没有福利分房待遇。没有栖身之地的她，找对象结婚成了为自己找“宿舍”。草率结婚，为以后的分手埋下了种子。

其次，离婚后，虽然法院将两居室的其中一间判给了她，但由于计划经济下，房子是各单位给自己职工提供的福利，产权属于单位。产权单位当然不愿意白送一套房子给已经不再是本单位职工家属的她。单位房管部门拒绝为她将两居室的单元房调为两个一居室的单元房，不难理解。于是，她只好带着儿子尴尬地依然和前夫住在同一屋檐下。前夫再婚后，增加了两口人，住房条件恶化，想把她母子逼走，改善自己的住房条件，为此目的，发

生摩擦，也就不足为奇了。使她的处境雪上加霜的是，本来她可以回娘家借住，偏又有个不顾手足情的哥哥，为了能独占父母留下的房子为自己出租挣钱，不惜对她大打出手。

最后，寻求司法救助，又遭遇执行难。霸道的法盲哥哥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坚持认为只有自己这个当儿子的才能住父母的房子，坚决不让她住进父母留下的房子中属于她的那一部分，而父母留下的房子的产权是父亲生前工作的单位的，只能住不能卖。这使得她至今没有一个安定的居所。

吴明的处境的确困难，但目前又确实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权宜之计，恐怕只好咬咬牙，出去租一间房，先有个安全的住处，等儿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情况就可能改善。和前夫与哥哥的房子纠纷，早晚会解决。因为北京市各级法院 2003 年将依法对一些长期不履行执行裁定的被执行人追究刑事责任。^① 希望吴明的房子问题，能借此东风，尽快得到解决。

① 参见《北京青年报》2003 年 1 月 20 日第五版。

16. 解脱之后我很幸福

叙述人 周笑音
访谈人 宋美娅
访谈时间 2002年3月9日
访谈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银海大厦
录音整理 宋美娅
文稿编辑 宋美娅

周笑音，一个文文静静的女人，她说得上是好看的，圆润的脸庞白里透红，乌黑的头发，梳成两条辫子盘在脑后，一双大眼睛很亮，身材适中，衣服也穿得比较整洁。周笑音1957年出生，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她高中文化，原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内退以后，她又找了一份送报的工作。

湖南省妇联权益部原部长荣秀琴女士陪着周笑音一块儿来的。周笑音在遭受丈夫施暴时，及时到省妇联反映情况，得到了省妇联的帮助和支持。离婚时，省妇联又向她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周笑音的离婚案，是湖南省适用新的婚姻法，因男方过错赔偿的第一案。离婚后，她得到了房子和大部分家产。

他总是检讨完了还打

我们是1983年元月结婚，当时我们家还不同意哩。他是农村人，我想他人挺好的，他是高中生。那时我在毛巾厂工作，他

在省委办公厅机关服务中心工作，我们谈了一年恋爱就结婚了，1984年生了儿子。

1996年前，他还可以，他脾气不好，爱打牌；我可以原谅他。1996年时他开始跳舞，在舞场上认识了一个姓方的女士，女的比他还大两岁呢。两个人总打电话，有时候半夜还打，一打好半天，我说：“哪有那么多话好讲。”他说：“你不要管。”后来别人提醒我：“你要关心他一下子，看看他的呼机。”我就留心看了一次，真的是总有女的呼他。

有一回，陈星光问我（我丈夫他叫陈星光）：“明天你上什么班？”我说上白班。第二天，也就是1997年5月17日，上午不到10点我就下班回来了，一进门看见他的侄儿在我家，我很奇怪：“你怎么进来的呢？”他说：“叔叔在家睡觉。”我当时买了好多菜，忙着收拾菜。一会儿，陈穿着背心、三角短裤，慌忙从卧室跑出来，他问我：“怎么回来这么早？”我说：“今天下班早。”他转身又进卧室了，还把门锁上，挺反常的样子，我要进去拿衣服他也不理我。我看见沙发上放了一个女式的包，地上还有一个西瓜，我以为是他天津的姨妈来了呢，我想姨妈可能出去散步去了。中午，我正在厨房做饭，听见门响，回头一看，是一个女的正开门出去。追上去看，原来就是那位方女士。我非常气愤，我问陈：“你怎么把她搞到家里来了？”他不作声。后来听邻居说，他们早上六七点钟去跳舞，然后一起买了菜就到我来了。我很生气，就给他们单位领导说了。我为什么不说不呢？你要是坐在客厅里，你来了客人我还要招呼呢，我为人是很好的。

自从给他们领导说了之后，他就变了，回来就发脾气：“炒得什么菜呀？”我说：“你又不交钱，靠我的钱只能买这些菜。”他经常性地无理取闹。有一次，他一回来就睡在沙发上，我把饭搞好了，叫他：“起来吃饭了。”他端起茶杯，狠狠地把茶往我脸上一泼，说：“我恨死你了！”他经常这样说，他说我得罪了他，

他说他的理由，他在屋里打人的事我不能出去说，本来他可以当官的，我说了影响他当官，但他经常性打人，我怎么能不说？

他最早一次打我是1984年。当时我生毛毛（婴儿），正在月子里，他妈妈来照顾我，有时有点儿矛盾。那一次，为一点儿小事，他揪住我的头发拖我，把我抓起来摔到地上打。那一次我妈妈也来了，劝说了一下。反正我迁就他，尽量忍一点儿，不跟他发生争吵，他不做事就不做，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钱从来不给我用，他说：“你的钱吃饭，我的钱等家里有事时用。”其实他的钱从来也没用过。我的钱有一点儿多的，我还交给他。比如说半年节余50块钱，还要交给他，放在他那里。我要求不高，有用的就行了，所以到最后，他有9万元的存款我都不知道，他买了股票，跌到了6万多，离婚时他都拿走了。家里的一切东西都是我买的。

是的，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些年，一直是我在养着他。他回家来只是吃饭睡觉，我下岗之后工资只有200元，家里一切开销都是我勉强维持着的，有时实在没办法，就找朋友借。他经常不在家住，他一不准我问他在哪里，二不准向领导说。陈星光总是有女人，他还很骄傲，他说：“我长得很漂亮，逗人喜欢，随时可以叫人来睡觉，你现在给某某打电话，她现在就过来。”1998年3月8日晚上8点多，我从烈士陵园旁边路过，突然看见陈星光坐在一个女人的腿上，我一下子很气愤，上前就去质问那个女人，她不做声。我就拉我丈夫回家，他不回。我心里好难受啊，一个人回了家。晚上10点多，陈星光回来了，一进门，二话不说，上前抓住我的头发就往墙上撞，一边打还一边骂，打得我全身青紫，头、脸、嘴都肿起来了，痛得很。第二天，我到湖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看病，诊断是全身软组织挫伤。

（这时，荣部长插话。）

第一次，陈星光打她打得厉害，那时还是和湘湖农场的那个

女的好，周笑音到我那儿去告状，我就叫陈星光来，批评了他一顿，他还写了保证，但是并不管事。这一次，我又叫他去，批评了他，他又写了保证书。

他检讨了还打。1998年8月7日晚上，我给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问他在哪里，因为那天小孩有点不舒服。当天晚上他就回来了，关起门就打我，一边打一边骂，打得我在地上滚，他把我踢过来，打过去，折磨我有一个小时，我被打得昏迷过去。第二天，我到省委机关医院看病，我的左眼、颈部，腿部软组织挫伤。

我那时好怕他呀！他骂人，他在客厅里骂，我都不敢出去。他要打人，不让我出去，不让我喊。他打我的时候，我全身颤抖，心跳得很快，好像要死了一样。我们院8幢2楼有一个男的，把他老婆打成精神病了，男的还让儿子、女儿打他们母亲。陈星光说，他就要把我搞成莫菊香似的（被打成精神病的那个女的叫莫菊香），我的结果就是莫菊香那样的，他说：“把你搞死，再把你弄成自杀的样子。”他经常这样说。

几次想解脱，可我没有房子

1998年12月11日下午6点多，我正打米，他从乡下父母家里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又骂我，最后又打我。到晚上9点多时，他把我的头撞伤了，我又昏迷过去。等我醒来后，头昏、恶心，肚子痛得厉害，我开了门，跑出去呼救。他们领导兰科长就住在这层楼上，我跑到兰科长家。兰科长把我送回来，对陈星光说以后不要老打骂妻子，陈星光向领导保证，兰科长就回去了。12点钟人家一走，我刚要上床睡觉，他上来抓住我的脚把我倒拖着，又拳打脚踢打了一顿，然后睡觉去了，还责令我只能睡地上。

我一夜没睡，坐在客厅里流泪，我想：我没做错什么，凭什么让你今天打一顿，明天打一顿？！别人说我对他太好了，他澡一洗，我就给他洗衣服，他在家白吃白住，什么也不管。我们结婚时他只有600块钱，离婚时他就有了9万多。下岗后我找了一个零工，拼命挣钱，一个月存50元，年底还乖乖交给他。我实在算得上是个贤妻良母了，他还这么残酷地打我。我越想越难受，就想一死了之。又想，我又没错，我为什么死？这时候，想起来有个女人告诉我说，她丈夫也是总打她，有一次，她拿了个锅铲对着她丈夫敲了一下，从此，她丈夫不敢再打她了。我想，我也教训他一下，让他看看我不是好欺侮的。我就去拿了菜刀，在他脸上划了一刀。然后我好害怕，把刀赶快扔掉，我怕他追我，就骑上单车，领着儿子回娘家了。

他又是找领导，又做法医鉴定，说我毁了他的容，要跟我离婚。荣部长就请了刘律师免费给我打官司，刘律师说他有过错，离婚的话房子应该归周笑音。他们单位做他的工作，说你老婆不错，离了婚你不一定能找上你老婆这样的了。别人也说他：“离了婚，没了房子，你什么东西也没有了。”他就又后悔了。

正好这个时候我脚扭伤了（下班晚，踩在了坑里），儿子给他打电话，说：“妈妈住了医院，你快来看看她吧。”他来了，对我挺好，说：“咱俩和好了吧，好了呢，以后我把工资都交给你；要是不好呢，我就把房子烧了。”我想，哪个人不犯错误呢，他能回心转意我当然高兴。这样，他就把我接回去了。

那以后好了一些，还买了两次米。可是没过多久，他又搞了一个女的，又逼着我离婚，我说：“没有房子，我离不了婚。”1999年10月，我们还没有离婚，他就说他要结婚了，他说，他们有感情，和我没感情。没感情他还要跟你睡觉，那边也要，这边也要。我不想跟他过，他就强迫。

2000年3月以后，他基本上不回家住了，别人告诉我：“他

和军区幼儿园的一个老师住一块儿了，那个幼儿园老师也是和丈夫离了婚的。”早上我就站在路口上看，上班的时候，他果然从那里出来。那时，他一回来就说要离婚，我说：“你去离呀！”他说：“那你就滚蛋了，这屋里只能有两个人。”有一次，他突然回来了，当时我正在床上睡觉，他一脚把我从床上踢下来，接着用拳头槌，打得我直喊救命。我问他为什么打，他说不为什么，就是要打，还把菜刀也拿出来了，威胁我说：“我从现在起要天天住在家里，如果这次老子下岗了，我就天天坐在家里打你。”这一次打得我疼了几个月。

我几次想解脱，可是我没有房子，也没有钱，那时候我父母也去世了，我妈临死前还说：“跟他离婚算了，他太不公道啊。”可是，离了婚我和儿子上哪儿去呢？我只好一次次忍。

2001年8月24日，儿子要开学了，我没有钱交学费，我说：“斯斯，明天我们俩一起去跟你爸爸要学费吧。”儿子说：“我不敢去。”儿子怕他，写日记写他爸爸打人时模样可怕得很。他经常故意当着儿子的面打我，让儿子看我被他打时的样子，他想让儿子也瞧不起我。陈星光不管儿子，连儿子有病也是我一个人带着看，安慰他、照顾他。

第二天早上8点10分，我去菜场等他，看到他我说：“陈星光，今天斯斯要交学费了。”他冷冷地说：“你去交就是了。”我慢慢跟着他走，他上二楼，我也上，我说：“斯斯坐在家里等，你真的不给呀？”他说：“不给！”我只好去找他的领导。领导听我说完后，说：“你回去吧。”我说：“他不给学费我就不走。”领导当时就给他打电话，当着领导的面，他答应了，我就去上班，我给一家报社送报纸。

10点多，我想回去看看他是不是把学费给了孩子。我一回来，他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我看孩子的书包不在了，就知道孩子上学去了。我去了趟卫生间，等我出来，他已经把门关上，不

让我走。他说：“今天我躲你都躲不过，我恨死你了！”说着，他拿起一把叉子朝我头上、身上、脸上乱打，叉子都打断了。我想喊“救命”，他又去拿了一根绳子，勒着我的脖子，说要勒死我，我双手紧紧地抓住绳子，发不出声音来。这个时候，他要上卫生间，趁这个机会，我跑到窗口喊：“救命啊！”正巧，他们单位的梁处长从楼下过，我喊他上来，还有个正搞装修的工人，听见我的喊声从窗户上爬了上来。陈星光一看有人来，赶快到沙发上躺着假装睡觉。梁处长上来一看：“你们家没什么事啊！”等别人走后，他从沙发上跳起来，恶狠狠地对我说：“这一次便宜了你，等下次你就没有喊救命的机会了。”

这件事以后，他又起诉离婚。我又去找荣部长，荣部长让我也去做法医鉴定。以前，他打我不敢作声，不敢告。这个时候，芙蓉区开始了创建“零家暴社区”的活动，男的打老婆3次，就可以被拘留15天，我去找妇联，荣部长又给他登记了一次。

离婚时，适用了新的婚姻法

荣：陈星光起诉离婚，周笑音很恐慌，又找到我。这时，我反过来劝她：“像陈星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考虑离婚。在离婚财产分割上，我们帮助你维护你的权益。”我就给她找法律援助，免费给她请了律师。这个女律师很厉害，到处跑材料。有一次，她找陈星光婚外情的证据，陈正好在幼儿园那个女的家里，证据也有了。在法庭上，她说陈：“你有婚外情，你有家庭暴力，按照新婚姻法，过错方要赔偿，房子应该归女方。”

陈自己算了一下，他要赔出好几万，他觉得自己吃亏了，法庭上，他同意调解。律师对周笑音说：“家中的财产你要有证据。”周笑音还真给法庭提供了一个证据，法院一查，陈有9万元的存款，为了保住这笔钱，他最后同意把房子给周笑音。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律师跟我说了以后我就留心。有一天中午，他回来睡午觉，我悄悄地拿了他的裤子，从口袋里找到一个单子，我把上面的一个号码抄了下来，交给了律师。法庭拿这个号码一查，说是炒股的一个东西，有9万块钱呢，我还骇（吓）了一跳，怎么有那么多钱呢？律师说：“这笔钱，两个人先平均分，然后陈星光再损害赔偿。”陈星光不愿给钱，就同意把房子给我和儿子，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归我，他只拿他自己的东西走，每个月他给儿子300元抚养费。他要是把钱给了我，他相好的那个女的也会赶他走。他说，他的钱以后还会涨的，他会有很多钱。我说：“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有钱，以后也不会惦记你的钱。”

荣：法院调解成功这一天，周笑音晚上来敲我家的门，她很高兴。她是湖南省适用新婚姻法对妇女损害赔偿的第一例，家里冰箱、电脑一样没少，男的扫地出门。

陈星光也到处找关系，他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他现在还是跟幼儿园那个女的住在一起。那个女的单位福利好，工资高，他在人家家里净做事，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他就是要女的工资高、待遇好。他还说：“在人家家里就要勤快一点儿，女人很容易讨好，只要给女人说两句好话就会好起来。”他不认为乱搞女人有什么不好，他还很自豪的样子，他说：“哪个男人没有三妻四妾，这算什么呢，这么多的女人都喜欢我。”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荣：离完婚之后，他钥匙没交，上午调解离了婚，晚上回来他还要跟她睡，不同意就强迫，一边搞着婚外情，一边强迫性生活。

没换门时他经常来，回来洗澡，洗完澡让我给他洗衣服，他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他说这是他的家。每次他都是穿一身衣服来，下次还要来换衣服。邻居们说：“你拿个塑料袋，把他的衣服一次装走。”妇代会主任说我：“你要换一个保险门。”有一次他又回来，我就去找他的领导，让他别再回来了。来了3位领导，他把床单都装进他的袋子里，我说：“调解书上写着，只有你的衣服是你的，别的都不是你的。你把床单拿走了，我就没得用了。”我把调解书给领导看，领导拿着调解书一一对照。陈星光气得一下子把茶几砸破了。他又要打人。后来我就把保险门换了。

我现在解脱了，我感到很幸福，回家再也不用害怕了。苦一点、累一点我都不怕，我现在送报纸，一个月400元，他每个月给孩子300元抚养费，孩子的学费、医药费，我们俩一人一半。我们是2001年11月15日办下来的离婚手续，孩子的抚养费他给了3个月，就不给了，他的领导也指责他，让他按时给。

在我们这里，发生了好多妻子被打的事，她们的下场都挺骇人的。有一个处级干部的老婆，受丈夫打、虐待，离婚后成了精神病。还有一个吴某，她爸爸还是省委一个大机关的领导，一样的被丈夫打。如果不是荣部长、妇联帮我，我没有房子住，又没有钱，真不知道我会成什么样。现在我的房子有110平方米，等我有了点钱，装修一下。如果以后能租出去一部分，我还可以有点补贴，我精神上好愉快哩！

点评：

一个成功的干预案例

宋美娅

在我们这次受暴妇女的系列访谈中，有几位不幸中的幸运

者，她们摆脱了家庭暴力，并且获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开始重建新的生活。她们之所以能够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结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们得到了妇联组织和其他部门的援助和支持，周笑音就是这些幸运者之一。

家庭暴力该不该管？传统观念认为，丈夫打老婆是家庭内部的私事，外人不能管。我们看到许多警察面对受暴妇女的求救都会说：“外人打你我们能管，你丈夫打你管不了。”女权主义者主张重新界定公与私的界线。对妇女的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不能以家庭为界，把妇女的权益割裂成为公领域和私领域，从而使法律对妇女的保护停留在家门之外。事实上，妇女权益被损害很多是发生在家庭内部。联合国1993年12月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在对暴力定义时说：“对妇女造成或有可能造成身体、性与心理方面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进行威胁、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不论其发生在公共还是私人生活中。”《宣言》要求，国家有义务谴责暴力，而不得借口习俗、传统及宗教逃避该责任。国家被期待立即采取所有“适当的手段”，来实施消除对妇女施暴的政策。这些要求和规定明确表示了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是全社会的责任。

周笑音的案例就是一个成功的干预案例。

首先是省妇联的支持。湖南省是我国第一个通过“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法规的省份，湖南省妇联有着比较敏感的反家庭暴力意识。周笑音从一开始申诉就受到了省妇联的全程关注，荣部长她们不断给她以具体的指导，使她不至于孤独地面对暴力，还给她请了免费的律师，帮她打官司。

重要的一点，是法律的保护。我国修改后的婚姻法，把禁止家庭暴力写了进去，同时，婚姻法还增加了过错赔偿制度。正是有了这些条款，周笑音才能够依法获得施暴方的赔偿，得到了住房，解除了她最大的离婚障碍。

还有，法官的秉公执法。现时有法难依的事情并不鲜见，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直接影响着判案的结果。这里面也有法官的观念问题，有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知态度问题。显然，周笑音得到了公正对待。

在国际反家庭暴力运动中，多机构合作被许多国家认为是有效保护受虐妇女的方法。一旦有家庭暴力的案件发生，警察、法院、检察院、医院、妇女救助组织、社区居民，都会有所行动。警察快速反应，接警、出警，有一套完备的程序。如果施暴者的威胁较大，警察会对他颁发“禁止令”，不允许他接近受虐妇女，连电话都不能打，还可以带着警犬在受虐妇女的住宅外巡逻。医院接收到一位有外伤的妇女，医生和护士会主动询问受伤的原因，了解是否有家庭暴力，医院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心理工作者来陪护受到家庭暴力的妇女。受虐严重者，还有庇护所可去，这些庇护所有妇女组织办的，也有政府办的。庇护所有警铃直接接到警察局，以保护受虐妇女的安全。如果邻居们听到有人施暴，他有责任去报警，而不是可管可不管。

我国已有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颁布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法规，我们正在向多机构合作的方向努力。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周笑音的案例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

17.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哩

叙述人 任英红

访谈人 宋美娅

访谈时间 2002年4月19日

访谈地点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 宋美娅

文稿编辑 宋美娅

任英红，1957年出生，内蒙古包头市人，曾上过两年小学。任英红是自由恋爱，男方不顾父母反对执意和她结婚。但婚后丈夫施暴，任英红3次提出离婚，都没有离成。1996年第四次提出，这回终于离成了。离婚后，前夫仍然滋扰她。1996年6月的一天，前夫又一次寻到她娘家，发现前夫身上别着刀后，她用裤腰带勒死了他。1997年，她被判无期徒刑。

看到任英红，不免让你想起一个温顺的动物：羊。她脸上和身上的每一个线条都是柔和的，圆圆的脸，圆圆的肩，目光中还带有一丝羞怯，说话时不经意地微低着头，眼睛总是向下看，说话时轻声细语。44岁的她，微微有些胖，推门进来的一瞬间，看她动作很利索，太阳光从她背后打来，映出缕缕白发。

曾经相爱，曾经数次离婚

问：你是哪里人？

任：我家在包头市昆区赵家营村。

问：你和你原来的丈夫是怎么认识的？

任：我和他是一个村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家是城市的，父母在太原市工作，他舅舅是我们村的，他舅舅没有孩子，他下乡下到我们村。

我们俩谈对象是他亲戚介绍的，说是介绍，其实我俩早就认识，农村咋说也得有个媒人。（说这两句时，任的脸上竟有了一丝的红润，让我感到他们当初是自己相爱的，并有过非常甜美的爱情。）他和我谈对象他父母不同意，说：“你是城里人，找个农村的不好。”他父母想让他回城里。他大哥在昆区给他找了工作，想让他往城里调。他觉得我这个人挺实在的吧，对我挺好的，他父母说，如果他要娶我，就不管他的事了，他也不听，就是要和我好，我们1979年结了婚。

问：什么时候不好了呢？

任：他开始上班之后。那时候上班的人少，他是建筑工，每个月挣18块钱，钱也不往家交，我在家种那点儿地够吃了，也没有想着要问他要钱。他不好好上班，后来单位把他开除了，他骗着我，天天早上还说去上班，其实在外面胡混。你说一个大男人，也不找个营生，一天天混。1983年，因为偷东西，他被劳教了3年。

他第一次打我我记不太清了，就记得那会儿刚结婚一个多月，那天我去我妈家了，一回来，他在床上躺着，我说：哎呀，你回来了，我赶紧做饭。他过来就是两个耳光，我气得趴在那儿哭。我想走，他不让走，又说上好话。我想他可能在外边遇上不高兴的事了，也就算了。

这就开始了，以后每次下班回来，只要饭不对意，就不行了，踢东西，这也不对了，那也不对了。他每天喝酒，回家就闹事。放的东西不对了，找茬儿打你、打娃娃，放个针也不对，

“妈的个×，你们家怎么教育的，把针随便乱放！”看电视也不对，“妈的个×，几点了你还看电视！”抱起电视机就要砸。咋也不对。你要不理他，不做声，他就揪住你的头发骂：“妈的个×，你是个甚东西？”找东西打我。

问：他伤害你严重到什么程度？

任：他打我像打死猪一样，他打人甚也打，打脸，经常扇耳光，耳朵扇得流血，拿着甚东西都打，总拿刀吓唬我，经常一动就把刀子别上，“唰”，刀子扎在我脸上，吓得我不行。家里打，他也在外头也打，走在路上，邻居们一看他来了，都躲着他。一看他喝酒回来我就吓得不行，他一拿刀我就吓得跑出去，听见他骂我躲在厕所里。他不在家我也害怕，不知道他在哪儿，喝酒喝成什么样了。回来他就折腾我。

有一次他半夜回来，要吃饺子：“起来起来，给我包饺子。”我起来包好了，给他端到跟前，他又要吃素饺子：“吃素饺子，素饺子！”我一个人好害怕，（哭泣得说不下去）弄上素的也不吃，就在那儿找茬儿，咋也不行，磨你一黑夜。快到明了，人家睡了，我还得干活儿。净那样，经常一黑夜一黑夜折腾你，让你上小卖部给他买酒，你就陪着吧。

问：你有几个孩子？

任：两个女儿。1980年生下大女儿，怀孕时检查是个男孩，他可高兴了，生下来是个女孩，哎呀，这脸马上就不行了。我妈去伺候我，也不跟我妈说话。对了，生下这个女孩他就更不行了，就嫌生了个闺女。我妈带去的米、奶票，他把奶票扔火炉里烧了，把粮食都锁上，不让我们吃。我只好去我妈家住，也不行，他去我妈家找：“你还回不回了？”把我妈吓得说：“你快回吧。”我不想给我妈家找事。他去我妈家也打，打我弟弟，也打过我妈，一伸手就把我妈推倒在地上。

问：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任：到出事时17年。出事时我已经和他离了婚了。1996年5月19日离的婚。以前离过几次都没有离掉。第一次离时，大女儿两岁多，结婚3年头上，到了法院，法院调解，他说：“不了，以后不了，我这脾气不好，以后听你的。”回来连3天也过不了，又是那样。他去劳改了3年，劳改时我去看他，给他买点他爱吃的。那时不骂，坐那儿头低着，不做声。我以为回来他会好一些，谁知道回来更厉害。

第二次我又提出离婚，他在法院写保证，保证以后不打了、不闹了。法院说：“回吧，保证也写了，孩子也那么大了，别离了，回吧。”从法院回来，他一次比一次打得厉害，我们家的墙上净酒瓶子印子，拿起甚也打，哪句话不对，酒瓶子就来了，碗也来了。我第三次提离婚，他又写了保证，还是没离成。第四次离成了。

这一次我先和他商量，看他好时我对他说：“你看咱俩净这样，你觉得好吗？不如离了吧。”他闷了一会儿说：“让你离，你不能带娃娃。”不带就不带，好容易得了这话，我就赶紧离，去民政局办手续，这次我死也离呀。一到离的跟前，他又说不让带小女儿，让带大女儿。行啊，离了就行啊。我一分钱的东西没要，领着大女儿回了娘家。

出事了

任：离了婚之后，小女儿他也不管，净跑到我妈那儿吃饭去，他整天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还要接孩子上学下学。在路上净碰见他，走着走着，他骑着车，叉着腿堵在你脸前，拦着我不让我走，训我，叫我回家：“回去给娃娃们做饭！”我说娃娃们都在我妈家吃饭呢。有时一扭头，他在后面跟着。1996年时，我们这儿地震，都住地震棚。一天晚上我从家往地震棚去，半路上又碰见他，他又是叉着腿站在我面前，说：“走，回家去！”我

说：“我跟你离婚了，回哪个家呀？”他说：“娃娃们还等你回去做饭呢。”还是那一套吧，我说大的小的都在我妈家呢。他就说：“你回呀！”我没回。

可能是他离婚离后悔了，他也求我，说软话，叫我：“红（我小名叫红），”他说：“看在咱俩年轻时好过的份上，你回吧！”说软话也不能让我动心，我的心凉了，他改不过来了。我说：“我刚刚离了婚，不回，要回也是你变化了。”他三天两天去我妈那儿，找闺女了，有事了，早上一大早就跑来，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看见他了。

问：他是不是还想和你过夫妻生活？

任：他就是那个意思。有一次，我回去寻找我的衣服，我让大女儿给我做伴。一进门，他就打我，上来两个耳光，打我我就跑，我们那儿有个派出所，我跑到派出所，把我吓得甚也不管了。他追到派出所，看见他来了，我说“来了来了”，吓得疯了，不知咋办了。派出所的人把他叫到一边，说了说，他走了，我吓得半天没走出来。回到我妈家，我妈说：“去找妇联吧，离了婚了，他还老来找。”我妈陪我去了包头市妇联，一个50来岁的干部说：“像他这样的人，管得轻了，不起作用；管得重了，对你也不好，你回吧。”

1996年6月的一天，晚上10点多了，他又来我妈家了。我妈他们在里间睡下了，大女儿小女儿在另一间屋看电视。他一坐下，我就看见他身上别着刀，夏天嘛，穿得薄，他腰里别着扳子，就是修自行车的扳子，腿上别着刀子。哎呀，我的脑子“轰”的一下，我就想，今天我得弄死他，我爸我妈都在家，不能让他伤着他们。他说：“你明天回家吧，回家给娃娃们做饭。”还是那些话。我那时就拿定主意了，他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了，我不跟他说话，就想怎么弄死他。他在床边坐着，我从旁边上床，假装拉窗帘，走到他身后，他一扭头，我解下了裤腰带，一

下子勒住他的脖子。

问：他反抗了吗？

任：没反抗，不知道怎么他就死了！他把刀拔出来了，在地上掉着。我大女儿听见点甚了，出来了，她问：“妈，咋了？”我说：“我把他弄死了！”（任英红把这一句话说得很响亮，很硬气，一点儿没有惧怕的感觉。）大女儿就去把我爸喊醒了，我爸喊管治安的人来，给派出所打电话报案。

问：当时你想到你这样做要承担的后果了吗？

任：我就想，我死也就死了，我爸我妈和娃娃们起码是平安的，他不能再祸害我妈家了。我妈妈家对我可好了。我是捡来的（说到这里，任英红抽泣得无法说话），从医院捡的，八九岁的时候，村里人告诉我的。你看我这儿。（她指着自己的嘴唇，嘴唇上有一道手术缝合的痕迹。噢，她是先天腭裂，俗称兔唇，她的亲生父母可能因此遗弃了她。）12岁的时候，妈妈给我治的病（做了手术）。妈妈爸爸对我可好了，就没有这么好的人，我不想连累他们。他们知道我的日子不好过，让弟弟妹妹给我送钱。我爸爸打了新面粉，新大米，放一袋子在我那儿。我们家的房子也是爸爸和弟弟帮我盖起来的。世上难找这样的好人，从小我就知道我是捡的，所以，啥也不想连累他们（任英红热泪涟涟）。

问：法院怎么给你判的刑？

任：一审判无期。我原来的公公，梁保宝的父亲他们都来了，他们上诉了，嫌判得太轻，要求判我死刑。开庭那会儿，他们管我要钱，说是养老费——我把他们儿子杀死了，我得负担他们的养老费、他们来这儿的坐车费，要8万多块钱，我没有钱。在看守所里，大家挺同情我，有个女的有文化，她看我不会说话，就帮我写材料，她说：“你给我说吧，想起来一句说一句，慢慢说。”二审时，在法庭上念了写的材料，二审维持了原判。

对了，他（指梁保宝）还写下了遗书，在他身上装着，开庭

时念的，意思是，喝酒喝后悔了，他死了以后，房产归两个女儿，让闺女给他上坟烧纸的时候，不要带酒。

问：说明他那天晚上去找你，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他带着刀，还带着遗书，他准备死，可能也要拉着你一块儿死，你看遗书里没有提到你。可能他也有悔意，才说到不让女儿给他带酒。你现在还恨他吗？

任：恨！现在好一些了，刚到看守所的时候，恨不得再回去，把他的肉一刀一刀地剃了它！

他到底是个甚人哩

问：让你这样一个温顺的女人产生这种想法，一定是有什么事让你特别不能忍吧？

任：你要我说具体的，我记不起来了，就是知道他打我，一次次地打，哪次哪次因为啥，记不清了，太多了。他一次次地打我，打完他甚事没有，我做甚也是不对，我记得当时我想，这次我打不过你，下次我想办法打过你。结果下次还是打不过他，一次又一次，慢慢地，心就凉了。

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懂，他到底是个甚人哩？为啥不好好过日子？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是哪儿不从你？村上人说，是我把他惯的，太顺从了，什么都是他说甚就是甚，他还是打，一会儿把我头发揪住，一会儿胳膊拧着，拿棍，扇耳光。孩子们在跟前吓得不得了，大闺女就不管哪有个旮旯藏起来了，好几次啊，他打过我之后，大闺女就哭着拉我：“走，走，不要跟他过了，您要再跟他过，我就离家出走！”

我问过他：“你为什么打？”他说：“不想过了。”“不想过了咱们就离婚。”“离婚？”这就不说话了。我就想，他离了婚在村子里找，肯定没人找他。我离了婚之后，邻居们说：“10年前你就该跟他离了！”开始他打我邻居们还拉，后来，我喊得厉害了，

人家才来，不敢了，谁拉他打谁。他没有一天不喝酒，喝了就找茬儿，要不就打孩子。对了，你不说我还想不起来，他还到大闺女学校去闹，大闺女念书念不好，吃饭时他就骂：“快找个地方去死，哪儿不能死，回这个家干嘛！”你说家里这样，孩子能学好吗？开家长会他跟老师吵，他不让我去开家长会，可能是嫌我不会说不会甚的吧。

现在我躺在那儿就想：到底他是咋了？我就是想不通。每天都要吵，每天我这心里头不知丢了啥东西似的，回家做饭就想：他去哪儿了，快找找他去吧，也不知是担心他还是什么，他回来又害怕。他倒没有一天不回来的，哪怕喝到（凌晨）4点，他也得回。他真不回来还好，干完活儿我就能睡了。这睡不着，门开着吧，我害怕，关着吧，我不能总坐那儿等他吧。有时睡着了，他一回来，就拿自行车撞门：“家里死得还有人没人了！”“死完了！”就这样大声喊，这门要是开迟了，今天你就准备着吧。

问：他对你有没有性虐待？

任：（低头哭起来）也有。他把你打一顿，又要和你睡觉，你说你气不气。不跟睡还不行，折腾你：“起起起，睡他妈的甚，起来做饭，我要吃饭。”或者是让你出去给他买酒，他一杯杯地坐那儿喝，你就在一边陪着，不能睡，也不能看电视。一夜一夜地这样。

看他清醒的时候，我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以后再不了。”他那个人，连10分钟都不过就变了，吃完早饭走时跟你说得挺好，晚上回来，还是那个样。有时他想对你好，爱吃的东西给你买回来了，就这吃的过程他就变了，又要骂，又要打。我以前也有过（弄死他）这个想法，下不了手，我怕万一弄不死他，他把我们全家，连孩子都弄死。

问：你能一次次提出离婚，还是挺有勇气的。

任：逼的。我们家离城很近，城市把村子包围了，我也改成

城市户口了，改了之后地也没有了，我后悔了。开始我卖菜，卖了一年，小女儿那会儿还不到两岁，我把她绑在柜台上，怕她跑到街上去。攒点儿钱买了个冰柜卖雪糕，又有了点儿钱卖肉。你说他个大男人，甚活不能干，他就是不干，他还搅得你卖东西也卖不成，喝多了他跟人家顾客吵架，早起他倒是跟我去拉货。有时我回家来，他把家弄得乱七八糟，搓麻将，喝酒，他有几个喝酒的朋友。喝酒他就到小卖部去拿，人家看见我就说：“你家的拿了两瓶酒。”“拿了两条烟。”我再把钱给人家送去。

问：现在你的两个女儿呢？

任：大女儿结婚了，对象看着挺好，挺善的。在看守所里时，我给她们写信说：“你们是不是挺恨我的，我把你们父亲杀了。”大女儿来信说：“妈妈，我不恨您，您咋想起说这样的话？要是我，我也会这样做！”我想，毕竟是她们爸爸……（任英红又一次泣不成声。）

二女儿在我妈家。其实，现在这个二女儿，是我的三女儿，二女儿生下来送人了。自己的骨肉怎么不心疼？可是我觉得他（指她前夫）喜欢小子，怀大闺女时，检查说是小子，他可高兴了，生下来是个闺女，一下脸就变了。我妈来伺候我月子，都不跟我妈说话，一下子就不回家了。把二女儿给人家，能再生个小子，我想他每天回来不高兴，是不是有个小子会好一点儿？二闺女生下来，他不愿意要，二闺女今年21岁了，比大闺女小两岁。怀老三时就说了，这一次不管是男是女都要着了，结果生下来还是个女孩。小女儿他还是挺喜欢的。

问：你还有多长时间的刑期？

任：还有13年半，减过一次刑了。我是1997年到这个地方来，当时啥也没想，我就想我闺女怪可怜的，从小挨打、受怕，连书也没念好，还连累我父母。我自己受罪一点儿也不怨，判我

死刑我都不在乎。了结这事（指和前夫的关系）真难，没有活的希望，他不死，就是我死。就是到现在我老想，到底这是个甚人哩？

任英红反复说着这句话，此时，她瞧着鞋尖前面的地，好像是自言自语，目光里充满痛苦、迷茫、无奈，人显得很衰老。

13年半，任英红还要在狱中度过一段漫长的时间，那个时候，她真的是一个老太太了，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点评：

家庭暴力不会因离婚而停止

陈 敏

纵观任英红的受暴经历及她的“以暴抗暴”的过程，在点评中应提及的规律性东西很多。但由于篇幅有限，我在这里只提及很重要的一点：家庭暴力不会因双方已分居或离婚而立即停止。摆脱家庭暴力的受虐妇女，在离婚诉讼期间、分居期间甚至离婚后，仍极有可能遭受来自前夫或前男友的暴力侵害。

国外的研究表明，当受害妻子下决心离开施暴丈夫时，她很可能会面临暴力的升级，甚至被害。美国司法部1991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三分之二家庭暴力的施暴人是受害女性的同居男友或前夫。美国的另一份调查显示，因家庭暴力而离婚的当事人中，73%的女性在离婚后继续受到前夫的暴力骚扰。加拿大、英国也都有类似的现象。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报告中说：1994年全美女性被害人中，28%是被丈夫或男友杀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道理很简单：受虐妻子希望借助离婚摆脱家庭暴力，是对丈夫暴力统治的挑战。而感觉失控会使施暴者变本加厉地用

以前屡试不爽的暴力，想方设法重新控制妻子。特别是在离婚诉讼期间、分居期间和离婚后的一段时间里，施暴人会想尽一切办法，不断寻求机会接近受害人，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研究表明，施暴人之所以对自己的家庭成员施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缺乏自信。为此目的，他可能不惜杀害妻子（或前妻），甚至与她同归于尽。失去家庭后，施暴男人连仅有的一点靠暴力维系的自信心也没有了。对施暴人来说，继续寻找机会对前妻施暴，便是他能采取的最后的挣扎了。

任英红的前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断用“回去给娃儿做饭”为借口，企图让任英红跟他回去。没达到目的，他就写好遗书、带着凶器来到任英红的娘家，显然是打算与她同归于尽的。任英红如果不先下手，恐怕早晚也难保性命。况且她前夫的暴力行为，很可能殃及从小收养她的养母一家。而她，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意因自己的原因而伤及对她恩重如山的养母一家。

离婚后仍无法摆脱来自前夫的暴力纠缠的受虐女性，一方面不要给前夫任何借口接近自己，更不能让他进入自己所住的地方。另一方面，要想办法离开当地，远走高飞。以便一步一步接近安全、自由的彼岸。当然，在这期间，不要让任何可能会将你的下落泄露给前夫的人知道你的下落。否则，你的一切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你有可能再一次陷入暴力的困境而无力摆脱。

18. 从暴力和伤害中挣脱

叙述人 穆英华
访谈人 钱满素
访谈地点 北京
访谈时间 2002年8月3日
整理编辑 钱满素
点 评 钱满素

穆英华是一位刚过40岁的图书馆员，举止端庄，谈吐文静，又很有朝气和活力。若不深谈，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知识女性也曾长期处于家庭暴力的磨难之中。我们的谈话不像采访，倒像是朋友间的坦率交流。

他举起菜刀吼道：“我杀了你！”

几乎刚一结婚，暴力就开始了。新婚那时，家里来了不少客人，他喝多了。我们送走客人回来，他就毫无理由地发起火来，说什么来客人了我还趴在床上，没礼貌。可我们那个小屋也就能放一张床、一张桌子，我还能呆在哪里？再说我也不大可能趴在床上。他说个没完，还动手打人。我当时都蒙了，不记得具体发生了什么。宿舍楼里有人看见他揪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哭泣）后来看门的老头打电话报告了领导。

你说他是不是因为喝醉了才闹事？不，他喝酒并不多，不喝酒也一样，总能找点茬儿跟我闹。从此以后，暴力断断续续就没停过，大大小小的冲突每月都有，一般的（不动手的）就更不用

说了。因为他找10次茬，我一般要在第八第九次才会忍不住去回应。为什么吵？说不上什么理由。有一次为的是一锅粥，他当着客人的面指责我熬粥的程序不对，其实粥熬熟了，程序又有什么关系？就算熬坏了，不就一锅粥么，值得伤了两个人的感情吗？但是他骂我生活上什么都不会，说着说着就开始打人，弄得客人也很难堪。我因为12岁就住校，确实不大会做家务，这我婚前就跟他说过，当时他说：“这算什么，只要相互体贴就行了。”我真信了。

他特别喜欢当着别人的面，尤其是别的女人的面来羞辱我，他知道这样会使我非常难堪，（抽泣）还大喊大叫要和我离婚。只要逮个机会他就贬低我、羞辱我，其实什么理由也不需要，他就是想激怒我，跟他干仗。他说过：“像你这样的人，多说点儿你就会受不了。”饭烧糊了也发火，有时躺着聊天儿，毫无准备，一巴掌就过来了。还有一次他出去买酒，酒瓶子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打碎了，回来就拿我撒气，说是因为我不想给他钱，所以酒瓶摔了。这哪是知识分子！反正他不顺心的事都是我的错，什么事没有，也总能找茬儿发发脾气，动不动就咆哮：“我和你离婚！你滚出去！”

你问他是不是真打？是真打，用拳头，用手。我的手腕被他打伤过，肿得不能动，（抽泣）楼里的一位老大姐天天来帮我梳头。他也常常会顺手拿起个杯子、瓶子什么的朝我摔过来，要是被他打中，真是不堪设想。有时他甚至会操起一把菜刀或别的刀子对我吼道：“我杀了你！”他还拿孩子来要挟我。孩子才五六个月的时候，他就揪着孩子威胁我，他知道我受不了这个。还有一次他一手揪着孩子，拎起她的衣领，一手拿着菜刀对我说：“你再敢犟，我就杀了她！”

最可怕的一次发生在我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那时我们和一个同事合住在一个单元房里，我们的卫生间坏了，我和他打了个

招呼就去楼上同事家（单身女子）的卫生间。我正和她聊天儿，他上来找我也坐下了。就在这时，同屋的人出门去车站了，他不知道屋里还烧着开水，把门给撞上了。我们都没带钥匙，很着急，去追也没追上。这时他一句话没有，在大马路上噤里啪啦地就开始打我，把我打晕在地，自己就走了。当时大约晚上八九点钟，我迷迷糊糊的，好像有几个女的，大概是散步的，把我弄回家来。

你说家庭暴力包括身体的、心理的、性方面的、经济的、口语的，这些他都有。他嘴特碎特损，骂人那个难听我根本学不来。那几年我父亲得癌症，特别想见我们几个孩子，我每年得回老家探望。说实在我也很想离开那个家。有一年父亲病危，全家人忙了一个来月才把他救活了，他嫌我走的时间长了，居然说“你呆那么久干什么，他死了吗？死了吗？”等我父亲去世后，他还动不动就拿我父亲的死来刺激我。

他一贯像贼一样防着我，这和打我骂我一样让我难受。对我的猜忌是从一结婚就开始了。回到家里看见桌上有两个杯子，他就会问是谁来了。他曾经把一个不用了的书桌给我用，还带着锁和钥匙。结果我发现他自己留了把钥匙，我不在时就翻我的抽屉，其实我什么秘密也没有。我开始以为他特别在乎我，后来才明白他就是这样的品质。我没他那么多心眼，斗不过他。别看他粗，他鬼着呢，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事。为了涨工资，他可以半夜两三点打电话到领导家里，又吵又闹，气得领导在家大哭，只好给他涨了。

经济上他分得清楚得很，从不把他的钱看做是共同的。我们还在一起住的时候，他因为做生意就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他只把工资拿出来作家用，其他钱都对我保密。甚至他做生意的事也对我保密，不让别人告诉我，是我偶然发现的。他很早就有一些时髦的东西，像摄像机什么的，都锁起来不让我碰。后来他买了汽

车，尽管我既无钥匙，又无驾驶执照，也不会开车，他还是叮嘱存车处的人不让我进去接触到车。他总是在防着我，做事鬼鬼祟祟的，这叫什么家呀！整天为这些事烦，真累！现在分居了，他虽然有时给孩子一点儿零花钱，但从来不给我孩子的生活费。算了，只要他不来烦我就行了。

我真想从阳台上跳下去

我怀孕那次他把我打晕在路上，好心人送我回家后，我醒来躺在床上，身心交瘁，我不想活了。（哭）我望着阳台，真想从那儿跳下去，一了百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而当时我们结婚才两年。我们领导找他谈话，他说是怕我跑步才着急的，这种理由连鬼都不信，我也懒得再说了。

但是我还得想着未出世的孩子，更何况我也不能就这么死了吧。他第一次打我后，我们单位的领导找我，我和他是同一单位的，领导问我是否要给他处分，我问他：“处分了，我们俩还能过吗？他不恨死我了吗？我还有好日子过吗？”我很犹豫，结果领导只是找他谈了话。这下他反倒觉得谁也拿他没办法了，还是怪我自己不坚决。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大想让父母知道，让他们为我担心。不过父母一来，很快就看出了我的处境。我母亲在厨房里冲奶茶，他居然就在外面大声说什么“奶粉得省着点用了”，把我母亲气得够戗。我父亲临死前也对我说：“实在不行，就离了算了。”

一听说我生了个女儿，他就不高兴，一定要我再生个儿子。但他这样待我，我是坚决不会再生第二个的，所以他为这件事也总跟我闹。有一次，我生病几天了躺在床上起不来，还有女儿要照顾，他却要出差去，我希望他留下来，他对我吼道：“我不可能为一个女人和孩子耽误我的工作！”你想想，我还能再要一个孩子吗？我觉得有这个孩子就已经错了，当时是和同事一起去做

检查的，她一个劲儿说：“要，怎么不要呢！”其实我应该自己拿主意，在那时就该离婚。

这还不算，他还外面拈花惹草，不仅追求女孩子，甚至还追求同事的妻子，闹得沸沸扬扬。1985年的时候，人家给我看了他给一个女孩子写的信，信中他答应带她去国外生活，而这时他正在闹着要我再生个儿子呢！1988年，他在外面对人家非礼，人家的丈夫找来了，告状的信送到我这里，我拿着信的手在发抖，我拼命对自己说：“别疯了，别疯了……”（呜咽）我真的怕控制不了我自己。

除了想死，我特别怕自己的神经会受不了这样经常性的刺激而发疯。我总是在怕，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会发作。我一天到晚情绪沮丧，精力都消耗在这上面了。开始我一直在问自己，他到底是怎么了？他怎么能这样？……慢慢地，我改变了思路，我不再想生活应该怎么样，而是突然醒悟到，也许生活就是这样，他也就是这么个人。我不能总是这样下去，我还年轻，我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出他的阴影。

我们1981年结婚，1983年有孩子。发生了告状的事后，1989年他从国外回来，我第一次向他提出离婚。我已经忍了十来年，总是想着孩子太小，我一个人养不活。现在我忍无可忍，正式跟他提出离婚。他大喊大叫不肯离，还哭了，说是要再试试。我又心软了，那就再过过看看，还是自己不坚定。他每次发作后过不了3分钟就又好得不行了，我开始老上当，给他哄哄事情就过去了。

1993年，我们正式去法院离婚。那次也是家里来亲戚，我正在包饺子，他嚷嚷着又饿又累，还急着要出去。我就对他说：“那你来帮我包饺子吧。”就这么一句话，他就大吵大闹起来。在法庭上，他矢口否认我们的婚姻有问题，说“没有任何矛盾啊”，好像是我在无理取闹。由于他坚决不离，法院没判，必须等半年

后才能再提。但后来几年我们两个人轮流出国学习，也没机会再提。

婚没离成，但我心里已经有了底，我开始考虑今后一个人生活的事。1999年单位给我们另补了房，他就搬过去了，我们终于可以不必天天生活在一起了。我们已经事实分居快5年了，我带着孩子过，他自己过，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搬去，但还留点儿书在我这里，以便随时可以来拿。不过两处房子都分在他的名下，我很想把我这房买下来，换成我和孩子的名字，他就是不干。我担心离了婚房子又是个问题。当然还有孩子的抚养问题，我一个人供她上大学会很困难，这也是我不得不犹豫的地方。他从不把钱看做是共同的，说什么“你要钱你自己做生意去”！还说：“这些年你都干什么去了？”但我能像他一样不管家吗？他是扔下家、扔下孩子去挣钱，没有我替他管着家他能这样做吗？

到了1997年，我又听说他在外面有人，可能还有了孩子。我想核实一下，就打电话去问和他一起出去的人，人家没有正面回答我，倒是说：“我不是早劝你自己在财产、钱上留点儿心吗？”这不等于回答了我？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怕他走，走了就省得我去离婚了。我想我成全你吧，于是我第二次去了法院。这次法院的同志回答得很痛快，说：“等我们通知，你们一起来，一两天就能办成。”结果我接到通知后去找他，他第二天正好要出国，他是故意不把行期告诉我的。我只好再次撤诉。

你问他为什么不肯离婚？我也在问我自己呢。他倒也对我说过：“你也知道我生理上有些问题（其实很可能是心理障碍），我再去找个有孩子的，我犯不着去养人家的孩子，要找个年轻的怕伺候不了，等我们老了再在一起吧。”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第三次是一定要把离婚办成的。

当初我觉得他比我成熟

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婚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是大学同学，他虽然只比我高一届，但比我大了6岁，因为他是工农兵学员，我是高中毕业直接上的大学，其他人大部分都是从社会上来的。我们七七级中我最小，别人都觉得我最幼稚，我也知道自己幼稚，缺乏自理能力。他通过别人找我时，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人真成熟，是个靠山”，他总是在教育开导我。我父亲比我母亲大8岁，始终那么宠爱我母亲，所以我也想找一个比自己大点儿的，也能有个依靠。从小到大，我在家庭中从未见过暴力，因此毫无这方面的经验阅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才上小学，当时也没有电视和其他娱乐消遣，我惟一的乐趣就是读小说。我认识个收购站的人，老是从他那里一捆一捆地把书借回家看。我想我对生活的认识就是从小说里来的，完全是理想化的，不现实的，净是些美好的幻觉。

我想我的婚姻失败，他应该负90%的责任，我的10%的责任就是自己的幼稚。我对婚姻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太幼稚，同时又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指望从男人那里得到依靠，我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我也考虑他的问题在哪里，他和我不一样，他出生在农村，又是家里惟一的男孩，很受宠，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我不是说吗，从认识他到结婚前的一年多，他从未暴露出暴力倾向，对我好着呢，要是惹我不高兴了还会跪下呢。那次在他宿舍，他出去打水，忘了拿钥匙又赶紧回来取。我感觉自己不被信任，很不舒服。我从小受的教育是决不翻别人的东西，哪怕是自己的男朋友。他看见我生气了，就跪下求我。因为他自己会乱翻别人东西，所以也这么看别人。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是我们关

系的一个征兆。

当时我直觉上感到有点儿不对，就去问介绍人，他对我保证，说他怎么好怎么能干，当过县里的团委书记，等等。还说从他的过去就能证明他的现在，预见他的将来。我还是缺乏自信，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的直觉，其实我的直觉才是最重要的。也有同学对我说，你怎么去和他好？这个人骄傲狂妄，但我却只看到他比我“成熟”。

是的，他就是想控制我，婚后生活可以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他想完完全全制服我，让我对他百依百顺，但我就是做不到。他越这样我越是蔑视他，这让他耿耿于怀，加倍恨我，他说过：“真想把你绑起来狠狠揍一顿！”

我有个感觉，他好像对女人都有一种仇恨，他对他母亲也很凶，张口就骂，他母亲也不敢拿他怎么样。他有一个妹妹已经30多岁了，也有了孩子，她来这儿帮忙工作，他却一不顺心就用笤帚把她打得浑身青肿。他对家人尚且如此，我还能指望什么呢？他常说：“女人算什么，女人就是个身体，一个工具，生孩子的工具。”结婚不久，家里来了个客人，他俩喝酒，客人招呼我也去喝。我刚要说我不会喝，他就轻蔑地说：“她怎么能跟我们一块儿喝酒！”在他们家里，女人是不上桌的，我很不习惯这种态度，回了句嘴就走了。他总是要在人前显得比我高。

走自己的路

我醒悟的过程很漫长，开始我经常不想活，又怕发疯，想想还有那么长几十年怎么过？人要颓废堕落下去是很容易的，一个女人想坚强不容易，但只有坚强自立，生活才有意思。人其实到头来只有靠自己，别人是帮不上的，我必须为分手做准备。那些年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打架上了，他的事业一点儿没耽误，我可全给误了。我真后悔自己以前陷在里面拔不出来，觉醒太

晚。我应该更早期地自力更生，以前更多地是在心里，不是在行动上。当时有个好朋友就常劝我，早点儿离，别再白费这么多事，以后会后悔的。

1988年他第一次出国，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一年下来我发现没有他我也照样生活，以前我还真以为没了他我不行。婚姻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我早已死心了，我想我一个人也能过。

1996年他又出国，我没有了他的干扰，一投入工作，真是感到其乐无穷。后来我不辞劳苦，在业余时间每周三次去挺远的地方补习外语，连续15个月，最后顺利通过了职称外语考试。在申请职称自述时，我讲述了资料工作应如何同步服务于科研教学，我的见解让评委们都很惊讶，没想到我平时不声不响，居然那么会说，我的高级职称是全票通过的。工作的成功和职称的获得使我增强了自信。我明白了一点：什么事只要努力就可能做到。

1998年我开始攻读在职硕士学位，学位对我并不是必须的，也不是给别人看的。因为我们单位博士多的是，也不稀罕我这么大年纪的一个小小硕士。但是我要给自己打打气，证明我可以走自己的路。学习过程中困难也不少，我曾到外地做调查，暑假孩子一人在家过了10天。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确实感到很痛苦，我哭了好多次，我以前从来没有写过这样几万字的论文。我可以写出来，但是我不想仅仅是应付。最后我的论文得到普遍好评，说写得不错。去年，我42岁时拿到了学位。

你问现在他对我如何，嘿，这几年我不理他他倒变了，现在对我好着呢，巴结还来不及。他看我投入那么多精力在学习、工作上，每次做完又都成功，也就说“我相信你肯定行，肯定能拿到学位”什么的。我现在没提出离婚的一个原因就是，只要一提离婚，我肯定不得安宁了。他还托别人告诉我，说我不给他台阶下，他想回家。但是我问传话的人，“我还有回头的余地吗？”

我现在对自己很有信心。今后我会把精力放到工作中，这样即使孩子去上大学，我也不会感到失落了。

点评：

家庭暴力离我们并不遥远

钱满素

一个当编辑的朋友听说我在参加反家暴的项目，不禁笑了起来，“现在还有家暴吗？”他那口气就像是听说还有人在缠足似的。我告诉他这不是件可笑的事，对家暴的受害者来说，这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他语气严肃起来，但宽慰地说：“在我接触的人里面没有。”我回答道，“不，很可能就在你周围那些你认为不会施暴的人里就有这样的人。”我绝非危言耸听，我也是在知识分子的圈里生活，但我知道家庭暴力存在着，很隐蔽，既不遥远，也不罕见。

我相信这位朋友在价值判断上和我没什么不同，但家暴像是隐藏在一个死角里，我们的社会不大去触及它，因而对许多人来说，它就像是天方夜谭。这里原因很多，略举几点：一是根本不知道家暴是什么，不能把家暴与打老婆等“习俗”联系起来，或者认为只有打伤了才叫暴力。二是认为家暴是家庭隐私，不是公害，局外人不宜干预。三是认为家暴的是是非非说不清，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管也白管，得罪人又不讨好。四是认为打骂吵架、相互管束、瞎猜忌等根本就是正常婚姻生活的一部分。五是受害者出于各种顾虑不愿对外公开。于是，家庭暴力只要不出人命，就成了一个没人管，甚至没人提的死角。

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在和平时期，除了黑社会，家庭也许是暴力发生最普遍、最频繁的地点。一个人在工作地点或其他公共

场合使用暴力，那是社会不能容忍的。我们很少听说谁能在单位里经常打人骂人，只要动一次手，就足以暴露了。医生打一次病人，或病人打一次医生，就可以成为新闻上报。老师和学生之间，售货员和顾客之间，任何关系都是一样。惟独在家庭里，好像使用暴力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丑恶的暴力包裹得严严实实，使我们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使我们容忍、容忍、再容忍。

为什么知识分子里同样有家庭暴力？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施暴者会比穆英华的丈夫来得更隐蔽些，他们外表文质彬彬，甚至不喝酒不抽烟，说他施暴你都不信。但穆的遭遇并非绝无仅有，而且如她所说，是从粗到细各种形式的家暴一应齐全。施暴者的动力来自极强的控制欲，虽然一些女性也很有控制欲，但她们施暴的可能性远不如男性，而且男性控制女性是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惯例，这一观念深入人心。所以，90%以上的家庭施暴者都是男性。当他们控制不成的时候，往往恼羞成怒，所谓黔驴技穷，只有诉诸武力。

因此，家暴的根子和男女不平等的观念直接相连，而在性别意识上，知识分子男性并不见得比“下里巴人”先进多少。1995年北京世妇会召开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一个院内人士性别意识调查，结果令人意外，倒也很有代表性——社科院的女性在两性平等意识上明显高于社会一般女性，而社科院的男性却和一般男性没什么区别。知识分子拥有的知识好像并没有帮助他们对女性具有更加平等的意识，他们最希望女性的仍然只是为他们提供后勤服务。他们并不相信女性能有他们的智慧，他们的事业，能和他们并驾齐驱。一句话，女人不是和他们平等的人，就像穆英华的丈夫说的，“女人就是个工具”！

当然，有文化的人也许会说得更文雅一些，诸如“红袖添

香”什么的，但定位还是定在为他服务。在两个知识分子的婚姻里，由于条件资源有限，基本上还是妻子在辅助丈夫成就事业，自己满足于相夫教子。同是大学毕业，几年下来，事业上的距离马上就拉大了。妇女整体素质落后于男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原因。但是丈夫把成功（无论是名是利）都看做是个人的，穆的丈夫可以对她说：“这几年你都干什么去了？”好像不知道如果他们的角色颠倒过来，穆英华可以干得和他一样好。

我们老祖宗的“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的观念至今还残留在很多人的意识深处，他们不时流露出对妇女的轻蔑，有时包括妇女自己。婚姻对男性道德的约束也远不如对女性的，男人风流是正常的，只要“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就算是有情有义了，这大概也是中国几千年实行一夫多妻制的遗毒吧。我们现在对不同性别的行为方式习以为常，如果颠倒过来想一想，马上就会发现其不合理了。一个男人在外面工作不管家会被认为大公无私，受到表扬，所以穆的丈夫能冠冕堂皇地说：“我不可能为一个女人和孩子耽误我的工作！”但是一个女人这样做又该得到什么评价呢？

结婚证书真的是打人执照吗？

有人说施暴者是缺乏自控，脾气不好，他们自己也常常这样辩解，好像是好心办坏事似的。果真如此吗？不，千万不要轻信，看看他们是不是也对他们的同事、领导施暴呢？他们是很会把握“分寸”的，他们的行为是有意识的，是受大脑支配的，绝不是不经意的。

再看，对同一个女人，他们在婚前婚后的态度就判若两人。为什么婚前他们就那么善解人意呢？穆英华的丈夫在婚前从未暴露出暴力倾向，总是显得十分成熟、体谅。穆英华婚前告诉他，她不会做家务，他回答：“这算什么，只要相互体贴就行了。”可

是一结婚马上就变了个人似的，第一次动手就是说她不会干家务，从此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中暴力不断。更有趣的是，现在穆英华自立了，不需要他了，他却又变了回去，文明起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他认为婚姻关系给了他这种特权。

为什么当丈夫的会认为自己对妻子有施暴的特权？因为他们觉得一结婚，妻子就是他的私有物了，恋爱时曾经追求的对象一进入夫妻关系马上就变成了比他做丈夫的低一等的人，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中。他要让你抬头仰望着他，处处服从于他。譬如穆英华。婚前，她属于她自己，分居后她又成了她自己，但在婚姻中，她属于他。从配偶关系上可以这样说，但一纸结婚证书并没有赋予任何一方虐待对方的权利，这种巨大的误解什么时候才能消除？

为什么一拖 20 年？

穆英华身怀六甲，竟然晚上被打晕在大马路上，丈夫扬长而去，还是路人将她送回家。她醒来后首先想到的是死，是跳楼。为什么她不是首先想到去告他，去拨“110”呢？

与其他暴力相比，家暴的特点一是普遍，二是隐蔽，三是无助。施暴者尽可以关起门来打，没人会来干预，也不会因此耽误他前程，几乎是零代价付出。穆英华不想让父母知道，他们知道了也很无奈，帮不了什么忙，至多劝她离婚。单位领导也是谈谈话罢了，并不能遏止他施暴的倾向。周围呢，好心人也许会来劝她离婚，但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无聊的好奇。总之，施暴者能感到的压力是极小的，很少有人会当面去批评、指责他。

派出所、法院呢？大家知道，这些部门长期以来是很少管家暴的，所幸由于各方面的努力，这方面的情况正在改善。对这种有家暴传统的婚姻，越快准许他们离婚越好，不要再勉强撮合，免得受虐者苦海无边。要知道这种人的习性如此，不大会痛改前

非。等到事情进一步恶化，比如以暴抗暴发生命案，可就后悔莫及了。

当然穆英华本人也有责任，她也一再说自己不够坚决。一方面她总是存有某种幻想，丈夫发作后哄哄就又信了。说也奇怪，为什么男人总觉得女人的心是伤不够的呢？难道你怎么虐待她都不会影响她对你的态度吗？难道女人的智商真那么低吗？另外，她也是受到传统性别意识的影响，所以从一开始就欣赏他的“成熟”，就有某种女人应该依靠男人的思想。她的这种想法再加上从看小说得来的美好幻想，真的使她变得幼稚，对实际婚姻生活一窍不通。文学不等于生活，文学作品是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出来，通过自己的想象形成的。若无一定指导，像穆英华那样从文学中去认识生活，必然留下极大的虚假印象。文学爱好者的婚姻往往不如学理工的人成功，这大概是个原因。

但也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她忧虑的房子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他们两人同在一个单位，为什么房子，甚至两处房子都要分在丈夫的名下呢？这算男女平等吗？

变他信为自信

我们常说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关键在于保持“自我”。没有了自我，这一切都谈不上。当一个人的自我被彻底摧毁以后，他就真的沦为一个驯服工具了。所以大凡要控制一个人，首先要摧毁他的自我。我们看到穆英华的丈夫就是逮个机会就羞辱她，贬低她，尤其在人前打击她的自尊，让她抬不起头来，拳打脚踢达到的也是同样的目的。穆英华越不服，他就越恨，恨不得将她捆起来狠狠揍一顿。不过施暴者都很注意“分寸”，打断骨头的毕竟很少，因为他们不想负责，也不想给自己添不便。

穆英华之所以能重新站起来，自强起来，就是因为她始终没有失去自我，她自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判断，她就是想死，也没

有觉得受虐是错在自己，而且丈夫的施暴只是加深了她对他的蔑视。自我是一个人觉醒的根本，觉醒的象征，觉醒的希望。穆英华开始总是相信别人的话，相信别人比她成熟，听别人的，最后，她发现在婚姻中只有她自己的直觉才是最准确的。变他信为自信，这就是她成熟起来的标志。

但如她所体会的，光是心里这样想还不够，必须付诸行动，为自己的平等创造客观条件。“一个女人要坚强不容易”，这句话说得真好！女人虽然经济上独立了，但精神上仍然可能不独立。男人有自己的事业，女人却把丈夫当成自己的事业。我见过不少做妻子的，为了保住她们的丈夫，真的是费尽心机，不要说把家里活儿全揽了，甚至一次次地去做美容，就怕自己老了，竞争不过年轻姑娘。也有的离了婚，心态处于不平衡状态，又急着再找，一次次地离婚、结婚，总是在寻求依靠。穆英华就不这样，她知道应该依靠的就是她自己，所以她去工作，去读学位，虽然也辛苦，但比起受虐来，总还是容易些吧。

看到穆英华自强自信的精神状态，我真为她高兴。她自信了，所以有平衡的心态，有接受采访的勇气。虽然她目前还尚未完全摆脱，但我相信她已经成熟，已经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了，绝对不会再回到以前受虐的状态。

三

暴力还会摧毁整个家庭

19. 让我的牺牲给他人一个警醒

叙述人 侯春树 性别：男
孙荣红 侯春树母亲
孙荣英 侯春树的姨妈
访谈人 宋美娅 张捷明
访谈时间 2001年5月8日
访谈地点 辽宁省普兰店市公安局监管大队
录音整理 宋美娅 张捷明
文稿编辑 宋美娅

2001年1月初的一天，冰封北国，辽宁省普兰店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一起报案，有人在距城20多里的河边，发现冰河下沉有一具尸体。刑警大队的干警立即赶赴现场。

死者是一位成年男性，40多岁，经法医鉴定，死者是被人用利器所伤而死，刑警队马上展开了紧张的侦察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某村有人报告他的哥哥失踪，刑警队立刻锁定了侦察的范围。半个月后，案件告破，出人意料的是，作案嫌疑人竟是死者19岁的儿子。

公安局逮捕了这位19岁的少年侯春树，同时拘捕的还有春树73岁的姥爷和他瘦弱的妈妈，他们涉嫌“同谋”。此时，春节临近，人们忙着准备过年，一片热闹祥和的气氛，春树一家三代却被警车带进了牢房。经过初步调查审理，刑警们了解到，死者侯某经常打妻子，“确实是一个不正干（不干活，游荡的意思）的人”，在家庭里长期闹纠纷。看到

春树年轻稚嫩的脸，刑警队王队长说：“没想到这个案子破得这么快，以前破了案子刑警们都很高兴，但这个案子破案后心情很复杂，一点不轻松。”警察们从内心里同情这老少祖孙三代，他们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2001年5月8日，我们得到普兰店公安监管大队的支持，在这里访问侯春树和他的母亲。

会见侯春树

5月的天气暖意融融，窗外一片明媚，草绿花红，监管大队坐落在郊外，四周静谧，金色的阳光普照着大地。坐在接见室里却感觉很冷。这是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中间被铁栅栏隔成里外两个部分，就像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铁栅栏对面还有一个门，那是进出犯人的。一会儿，沉重的镣铐声在楼道尽头响起，“哗、哗”，铁镣拖在水泥地板上发出尖锐的碰撞声，让人感到有些刺激。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对面的那扇门被推开了，一个瘦削、修长的身板，一张稚气的脸，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要见的春树。只见他手上戴着手铐、脚腕子上锁着脚镣。可能是脚镣太重，他用一块白布从中兜起，一只手提着这块白布，另一只手抓住手铐的铁链，他一步一步地往前挪着，走到放在屋子中间的犯人椅前，狱警把椅子上的挡板打开，他坐进去，狱警再把挡板放下，锁上锁，狱警退出，关上了门。

我们隔着铁栅栏对面相坐。他还是个孩子，脸上的细茸毛还在，看起来，他有点腼腆、文弱，可能有一阵子不晒太阳，他的面色有些苍白。看着如此单薄的身体，年轻的生命，被沉重、冰凉的镣铐锁住，感觉有些震惊。

春树也眯着眼睛看我们，我们主动介绍自己的身份和来访问他的目的，他突然问：“能看一下你们的证件吗？”他是第一个要求看我们证件的受访者。我把我们的介绍信和身份证明信从铁栅

栏里伸过去给他看，并念给他听。征得他的同意后，我们开始谈话。

问：你多大了？

春树：19岁了，我是1982年5月11日出生的。

问：现在做什么呢——没进来之前？

春树：高中刚毕业，在家里。

问：你能和我们谈一谈你母亲和你父亲之间的关系吗？

春树：从我小时候记事，我父亲和我母亲就经常吵架打架。当时小，也不太懂，等我长大了，他们还是老打、老打，邻居们议论很不好，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坏。主要是我爸太懒，什么也不干，我妈一说他，他就打我妈，每次我都劝我爸，别打我妈了，对我妈态度好一点，他根本不听。

问：你父亲对你怎么样？

春树：我从生下来三天就在我姥姥家，他没有照看过我，他给我的全是负面的影响，他总打我妈，我就觉得出去抬不起头。人家的爸爸妈妈都和和气气，我家总是打打闹闹，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几乎都知道，他们都挺同情我的，可我就是觉得抬不起头，上课时精力不集中，有时候正上课，突然想到我爸和我妈是不是又在家里打起来了。十五六岁的时候，我曾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寻死。

问：你妈妈对你父亲反抗吗？

春树：（摇头）我妈打不过我爸，只有让我爸打。我妈能忍就忍，不能忍就回我姥姥家。为了减轻我的精神负担，她挨打都不告诉我，我知道有一次我妈躺了一个星期不能动。每次打完，我爸从不管我妈，不送她去医院，因为他没有钱。

问：你父亲做什么工作？

春树：他就是个农民。

问：你能给我们讲一讲去年12月27日这天的事情吗？

春树：（低头长时间沉默）反正我是大逆不道吧，采用的手段过于……严重吧，或许，或许可以用别的渠道来解决。

去年七八月份，我爸又和我妈吵架，又打了我妈，我妈就回到我姥姥家去住。我四叔无缘无故地跑到我家来大吵大闹，来过好几回，说我妈欺侮我爸，实际每次都是我爸打我妈，我妈受伤，我四叔还骂我妈，连我姥姥、姥爷一起骂。我四叔有一次还打我妈妈，从后面把我妈妈一把就推倒在地上。我妈在我姥姥家呆着，我爸每次去都大吵大嚷，态度很不好。我奶奶总说我爸我妈没一个好人，说我爸愿打我妈就打，她不管，我听了挺生气的。我姥姥和我奶奶是一个村，离得很近，我妈在村小学上班，我妈想过离婚，但是离婚的话，我爸也会经常去找我妈。搬走吧，也没有确定的地点可去，还有我姥姥、姥爷也不可能走。

12月27日下午，我爸又去找我妈，叫我妈回去，他说了很多吓唬我妈的话。然后，他又动手打我妈，还打伤了我姥爷，我很生气。我又过去跟他谈，让他对我母亲态度好一些，他不听……临走时他说，他还要来，如果我妈还不跟他回去，他就要杀死我妈、杀死我姥姥全家。（这一段话春树说得很吃力，他低着头，每一句话都要间歇一会儿。）

到天黑，我爸又上我姥姥家敲门，来的时候，他手里拿了一把斧子，我妈说，不让我们出去，怕我们不安全，她出去跟他说。我从窗户的玻璃上看到我爸在院子里撕扯我妈，我就出去了……下面的事我……我能不说吗？（他看着我们，目光里发出征询的含义。）

问：你可以不说。你可以只说你想说的。

春树：我想告诉外面的叔叔阿姨，即使有不美满的婚姻，也不要打打闹闹，从我的牺牲中做一个参考。家庭不好特别对孩子不好，因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最大。

春树说到“外面”这个词的时候，抬起了头，看着外面，目

光有一种极目远眺的意味，他的脸微仰着，显出向往阳光明媚的“外面”的神情。但他很快又低下头。这一天，是5月8日，离他19岁的生日只有三天，按照我国的法律，年满18岁，就要承担完全刑事责任，春树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据警察们说：“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他的死刑是定了。”

春树要回去了，我们跟他说“再见”，他却没说。当他听我们说，一会儿我们会见到他的母亲时，他托我们转告他母亲：要“好好爱护身体”。狱警进来，带他走，他年轻的背影消失在那扇红木门后，铁镣碰撞在水泥地上的“哗哗”声又一次响起，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声音很大，很刺耳，再一次让人感觉很冷。

会见孙荣红

我们等着会见春树的母亲，孙荣红。

孙荣红的到来是静悄悄的，听说刚进来的时候，她也戴上了脚镣，监管大队的女大队长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她不应该是死刑犯，又把她的脚镣卸了下来。狱警同样把她锁在犯人椅子上，她很顺从地把胳膊抬起来，配合狱警的动作。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艰难，她告诉我们：“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想咋能保住俺儿的命，啥也记不住了。”她坐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流眼泪。就在她抬手擦眼泪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的左手只有两个手指。

问：听说你在学校里教书？

荣红：是的，我1976年高中毕业，因为手有残疾，就更加勤奋学习，毕业后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后来又考上了师范学校，学了三年，转成了正式教师。每年我教的班都是前几名，学校里搞评比嘛。

问：和你丈夫相比，你的个人条件要好一些呀。

荣红：哎，当时也是因为手，手有残疾，不敢找好的，他也

是人家给介绍的。他太懒，一点活也不干，你叫他干活他就打，结婚三天就开始打。俺儿他根本不管，从小就不管，长这么大，没吃过他的，没穿过他的，都是俺妈、俺妹妹帮我管。我上班忙，还得种他的责任田，种子、化肥我得花钱买。他确实是个懒人，连拾把柴火烧热炕的活都不干。

问：他对你的虐待你一直忍着吗？

荣红：我的体格打不过他，不忍怎么办？在孩子6个月的时候，就因为他老打我，我提出过离婚，他说，要离婚就不给我孩子。我一看他根本不关心孩子，留给他不行。难在孩子身上，孩子大了，再一想，将就他吧，怕离婚对孩子不好。

问：他打你的时候一般用什么打？

荣红：有时候拿刀，有时候拿斧子。关键是我一下不动，他打一会儿就算了，我一动手那就不好说了。有一年，他非要让我从中心学校调回村里的小学，我不愿调，人在哪儿呆习惯了不愿动，校长也不放我走，学校也愿要好老师，我正上课，他掂着刀冲进去，在讲台上把我砍倒，又掂着刀去找校长，要杀校长。

问：你报过警吗？

荣红：找过支书，也找过保安，谁说话也不管用。从去年夏天，我们分居了4个月，他弟弟也上我妈家又打又骂，把我妈家的铁门都砸烂了，也打过“110”，“110”来了说让当地解决，他们不怕。我们家姐妹3个，都出嫁了，家里就老父亲老母亲。这一回（指2000年12月27日）晚上7点半，他又是手拿斧头去我妈家，是我从他手中夺过斧头的。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人要是我杀的，咋也好说，我怎么样都行，我宁愿我死，拿我的命换俺儿的命。现在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想咋能保住俺儿的命。

孙荣红坐在那儿，眼泪就不停地流，像是一串没有尽头的珠子，掉啊掉。我感到，孙荣红的谨言慎语，除了她说的“脑子一片空白”外，好像对我们还有一些戒备。我们来此访谈前，不仅

得到相关部门的同意，也通过相关部门，把我们访谈的目的告诉了孙荣红，征得她的同意之后，我们才安排这项工作，她为什么又不太配合呢？后来我们听说，就在我们来的前两天，当地处决罪犯，孙荣红、侯春树和他的姥爷，都去陪了法场。了解了这个情况，我们就理解了孙荣红的心情，法场上的情境一定是给了她极大的刺激，使她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怖、可怕，感到了死对儿子的威胁，作为母亲，这是剜心割肉般的痛苦。

在孙荣红被带回去之前，她不忘央告我们：“求你们，想办法救救俺儿！”

会见孙荣英

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我们找到了春树的姨妈，孙荣红的妹妹孙荣英。荣英的性格显然比她姐姐爽快，快人快语。

荣英：这个案子普兰店都知道，电视台放了。我妈说，春树是从他爸手里夺的斧头，可春树供认时说：是从他自己衣袖里拿出的斧头，电视里就是这么播的。我老妈说：“这孩子怎么这么骡（傻）！”等他清醒过来说是从我爸手里夺过来，已经晚了。记录已经记下了。这是在春节后放的。就这么公布了。给他请了个律师稍离了缝（有一线希望），公判会一开，又不离缝了（没希望了）。这孩子进去无精打采，自暴自弃。

问：事情发生之后，为什么不让孩子去自首？

荣英：没去自首都怨他姥爷，他不让去自首，当时我妈我姐都说去自首，孩子也想去自首，可我老爹不让去，说出事他顶着，一人犯法不能全家顶。一人做事一人当。刑警队对春树的确同情，但同情归同情，法律归法律。

问：春树这孩子平时怎么样？

荣英：老实，自尊心还强。这个孩子在社会上，在学校里，没有人说他不好。他就嫌他爸丢人。他爸经常骂人，从街这头骂

到街那头。我们去帮助他打井，他也骂。为打井也骂我爸，他长期吵骂，孩子嫌丢人，放学路过他自己家都不回。孩子多次这样讲：“你看人家有个好爸爸多幸福。你看我这家庭。”

这个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极大极大的。他爸要不是说“杀死你们全家”，孩子他也不能（这样做）啊！当时他说要杀死全家，孩子知道是真是假？作为爸爸，你的行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恩德。就是给孩子生出来，孩子叫他声爸，除此以外，他连个邻居都跟不上。孩子有病，他连去医院看都不看，孩子到啥程度他都不管。

问：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你姐姐？

荣英：他俩结婚不久就打。那一年，他和我姐在家吵打。他俩在家打完了，到我妈家，一下把玻璃砸碎了。他刚把玻璃砸了，他爹和他四哥就跟过去，我爹问他亲家怎么回事，话刚说完，他四哥就把我爹推一眼头。去年7月15日，他家老四去我妈家吵，说我姐长年住娘家，根本没影的事。（2000年）8月17日这一天晚上，他家老四又去打，把我娘家门闯开，把我爹鼻子都碰出血。我妈说，这样欺负不能过了，我们去告。去派出所也报了（案），也打过“110”，“110”告诉说让当地解决。8月18日，村上保安也去了。他老四因为我姐告他了，就从他奶家一直骂到我妈家。这事我遇上了，我姐夫欺负我姐，他兄弟也来欺负。我知道他没喝酒，但我还是问他：“怎么，他四叔，是喝多酒了？”他也不回答，还是骂。我妈怕他打我，我不怕。接着他就骂我姐了，连我妈一起骂。我说：“没有法律了?!”他说：“法律算个鸡，我看谁敢登我门，谁敢登我门我就干断谁的腿。”我姐夫把我姐领走，刚走到三岔路口，他家老四跟上，一下把我姐打倒。

我姐想与我姐夫离婚。我姐夫说：“你要跟我离，我就干死你！”他还上我妈家点过一次火。把我妈家的麦秸垛烧得一点都

没有了。我姐胆小，想等孩子大了跟孩子过。一天天凑合，谁知道出了这种事。我姐就是怕，忍气吞声到现在。你说就是打死，也是你俩的事，可现在，毁了孩子一生，毁了一家人，我妈因为有脑血栓没让她进去，有我们家这么惨的吗，三代人都牵扯进去，我姐、我爹，他们三个人都在里面。

抓春树的当天晚上，派出所打电话让我回家，我问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你回来就知道了。”我第二天就去了。三点钟拘留的，六点钟就招供了。他大脑糊涂了，吓得怎么大怎么说。

第二天，带他来拍摄（现场），刑警队的人让我把我妈带走，怕她受不了。我站在雪地里等了两个小时，想见他们一面。他看见我，把手铐藏着，怕我看见。拍摄现场那天我姐没回去。孩子那辆车停下来了，他没穿黄马夹，给他留点面子。车停下来，我跟孩子说了两句话，他还想着他姥姥，说：“姨，好好照顾我姥姥。”我说：“你不用操心姥姥。”我爹那辆车没停下，我看见他穿的黄马夹。我想跟我爹说两句话，因我老妈有脑血栓，我怕他挂念，想告诉他不用挂念。但没让我说。我真没想到我爹 73 岁去遭这个罪！

他们被抓之后，派出所的人找我说：我妈就得靠我照顾。姐夫家处理我姐夫的尸体，派出所的人说：“你姐还有几个月的工资，让你姐夫家的人领了。”他家也有老人，我说：“领就领了吧。”他四叔过来，我对他说：“这边就要靠你了。”他摆着手说：“不管，不管，一切靠法律。”

（2001年）2月14日的下午，派出所来电话，让我去拿逮捕通知书。那时，春树他二大爷、他姑都在我家商量归拢（处理）我姐夫的事，我姐去年6个月的工资都让他们领走。他们也说要挽救孩子，说是侯家的骨肉，然后还要挽救他妈。把钱骗去了。到现在不见救的踪影。

现在，春树真是生不如死，市里开公判会，他们也带着牌子

在旁边看，执行犯人的刑场他们也去了，但是没靠近。他们心里的压力绝对大。

问：你刚才说，春树的爷爷锁了你妈家的门，为什么？

荣英：他们说：是我爸帮着一块打的，让赔偿损失。他二大爷和他姑找过我两次，一次归置我姐夫尸体的事，我把我姐的工资给他们了。第二次是让我们一家拿 2000 元钱，我光管我家这三人就够我受的了，没办法，我和我妹一人拿了 100 元，就算给我姐夫的烧纸钱。

我给春树请了律师了。我对他二大爷说：“我知道你们的情况都不太好，请律师不需要你们拿钱。如果需要你们写证明材料，你们就写，不需要就算。如果需要你们到场去保孩子的话，车费我负担。”他二大爷说：“他流的是老侯家的血，我说救就是救。”

可是他说是说，门还是锁着，我妈也回不了家，原本好好的一家人，现在家破人亡，还不知道春树最后是个什么结果。

后记：2003 年 5 月初，我又一次给春树的姨妈打电话，询问春树的情况，他姨妈说，案子去年 8 月已经判了，春树判了死缓，他妈妈无罪释放，都回单位上班了，姥爷判了三年。姨妈说，“他们挺好的，挺好的”。

这个消息让我的心一天都是轻松愉快的。

点评：

不该由他们付出代价

陈 敏

读完对侯春树的访谈录，掩卷沉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侯春树及其家人的受暴经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其实很具有代表性。那就是：当家庭暴力受害人不堪忍受长期的暴力侵害，要求执法机关干预时，执法机关往往会以“夫妻打架是家庭私事”为由拒绝介入。而一旦家庭暴力受害人在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奋起反抗，不得不杀死原加害人时，原先拒绝介入的执法机关便会迅速介入并严惩原受害人。

侯春树之所以杀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当地派出所屡次接报警后拒绝出警的失职行为造成的。执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冷漠态度，大大地鼓励了侯春树的父亲，使他有恃无恐，将暴力控制家人的手段应用的得心应手，从而使侯春树及其家人对寻求司法救助感到极度的绝望。侯春树就是在自己、母亲和姥姥、姥爷的生命安全无法获得国家的公力保障时，不得已而采取私力救助。这样的后果，让长期深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侯春树及其家人承担，实在是不公平，这也不符合司法公正的原则。因为，不管暴力来自家庭成员还是非家庭成员，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不受侵害，都是执法机关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期望我们的社会能更多地关注家庭暴力的犯罪性质和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危难处境，期望我们的立法早日做有利于家庭暴力受害人权利保障的修改，我们的执法机关改变观念，不再将人身侵害的主体是家庭成员还是非家庭成员作为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分界线，严格依法办事，使许许多多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及他/她们的家人不再仅仅为了想要过上没有暴力、没有恐惧的正常人生活而被迫铤而走险，付出不该由他或她们承担的惨重代价。

20. 就因为我生的是女孩

叙述人 赵小燕
访谈人 范爱莲 张捷明
访谈地点 北京女子监狱
访谈时间 2001年3月2日
录音整理 范爱莲
文稿编辑 薛宁兰

赵小燕，41岁，乡镇企业职工，初中文化，因生女孩，受到丈夫及其家人的歧视，夫妻关系开始恶化，并多次遭到丈夫殴打。1998年某天，在与婆家人的吵打中，她手握刀子不慎将其夫的姐姐戳伤，并致其死亡。经法院审理，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减为有期徒刑20年。

我是通过别人介绍跟我爱人认识的。跟他搞对象时觉得他挺好的，那会儿他对我付出的是真感情，要死要活的，又喝药，又跳山地跟我好。在情人眼里一切东西不管是错误的，还是虚伪的，我都认为是最好的。这会儿回忆起来，我要是当时理智一些，也应该看到他的缺点，可是那会儿就是没有看到。以前我也搞过一个对象，因为种种原因，谈了几次就不乐意了，我觉得也挺伤害人家的。那会儿农村也挺保守的，互相见过几次面，那个男的挺乐意的，我不乐意。他的朋友给我写过信，管我叫姐姐，说：“姐，你知道吗？你不乐意后对他的伤害有多大，你提出了不跟他搞对象，他喝了好多酒，都胃出血了，现在住医院了。”

当时我也想，已经说不乐意了，我再去找人家，就怕人家说藕断丝连的。后来我想，我以后搞对象，不管他长的难看与否，只要他是真心，对我付出真感情，我就要真心对他。所以，就是在这件事后，在这种心情下跟他搞的对象。他当时是挺乐意的，他当时跟他父母闹的特别不好，他的心情也特别苦闷。最开始他的父母怕我是外地的，把北京当成跳板，就不太同意，对他说：“别让她给你骗了。”我想也可以理解，人家儿子找对象，当然怕上当受骗。我觉得我结婚以后要用实际行动来感化他们，驳倒他们的谬论。

我们是1986年8月结的婚。一开始我们感情还不错。结婚时，他妈还对他儿子说：“你媳妇是外地的，这经济权你可不能交给她。”结婚后，我想我这个人大大咧咧的，挺粗心的，他细心，我就把工资都交给他，连工资条都交给他。那会儿我在一个个体家具厂工作，他在乡林业站搞种子工作。

我丈夫第一次打我是从1987年开始的。我们1986年结婚，1987年我生了女儿。他们家算日子说一定是男孩，结果生了一个女孩。我爱人挺生气的，说人家医院给换了，还对我说：“你喜欢女孩，是不是你给换了？”还要找医院打架。我说：“你看看这孩子像不像你，你还说人家给换了，人家能给换吗？”他父母也挺生气的，因为我生的是一个女孩，他们家是哥俩，他哥哥家生的就是一个女孩，我们再生一个女孩，他们家就绝了。他爸爸就说：“这回我们家可绝后了，这回我们家可绝后了。”那会儿我们工资也少，他们家也不给看孩子。

我丈夫也觉得没奔头了，生了一个女孩，不照男孩那么有奔头似的。有时喝酒就撒酒疯。那会儿他妈还老说：“要是再找一个外地的，找一个没有结过婚的，还能再要二胎呢。”她就是老给儿子说这个，搞得他也想，女的跟他结婚就能进皇城（北京），再生个男孩。因为按计划生育规定，找一个没结过婚的就能再给

一个指标。

后来我就发现他有外遇了。开始时我具体也没有抓到什么，实际上他跟他们单位的一个女的挺好的，我当时没有多想，我觉得一个厂的同事，男的女的在一起无可非议，也可以互相交朋友。1990年的一天，晚上11点多了，他还没有回来，我特别着急，就出去找。我去了他们单位，单位说早走了，4点多钟就下班走了。到了晚上1点多钟还没回来，我又找人陪我去他们单位问是不是又回单位了，值班的老头又挨屋转了转，也没有。等了一夜也没有回来。这一晚上我就没睡好，他父母也没睡好。第二天我就看见跟他挺不错的那个女人的爱人，我说：“你知道我们家的去哪儿了吗？”他说：“不知道。”但是他说完就乐了，我看他的乐不对劲，就说：“你不知道，他没上你家去？”他说：“是上我们家去了，他不让告诉你。”我说：“为什么不让告诉我呀？”他父亲也挺着急。我到厂子就给他父亲打了个电话。后来我问他：“你一晚上为什么不回家？”他说：“自行车坏了，我上他们家修车去了。”我说：“那天刮西北风，往家走是顺风，往他们家走是逆风，你怎么不往家走，反往他们家去？”因为那事，我们俩人吵架，他还打我。那会儿他没少打我，他把我眼睛都打得青紫青紫的，肿了，把身上也打了。

我也找过大队的妇联。妇联有时就说，不行就离婚吧。我记得朱镕基总理说过，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我听了心里特有感触，我想如果要是咱们的妇联和有关组织能对人民特别负责任，能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也许我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1997年6月，一天晚上，孩子出去玩，他就催我找孩子。我回来后见他在外头站着，我说：“你让我找孩子，你自己站着，不成。”他说：“那好，咱们去遛弯儿。”我们走到村口，我发现他有点儿不对劲，我就逗他说：“干嘛，有约会啊？”他说：“没有。”这时就看见那个女的骑着车过来，她穿的挺漂亮的，见到我们，就放慢

脚步，看了看我们。我爱人就对我说：“我去那边找两个铁管。”我说：“你别去了。”他就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说：“你要去就去吧。”回来后我就去他大哥家，他大嫂说：“没好事，咱俩去看看。”正好遇见他和那个女的往回走，我就问那个女的：“你找我爱人什么事啊？都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回家说，也许我还能帮你呢。”她不说话，骑车要走。我就拉着她的车说：“你别走。”我爱人就动手打我，乒乓五四就打了我一顿。后来就不回家了。我就想让他父母、他哥哥、他姐姐劝他。他哥哥也不敢深劝，说是劝赌不劝嫖，他哥哥也没他的力气大，还怕打不过他，他哥哥也不管了。我又对他姐姐说：“这事你得管管，劝劝他。”

我丈夫因为跟那个女的，得了梅毒。他上医院没告诉我。他往录音机下塞了一张纸条，走后我翻出来一看是医院的化验单，上面写的是外文字母，我拿给开诊所的朋友一看，是梅毒。我就跟他说：“你得了这个病，回头你把我们娘俩也传上了，你也得为这个家想想。”他说：“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想夫妻一场，还是愿意他的病能好，我劝他别再跟她好了，不然病不是越来越重吗？后来他去了外地的一个性病研究所，带那个女的去的，花了1200多块钱，拿了两大袋药，可是他还是老去那个女的家。我挺生气的，去找他哥哥。他哥哥说：“都到这地步了，你也别找他了，找回他人找不回他的心。”我不死心，又找他姐姐。他姐和我就把他从那个女的那里叫了回来。本想让他母亲劝他。他母亲说：“别跟我说这个。现在这社会，就时兴这个，不丢人。”虽然她这样说，她儿子得了这个病，她还是挺心疼的，也哭了。

从那时起他就不回家住了。自从1997年9月把他从那女的家里拉回来，他就再不回家住了。你一问，他就跟你打架。他说：“你还拉我回来有什么用，你就像癞皮狗一样，你不就是不

想走吗？我告诉你，你要协议离婚，还能占点便宜；不协议离婚，连一根火柴棍你都别想拿走。”我觉得这种心灵和肉体的创伤使我真的对这个家感到失望了。1997年9月8日，我第三次提出了离婚。

我第一次提出离婚是在1987年12月。女儿出生后，他和他们全家都盼男孩。我生的我就喜欢，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喜欢。他也不干活，还打我，我就提出了离婚。第一次提出离婚，他不同意，当时我想冲着孩子，他要改了就凑合着过。1992年我又提出过一次离婚，他对我说：“人家说了，你这个媳妇就是欠揍。走，到村外头去。”后来我对他说：“我怕了你了，你是英雄，成吗？”我说这些时眼睛里流着泪，我真的是感到我的心在滴血。

这次我向法院提出离婚后，开了两次庭。在法庭上审判员问，“你们为什么离婚？”我说：“他有外遇，他老打我。他还得了梅毒，我怕传染。”他反说他的梅毒是我给传染上的，我将律师让我在医院做的化验和他的梅毒化验报告交给法庭，他才没的说。1997年11月，我想尽快离婚，就到法院去了，法院说你们的财产分割不清，你得先析产，你还得先撤诉，我不想撤诉。可是律师说，法院到年底了要提高结案率，我要不撤诉，就影响人家拿奖金。我要想离婚，就得走这一步。我一听，真是没办法了，就在1997年11月7日撤诉了。接着，我就起诉了析产。但是一切证据对我都不利。因为婚后盖房子是他父母给钱买的材料，这些当然都写的是他们的名字。我觉得我就像掉到一个陷阱里了。

他打我最重的那次，是在1997年11月24日。他把我打坏了，也可能他想把我打死。你看我脑袋，这儿缝了8针，这儿缝了6针。我爱人有了外遇后，他好些天没有回家了。1997年11月24日早上，我起来出门上厕所，天还有点黑，也没看清，就

受到大棒子的袭击，乒乓五四地就朝我打来，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嚷起来了：“救命！救命！”我的女儿从屋里跑出来，一看是她爸爸在打我，就对她爸爸说：“爸爸，求求您了，别打我妈了。”他还是不听，继续打我，就把我打昏了。我女儿害怕了，赶紧找我的一个朋友，对人家说：“大妈，您快去看看吧，我爸爸把我妈打死了。”后来，我的那个朋友就把我搀到她家去了。她开了一个诊所，给我缝了针，打了封闭，就找车把我送医院了。为这事情，我找了派出所。找派出所时，他们总是楼上楼下的有事，我一等就是半天。我还得上班，我孩子要上学，我需要工作，我需要挣钱。我想通过法律解决，因为他打我头部，缝了14针，浑身软组织都打坏了不少，医院都有证明。打完我以后，他就跑了，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后来我就要求公安机关把他抓起来，他把我打成这样，在外面胡作非为，整天不管家，回家不是打我就是耍钱。派出所说：“我们也在找他，我们找不到他。”后来我知道他藏在一个朋友家了，我告诉派出所，可是派出所说：“我们去了，他没在那儿。”

主管我们那片的民警对我说：“人家都说我们派出所连人家两口子打架都管，你们真逗，你们没的干了吧！”他说让我同意他们的调解，说让他赔我1800块钱，当时我住医院手头没有钱，我跟我爱人单位借了500块钱，所以赔了1300块钱，再加上我借的500块钱。我说：“这算什么，这个钱就是我们夫妻共有的，这根本就不算他赔我。”民警说：“那你还让不让我们解决，你还不想解决了？”因为我还要在这里住，我不想得罪当地的派出所，也可以说我违心地同意他们那种解决方法，赔了1800块钱。我想那次如果我用法律保护我自己，我也不至于现在这样自己进来了（指进监狱）。自己是受害者又成了害人者了。

这以后我在家住的时候就害怕，生怕不知什么时候他闯进来再打我。我把门上下用四个门栓顶上，再顶上椅子，椅子上还放

着一个倒立的酒瓶，把灯绳拴在床头，生怕他不知什么时候闯进来再打我。从我被打以后，孩子也害怕。她说：“妈，以后您出门时，我先出去，出去以后我就唱歌。妈，您知道我为什么老唱着歌进出吗？因为他一听是我的声音就不打了，其实我也害怕，怕他以为是您，再把我打了。”孩子对她爸爸说过：“爸爸，你们两个是不是因为钱打架，如果是因为没有钱，你就把我卖了得了。你们把钱分了，就别打架了。”我们是孩子的亲爸爸、亲妈妈，我听了这些心里特别难受，我想这孩子真是也跟着这个家受罪。我想不在这个家住了，就带着孩子住在厂子里了。我每天上班拼命干活，还得接送孩子上学，顶着大北风，推着自行车，越想越觉得活得没劲了，就对女儿说：“媛媛，妈妈活着真的没劲了，真的不愿意活了。”说完我就奔着一辆汽车去了，司机猛一刹车，说：“你找死呢！”我说：“我是找死！”

那时我真想自杀。孩子对我说：“妈妈，我不坐车了，我下来。我以前一直想对您说，我怕您生气，今天我一定要对您说，我说完了您打我也好，骂我也好，我必须要说，您必须要坚强地活着，我可不想死，我刚这么大点。您没想想我姥姥这么大岁数了，您还没养活我姥姥呢。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学习，挣钱养活您。”孩子这么说对我震撼特别大，为了孩子，我得好好活着。

我妈和我姐都不赞成我离婚。在我们农村，丈夫打老婆有的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妈就说，你出一门嫁一户的，能凑合着过就行了，早晚他有清醒的那一天。因为我们家在农村，挺守旧的，我姐姐就说：“你要是提出离婚，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别来找我们。”我大姐和我二姐还老这样说我：“能挽回就挽回，你好好对待他，把他的心唤回来。”

后来就发生了我将大姑姐扎死的事。1997年11月以后，天气冷了，住在厂子里也不方便，我带孩子又搬回家住。因为他老打我，我妈妈就不放心，过来看看我。1998年4月21日，我妈

妈来我家，那会儿我一天打两份工，早上在大队扫街道，白天去工厂上班。每天早上4点起来扫街道。4月23日早上6点左右，我扫完街道回来，听到那边吵吵嚷嚷的，正好我们邻居骑车过来，说：“你还不快去，他们在那儿打你妈呢！”我赶紧跑去一看，我大姑子姐和她儿子正打我妈呢，我妈被打得滚在地上，满身是泥。我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你们打我就罢了，还打我妈?!”后来他们就把我也打了。我呢怎么也不是个儿，赶紧拉着我妈就跑。我就给派出所打电话说：“你们快来吧，他们又打我们了。”派出所的人说：“我们刚巡逻回来，刚睡下，等会儿吧。”我又给我大姐打电话说：“你快来吧，他们把咱妈打坏了。”我姐来了，我们正要送我妈去医院的时候，我大姑子姐和她爱人来了，站在我家门外就骂：“装什么死啊，赵小燕，你出来，出来打死你。”后来我姐姐就出来了，说：“你们有完没完，你们是不是太欺负人了，我妹妹整天挨打，你们还打我妈妈。”他们一下子又奔我姐姐去了，又把我姐姐给打了。我一看就急了，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当时就想吓唬吓唬他们，拿了一把刀就出去了，没想到，我冲出去的时候，大姑姐就奔我冲来，大姑姐的爱人在她后面也冲我奔来，这一冲撞，刀子正好扎在我大姑姐身上。

大姑姐为什么跟我妈打了起来呢？听我妈讲是在上厕所时。我们用的是公共厕所，都在外面。他姐姐遇见我妈，就骂我妈，我妈没理她，因为我妈有气管炎，有痰，我妈就吐在旁边了，她说我妈啐她了，就打了起来，因为我们两家离得近，她儿子听到了，就出来帮她妈打。

后来我就以故意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现在从无期减到有期徒刑20年。1999年7月，我接到他的离婚起诉书。11月一审判决离婚，房子、存款和孩子都归他。我不同意，我们家共有房屋2间，我们1986年8月结婚，11月分的家，都是我和我爱人

自己盖的。我提出了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说是为了便于管理使用，房子全归他，给了我 3500 块钱。我不想要钱，我今年 41 岁，服完 20 年刑就 60 多岁了，我出去后没有房子住，那会儿我父母也不在了，我不可能住在我姐姐家。我申诉了。我写了一份申诉材料，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

我真的很后悔，自己原来是一个受害者，现在变成了一个害人者。希望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劝劝受害的姐妹，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候好好把握自己，千万不要做出冲动的事。还有就是咱们的政府机关、法律部门和妇联，在受害人受到伤害时，能够给予及时的解决。

点评：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至关重要

范爱莲

2001 年 3 月 2 日，我们来到女子监狱的接待室，随着大铁门的一声沉重的响声，管教干部将赵小燕带到了我们面前。说明来意，她乐意地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她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一时冲动，却变成了施暴者。现在，她非常后悔，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往外倒。在整个访谈的过程中，她都是一边哭，一边说。

赵小燕遭受家庭暴力的迫害是从她婚后生下了一个女孩开始的。丈夫对她很恼火，公公婆婆更是认为这是绝了他们家的后，连她的大伯子、大姑姐都对她们有了误会。而赵小燕的娘家人对此事的态度也是令人担忧，她妈妈认为不能因为挨丈夫的打骂就离婚，能凑合着过就行；她的姐姐们也认为“要是因为这事离婚，以后就别来找我们”。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意识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依旧是遵循着男尊女卑的理念，依旧是奉行着传

宗接代的宗旨。赵小燕作为一个女人，嫁入夫家后他们只是把她当做了生育的工具，而且只准她生男孩。而她的娘家人又认为女人要从一而终，不同意她离婚。因此，赵小燕不仅要遭受丈夫对她的打骂，还要承受来自夫家和娘家人的各种精神压力，她真的很苦，甚至想到了死。最后，双方家庭的兄弟姐妹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家庭内部的战争，终于导致了大姑姐被伤害致死的恶果。由此可见，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不仅是夫妻双方，如果社会干预不能及时介入的话，还会殃及其他家庭成员。

赵小燕在遭受了丈夫的毒打后也去找过派出所，经派出所调解，丈夫赔了1800元医疗费给她。但是，她丈夫并没有因为此事而受到教育，反而变本加厉地对她进行迫害。当时人们对于家庭暴力问题认识不够，不少人认为丈夫打老婆是家务事。正如那位派出所民警所说：“人家说我们派出所是管闲事，人家两口子打架你们也管，你们没事干了！”这也正反映出在《婚姻法》修正之前，我国在法律上对家庭暴力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无法可依。2001年《婚姻法》的修正，填补了这一立法空白，它在第一章总则部分的第三条第二款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在第五章第四十三条中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第四十五条中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公安机关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使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中做到有法可依。

人民警察担负着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打击违法犯罪的职责，在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家庭暴力案件都是通过他们调处的。因此，提高他们反对家庭暴力的意识，充分发挥他们的职能作用，将能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21. 活着受罪就想死

叙述人 袁怡草
访谈人 宋美娅
访谈时间 2001年8月16日
访谈地点 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卫生院
录音整理 宋美娅
文稿编辑 宋美娅

因为遭受丈夫和公公的打骂，袁怡草自杀过三次，都是在镇卫生院抢救的，镇卫生院王副院长热心地带我去找她。乡村的夜漆黑，路面坑坑洼洼，我紧跟着王副院长，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白天我们到她家来过，她不在家，她丈夫一双大眼睛里充满了警惕和狐疑，谨慎地说她“下地拾花生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想，晚上她总该回来了。果然，灯光从门缝泄出，“家里有人”，王副院长说。她一边拍着院子的大门，一边喊：“袁怡草、袁怡草。”屋里没有回应，突然，灯灭了，狗叫起来了，紧跟着，四野围合，吠声大作。院子里却一片沉寂，王副院长说话的声音有点发颤：“咱回去吧！”

第二天早上，正在我有点失望的时候，袁怡草跟着王院长来了。她1962年出生，上过两年中学，是一个清爽利索的女人，乌黑的头发高高盘起。讲话也很利索，她问我：“我讲话你听得懂吗？不懂我可以用普通话讲。”

离不了婚就想死

我和丈夫结婚 18 年了，是我表姐介绍的。刚结婚头几个月还可以，后来就不行了，打得厉害。

刚结婚时，我们和公公婆婆一起住，我婆婆是老牌高中生，公公 16 岁就当生产队长，但公公的思想还像是旧社会似的，媳妇就是媳妇，说你什么你只能听着。现在的年轻人跟过去可不一样，他看不惯（我的做法），我那口子在外面开车，一回来公公就说给他我的不是。他脾气杆子得很（脾气躁、不分青红皂白），一听公公说，上来就抓住我打，一打就拿家伙，看见什么拿什么，不见血不撒手。公公婆婆看着我挨打不管，打得我受不了，闹过多少回离婚。可是我娘家不同意。我父母觉得离婚多丢人，嫌名声不好，劝到现在。我父亲说：“只要你离婚，进我这个门，我先拿箔把你卷死。”我母亲说：“过人家不容易，哪能一打就离婚。”婚离不了，我才想到死。

那是 1986 年的夏天，女儿 2 岁，那一天，雨下得好大哟。下了雨，就得插红薯秧，赶这个季节。我把闺女送到公公那，让婆婆带一会儿。他们不带，他们说，只管儿子辈的事，不管孙子辈的事。可是农村女人活多，我一个人要种 8 亩田，开了个米面加工厂，还养两头猪。孩子爸在外开车，一落家就出去玩，不给你带孩子。我都是一只手抱孩子，一只手干活。这下雨带孩子不方便。他们不给带我就着急，我说：“是你家的孙子娃，你为啥不带？”我公公嫌我顶了他，开口大骂我，抽出赶大车的鞭子，照我身上甩几鞭，我的胳膊上、脖梗上，立时就起来了一道道红梗子。我气得哭着走了。

等晚上小孩爸回来，不知我公公给他学点什么，他回来家二话不说，一下子就把我摔翻在地上，骑在我身上打，抓着头发往地上撞，我的头发被他一缕一缕地抓掉了，你看这块疤，到现在

还不长头发。(她撩开乌密的头发，果然见一块钱币大的疤。)

当时正打油菜，家里有“乐果”(一种农药)。他打累了，住手了，我慢慢爬起来，找着药就喝了。我闺女抱着我的腿哭，两岁多的孩子就晓得喊：“我妈妈喝药了，我妈妈喝药了！”喝完药，我往外走，走到大门口，吐得不行，小孩爸弄了个板车，一溜儿小跑把我送到医院，抢救了8天，脱离危险。医生、院长看了我身上的伤都说他不对。在这期间，我公公婆婆一次也没来看过我，他们说我是装死。

回家后，街坊邻居也说他：“你媳妇要手头子有手头子，要嘴头子有嘴头子，里里外外能干，你还不知足？她要死了，娃子们多可怜。”“你也是大人了，老人的话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能全听。”小孩爸觉出自己的不对了，一个月后，他对我说，他要去深圳打工，他说：“我不在家，老人对你可能会好一些。”接着，他就到深圳去了。

没成想，他走了以后，公公对我还狠些。

公公跟我过不去

上回的事之后，我不说让婆婆带孩子了，上地干活，孩子就放在地头。经过这次喝药、洗胃，我的身体还没有很好恢复，地里的活又重，常常觉得吃力。可是公公不让我用耕牛。

这头牛也有我一份。生产队分田到户时，随带着分了这头牛，当时我们还和公婆一起过，我结婚一年后和公婆分了家，只把田分了，牛还留在公公家，公公不让我用，我没得办法，请(借)(别人家的牛)又请不起，在医院花掉了700多块钱，还是卖粮食、卖棉花凑的。村里人大部分都姓胡，是他们一个门里的，我小叔公、大姐夫，看我怪难，经常把他们的牛让我用。

有一次，生产队让拉石子，交不上石子得交钱。村里人说：“你们家老爷子请车拉，让他给你带一点。”我去给公公说时，公

公不答应，他说：“我给你的少了，你不愿意，给你的多了，我不合适。”我说：“那就把板车让我使使，我自己上山去拉。”实际上，这个板车也是生产队分的，我也有用的权利。公公还不答应，他说：“山上的路那么陡，你要把车子给我摔坏了怎么办？”我一听就生气了：“你只怕把车子摔坏了，不怕把人摔坏了，你们又不给我带孩子，我还得把孩子搁车子高（上）头，你就不怕媳妇下山摔死？”

我公公摸起个大棍子抡起来打在我腿上，还没等我转过神，几棍子就打得我晕了头。

回到家里我越想越生气，离婚吧，我父亲要用箔把我卷死，一个女人要种8亩田，还有（个）加工厂，挨打、受累，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我就给小孩爸写信，我死也要死得清清白白，我公公能说会道，等小孩爸回来，我不在了，还不是他说啥是啥。中午我也没吃饭，把孩子打发到小叔公家，骑车跑了七八里地，到镇上把信发了。回来后，我找了个绳子挂在房梁上，刚把套圈套在脖子上，就在这时，我闺女回来，她使劲抱着我的腿，又哭又喊。我小叔公、婶婆都来了，把我劝下来。婶婆说：“算了，让你叔公把你的石子交了。”

小孩爸接到信后很快就回来了，婶子大娘们七嘴八舌告他说，这回确实不怨我。他对他老的也有意见了，往后有两年的时间不怎么跟他父母来往，他在外面干点帮工，挣了钱先买了辆板车。

我到广州打了五年工

1989年深秋的一天，我搂着两个孩子睡下了，夜里两三点钟他回来了，一把手把我从床上抓起来，摁在地上就打，我正在睡梦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急慌里要逃命，他不让我走，抓回来还打得狠些。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那次是为什么打。那时我

家是木头门，他把门反锁上了，趁他不注意，我从门缝里挤出去了，出门我就跑，他在后面追，我没有穿鞋，眼看跑不过他，我转身藏在棉花地里，看着他从我身边跑过去，他没有看见我。

深秋的夜，挺凉的，我只穿着背心短裤——正睡觉的嘛，冻得直哆嗦，就这样赤脚走了几里路走到我娘家，也不敢进去，怕半夜里吓着他们，就在外面呆了一夜。天亮了，我爹看见我吓了一跳，当时我浑身是伤，半个臀部都是紫的，老父亲气哭了。不一会儿，小孩爸撵来了，要叫我回去，我父亲说：“她都死几死了，不叫她回去了，只当我多养了一个儿子。”他就在我们家闹，当着我父母的面打我，拉着我的胳膊往外拽。这回有我父母的支持，我怎么也不跟他回。他走了以后，我父亲说：“去你二姐家躲躲吧。”我到二姐家，他又打听到了，又是去闹。反正他就是让你在哪个亲戚那都住不住，闹得人家不敢留你。我又去了襄樊大姐家。过了两天，他又找到了。大姐上班走，叮嘱我别跟他碰面，怕他打我。我在屋里把门插上，他翻窗户进来，我出去再到别的屋。他对我姐姐说：“你再不让她跟我回去，我从你这五楼跳下去。”他看我姐姐不理他，又说要回家把孩子带来。

我有个表妹在广州打工，我父亲和姐姐给她写信说了我的情况，让表妹速回信。正好这天下午表妹的回信到了，我姐说：“你快走吧，明天他就带孩子来了！”我乘当天晚上的火车去往广州。大姐送我上车，我们姐俩哭得啊，虽说有地址，但毕竟第一次一个人出这么远的门，我想着出去闯闯，闯不出来就一头撞在火车上，谁也找不着我。

到广州很顺利地找到了表妹，第二天我就上班了。三天后，小孩爸就站在了厂门口，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了，闹啊等啊地要见我，他对表妹说：“你让我瞧她一眼，只要瞧见她在这儿，我就放心了。”表妹不让我出厂门，怕被他打，表妹说他：“你要敢在这儿闹，就叫保安。”他隔着厂门对我说：“你在这儿我就放

心了，我也不回去了，上平湖老乡那找个工打。”

第八天，我突然肚子疼，疼得死过去，老乡们就把我送到平湖他那里，医院在输液里加了安眠药，我照样疼得摔在地上，身上抓得流血，眼睛涩得睁不开还睡不着。医院让我们往深圳转院，他哭了，说：“她肯定好不了了。”我们有个老乡在军区医院工作，他给我们担保，双方厂里出了点钱，慢慢病好了。出院之后我就留在平湖，跟小孩爸一个厂上班，他是技术工，一个月能挣1000多元，我基本工资500多元。星期天我们可以一起做点饭，逛逛街，这一段时间比较好。

我丈夫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把孩子锁在屋里了，心想，大人还没着落呢，孩子就自生自灭吧，邻居叫了他们爷爷来。这些年，爷爷奶奶照看着孩子，开始我每年给公公600元钱，1993年增加到2000元，两年后我公公还要让增加。我想着自己的孩子还是要自己带，我也想孩子。1995年，我就回来了，小孩爸1997年回来。

他再一次逼我上绝路

从广州回来后，我再也不想和公公住在一个村，我们在镇上买了户口，买了房，给小孩转了学，小孩爸用余下的2万块钱做生意。我知道我也斗不过他，平时他不高兴就骂骂咧咧的，我不吭声，这些年凑合着过去了。

这一次（自杀）是因为很小一件事。春天时儿子去春游，捡回来一盒烟。我想留着家里有客人时用，就让儿子藏起来了。这天是星期五，小孩爸回来，对儿子说：“给你妈要钱，给我买盒烟。”我说你都没钱，我上哪弄钱。我们这儿做生意收钱很难。闺女说：“今天弟弟还捡了一盒烟。”他爸一听，就让儿子拿出来。儿子看我一眼，见我没有示意，他就没动。他爸抬手就打他。我说：“你那么大的的人了，克制不住自己，有钱抽，没钱就

不要抽。”

他当时坐着个小板凳，抡起板凳砸在我头上，把小板凳都砸散了，正好有个邻居在我家玩，他急忙拉架，我趁空赶快往外走，他从后面撵上来把我抓回去。他打人的时候你不能反抗，反抗他打得更狠。我觉得挺委屈，在他歇手的时候脱出身，我说：“我去找你妈妈评评理。”他上前一步，一脚把我踹倒在地，自行车砸在我身上。爬起来我还往外走。走到大路口的时候，他追上来了，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扯倒在地上，他抓着头发把我往回拖。从路口到我家还有好远一段路呢，他就这样一直把我倒着拖到家门口。我又气又疼，昏过去了。（王院长这时说，她被送到医院抢救时，头皮已脱掉，像帽子一样扣在头上。）

邻居们都出来看，有人说：“你还拖哩，她都死过去了！”小孩爸说：“她是装的，不信，我一磕她就醒过来了。”我们邻居家是石头砌的院墙，他抱起我，抡起来把我的头往石头墙上撞。几个人把我从他手里抢出来，又掐人中，又泼凉水，我才慢慢醒过来。

我特别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天，我去买安眠药，我儿子跟在我后面。我说，多卖给我一点，我天天晚上睡不着，我儿子就说：“我妈和我爸生气了，你莫卖给我妈。”人家就只卖我两颗。走了三家药店，买了6颗。回到家，儿子对他爸说：“爸，我妈想寻死，她去买安眠药。”他爸看我一眼，说：“想死你就死，咋死都行。反正我儿女都有了，结得着（婚）我就结，结不着也有人伺候我了。”这天是星期天，他对两个孩子说：“走，上你奶家吃饭去。”

我已经三顿没吃饭了，他问都没问我一句，还嫌我不做饭。他这样一说，我更想去死。他们走后，我又去药店买安眠药，每个药店买了一板，三家买了三板，90颗。我想起来上次在医院，一个女人吃了30多片，医生说：“晚来一会儿就没命了。”我算

着等他们回来，我也就差不多了。于是把门闩上，喝完药就躺在床上了。

到了奶奶家，儿子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给奶奶说了，儿子强调说：“不怨我妈。”我老婆婆就骂她儿子，她撵我儿子赶快回来。儿子骑车回来，喊门喊不开，他翻院墙进来，屋里头的门我也闩着，他拿刀把纱窗划破，拨开门栓，一看地上的空药板他就哭，我那时候没了知觉，他出门去喊我丈夫的小叔公：“我妈喝药喝死了！”小叔公慌得跑，用板车把我送到医院，院长亲自参加抢救。儿子转身打电话通知他二姨，又骑上自行车去叫他爸爸。这一次是儿子回来得快，不然就不行了。

出院时我大姐把我接到了她家，她气得很，我丈夫每次打电话她都挂了，她说：“不让小妹回去了，她又不吃闲饭，跟我过了。”身体恢复些以后，大姐在襄樊给我找了个工作，在一个小商店里卖东西。

现在孩子们放暑假，我回来收秋，过几天，小孩爸还要去深圳打工，他走了之后我就回来了。

后记：袁怡草没有离婚，但她和丈夫难以共同生活在一起，不是她出去打工，就是丈夫出去打工，他们的日子就这样凑合着过。

点评：

暴力是诱使妇女自杀的重要因素

宋美娅

当妇女无法摆脱暴力，求助无门，又难以忍受摧残时，有两种情况经常发生，一是杀死施暴者；二是自杀，以求解脱。袁怡

草因为受暴自杀三次，和她一样，不少受暴妇女都曾有自杀的行动或念头。

自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我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其他国家都是男性的自杀率高于女性，大致是女性自杀率的3倍，而只有我国，女性自杀的比率远远高于男性。经分析看出，主要是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比较高，更加引人注意的是，15—34岁的青年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最高。专家们从对自杀未遂者的访问中，分析引发她们自杀的生活事件时，排在前三位的是：(1) 夫妻吵架或不和 (64.54%)；(2) 经济困难 (42.55%)；(3) 被丈夫殴打 (38.30%)。实际上，列于第一位的“夫妻吵架或不和”中，包含大量丈夫对妻子虐待的事件。可见，在我国，家庭暴力是引发妇女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费立鹏博士（现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执行主任）最早在我国开始做自杀问题的调查研究，2000年，他曾帮助我在他的资料库中查找暴力与妇女自杀的相关数据，这里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在费先生的研究小组1997年3月至1998年3月的调查登记中，共有216位妇女自杀死亡，其中有32位的自杀原因是由于被丈夫殴打，占总数的14.8%。这是由家属承认的，由于妇女已经死亡，也许还有同样的原因而家属没有承认，所以费先生认为由暴力致妇女自杀死亡的事例在实际上可能会更多。另外，费先生他们在一家医院的急诊科收集到113例妇女因意外事故而死亡的病例，其中有8例家属承认妇女被丈夫打过，所占比例是7.1%。按照费先生的看法，这两个数字在统计学上有着显著的差异，因遭受暴力而自杀的妇女，比意外死亡中受过暴力的妇女高出一倍。

研究小组在对71位女性自杀未遂者的访谈中，有24例是被打的当天就自杀，平均起来，在被打的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

她们都有自杀的冲动。说到一年中所遭受暴力对自己心理的影响，有3例说没什么影响；9例认为有轻度影响；24例认为有重度影响；还有24例认为是极重度的影响。如果把重度和极重度的加在一起，比例就高达68%，由此可见，家庭暴力与妇女的自杀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袁怡草是幸运的，她三次自杀都幸存下来，但有些人不那么幸运。我在枣阳鹿头镇卫生院时，看到王副院长记下的2001年8月收治自杀妇女的登记单，这个月共有14位妇女因自杀送来急救，细心的王副院长对其中一位自杀死亡的妇女写有一段简短的文字，我如实转抄下来，以示对那些已经死于家庭暴力的姐妹们的纪念：

杨秀清，女，28岁。16岁看瓜棚时被强奸，父母匆忙为她找了个男人，婚后三天生一女孩，送人。其夫好吃懒做，杨，白净，漂亮，丈夫天天打她，说是惩罚其不检点，甚至用刀在脸上划了两刀，说破了相才放心些。杨娘家看女儿天天挨打，往死里打，把女儿接回。因杨与恶夫没领结婚证，又许了后山一家。那家男人知道疼她。但恶夫找到了杨的地方，说：“不跟我回去杀死你娘家全家。”杨怕连累他人，只好回去。不久生下一个男孩，恶夫说不是他的，生下几天后，500元卖掉。

2001年8月14日，杨又一次遭丈夫毒打。杨在告诉丈夫“我喝药了”之后，还被丈夫在地上拖出去好远。到医院时，杨的呼吸、血压、脉搏、心跳均为零。杨死后仍眉目清秀。在确认死亡，被抬上农用车后，还被丈夫照脸甩了两巴掌，后来，恶夫抱着杨的尸体痛哭。

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类似的故事悄悄地发生，又悄悄地消散，谁会记住那些死在丈夫棍棒下冤屈的妇女们呢？

22. 咋遇上这么个姑爷

叙述人 文佳玉
访谈人 张捷明
访谈时间 2001年11月14日
访谈地点 天津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 张捷明
文稿编辑 宋美娅

文佳玉，58岁，农民，文盲。

文佳玉不是家庭暴力直接的受害者，她女儿郭秋月被丈夫骗婚，婚后长期受到丈夫的心理和性虐待，家庭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1998年春节（大年初一），郭秋月夫妇又一次发生争吵，进而引发了郭的丈夫与郭的弟弟的争吵，最后导致了一场家庭悲剧。文佳玉夫妇同时入狱。

文佳玉谈她女儿受虐待的过程比较简单，因为她女儿所受到的心理和性方面的虐待，没有对她详细叙述，只是反复强调了“夜里受罪，不想与他睡觉，像下地狱似的”。

问：你家里是什么情况？

答：我家在蓟县。我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那姑爷是山东的，在蓟县打工，就把我闺女骗到山东去了。她是我大女儿，当时刚17岁，初中二年级，他已经26（岁）了，我闺女与他在一个厂子做工，他们也没有手续，没办结婚登记，就是给骗走了。他做小工的时候跟别人说，他有对象。我闺女走时

我们也不知道。

闺女走后，顶上（差不多）有4年没回家。她爸爸说，我闺女有4年没回家了，上山东瞧瞧去吧。我们两口子就到山东去找她了，我们开车去的，他们家人死活是不让见。她爸说：如果闺女同意（留在山东）呢，我们就开车回家，如果不同意就让她跟我们回家来。他们怕我闺女跟我们回家，说啥也不让见。她爸再三说好话，说什么也不让见，都到夜里11点多了，又说上他姐姐家去了。他姐家离他们庄有20多里地，半夜三更我们又开车上他姐姐家去了，到那儿还是不让见，说：“又走了，找不到了。”我们开车去山东无棣派出所。因为，他打工那时说有对象，我们就怕他把我闺女给卖了。如果他们真正是搞对象，我们也就不死乞白赖的了。他们庄上的人说他没对象，我们就惦记着问问我闺女是咋回事，他们就不让见。我们就上派出所去问，派出所说：“没事啊，他们就是为了让你闺女跟他过日子。”我们就想让派出所协助找一找我闺女，还惦记见一见我闺女，派出所就去了无棣县，到那儿吧，他们还是不中，说别见了，你闺女不见。她爸爸不死心，又去公安局了。一带人向着那一带人，我们刚到公安局，就看到派出所的人到里头了。我们到公安局那屋，她爸说：“我们是蓟县的，我闺女让山东一小子带这儿来了，你给我们解决解决。”公安局的人说：“他们派出所的人解决不了，我们更解决不了。”就把我们俩口子又打发出来了。有人给我们指着说上民政，上民政也不管。我们两口子在那儿晃了四五天。找这儿，找那儿，就是惦记见见闺女，不让见。我们就回来了。她爸爸说：“甭管了，就这样吧。”后来闺女来信了，说：“我秋后就回家去。”今年秋后等不回来，过年秋后还不回来。等到第四年，他爸不放心，山东那儿特别穷，都是泥房子，我们去时还没安电灯呢。

他们不让回来，那庄上的人说：你闺女不给人家生孩子，不

让回来。也不让她摸钱，整天看着不让回来。第四年回来了，姑爷也一起回来了。我们看孩子（小外孙）都长那么大了，我们就认了。我们闺女说：你要是跟我过，就在这儿过，不回山东去了，两人（在我们这里）过了两年。

问：回来以后结婚手续办了吗？

答：没办，农村这样的情况多着呢。

我闺女说不回去了，那儿太苦了，我姑爷也说：中。我们蓟县挺不错的。他们过到一年多，就开始打架生气。他们白天不打，我们庄上的人说：“他们怎么净黑天半夜打架呢？”这姑爷成天吃醋，我闺女一上街，他就要说：“你上街又与谁呆着去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净为这些事打架。

问：你女婿打她吗？

答：打她呀，如果他对我闺女挺好的，哪能出这事？这不都是逼的吗。他们一直打架生气的，我闺女就想跟他离婚，闺女说：“离婚吧，孩子给你，我也不要了。”姑爷说：“离婚？门也没有！我要定你了。你要跟我离婚，先把你兄弟弄死，你爹妈也好不了。”

问：你女婿打你闺女，很厉害的有几次？

答：挫嘴巴子，踢她。特别是黑间（夜里）。我闺女对我说：“妈，我黑间不爱跟他睡觉，跟他睡觉就像下地狱似的，妈呀，他没完没了的。”他净黑间里整她。

问：这个情节，你女儿怎么向你叙述的？

答：我闺女说：我干一天活怪累的，可他晚上没完没了的。我不愿跟他一块住了。我让我闺女说说他，我闺女说他，他说：这莫不是病？去瞅瞅去。成天为这事（性生活）闹不和。七八点钟也不让她起来。天天小打，我们庄上的人都知道，半夜一两点钟还打呢。两人不和了，摘菜也打起架来，吃饭也打起架来。没法再过下去了。我闺女就提出离婚。

问：可他们俩没有法律上的婚姻关系。

答：没法律关系。不是让他走吗，让他走他不走。我闺女说：“咱俩上派出所。”他不去，他也不敢去。姑爷说：“我凭啥走，我就在这儿呆定了，我儿子在这儿呢。”我闺女说：“把孩子给你，我不要孩子了。”他还是不走。

最可气的是，我闺女在油漆道去给人家当小工去，油漆道那儿有开车司机吃饭，有一个师傅，他说我闺女跟那个师傅，为这个我闺女也跟他打架生气的，他说：“你跟他什么关系？你俩连说带笑的。”他成天吃醋。

我闺女有尿道炎。闺女她爸也得尿道炎，解不出溲，一样的血统得一样的病。我女婿对我闺女说：“你爸爸跟你了吧？”哪有这样说话的？

我闺女为这个经常跟他打架。在山东时，他俩打架，他说我闺女跟他二大伯子（有性关系），说：“你这孩子不是我的，是二大伯子的。”哪有这样成天吃醋的。这吃醋也是产生不和的原因，我闺女说：“在山东你说我跟你二大伯子，在这你又说我跟我爸爸。我没法跟你过了。”在山东时，有个小伙子，管我闺女叫四婶，说：“四婶，我就爱听蓟县人说话。”姑爷出来就跟我闺女打架，丁当地踹，说：“为啥你要跟他说话？为什么他爱听你说话呢？”

上街回来晚点也不行，晚点就要问：“你上街又跟谁呆着了？是男的是女的？”这些事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回来一年多了，我闺女不想跟他过了，才跟我们念叨。我当时还劝：他爱说啥说啥，冲这个孩子，稀里糊涂过吧。

再一个原因，我闺女哭天抹泪地说：“妈，我实在不愿跟他去睡了。跟他睡就像下地狱似的，这一宿忒难过了。”

问：你闺女没有对你具体的叙述？

答：就这样说，没有具体叙述，就说黑里不好过。具体的她

也说不出口，她也不愿意说。她就有一次说他啃她妈妈（乳房）。让我瞅，都是紫青。闺女说：“白天干活，夜里成天不让我睡觉。”他们这样的关系维持了一年多。后来他们从外庄搬到我们那庄来了，我们给他们租了房子，花了数万元给他们装修，铺的地面，打的大立柜。他们还是不行。怎么也维持不了，就是过不下去了。

问：他们的孩子那时多大了？

答：那时孩子五岁了。

问：后来这事怎么越演变越激烈？

答：1998年大年初一那天生气，就出这事了，就把他（女婿）打死了。

问：怎么会出现这么激烈的事情？

答：那不是因为一天一天累的多了吗。事多着呢。我潦草地跟你说了。

问：你能不能把这事详细地讲一下？

答：我进来都三年多了，我这脑子就跟傻子似的。

问：你心静一静，举几个例子。

答：举例子？像睡觉的事，她也没跟我细学。她就是说：我不愿跟他睡，他老拿这事整我。

我天天给他们看着孩子。什么活也不干。他们出去干活挣钱。他到家就问孩子今天干啥去了，天天问，天天问。我怀疑，怕我看不好？那孩子叫宝。我说：“宝他爸，你是不放心我给你看这个孩子吧？”他厉声地说：“我想孩子，还不兴（许）我问孩子？我想我就问。”就这样答对我。我说：“你在庄上打听打听，我怎么给你看着孩子的，要啥就给买啥。”他说：“你是应该的，你愿意。”哎呀，多让我伤心，我天天搭着工，搭着钱，听不见一句好话。我说：“当时，我闺女去你那去四年，你第一年不让她回来，第二年也不让她回来，结果我们家找去了，孩子那么大

才让回来。你知道我们怎么想的？”他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管你！”哎哟，当时我听了这话之后我都想撞墙，遇着这样的姑爷！

问：这个人是怎样一种性格？

答：又混、又拧、又拙，说话还难听。

问：当时，你女儿跟他走的时候，没叙说是什么样的情况跟他走的？

答：农村的人比较腼腆，她不愿说了，我们也不愿问了，就这样过下去了。是他对我闺女说，山东如何如何好，让我闺女跟他去。我闺女那时才十七八岁，心也浮，听他这么说，就跟他走了吧。回来我也不愿多问她了。

问：她回来以后，在山东的那段生活跟你讲了没有？

答：后来，他俩生气，她说她在那儿也是为吃醋生气。她想跑家来，他又把她给追回去了。我女儿就不愿往外说，后来，她想跟他离婚，生气才说出这话的，她说：“他那次差点把我卡死，我踹到他小肚子，他才撒手了。”她想跑回来，也不行，一个是手上没钱，一个是离车站忒远。为了孩子就跟他忍着过吧。

问：他们夫妻也回到你们那儿去吗？

答：到我们那儿去，去时看着还挺好的。可是他们街坊经常对我说：“你闺女他们两口子又打架了。”我问我闺女怎么回事，她说：“妈你别管我们的事。”

问：你女儿现在在哪儿？

答：她当时也进来了，判三年缓期三年执行，现在回家了。她的孩子在男方家，她给我来信也挺难受的，说想孩子就埋在心底了。当时，我们都进来了，孩子就让男方家领去了。现在，人家不能给了。

问：最后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答：1998年1月28日出的这事。

这个男的吧，今挤点儿事，明挤点儿事，他们之间长期的吵打，我闺女伤心了，就想与他离婚。离婚离不了。让他走，他不走。有一回，他说他走，等到晚上 11 点多了，他又悄悄地进来了。我闺女问：“你咋没走啊？”他说：“我没赶上车。”实际是他根本就没走，去山东一天有好几趟车。我们那儿离山东有 600 多里地。没走，他们俩就打架。他说：“我凭啥走呢，我儿子还在这儿。”我闺女说：“儿子给你，咱俩过不了，你成天老没事找事的打架。”一次为摘韭菜也找事生气，说我闺女：“你看你这个摔打劲，不就是不愿意伺候我吗，我知道你看上谁了，你就是不愿意给我做饭了。”我闺女能不生气吗，一天干活累巴巴的，我闺女也没那心。为这鸡毛蒜皮的事成天生气。他对我闺女说：“你要想着离婚，我先把你兄弟弄死，让你爹妈也好不了。”我们家他爸爸想，我们又搭钱、又搭工，可姑爷一点知足的地方也没有。1998 年 1 月 28 日那天，他又跟我儿子打架，跟我儿子嚷嚷起来了。

问：你儿子那时多大？

答：我儿子那时 16 岁。那天，是大年初一，女婿让我闺女跟他去小店买点心，给孩子他老叔老婶、爷爷奶奶备礼。我闺女当时一点也没带气，一边拢头，一边对他说：“你个人（自己）去吧，等买回来我跟你一块送去。”当时，酒饭都摆好了，是吃饺子。他对我闺女大声地嚷嚷：“你为啥不跟我去？你想干啥？”我闺女说：“你不认识咋的？”两人就吵开了。我小外孙搽了一脸玉美液，问他：“爸爸你看我脸白吗？”他铛一脚，就给孩踹了个大仰巴跤，踹倒了，孩子就嚎。我没言语，她爸爸（文佳玉丈夫）也没言语。心里觉得别扭。我们儿子疼他外甥，就说：“咋着，事×啊？”他说：“你为什么说我事×，我咋事×了？”这就跟我儿子打架。我们孩子爸爸觉着跟姑爷没法说，就拿一碗饺子砸我儿子去了，砸脑袋上了，我儿子怕他爸爸再打他，穿拖鞋就

走了。走了半天没回来。我就去他爷爷奶奶家、同学家去找。也找不着。哎呀，这上哪儿去了？这一庄也找不到，就骑车子这儿找，那儿找。半天了，中午饭我们一家都没吃好。说实际的，我们农村特别重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上哪儿去了？你说因为姑爷惹的这一家子大年初一过得这是啥。本来想的是好好过年，他们不是租的房嘛，她爸爸疼他们，他们也没有多少钱，过年一块儿来过，年初一一块儿吃饭，吃完了你们该上家溜达溜达去，你们就去。这找不到儿子就着急。下午3点了，看见孩子在大河沟子上坐着呢。我对儿子说：“快家走吧。”他说：“我回家我爸还打我。”我说：“你爸打你啥啊，他是有气跟姑爷撒不了，不好意思说他就砸儿子。”那一天没法过了，都没吃饭，中午也没吃饭。中午吃饺子，也包好了，也煮好了。姑爷也不管找，回他那房睡觉去了。后来他来了。他老丈人说：“早上就为这么点小事，有啥过不去的，咱们这一家子也没吃好，没过好。”他说：“不让我好过谁也好过不了。”他老丈人说：“咋没让你好过呀？”他说：“你知道！”就这样嚷他老丈人。他老丈人是个木匠，脾气又暴，这样就战战起来了。说急了，他老丈人拿锤子给姑爷后脑勺一锤子。就因为这个，打闷过去了，就死了。

问：当时发生的事情就这么简单？

答：这不也是平常一件事一件事积压来的。他俩平时打架生气时，他也常说：你要跟我离婚，我先弄死你弟弟。她爸爸想，你今天又跟我儿子打架，我先弄死你吧，要不然你把我儿子弄死。她爸爸隔应（讨厌、反感）初一生气。他也是个死心眼的人，想，大年初一清早就跟我们打架，大年初一不让我们过好，平常又跟我们闺女打架。这一天都生气，谁也没吃好饭。今天你这么气我，反正你是想不让我好受，我先把你弄死吧。

问：他们之间没有厮打？姑爷也没有防备？

答：他没有防备，他老丈人一转弯拿锤子，一下子奔上去，

就把他打死了。

问：那后来呢？你们怎么都牵连进来了？

答：打死以后也害怕了，大冬天，（尸体）也不知道搁哪儿好了，农村有那个井，就扔井里去了。就我们老两口，三个孩子都上他们爷爷家去了。我帮着抬尸体，我被判10年，老伴他被判无期。

问：这案子是怎么被发现的？

答：有人——不是我们村的，用井水浇地，发现井里有一个。那村的人就报告公安局了。我们庄的人都知道，姑爷这么长时间没上我们这儿来，公安局就把我们画圈里了，就向我们调查这事。调查后就把我们一家子弄派出所去了。

问：当时，你没想到后果吗？

答：当时没想那么多，脑瓜子一根筋，就想把他弄死了去块病。脑瓜子简单，也没有前思后想，过后想，多的方法呢，不离婚，把我们女儿弄走上别处过去也行。

问：到监狱以后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认识？

答：队长对我们的管教，使我受到很多的教育。因为法盲犯了罪，我被判10年，我老伴判无期。儿子考上大学了，借的贷款上学，我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孩子。我后悔，悔死了。我恨不得悔的撞墙。我的头发全白了。我睡不着觉，天天就睡半宿觉。醒了就想，自己这是怎么一回子事，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会做这么件蠢事。我在家，跟人连架都没打过，却成了杀人犯。我心里愧，难受。现在真是一言难尽，想回头也回不来了！

点评：

政府机构的失职

陈 敏

文佳玉一家从受害到被迫以暴抗暴，直至锒铛入狱的不幸遭遇，在那些从受害人转为加害人的受暴人群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使她（他）们被迫走到这一步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负有普法义务的有关部门的工作没有到位

我国有庞大的司法行政和妇联网络。这些网络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它们负有宣传法制的重要义务。但从文佳玉的遭遇来看，这个宣传网络显然还有不少被人遗忘的角落。文佳玉一家至今不知道女儿和她的同居男友的关系是非法的，不知道女儿一开始就可以到法院去申请解除其与施暴人的非法同居关系，更不知道国家法律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不受侵犯，同居男友对她的殴打和性虐待已构成犯罪。

2. 执法机关的冷漠和失职

文佳玉夫妇发现女儿在同居男友家失去行动自由后，曾求助于当地派出所和当地公安局，但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执法机关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冷漠，是对施暴人的犯罪行为的纵容和奖赏。这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使文佳玉夫妇对警察干预失去信心，为文佳玉的丈夫1998年春节的私力救济行为埋下隐患；二是使拐骗妇女、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文佳玉准女婿及其家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3. 社会上可供受害女性求助的机制缺失

文佳玉夫妇向当地派出所和当地公安局求助未果后，也曾向当地民政部门求助，但同样负有帮助被拐骗妇女回家的当地民政部门，却拒绝提供帮助。当地的妇联组织也没有干预。这也是导致文佳玉一家最终被逼以暴抗暴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我们的普法工作到位了，如果我们的执法部门不存偏见严格执法，如果我们的社会救助系统健全了，文佳玉全家人被欺侮、被侵害而又求助无门的愤怒和委屈，就不会在心中长时间的积累，惨案就很可能不会发生，我们的公、检、法、司系统就不用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把这些对社会本没有任何危害性，本身又是被逼成加害人的受害人关进监狱。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

我们呼吁普及法制宣传，呼吁对家庭暴力的有效法律干预和社会干预，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制止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帮助受暴妇女摆脱暴力，使每一位正在遭受家庭暴力摧残的女性都能过上没有暴力和没有恐惧的正常生活。

23. 儿子，再婚不是你打我的理由

叙述人 李朝霞
访谈人 范爱莲
访谈时间 2001年11月14日
访谈地点 天津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 范爱莲
文稿编辑 薛宁兰

李朝霞，56岁，农民，文盲，丈夫病逝10年后，携带两个儿子改嫁到天津某县。再婚后，大儿子开始打骂她。大队、公社及派出所出面干预过，但是，她还是不断遭到殴打与谩骂，并且受到致命暴力威胁。1998年某天晚上，她与小儿子一同用斧子，将熟睡中的大儿子砍死。李朝霞被判有期徒刑11年，小儿子被判无期徒刑。李朝霞的老伴因事后协助埋尸，被判有期徒刑3年。

我的老家在东北。我这个人的一辈子很苦，3岁那年就没有了娘，之后我爹去抗美援朝打仗，我是奶奶和叔叔养大的。后来我爹又娶了一个老婆，我就有了一个后妈。我18岁那年，与第一个丈夫在老家结婚，我们是一个村的。婚后我们感情挺好的，我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孩，老二和老三是男孩，之后我就做了节育手术，那会儿，在我们那里还是第一批。我丈夫32岁那年因病去世了，那年我30岁。我丈夫去世前，我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我们辛辛苦苦拉扯着三个孩子过日子。丈夫一死，三个

孩子都靠我一个人养活。他们都没有念过书，我没钱供，能养活他们就成，日子过得实在是很艰难的。

我42岁那年，改嫁到这里。我们邻村有个女的嫁到这里好几年了，她跟我说：“天津那边的日子好过，我可以领你去我们那儿，你们娘仨可以进厂子里干活，一个人干的够吃，两个人干的就能攒下钱。”就这么着，我就跟她到天津来了。赶到了天津后，她就变了，不说帮我找工作的事了，说给我找个主，就是找对象，让我跟人家结婚。当时我没想嫁人，只是想找工作挣些钱养活我们娘三个。我想回去，可是身无分文，跟她借回去的路费，她又不借给我，她嫌我穷，怕我还不起。我对她说：“你看我穷，可我的亲戚们不穷，我能还给你。”可她就是不干。后来我才知道，她给我找对象，是为了向人家要钱，她跟那个老头儿要了1000多块呢！那会儿从黑龙江坐火车到天津才二十几块钱，再坐汽车到我们县也才要几块钱。当时就我单身一个人同她来的，因为不知道这里是个怎么样的地方，能找一个怎么样的工作，就没有带孩子们来。当时，我大女儿已经18岁，在东北老家结婚了。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17岁，小儿子16岁。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办法了，就同意跟我现在的老伴结婚了。当年我们都是42岁。于是我就托人捎信回老家，我那两个儿子就按地址从东北找到了这里。

我再嫁后，大儿子就开始对我进行打骂。我老头人不错，很老实厚道。他以前没有结过婚，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我这两个儿子过来后，我们就在一起生活了。他对我和孩子们都很好。人家都说，儿女大了就不要爹娘，可是爹娘再婚、再嫁了也认儿女。我不会因为自己结婚了，就不要两个儿子了。两个儿子随我嫁到这里后，按照这里的习惯，改为现在丈夫的姓。

这里的日子确实比东北好混。这里有钢条厂，他们都去干活。可是我这个大儿子到了这里后，不知是怎么搞的，总是不乐

意，跟我闹，骂我、打我，对我的再嫁问题，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心灵上是受打击，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低头。所以他在钢条厂也不好好干，嫌累。我就对他说：“你得给人家好好干，习惯了就不累了。你现在正是年轻、有力气的时候，干了活能挣上钱，多么好啊！你看我那时候，想找活干，想挣点钱，可是没有活干。那会儿下地干活挣工分，只够吃饭，真是一分钱也看不见。老人要是不给你钱，你也无的花，要想买点东西，老人一听贵了，就不给钱，不让你买。你现在多自由啊，干活挣钱，别人也不要你的，你自己挣钱自己花，我嫁的这个丈夫他挣的钱也够我花的了。你自己好好干活，攒钱娶媳妇过日子多好。”可是他就是不听，咱东北人在这边来干活挣钱的贼多（很多），可是他是谁劝也不听，一年的活都干不下来，只干半年的。他还总是跟我打架，对我是又打又骂。

他脾气暴躁。他爹死后，他跟着我过，那会儿他小，我可以打他、管他。他在外面打别的孩子，别人告诉我后，他回到家我就管他、打他。你想，他在外面跟别的孩子打架，人家来告状，不打他，不管教他，就好像我在护孩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他小的时候，我打过他，他记仇了，等他长大了，这会儿就老打我。其实，他小时候我也不经常打他。

他第一次打我，是在他到了这里以后。那年他有18岁，他就开始动手打我，而且经常打我。我记得第一次挨打，是他把我摁在床上打。他用手掐我的脖子，差一点就被他掐死。要说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看电视。我们住在农村，每天下地干活，从早到晚很累的。晚上休息时，他看电视把声音开得很大，吵得我们睡不好觉。我就对他说：“你把电视的声音开小点。”他不听，我就把电闸拉了，不让他看，他就动手打我，推我，把我推到床上，掐我脖子，把我的脖子都掐肿了，我的脖子被他掐得青紫，多少日子都不好。我们一共有三间房子，一台电视，电视放在我们那

间屋里，他过去看。

我大儿子打我，老伴也没有吱声。因为他是继父，不好管，管急了又怕我儿子翻脸。有时说他几句，他就当着我的面提名道姓地骂他继父。我就对我儿子说：“你别骂你继父，多不好听，不管怎么样，亲的也好，后的也好，人家对你不错。”开始他不听，越说越来劲，有时蹦着高地骂人家，老头就生气，有时就走了，儿子也骂够了，我还得出去找老伴，黑灯瞎火的我去村外找几回也找不到，等半夜，老伴自己又回来了，也不知他到哪儿去了。你看我过的这个日子，多么为难，一头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头是自己的老伴。我老伴见我儿子打我，也不敢说，也不敢管。儿子高兴了，顺心了，就招呼他一声，不高兴，不顺心时还骂人家。我嫁给老头时，儿子跟过来就随了老伴姓，不然的话，就不好上户口。老伴的姐夫在公社，我们也没有花钱就把户口落上了。来这里时我就跟儿子商量了，问他们的意见，我们都觉得在天津这边日子好混，条件比东北强，儿子当时也没有表示不好，就这样生活了，可是来了这里就变了，儿子也承认继父对他还可以。但是他就是不好好干活，跟人家生气。我也对他说过：“你要是不愿意在天津生活，我借钱给你买车票，你可以回东北老家去。”可是他也不愿意。

从这以后，他三天两头地对我小骂大打不断。骂我不是好人，不能从一而终，改嫁到天津，丢人现眼。总之是因为我再嫁人后，他也是因为没有办法生活，跟我来到天津，随着改了姓，觉得在人跟前抬不起头来，心里不满，就整天跟我没事找事地打架。大打就是对我动手。有次他拿着菜刀追着我打。我那会儿还年轻，还跑得动。那次惊动了大队和公社，教育了他半夜，才把他放回来。可是打那以后，他不但不改，反而更加记仇了。他说：“我打你，你就告到大队和公社，要人家整我，我更要打你了，我看你怎么办?!”就因为他打自己亲娘的恶名传开了，这些

年他也找不上个对象，结不了婚。在我们这里东北人来的也不少，比我们来的早的都娶上了媳妇，生了孩子；比我们来的晚的也都找上了媳妇，过上了好日子。人家的孩子过来后都知道好好干活，挣钱，盖房子娶媳妇。只有他，整天地打我骂我，因为这事影响他找媳妇，谁敢跟他！越是这样他就越是心情不好，变本加厉地找碴，打我骂我，闹得全家人都过不好日子。邻居、村里人、大队、公社都知道儿子打自己的亲娘，可是为什么要打亲娘，其中的原因他又说不出来，因为他没有任何道理打自己的亲娘，他又打又骂，我说他几句，他更加厉害地打我，我又打不过他。他对他继父也是张口就骂，但是他不打他继父，他继父个子大，要是真与他动手的话，是能打得过他的。开始儿子打我，我老伴还说说他，开始一说他，他就骂我老伴，我老伴见他不听，只好躲走了，由着我们娘两个打去吧。就这样打打闹闹地一直过了十来年。附近邻村的人都知道这事。

他也长大成人了，过不到一块儿，我们就分家，他出去过。可是过了一阵，他过不下去，又回来找我。其实，这次分家还是他提出来的，但是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拿，就回了东北老家了。回东北后，过不下去，因为那里穷，没吃没喝。大约有一年时间，混不下去了，他就又回来了，背着自己的小包袱、小被子。就分了这一次家。

大队、公社对这事也管。可是你不找人家，人家就不管，你去找，人家就管一下。他都那么大的人了，大队、公社的人住哪儿他都知道，人家管不好，还怕他跟人家记仇，找人家的事。

派出所我去过一次。那次他动刀子要砍我了，我就跑。我跑到大队，大队解决不了，就打电话给公社，公社通知派出所，派出所来车把我们娘三个都接走了，大队的支部书记也跟着去了。到了派出所警察问他，他都承认了。用什么东西打的，怎么打的，他都说了，也都承认了。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干地里的活，

一茬麦子一茬晚玉米、豆子，那会儿农活忙了，让他帮着干一阵子，他嫌累不去。我们老两口老早起床，摸黑下地干活。我们四口人，二十多亩地呢！我们回来时他还在家睡觉呢。他在厂子里一年只干半年的活，挣的钱也不给我，还吃我的用我的，他把自己的钱都花光，喝酒抽烟了。那天，我让他起来帮我们干活，他不去，嫌累嫌冷，说：“我不去，又冷又累。”他听着外头他继父走了，就起来用拳头打我的头，现在我这个头还一阵一阵地疼，不好使，都是他那会儿用拳头打的。他一打我，我就往外屋跑，外屋桌子上放着菜刀，他操起菜刀就向我砍来，我就跑去大队，后来派出所管了，他也承认了错误，并向警察表示再也不打我了。他还说：“你们要再听着我打我妈了，你们怎么处理我都行。”这样派出所就把我们三个人放回来了，那时都半夜一点多钟了。

过后，他还是照旧打我，好多次呢！最后那一次他用剪子扎我，扎歪了，把我这边扎了这么一个大口子。我老儿子（小儿子）过来拉我，他更生气了，就说：“我把你们娘两个都杀了。”这样我们就跟他打了起来，毕竟他打不过我们娘两个，之后我老儿子把我送到别人家安置好，才去干活。老伴到家才把我接回去。家里有别人在，他就不敢打我了。

我这老儿子挺好的，对他继父也不错，他继父对老儿子也挺好。有一年老儿子干活把脚扎了，他继父用车驮着他去看病。可这个大儿子就特别不孝，没有良心，有一年我回东北老家看我的老父亲，我老伴看着有西瓜卖，就买了一些回来，对我大儿子说：“你妈快回来了，她喜欢吃，给她买些留着。”我大儿子一听我要回来了，他把好的西瓜都挑吃了，把不好的就扔了，我老伴心疼，就把不好的吃了，再问他：“给你妈留了吗？”他说：“没有了，我都吃了。”你看我这个儿子，一点儿良心也没有。他自己挣钱还吃我的喝我的，他自己挣的钱一分都不给我，自己都花

光。我自己下地劳动挣工分，也没有钱花，卖点粮食换点钱花。

他也打他弟弟。他用菜刀砍他弟弟的手，差点把他的手给砍下来。这都是因为他弟弟看他打我，就保护我，跟他打。他弟弟也不是真的打不过他，兄弟两人只差一岁，个头也差不多，但是弟弟下不去手，他并不想打他哥哥，他是心疼我，不容他哥哥对我下毒手，不让他哥哥打我。我大儿子的恶名传遍了我们那一带，因此他也找不上对象，人家都知道他打娘骂爹的，谁都不跟他谈，所以他始终都没谈过对象。他继父也跟他说过：“你好好干活，攒几个钱，娶个媳妇，如果钱不够，我帮你两个，把家成起来。”他也不听，一天就是吃饭、看电视、喝酒混日子。

他打了我多少次我都记不清了，手上都是他打的疤痕。我的手胖，用力一拉肉都翻了出来。可是就是这样我也只是去过一次派出所，告过一次。我也认了。我觉得总给政府找麻烦干什么，另外我也觉得丢人，没面子，告了也是这样了。他还威胁我说：“你要是再去告，我就打你比这还凶，当心你的命！”我也害怕了，因为我怕再告，我的性命不保了。因为他打我打得太厉害了，几次掐我脖子，掐得我上不来气，脖子青紫，嗓子疼得不行，几天都吃不下东西。我想我早晚有一天让他给害了。

我想不如把他的腿打折了，让他走不了路，瘫在床上，再也不让我们这个家因为他而受罪了。哪怕我养活他一辈子呢！想这招是我自个琢磨的，我都寻思好几个月了。可是我又打不过他，于是我就和老儿子商量，我说：“你看你哥他总打我，害咱们这个家，你就不能下个狠心。把他的腿打折，让他成个瘸子，我们养活他。”我老儿子因为他，被劳动教养一年，也恨他。那是有一年我大儿子偷工厂的钢条，还把人家的小鸡偷出来给村里的小孩们玩。他对小孩们说：“你们别说是我偷出来给你们的，就说是我们家老二偷了给你们的。”街坊邻居信了就告了政府，政府的人就把我老儿子抓了去，劳动教养一年。这都是我大儿子成心

陷害他弟弟。那事是我那年回老家发生的，就这样他弟弟也非常恨他。

他弟弟劳动教养中有了病，我找车接我老儿子回来看病。他就不让，还骂我。他弟弟回来当天，他就跟我干了两仗，他又打我，又掐我脖子，还说：“你把他接回来干啥？我让你们娘儿俩死在一堆儿。”当天，我和我老儿子就商量这个事。开始想着让他吃耗子药，可是不好灌。我就寻思着把他打瘫了。我也不识字，不知道那天是几月几号，反正那天晚上，天下大雾，啥也看不见，他睡着了。我就对我老儿子说：“我打他去。”可他怕我打不动他，打不好，他醒了，就更糟了，我们俩的命都逮在他手里了。老儿子说：“还是我下手吧。”我们俩人就过他睡觉的屋，当时打人的斧子在我手里拿着，可到了地方，我老儿子抢了过去，那时屋里黑，外头也黑，看不清，也不知是他身上的什么地方，他就用斧子砍了下去。没想到没砍到他的腿上，而是砍到了他的小脑袋上了。过了一会儿，没听到他吭音，我想坏了，开灯一看，已经把他给砍死了。那一斧子砍在了他的太阳穴上，那儿下去了一个窟窿。

反正已经把他打死了，我认了，就是去坐牢我也认了，再也没有人打我骂我了。当晚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拉到村子北边给埋了。我们没有报案，对外人就说他回东北老家了。这个事就这样给办完了。我老伴没有参与杀他的计划，之后他帮我和老儿子一起挖坑埋了他的尸体。

我们没有想到这事会被发现。两个月后，事情被别人举报了，是我们村的一个人干的。那天晚上警察到我们家去抓人，把我们三个人都抓走了。抓我们的那天晚上，他们问我大儿子去了哪里？我还对人家说：“他回东北老家了。”到了公安局，我们三个人是分开关分开审问的。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由我一个人承担下来，不想连累我老儿子，他还年轻，就对审判员说：“是我一

个人干的。”可是我小儿子对审判员承认了是他动手杀的。就这样，我们在事前也没有合计好，因为根本没想到事情会被发现。砍死他后，我心里一点也不紧张、不后悔，反而觉得轻松了，再没有人打我骂我了。没想到为这事，害了我老儿子和我老伴，老儿子被判无期徒刑，老伴也被判了三年徒刑。

入狱后，大女儿来看过我一次。她在东北有了孩子，从东北老家来一趟不容易，花了很多的钱，又是路费，又是住店钱，我就对她说：“你别来了，要是你有钱，给我寄俩钱来就行了。”我那个死了的大儿子那年我们分家后回东北老家，就是住在他姐姐姐夫家，可是，他也是不好好干活，还害他姐姐姐夫，不知是因为什么，他把人家的柴火垛子点着了，幸好被人发现救了火，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因为他姐姐姐夫顾到我的面子，就没有告发他。这样他在东北也呆不下去了，就又回来了。姐姐这次探监，还去看了她小弟弟。

这事发生了之后，我们这个家也散了，我老伴的弟弟给照顾着院子。到今年，我们入狱有三年多了，我老伴刑满释放，回家了。出狱后他来看过我一趟。现在我年老了，体弱多病。在监狱服刑期间，监管人员对我很照顾，给我看病，吃住也不愁，将来我出去了怎么办，我那老伴他还会要我吗？他会等我吗？如果他不要我了，我就无家可归了！

点评：

法律保障父母再婚的权利

薛宁兰

在我们访谈的入狱妇女中，绝大多数是妻子不堪忍受丈夫暴行而杀夫或者其他亲属的，只有李朝霞是因为受亲生儿子多年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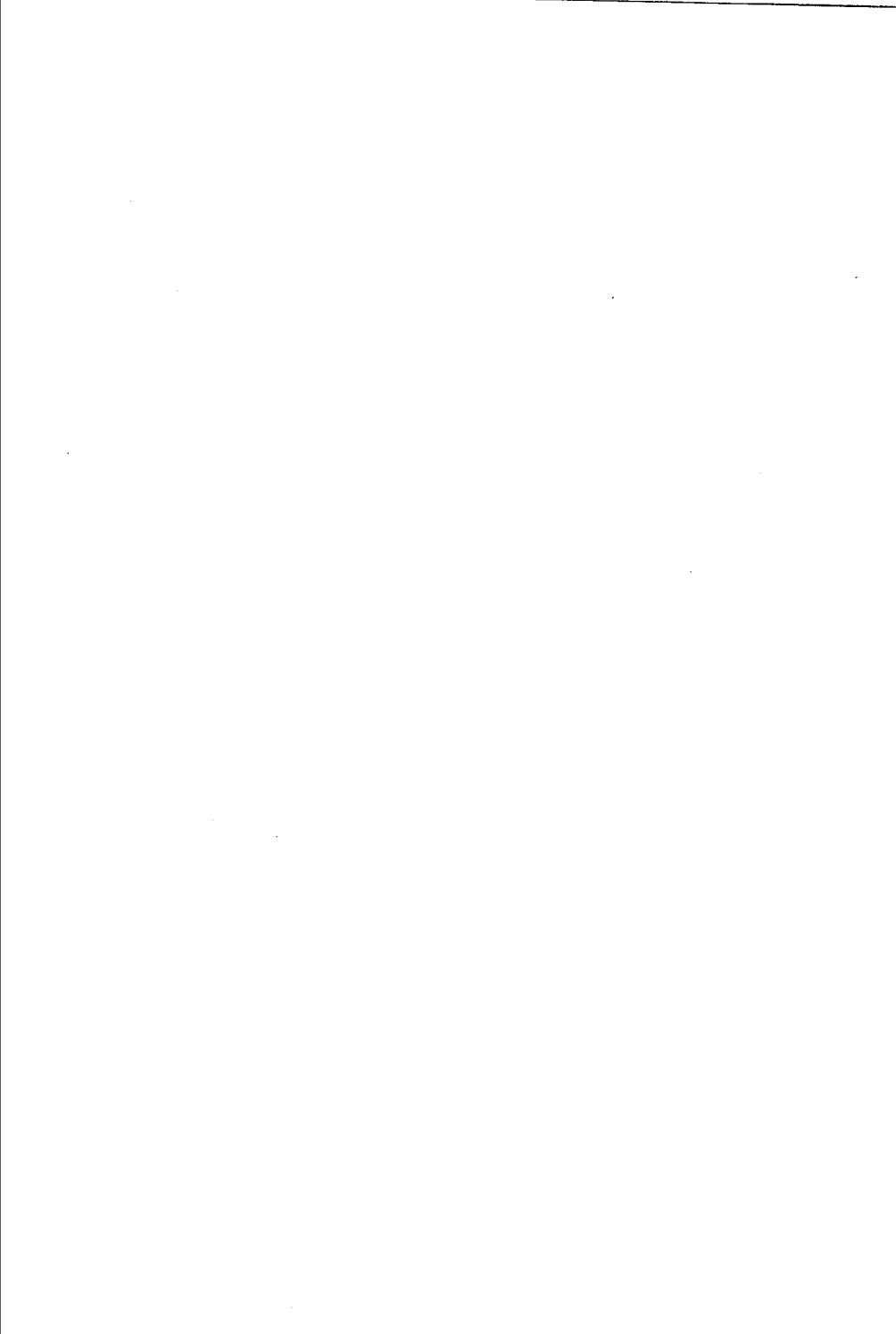
力，最终杀子，走上了犯罪道路。李朝霞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对她受暴干预不得力的原因，还有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法制观念淡薄的因素。

说到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法制观念淡薄，本案涉及的四位当事人，都存在这方面问题。这里我们主要就李朝霞大儿子在向亲生母亲施暴过程中，反映的法制观念淡薄问题做一分析。李朝霞大儿子频繁殴打谩骂自己母亲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母亲没有从一而终，改嫁到了天津，并且让他们改随继父姓。在他眼里，母亲如果一直不嫁，就是好人，否则，就是丢人现眼。再进一步推论，对这样不守“妇道”的母亲，长子有权力打她骂她，因为，按照传统，妇女是要“夫死从子”的。但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封建制度和礼教对妇女“三从四德”的要求，已经被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型婚姻家庭制度所取代。无论是1950年《婚姻法》，还是现行1980年《婚姻法》，均以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合法利益的婚姻制度为原则。它们分别规定“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1950年《婚姻法》第2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1980年《婚姻法》第3条）。这表明，妇女丧夫后，有权利再婚，有权寻求自己未来的婚姻幸福，任何人包括儿子，均不得干涉。本案中，尽管李朝霞起初到天津的目的不是为了再婚，这次婚姻还带有被他人欺骗的特点，但是，婚后她与老伴过得还不错，并没有受到来自现任丈夫的暴力，可是，她却在这次婚姻中遭到了亲生儿子的暴力。个中主要原因，就是她大儿子头脑中传统的封建观念在作祟，加上对现行法律的无知。

2001年4月28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第30条）

修正案还对禁止家庭暴力做了专门规定。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子女无权干涉父母再婚，如果对再婚后的父或母实施暴力、虐待，就是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让我们以李朝霞一案为戒，消除头脑中残存的封建观念，学法、知法、守法，建立相互尊重、敬老爱幼、相互帮助，平等、和睦、文明的亲子关系。



四

站起来，创造美好生活



24. 我要讨回做人的尊严

叙述人 王菊芬

访谈人 薛宁兰 宋美娅

访谈地点 中国法学会反家暴项目资料室
北京某招待所 101 房间

访谈时间 2001 年 2 月 15 日、17 日
2001 年 8 月 18 日

录音整理 薛宁兰

文稿编辑 薛宁兰

王菊芬，42 岁，文盲，农民。1979 年结婚，1999 年离婚。在她 20 年的婚姻生活中充满了暴力。她的头上、脸上、手上以及身体的其他部位，落下了大大小小的被丈夫用拳头、炉钩子、棍子、菜刀、热油，打出、砍出、淋出的疤痕。1998 年当她被丈夫棒打致重伤，父亲因此病故后，她开始觉醒，走上了维护自身权益之路。在省、市、县三级妇联组织直接参与和帮助下，施暴丈夫终于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婚后第二年就开始挨打

我跟他别人介绍认识的，（介绍人）是我父亲一块儿干活的他的一个姐夫。那会儿，农村有修道站，我父亲是个铁匠，他姐夫是个赶马车的。那会儿我也不小了，二十来岁。一天，他去我们家吃饭，他说：“二女子是个好女子，我给你找个好对象。”他家在坝上，我们在坝下。我们吃粮不富裕，坝上的粮食够吃一

些。他们给我领下去，看了他一次。订婚我们又见了一回，赶交流会那次又见一面，到腊月就结婚了。我们从认识到结婚也就半年，没有单独接触过。农村的风俗，两个人一块走一回路人家都会说。两个人根本没有单独地接触和了解。人家（指她丈夫）长得高高大大的，他们都说我有个好后生。我也就定了。农历五月初三订的婚。

农历六月份，县上赶交流会。他到我家领我去。那天正好下雨，交通不方便，我就在他家呆了15天。他那个嫂子真好！就实告诉我，起先他找过一个对象，后来退了婚。他知道她和我说了什么，就插上房门，骂她，给她当老子。那会儿，我没见过什么，挺怕的。心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给他嫂子当老子？那会儿，我们老奶奶子（他母亲）也在。我说：“快去吧，和我嫂子吵架了。”他嫂子就更和我说了，说他是属猴的。我说：“嫂子，要是属猴的，我就不干！”我是属猪的。他比我大三岁。我们农村可讲这个了，属猴的和属猪的相克！当时，他要是实说，我肯定就不给人家（他）。

从他家回来，我和我娘说：“娘，人家是个属猴的。不要动人家订婚时给的钱和衣服。”我妈那会儿也看上人家了，她说：“我们王家没有这样的，五月里给人家（指订婚），六月里跟人家退婚。”后来，他又买了些毛线来看我们。我说不要。我二姨说：“五月里给人家，六月里来退婚。你不穿我穿，给我放下！”人家就把东西都放下了。那会儿，我就看出点来了，我不傻。

到了腊月结婚，我不结。当时，我三弟正感冒流鼻血，我也不愿意走。我妈气得三天没有吃饭，说：“不能退婚。”人家可机灵了，贿赂我妈妈。后来，我就说：“走吧。”腊月领了结婚证，正月初六就典了礼。那一年我20岁，好像是1979年。

结婚第二年他就开始打我。可能是二月份，反正还没有生儿子呢。他拿了一个炉钩子刨我，脸上这块皮就粘起来了，现在这

里还有块印（脸部右下方）。我不敢往娘家跑，跑到娘家人家能寻得到。我一直也没有想到过牵连他们（娘家），因为，我下面是四个弟弟，一个姐姐也是个残人，就我大一点，应该对他们负点责任。我就往邻村跑，怕人家追上来，一个劲地跑，跑得嗓子里冒黑烟。那会儿雪很深，我就拿起浮雪吃一气。那时刚去一年多，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跑到了单晶河（读音），只好在马棚里呆了一夜。第二天，到了小黄石崖才有了车，坐车到县上找我舅舅。那会儿，他在县教育局。我就要求离婚，我父亲也来了。在法庭上，他给列了保证，在公社、大队里他都列了保证。说不打我了。婚没有离成，人家套着马车拉我回去。走时把我父亲骂了一顿。那会儿，我父亲就为我的事受了伤害，嗓子里起了血泡。一听到我的事，他就起血泡。后来，他还打，伤不好就不让我出去，好了才让出去。那是第一次。

他列了保证刚回去不久，一天，我们炸油饼，他拿胡麻油用白面搅起来。油和起来的面不精了，是酥的，他抓起一块往锅里一夺，油就溅起来。我在下面烧火，他一溅，我一躲。他嫌我躲，反过来舀上锅里的烫油，就这么往下滴，我吓得不行，就跑到大队。大队里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在没砍那刀之前。

我就一件一件地告诉你。我们盖房子的那年，没有雇人，他抹墙，我给他递泥。我递不上去，就让他低一些。他反过来拿抹墙的抹子往我脸上捅了一下，当下就流出血来了。那会儿，我就像是一个耳旁风，不（被）当一回子事。

你要说因为什么我挨打，有时候我知道，有时候我不知道。他从外边回来，要是一边走一边骂，老子今天和谁吵架了。我知道是和人家吵架了；有时候不骂，回来就打。我知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是拣主要的告诉你们吧。儿子一岁多时，那会儿，种地，老奶子（婆婆）给哄孩子，她叫我奶完孩子再出去。人家从

外边回来，说：“老子早就去了，你还不去!?”我说：“你妈让我奶孩子呢。”他说：“谁叫你奶孩子！你不知道老子早就走了？”他说话一直是“老子”，离了“老子”不说话。我也习惯了，反正是不打我，就觉着挺好。就这么三两句话，他就打我。他嫂子和他的父亲一起过来拉架，让我往老奶奶家跑。我们和老奶奶家住前后院，我跑进老奶奶的屋，一边跑一边往炕上爬。老奶奶怕我上去打了她的玻璃，使劲拽我。我说：“后头断着（追上）来了，东子他爸断着来了，快让我上去。”老奶奶不要啊，就一个劲地往下拽我。人家追进来打我，我就使劲往上爬，老奶奶使劲朝下拽。那会儿，她胖，劲大，把我的裤子都要拽下来了。街那人家都往里边了（看），人家都不敢进来拉架。

这是奶孩子打了一回。儿子过3岁生日那次，那时，场已经打完了。农村过生日要吃炸糕。他哥的闺女去了，只有5岁。我叫她吃，她不敢吃，孩子怕他。我就说了一句：“三姐，你看，这孩子要是她二爹不在和我抢着吃，她二爹在就不吃。”这句话可说下乱子了。他拿起蒸饭的笊子，是竹子做的，就砸我。他三姐吓得不敢拉，往外跑。他一个劲地往我后背上砸，砸得没有一处好的……

服药自杀，并未遏制丈夫继续施暴

离婚，也离不了，后来我就想着服药。起先喝了一把20多片敌百脱（读音，一种给牲畜吃的药）。喝到肚里，我就上了炕，躺了一段还不死。那时也不觉得难受，我想痛快一点吧，就下炕喝了耗子药。这药是我们在老房子里住的时候我偷他哥家的。我自己卷了个纸筒将耗子药倒在嘴里，到缸边喝了水。过后，可能是敌百脱发作了，我没起来就倒在地上了。那会儿，我心里还清楚，知道肚子痛。我嘴里吐的是白沫，拉的也是白沫。后来，他嫂子寻了他们村的一个哥，套了一个毛驴车，把我送到乡医院。

从我家到乡医院有五里路。他们把我送下的时候，我不清楚。那会儿，人们都说我活不了了。我身上全起的是泡，嘴里也全都是泡。过了半年多，嘴里才不起泡了。

我服药的事，开始娘家人不知道。过了可能20天，我父亲知道了。唉，提起来这事更难。我老父亲30多里地步行来看我。我给他擀了些面条，想卧几个鸡蛋。人家就把生的都拿上走了，到街里坐着和别人聊天。他把鸡蛋摁到衣服里，硬是摁烂了，也不让我们吃。我们家不难过，年年过年杀一头大猪。他把肉一条一条地称好，在上头写上15斤、12斤。虽然都在那里放着，他不回家，我不能动。我一动那些斤称就掉了，就麻烦了。他心顺的时候，才给我挖一点。

后来，他把肉放到柜子里锁着。我就说：“不吃饭能饿死了人，不吃肉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啦。”总而言之，到现在凭我的心，我看不起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不是真正的一个人。如果要是真正的一个人，我没有一点对不起他的。（哭）

这件事发生后（指服药自杀），他说，不打了。可是，遇到事他还打。

我家开着小卖部。农村修路，大队要点义务工，就得我去。他去一回，就和人家吵架。那次我没去，他去了，和人家吵起来。他哭着回到家。我说，又怎么了？他说让人家打了。他拿着火枪要去夺（打）人家，我就使劲地拉他，说“不要去。”他反过来使着火枪就夺我，我脸上的血当时就流了下来，是凉的。那会儿，我脸上的血滋拉拉地流着，厉害了，儿子就给我摁。因为我们打架，儿子气得寻死了好几回。儿子自己用头撞墙。唉，我告诉你，我实在是对不起两个孩子。

那年，好像是儿子上学了，当时还没有闺女呢。儿子要去上晚自习，我给他煎了几个小馒头，让他先吃。儿子吃着，他说：“给老子点！”我说：“乐乐快吃，吃了上学。不要管了，妈妈没

事的。”儿子不走，他还要打我，儿子拿了一个馒头冲头就夺（砸）了他，说：“你要再打我妈妈，我把你揍死。”我们娘儿俩打他，不小心，他把儿子的脖子卡住，卡厉害了，儿子嘴里吐白沫。我当时吓得，拨、拨（拉）不开人家，只好咯喽他。他放开了儿子。我说，儿子快跑。儿子没有去学校，一直在外面藏着。他打我的时候，我就自个拉自个的架，我劝人家，拉人家。人家打我，我就抢人家手里的东西，就那么着。

那年他摁着我往锅里煮。那会儿，我一个人在家，煮土豆做粉。我把锅里的渣子铲出来，准备喂猪。他从他妈那里回来，“吭、吭”几声，进到屋里。我说：“又怎么了？”他也没说什么，他就把我铲出的渣子捣了两把，往地下一扔一扔。“给老子拿嘴往起含。”我说：“你想找茬就找吧。反正我也是个挨打。我不给你拿嘴含。”“含不含？！”“不含。我给你拿手拣起来，行了吧。”他不叫我往起拣。我拿手拣，他就摁着我到地上打。又摁着我全身进了锅了，是农村用的大锅。他拿上锅盖盖上，使劲摁，把锅盖摁成了两瓣。

锅里盛的是煮了山芋渣子的水。当时火熄了，反正烫也烫不伤人，就烧一点。我娘家的人来问我锅盖是怎么烂的。我说：“用时间长了，不好了。”我用烂暖水瓶上的条子，把锅盖缀住，又使了两年多。

当时身上有伤。过后没有留下痕迹。反正，那会儿，我从锅里出来，好像是一个死人。他把我从锅里拉出来，就扔到炕上。我好长时间起不来炕，是儿子每天喂我饭。那回，可能是1983、1984年，第二年、第三年生的闺女嘛。

后来我们搬到县城住，靠做小买卖生活。一天，他从他姐家回来，把自行车往院里一扔，上炕就脱了睡。我下去弄车子，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回来嘛顺便把车子推进来，还得我下去再推一回。”“不愿意给老子推？不愿意给老子推，就推出去！”他

用脚一踹，把两个车子踹到一块儿了，南边那个脚蹬子到了辐条里。我低头搬那个辐条的时候，他抓住筐子套在我头上就打。我觉得他没穿衣服啊，我们住在街面，门前就是马路，晚上不到9点钟，县里人也都出来乘凉、散散心，人可多的了，我觉得他不敢出来打我。可他还是出来了，出来就打开了，那会儿我就跑，人家拿着砖头一扔一扔的。我就跑，他扔过来，我就给扔回去。别人不知怎么回事。他返回去拿刀子，我就跑，跑了大概七八十米吧。有个开饭店的，我认识。我敲门喊着：“快点给姨开开门，快点。”小伙说：“咋地了，姨？”我说：“你放姨进去啊！”后来我们就插住门，人家断（追）了过去。我们俩就使劲顶着门，他把人家的一块玻璃都打烂了。

我们这边有个开饭馆的小伙子，人们都叫他老六。俺儿子和他说：“小六叔，快去给我看看，我爸爸又寻刀子”。老六在城里挺有名的，能吓住他，一把提住他：“干什么呀？没有羞的，你跟我走！不走，揍你一顿。”后来他姑姑和闺女都去了，说：“又怎么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我那会儿和大姐姐挺好的，我说：“姐，你可能又骂他了？”“嗯，是骂他了。”我说：“果真是你骂他了，要是你不骂他，今天回来肯定不会这样的。”“我骂他，是给你出气！”我说：“二姐，我就是他的出气筒了。”回去我挺怕的，我和他二姐把刀子都藏起来了，说是没事了。结果我们一个摊的，看不过了，就说：“你就这么让着他啊？”我说：“没办法，只要在这个家里边，就得忍，你要和他弄，能弄出什么？不出什么事，只好就是忍。”

有一天他打我，又是这个厨子，问他：“你再敢给大姐一捶吧？”他就嘿嘿笑。“你再打我大姐，我也就该揍你了。”他还是笑。那个餐厅的厨子说：“大姐你有钱没有？”我说：“有。”他说：“你没有钱，起诉费我给你出，你不和他干了。”

说句实话，我不是没有钱。我是告不了人家，我没办法，告

也是浪费时间。我的摊关了、停了，我也告不了人家。名义上，谁也知道我们是一家子，他是孩子的父亲，我是孩子的母亲，但不管我走到什么时候，心里也不和他在一起。我说：“我要是做对对不起你的事，是爱吃了，还是爱打扮了？（要是那样，）你不光打我一个，到我家随便打也行。但是我没有做错，你不要打了。就好像这么长的一个绳子，你多打我一回，我多系一个疙瘩。你这么做，觉得是你厉害，但我是受委屈的。你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不是说我怕你，你说怕你能过日子，你觉得也不错吧？但是我心里和外表肯定是不一致的。”我说：“你打我一次，我就多系一个疙瘩。不能打了，再打我的疙瘩就没有系处了。”

这里是他用刀砍的。（脱下上衣，让我们看右胳膊上的刀伤印。）

这是在儿子念六年级的那年。这次我知道他为什么打。他堂哥借了我的300元钱，借100块钱一个月是1块5毛钱的利息。我们那口子说，我少给了他一个月的利息，4块5毛钱。人家是三月份借的，他就三月算一个月，四月算一个月。应该是三月到四月算一个月。他让我去要，我说：“你一页一页地翻日历，一页一页地数，不能诬赖人家。”他不吱声，从风箱底下拿起菜刀砍我，我使劲往下摁。当时，心里特别糊（涂），不知道痛，一摁风箱板，我这里就破了。那会儿，我穿了一件衬衫。我把衣服往下一脱，皮肉像杀了猪的那样翻出来了。那会儿，血还不多，我拿起手绢使劲摁着。他把菜刀往外一扔，见他弟弟和弟媳妇从院墙那边跳过来，就说：“寻上绷带，过去吧。”他们寻上绷带给我弄上。那会儿，还不太痛，后来可把我痛砸了。他姐在酒厂工作，他过来把从酒厂带回来的酒精，有半盐水瓶，全部给我浇到口子上了。那会儿，痛得我在地上打滚。（哭）

后来我也没有去医院。就这么挺过来了。刀口有二寸长。儿子天天一边哭一边用盛着开水的罐给我敷，40多天口子才长起

来。当时什么也不懂，不懂得去医院缝一缝，就这么长上去的。

我闺女特别灵。按说是大人为孩子们操心，现在，孩子们为我们操心了。晚上，他一回来，就这么“吭、吭。”我心里就慌得呀，想：“这又怎么了？”小闺女特别机灵，赶紧把能杀人的东西藏起来。孩子，不大的时候就操心。前年的时候，他一打我，孩子就抽起来了，嘴里吐白沫。

多年忍让，最终被打致脾破裂

1998年，我们开了个粮摊，6月份儿子高中没有考上，我还想让儿子进高中，继续读要缴6800块钱（学费）。他父亲不愿意，想让他学点手艺，或学厨子或者学开车。我说：“征求孩子的意见。”他说：“你到底有多少钱。给他6800块钱，就给老子1万块。”“给老子1万块，老子不和你们过了，老子就走。”

儿子当时相信他了，说：“你说话算话吧？”他说：“算话。给老子1万块，就走。”儿子可真相信他了。说：“妈，书我不念了，给他1万块，他就走。”后来，儿子取出钱，不够1万块，有八九千块钱，就给他了。说：“告你啊，老子我也不要，书我也不念。”就把钱扔到他头上，说：“你说话算数。”他不敢打儿子，反过来揪着我的头发又打我。儿子叫他放，他不放。儿子就摁倒他打，把他的脸上、耳朵都打黑了。他就咬儿子。后来，儿子拉着我说：“妈，快跑吧。”我们跑到县政府那个巷子，到公安局的时候，人家骑着车子赶上来了。儿子说：“断（追）上来了，跑不了了。妈，你前头跑，我在后头断（截）他。”他冲过来拿车子把儿子挫倒在地上，腿都挫破了。儿子在地上叫唤，我回过头来看儿子。路上的人冲我喊：“别管了，往公安局跑。”

我跑到公安局的时候，公安局的人说：“两口子打架，没法弄。”让我先避一避。赶黑，他说：“你走吧，我们这里没有休息的地方。”我说：“我没处去。”后来，人们说去派出所，我去了

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说了：“大姐，要是别人打你嘛，我们给你揍一顿。你丈夫打你，好像是应该的。你去那边瞄一瞄，是管婚姻的。”我就去那边，可叫那个老汉骂了一顿。他说：“县上将近几百万人，一个一个能管得了吗？”他穿着警服，是派出所的，但不知道是管什么的。

他不管，还骂我一顿。当天晚上我就去了一个朋友家住，有四五天没有回家。今天住这家，明天住那家，一家一家地倒。

后来，我就找到城关法庭，见到庭长，要离婚。他也给调查了，说：“我们让他给你列个保证吧。这个保证贴到你们家里边。下回他打你，他就看到了。”我说：“没有用的，就放到你们的档案里吧。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可以查到我是伸过一个冤的，我也是县上的一个人。”那时，好像是七八月份，我就回去了。

后来我儿子开学，我的面店就不能开了。因为，我也没有存多少钱，他要走1万块，儿子上学用了6800块钱。我跟儿子说：“学你还是上，妈把店摊出去，就是推着车也能做买卖。”我不敢带儿子去交钱，怕他抢钱，是别人去给儿子交的。我就在街里搞蔬菜。后来韩国人来收红萝卜，我就去我妈家那边洗红萝卜。那年挣的钱也可以。我们收的毛货一斤是两毛，我雇人洗，一斤给他们加工费2毛5，也就12天，我就挣了4300多块钱。

他做收牲畜的买卖。那次让我去卖牛。两个小的、一个大的。我不识字，让他给我写上哪个卖多少钱。他要我大的卖2430元。第一天我没卖出去，后来我卖了2320元，没卖够他要的那个钱数。我们租的是一间小南房。他贩完牛回到家，手里提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卖了牛的牛笼头和一块牛肉，冲头就用书包抽我，我用手抱住书包说：“你又怎么了？”正好出来一个老板说：“有什么你就说，不要打，给我一个面子。”他说：“叫她给老子跪！”我一步一步往里面跪，我说：“跪也行，到底是因为什么，你叫我知道一些？”这个老板说：“要跪，我给你跪，你千万

不要动手打了。”我反过来拉那个老板，说：“姐，你别给他跪。”我拉着她就往我南房走。他拿起棍子往我背上敲了六棒子。后来公安局验伤是四棒子的印。我当时不知道是背痛，只觉得肚子痛。老板、还有好几个人把我扶进去。他们看我的背上起来了几个黑棱子，一棒一个，现在我的这个左胳膊还抬不上来。

街里人知道后，有个姓马的女的问我：“又挨打了？”我说：“今天不一样，你快去给我吆喝儿子。”儿子下午在上课，可能就是四五点钟。她说：“这会儿他在上课，别吓着他了，要么你先去医院？”人家还要吃肉，说：“给老子切肉。”我说：“我不能切了，锅里有做好的羊肉，你自己热着吃吧。”那会儿，我痛得尿了一裤子，口水哗啦啦地往外流。他自个吃罢，就去了他侄子家。我就跟那个女的说：“快给我吆喝儿子吧。”她没有吆喝儿子，就吆喝了挨着我住的邻居。他是个开饭店的。他进去，往起拉我看伤势怎么样。他往起一拉，我就知道了（昏了过去）。我们院子的另一个邻居说：“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怎么这么叫唤，又挨打了？！”他说：“今天肯定厉害了，我一拉她倒没有了，平时她可坚强了。”我知道我厉害了，直求他们给我找儿子，想把我欠外边的账交待给儿子。我小闺女回来了，我说闺女快去打车（三轮），她就去打三轮了。当时孩子吓得拉了一裤子屎。出租三轮正是雇的他二姐夫的。他的外甥开着车，他一看我不行了，不敢送我，说：“不能送了，不能送了，快吆喝一个大点的车。”当时，小闺女连鞋都没穿，就跑去吆喝车。我们院里的一个女老板跟上去了。到医院，都已经下班了，在走廊里我痛的直喊娘，他不让我喊，骂他们说：“谁把她抬来的，把她抬回去，给老子叫唤？”他侄子当时在走廊里，摁起他来就打，说：“我二婶子是个有骨气的人，今天没有骨气了。”当时，我一躺倒血就上不来，平躺着还可以。医院给我做B超，我一会儿清楚，一会儿不清楚。我怕花那俩钱。反正肚子里一点也看不清了，全是

血。从肚子里抽出血来，他们要我做手术，我还是一个劲地要见儿子，他们没有人叫。赶第二天下午4点多，把儿子吆喝去了。他们让我做手术，儿子说：“妈坚持住。”我告诉他欠的账，儿子说：“妈，不要管了，快做手术。”我说：“不行！”我知道那会儿我是白花钱。

做手术的时候血库里没有血了，好像是只剩了两袋。那会儿输也输不进去。1万块钱还在他身上装着，他弟弟抢过来说：“你要这钱干什么呀？”儿子把他摁到地上打了一顿。我那会儿不想做手术，想给孩子攒几个钱。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手术做了两个多小时。

我的脾破裂了。手术把它补好了。但是，现在天变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一块石头吊着，沉甸甸的；路走得快了，好像一根棍子支起来。我现在不敢查，知道我的血管就是挺的，有时候，手上、背上的血管鼓起来，鼓着。不过两天血管就破了，过不几天皮肤下面就变黑了。从那年得胸膜炎以后，现在胸脯这里鼓起来了。

人家那会儿不让我娘家的人知道，第13天该拆肉线了，我父亲正好去看我。他一边看一边哭，他不敢说人家，悄悄一个人骂：“黑心眼，黑骨头！”我爬到父亲耳边说：“不要管。现在到了这个程度了，更不要管。我好了以后，自个的事自个管。你呆个一两天，就回去吧。”他在那边躺着，啥话也不说，也不给我父亲吃的。其他病人说：“你给他买点吃的。”当时血库的血不够，他的血型和我的一样，就抽了他400毫升，抽他侄女的200毫升。他躺着不动，说：“我抽血了，要养身体。”我就让儿子给他姥爷买了点吃的。我父亲走时又去看我，说：“闺女你养着吧。家里还有一个公鸡，宰了我就给你送来。”他回去一直没有来。那面的人都向他问我的情况。那天我舅舅问他，他就一告一难（难受）：“唉，没有逃过他的手心。”说完这句话，他昏了过去，

躺到炕上不到8个小时，就死了。（王菊芬讲到这里痛哭不止）

我们姊妹7个，我老二。一个姐姐是个残人，6岁时腿摔断，自己对骨头没对好，现在走路一拐一拐的。我是老二，下面是四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我哄大的。我十二三岁时想上学，用手巾缝了个书包，我妈妈拉下来，不让我上学，让我在家里哄弟妹。我家里人都知道我那时吃了苦。

当时我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做罢手术18天，我想回家养着。第18天回去，第21天又去了医院。我告诉你吧。那天，儿子住学校了，闺女几天前被他送到姥姥家了。他又要和我来（指发生性关系），把我吓得不行，晚上，那个姓马的女的进来看我，我就跟她说：“你不要走了，多呆一会儿啊！”他衣服也不穿，在那儿蹲着，也不怕人笑话。

他没有得逞。要是她不进来也放不过我。我可能吓着了，又怕又气，第二天胸口的气憋得鼓起一个大包，人家说是胸膜炎。气憋得上不来，我就昏了过去。又去了医院，住了大概有半个多月。

我好像是怕的。第一，伤口那么大；第二，做手术时人家说我肠子上有瘤子，是结核。我在医院又住了半个多月，回来，就把儿子安排在家里面住。儿子住也不行。后来，我又把妹妹叫来陪住。人家打得不行，不要我妹妹，一到晚上就把刀子放着。他倒是没砍过我，我知道是吓唬我。人们说：“你崽兮兮（厉害）地拿刀子干什么呀？”他说：“砍骨头！”

到了正月，我要回我妈家，他不让回，我就回到了他妈妈家。在我们老家那会儿，我就想着走，但没有想着和他离婚。当时还直不起腰来，养得不好。我妹妹家离我们那里有五里地。我就回到了她家。我父亲死的事，我还不知道。我去时她们把戴的孝都摘了。我妹、我姐还有我大弟三个人套着骡子去接我。一般我父亲最疼我，我知道他应该去接我。接的时候我就说：“怎么，

大（爸）没有来，你们来了？”他们说“大（爸）出去给你打工去了。给你去编那个耙地的篓子去了。”我说：“不应该叫大（爸）去，老弟今年（大学）就毕业了，三弟工作也有了着落（到北京当厨子）。父亲拉扯了那么多，苦那么重，不嫌累？”我大弟是个男子汉，还能忍住，说：“没事的，走吧。”姐姐和妹妹头触在车里，不说话。我不傻，就抱起妹妹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能不说话！”我妹就哭起来，哭成一堆了。他们叫我去妹妹家，我不去。最后，去了我妈家，他们还都说我大（爸）出门了，但一个个脸上不对劲。后来我妈就告诉我：“你不要恨我们。当时谁也不敢告诉你，一个已经这么了。”我说：“他不会死的！那么难他都过来了。哪怕你叫我见他一面呐？哪怕不说话你叫我见一面呐！”（泣不成声）

后来，我就一个村一个村地寻，叫我大弟、二弟扶着，到父亲的坟地。在坟地里我就实话实说，就和告诉你们的一样，就全告诉了他，把以前瞒着的全告诉了他。我每天都去，一个人坐在那里，对他说：“你让我看一看，你就给我托一个梦，让我看一看你，行吗？”我心里这么想着，就好像看见了他。（哭泣！）

我父亲去世时 65 岁。在家里他没有什么病。大夫检查他是脑溢血。我就答应我父亲一句话，我要报仇！

到省城去，寻求妇联帮助

我在娘家呆了快 6 个月。那段时间，他没敢去看我。他托我在县城的几个姐妹，搭车过来看我。她们不光看我，也给我通气，他还想让我回去。我对她们说：“我就是死了，也不回去。你们救了我的人，让我干什么都行。但是，让我回家，不回。”我向儿子要 170 块钱，坐车直接到了省妇联。

是我自个要去的。当时，我二弟媳妇不让我去，说：“人家谁管你呐！在家里呆着。我们能供得起你”。我说：“人活一天，

总要活得明明白白的，不能待到这儿，躲到这儿就完事了。”后来，我二弟媳妇就给我做了一条裤子，她是个裁缝。我二弟还让她把自己的衬衣给了我一件。我没有什么衣服。在自己家里就不爱打扮，从来不爱美。我不是说现在后悔了，这是命。

后来，我就走。

我是农历六月初七跟我妈家走的。他们不让我去，说肯定没人管我。我跟儿子要了170块钱，没告诉他我去哪儿。

到了省城，我就找工，沿门一家一家地问，反正去了外地，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最后找到了一个拉面馆，给人家洗碗、端盘子。老板是个浙江人，说一月给我350块钱。我说：“多少钱也行，有个休息的地方就行。”那会儿我的腰还抬不起来，脚也肿，连鞋也穿不上。干一会活，眼睛就肿得什么也看不清，我就拿湿毛巾苦（盖）一阵，凉快一下，就能看到。儿子知道我去了那儿，断（追）过去，不让我干。我心里一个劲地说，“我缺钱，我要干下去！”我对他说：“你把妹妹照顾好，不要管我，只要我活着就行。”干活的时候，我干一会就蹲在那儿哭一气。饭馆在一个大学门口，来吃饭的学生就问我，“这个姨，怎么想哭就哭一气？”我告诉他们：“我出来不是打工的，我缺钱打官司。”我就像告诉你们那样，一个一个地告诉他们。学生们说：“你去找记者，让他们给你登报。”那会儿，我心里一个劲地惦记着妇联，说：“我想找妇联。不管哪个妇联，找到一个说说心里话，把我心里的怨恨，就跟告诉亲母亲、亲姐妹那样，都说出来。”他们说：“不行。要是报上登出来，妇联看了就会找你。”

后来，一个男学生带着我找到记者李子英（读音）。她给我登了报，并且告诉我省妇联的地址。那会儿我不敢坐车，怕坐过站。我就自个走，一边走一边问路上的警察。到了省妇联，她们问我找谁。我说：“找省妇联。”她们说：“我们都是省妇联。你要找谁？”我说：“我也不知道找谁？”“你是干什么的？”“我心里

有委屈，想告诉你们。”“你这叫‘上访’。”我不知道“上访”是什么意思，以为她们让我上高处，就说：“我不上那里。我就想告诉你们，我这20多年来受的罪。”我边说边把身上的伤让她们看。妇联权益部的于部长听了和我一道儿哭起来。她说：“别哭了。我给你出去买饭，吃了饭再说。”她出去给我买了一盘菜、一个馒头。我吃完就继续告诉她。过后，她写了一封信让我找市妇联。临走还给了我50块钱。我不知道信上写的什么，就想到在医科大学读书的小弟弟。我不知道学校在哪里，就问人。最后问到了。我好几年没有见他了，从他上中学、大学几年没见了。当时，他正给人家扎针呢。我那会儿想，信上写得好一点（能解决问题），我就回去。

小弟弟见到我，什么也不说，就一个劲地哭。其他医生问他：“你姐姐来了，你怎么哭呀？”他说：“你们不知道，她找我有多难啊。她不识字，和别人找不一样。”那会儿，我不懂得哭，说：“快给我看信，看看人家说的什么？”他说，不能拆。我说没事。他看后说，省妇联让你回市里呢。我说“回市里怎么办？”他说：“人家给你打电话过去了。”

第二天，我小弟弟和他女朋友把我送到车站，我坐车到了市里。在省城，我呆了不到一个月。

到市妇联，我把于部长的信交给赵部长。她看后，又给我写了封信，让我送到县妇联。那会儿，我说什么也不回去。“你要管我就管。管不了，我就走。要我回县上，我不去！”她说：“这个事非得县上处理。”我说：“不，我回到县上还是不出来。”那会儿，我那口子还没有被逮捕，整天喊着找我，说要抠我的眼睛，劈我的腿。那会儿，他知道我去了省城，说把我的眼抠了，腿砍了，看我能到哪里去。我现在回去不正好给人家送回去了吗？！那会儿，我心里挺动怒的，说：“你让我回县上还是害我，还是送我一条命。”她说：“我给你信上都写清楚了。我再给县妇

联打个电话，行吧？”她给县妇联打了电话。我拿着信，一边走，一边哭着说：“我又要死一遭了。不过，告诉你，我弟弟可知道我走到哪里了。如果我要出了什么麻烦，我弟弟会来找你的。”

回到县城，我打了的（车），直接到了县委大院，找到妇联。赵部长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她说：“给我随时保护好王菊芬。谁要让她有个三长两短的，谁就负责！”县妇联及时把我保护起来，在县委院里，给我找了一间房子，白天也拉上窗帘。她们不让我出那间屋子，连上厕所也在屋里。用一个桶，她们晚上给我倒出去。每天她们轮流陪我。第一，这是她们的工作，第二，她们也都是女的，同情我。吃的、用的，都随时拿来。省妇联一个劲地催她们，她们好像以前没有搞过这个工作，不清楚该怎么办。后来，她们找来一个律师，他是妇联办的律师事务所的。他说，先把我在医院的病历搞出来。

他带上我，妇联的好几个人也陪着，我们一起到了医院。走之前，她们把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了，给我戴上了墨镜。那天，正好有个法医在，律师问他这种情况属于什么伤。法医当时就说，是重伤。他们说明天去公安局鉴定。我说：“不行。要尽快办。人家（指她丈夫）认识的人多，要是透露了风声，又办不了了。今天下午就去。”下午，在医院设的法医鉴定所里，法院的一个法医、公安局的一个法医给我作了鉴定。公安局的说是重伤，法院的人加了一句，说这是两口子打架。但他签的也是重伤。

9月2日法医鉴定下来，3日，妇联的两个人带着我去县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接待我们的人说这是两口子打架嘛。妇联的人说：“你不知道这两口子打架到什么程度了，人家是省里指派下来的，鉴定书都有了。”他们又让妇联给写了个什么东西，就收下了。

第二天，他们开始逮人（指她丈夫），直到8号才把他逮住。公安局挺认真的。他不是牲口市场上卖牲口嘛，他们就在那里

搁上人，叫“蹲坑”，在我们家周围也搁着人。后来有人说他回到我们老家那边去了。我怕人家跑了，就把那边的电话查着，打电话给他表妹。果真他在那里。他在电话里说：“你回来吧。”我一听到他的声音，搁下电话，就给刑警队打电话。我是早上七八点告诉他们的。他们10点多就把他逮回来了。

一把他逮起来，我儿子、他们家的人就知道了。他叫儿子快求我。儿子到县妇联找我时，正好市妇联赵部长带记者来采访。儿子就哭着说：“妈，你放了他吧。你们只要离婚就行，不要逮他了。”儿子跪在那里，哭得不行。我老母亲也劝我，什么人都劝我，我就是不行。要是我父亲活着，什么都好说。我知道，不能让他再往下害人了。他现在害的人就够多的了，把儿子、闺女害得够深的了。我要是早知道法律上能告他，能说理，也不会把儿子、闺女害到这个程度，把父亲害到那个程度。你们说是吧。

和我再好的人都劝不了。我心里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妇联当时也挺可怜我的，逮住他好几天了，妇联和公安局商量，才让我出去。他们和公安局(的人)说：“如果我们的人出去，他们家的人威胁，怎么办？”公安局(的人)说：“我们和他们家人说了，谁威胁，谁犯法！”我从妇联出去后，回到了我家，照顾两个孩子。

依法讨回做人的尊严

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有的人把这个事看得重，有的看得轻。

就拿妇联来说吧：省妇联于部长，还有吴部长，她们是那么的认真。她们是妇联权益部的，是男人的性格，像个汉子；县妇联武主席也特认真。工作上，她是我们妇联的主席，实际上她就跟我的一个亲姐妹一样。她有时候吧，一进门就问我吃过了吗？饿不饿？冷不冷？我心里暖烘烘的。并不是说问你几句就好，不问就不好，我是说她心里总的来讲惦记着这事。去年过年的时候，她给了我100块钱，说：“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帮不了你多

少，今天给你 100 块钱，买一点什么东西。”当时我不愿意要，我知道她们也没有多富，后来一想这是她的一点心意，我就收下了。

到了我们刑警队，那几个人开始逮他，有两个后生一个姓李，一个姓张，他们是很认真的。我们报案的时候，他们当时就好像挺动怒的啊，听了觉得挺气愤，给他带上手铐那会儿挺气的。

到了检察院的时候，有两个女的，她们很认真。第一，对工作很认真；第二，好像她们也是女的，接受这个案子心里好像有一点不平衡。去查我案子的时候，调查取那个证据，那个姓余的女的，当时骑车子把裤子都戳破了，戳了这么大一个窟窿。她推着车子到我家，对我说：“哎呀终于找到你了，你想想请个律师？”我说：“我和妇联商量商量。”她说：“如果不请律师，我们就是代理人。”后来，她才告诉我，裤子戳了那么一个窟窿，肉也吡破了。我反正多会儿心里也惦记她。

到了法院的时候，接收案子的法院院长是很重视的。他说：“没事，我们会给你一个公道的答复。”起诉，不是要缴起诉费嘛，院长给我签了字，免费。有时，他就说交 50 块钱。一般我最多就是交 50 块钱，没有多过。接下去我就是找他，他一直在催。因为，我那会儿回去的时候，眼睛、手都肿着。有一天眼睛肿得都看不见什么了。我就说：“你们快点啊。”因为逮着他就有办法，反正我有腿能走，有话我能说，不过我的身体不太好。我怕那会儿我坚持不过去了。我说：“我怕我的身体坚持不过去，快点给我一个明白吧。”

那会儿是办他伤害罪，我还起诉他虐待罪呢。办案的法官非得叫我回家取证。我取证？我不识字，再说我觉得我取证不合适。后来没有办法了，妇联吴主席和我一起取证。那几个证人证言都是妇联帮我写的，取回证来，法院又让我取证。我烦了，

说：“我给你取不回来！”赶到检察院取证的时候，县里人比农村好像素质高一点，他们实事求是地说。

他是1999年9月8号被逮到的，案子从公安局到检察院有20多天。两个月后，法院开庭给他判的伤害罪。一开始，定在10月26号开庭。10月26号是我心里很难过的一天，那天我被打整一年。一到那天，我心里就又想起来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偏偏选这个时间。他们手里有那些证据，肯定知道这一天是我挨打的纪念日。后来我还是去了。想不到，改庭了。说是上午8点开庭，我们8点就去了，省电视台“大众话题”节目那边报道过我的事情，他们也说过要去。但是，26号改庭，通知记者了，没有告诉我们。那天人去的还不少呢，在法院站了半院子。赶我们去了，庭长说，改到下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开庭，我去了，在省城的小弟弟也回来参加。妇联给我找了律师，人家（我丈夫）也请了律师。开庭的时候，他的律师说不是故意伤害，是过失。我说：“你家有这么过失的没有？咱打个比方，你们家有这回事，你怎么办呀？”我说：“拿良心衡量这个事，我也不愿意把他放在牢里，但我们这样继续下去，不但害了我们两个人，害的人多了啊！”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后来，他们老说是过失，好像过失就没事了。我说：“判得轻我也不怕，只要你给我结果就行；给了我结果，不服我还告！”在还没给他判刑的时候，妇联怕判不下来，每天都给省妇联打电话，讨论这事怎么办。吴部长、于部长她们请的律师和我一同到省电视台“大众话题”栏目做节目，给他曝光。律师、记者在“大众话题”讨论说应该判几年，说跟（在）法律上查，故意伤害罪应该判7年，虐待罪是2年，结合起来是9年的刑。

告他虐待罪，是妇联帮我写的诉状。检察院把伤害罪的公诉状移送到法院的第二天，我就把状子递给法院了。开始，人家不受理，说：“伤害罪你已经告了。伤害就包括虐待了。”我说：“不

对。反正你要给我公道。我要一直告到公道为止。”在“大众话题”律师和记者讨论过，认为他也构成虐待罪。他们说一个人在家里不自由，就归为虐待。我那会儿，是想吃不让吃，有脚不能走。他把家里的肉放起来，还在面里插上棍，不让我随便吃；不让我上娘家去。这些能不归为虐待吗？！

虐待罪开了一次庭。他就是不认。说我的脚二拇指不是他打断的，是我自己碰的。儿子对他说：“你还是实事求是地说出来，人家证据都取回来了。”他和儿子、闺女说：“爸爸不能认，要是一认，罪就加上去了。不认她也没办法。”最后，县法院没有给他判刑，认为不构成犯罪。我不服，去市里上诉。市法院二审没有开庭。过了一段时间就给我写下一份判决书，说是维持原判。

我自己觉得他构成虐待。我的身子都由他支配了，你说不构成虐待？从我跟他结婚到出事，20年来他一直打我。我没有好好地过一天，身上落下了许多伤疤。这个右手大拇指上的伤疤是他用镰刀砍的。本来他要往我头上砍，我用手一抱头，就砍到这儿了。

伤害罪判下来是4年。我不服，只好找检察院，检察院的那个姓余的女检察官说：“我也知道好像有一点偏低，人家这个罪量刑最高是10年，最低3年，给他判4年刑，也在3年上面了，没法提出公诉，我们提起抗诉的时候，如果不符合法律，要罚我们的。”我说：“连累你们我就不了，要是我自个的，我绝对还要起诉。”过后，他不服，向市里上诉。市法院维持原判。县法院说给他判4年，第一是考虑他给我输过血；第二说是考虑两个孩子，法官说：“我也为两个孩子想一想，因为你儿子也大了，将来必定得成个家，还得放他回来。”他对小闺女吧，可疼了。对儿子不怎么好。

在县看守所，我第一次去开离婚那个庭。可能他在牢里不怎么样，我知道他的性子啊，不知道他是怎的，叫人家打了。那天

在看守所开庭的时候，孩子们都没有去。把他提出来的时候，里边的衬衣、囚衣、背心全都是血，脸全都是黑的，耳朵也是黑的。我没问他谁打的。我当时好像说：“不管你怎么样，你想想看，我挨打的时候那么央求你。现在你也可能央求别人了吧？”我就这么和他说了一句。开庭时他说：“婚我同意离，但是我要小闺女。”过后，法院征求闺女的意见，她不跟他。最后，两个孩子都判给了我。他出狱如果要求变更抚养，那个是根本没有用的。他出狱时，我最好不要见到他，也不愿意听到他。他出狱就是给我几百万也好，给我什么，我都不愿意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脸色。这是绝对什么人也改变不了的。

我从内心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咱们省、市、县妇联，就是咱们做妇女工作的人，感谢律师援助我、感谢法院的帮助。总的来说，前一阶段我是受折磨的人；后一阶段，我处的人不一样，我心里挺满足的啊。像我这样的不要再出来第二个、第三个。家里人都要互相尊重，不是说谁怕谁，不管是女的还是男的，谁也不要欺负谁。

我现在还做生意，但没有资金做面摊。妇联答应我：“王菊芬，你要是想干点什么啊，没有钱，我们也支持你一点，我们给你贷点款啊，3000元还是5000元我们都支持你。”我也想过，开个摊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开起来，第一年肯定也没有多大的效果，肯定是赔本。

我们租的房子不贵，一个月就45块钱，连水费、电费不到60块钱。我们娘三个住一间，一间西房。秋天我还愿意搞蔬菜，到冬天我也是搞蔬菜。现在我没有一个车，人家有三个车、两个车的，我就借上人家的，要不就租人家的几天。今天包下货了，包下人家菜，一般就是包车，包下来之后我就拉上去卖。卖吧，我现在身体不如以前了，一个人掀不上去，我就雇旁人。我们那会儿在一个摊合伙，家里有一个男的还可以。现在我不敢和男的

接触，我就是尽量和一个女的。她力气挺大的，不怕累。有时找不对，她还没这个胆量下这个货，怕包这个货赔了。我一般包的是3天、5天不会坏的货。

一冬天妇联在帮我，就像亲姐妹一样的。我搞的那个（菜），你们叫葱头，我们叫洋葱。冬天我老母亲那边种。我二弟有个农用三轮车，帮我从老家把葱头运到县城。妇联说：“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冬天冷，不能每天在早市上卖。不行就沿着单位卖。”我有的时候去单位卖，认识的单位去可以，不认识的单位那就卖不出去，卖给食堂，居民楼也卖。妇联说：“你给我包起，用塑料袋打起包，打个十斤或八斤，三块或五块的，我给你到县委大院处理一部分。你不和他论斤，就是论袋。一袋多少钱，多少斤，你在家要（称）好。”我就在家里和我弟弟、小闺女装起袋。一袋约三块、五块钱，多了人家也吃不了啊，不能赖人家。要不等于和人家要钱了。

我现在就靠这个生活，大本生意没有，只是做小本生意，我不敢太大。我知道我抬下人家一个摊，租摊人家一部分资金，你就是贷也好借也好，你不能说你收拾摊，欠人家了吧？我怕收拾摊的时候欠人家。

我今天和你们说一个实话吧，我不敢在县上呆着。我想，他刑满的时候我就走。不管走到哪儿，绝对不能在县上。

后记：2002年年底，王菊芬外嫁他乡，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

点评：

妇女权利与能力增长的内在和外动力

薛宁兰

王菊芬，是我们访谈的第一位妇女，也是惟一接受两次访谈的叙述人。在她回忆受暴往事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时时被那些情境揪住，有时禁不住与她一同洒泪。每当那时，现场的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在听录音将她的口述转化成文字时，访谈过程中的那种感受依然强烈——喉头哽咽，泪水盈盈，每每不得不暂停工作，冲出房门，到外面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

她没有进校门学习过一天，至今也只会写自己的姓名，不过，她朴实平和的话语中，常常透出对人性与两性如何相处的体验与感悟。经历了多年磨难和为自己奔走伸冤后的她，现在很自信。她今天的自信来自哪里呢？

第一次挨丈夫打后，王菊芬反抗过，从家中逃离，到县城找亲属，上法庭要求离婚。但是她没有得到社会的有效支持，只是获得了施暴者的一纸保证。外国学者在对配偶暴力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受虐妇女长期受暴得不到相应支持后，就会逐渐丧失尝试寻求出路的努力，从而习得无助，开始消极躲避，在受虐关系中靠妥协求生存；同时，他们还发现，随着暴力的不断升级，当受虐妇女开始意识到家人和自己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出于求生的本能，便会不顾一切向外扩大自己的求助行为，以便生存下来。如果没有父亲气绝身亡的后果出现，王菊芬或许还不可能挣脱各种束缚，义无反顾地走上寻求社会帮助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之路。可是，一旦她开始寻求社会的帮助，就会有许多人伸出援助之手。

在王菊芬求助的过程中，她始终得到社会各界，包括大学生、报社记者、妇联组织、律师，以及公、检、法三机关无偿的援助。这一方面表明，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我国各级妇联和公、检、法机关，对家庭暴力性质的认识有很大改观，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力度较以前有了很大进步；另一方面，也向广大妇女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对配偶暴力一味地采取忍让与消极躲避，只能使暴力升级，每个妇女自身都有着制止暴力、维护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的潜在能力。维护妇女权益、制止家庭暴力是各级妇联和公检法机关的职责。

王菊芬的经历，不仅证明着妇女自身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农村妇女能力的不断增长过程。这其中，省、市、县三级妇联对她的支持与援助尤为重要。正是有了她们在法律上、生活上以及谋生能力上对她的关心与帮助，才使得一个生命和希望都接近死亡边缘的王菊芬，重新看到了生活的美好与价值；才有了一个欠缺法律知识的农村妇女，在第一个官司之后，接二连三地又打了几个官司。尽管有的官司王菊芬并未打赢，但是，打官司本身使她成长了，她不仅掌握了更多的法律知识，也树立了做人的自信与自尊。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前一阶段我是受折磨的人；后一阶段，我处的人不一样，我心里挺满足的啊”。她是配偶暴力的受害者，又是幸存者。

可见，妇女权利与能力的增长，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妇女被动地接受，即通常所说的“赋权于妇女”，而是妇女自身主动地寻求、争取与社会各界支持相结合的能动过程。性别平等的法律，只是实现妇女权利与能力增长（即 Empowerment）的一个必要条件。

25. 一忍就是三十六年

叙述人 马月香
访谈人 宋美娅
访谈时间 2002年2月5日
访谈地点 北京市北大妇女法律援助中心
录音整理 宋美娅 徐翠香
文稿编辑 宋美娅

马月香今年60岁，是我们这次访谈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家庭暴力受害者。她忍耐了36年，到老年了，她不能再忍了，她坚决要求离婚，而且几次上法庭要“告他刑事的事”，最后，法庭对“老头子”判刑半年，监外执行。马月香不服，她想继续到高级法院告。但是，因为采不到证据，她愤怒中又有些无奈，儿子也不支持她再告父亲。她想离婚，也因为房子的问题和儿子们的反对，办起来有些难度。

马大妈小学文化，是北京的一位退休工人，她性格爽朗，待人热情，她说：“妇女们还没有真正站起来啊，我接受你的采访，就是为了呼吁这件事儿。”

我作为妇女，要维护他男子汉的尊严

马：爷们儿打媳妇，好像是天经地义似的，对社会或街坊四邻来说根本没有关系，他们根本管不着，老说这是家庭的事儿，你们管得着吗？

访：我们正在努力。

马：我是1963年1月22日进的这个村，今年已经39年了。鲁保南（化名）是通过我姐姐给介绍的，我娘家是在京郊一个半山区，还很封闭，自己搞对象的特别少。那会儿我都21周岁了，在我们村就是一个大姑娘了。我哥哥跟我父亲有点为我发愁，我是个后妈，我母亲死了。我从小是在美国人开的教堂孤儿院长大的，我五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照顾不了，刚5个月就把我给人了，解放以后家里给接回来了，回来不到一年我母亲就死了，所以从家庭里头来说，感情就不如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哥们融洽。

我21周岁跟他结的婚。他比我大4岁，结过婚，他没有父母，10岁母亲死了，17岁父亲死了。我父亲就说：他没爹没娘，受不着公公婆婆的气。到了别人家跟人好好过日子，有了孩子好好抚养孩子。

据他说，他前一个老婆结婚三年不生育离的婚，我姐跟我介绍时也没说，后来才知道的，我们都已经搞了好几个月对象了，那会儿再吹了又怕村里人笑话。我爸说甭管怎么说，他身体挺好的，进了门就你们两人，这样我也就同意了。

刚开始还行，后来有了孩子之后，我就不能到农业社上班了，天天看着孩子，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发现他脾气特别不好，好酗酒。尤其是来个亲戚朋友，就爱摆出男子汉那个样子来：你是我媳妇，就必须服从我。从那会儿起我就这样想：他是个男的，我是个妇女，女打内，男打外，他外头必须要结交朋友，我作为妇女要尊重他一个男子汉的尊严。这些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不管当着亲戚也好，朋友也好，他骂我，我从来没反驳过。

访：他当着亲戚朋友骂你这种情况多不多？

马：确实不少。从男子汉这方面来说，他是十顶十的这样的人，我也就维护他这一点，因为对于一个妇女来说，你在外头结交的总而言之不如男的，从我思想来说：如果一个女的在外头结

交就怕别人说闲话，我也不出村，哪儿都没去过，有一回我八年都没回娘家，一般都是几年才回去一趟，孩子又多，三个，老大跟老三才相差4岁多点，一个紧一个，也不方便回去。

访：他第一次对您动手您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马：我记得很清楚，我大儿子1岁多，我1963年1月结婚，1963年12月就生了这个大的，不到1岁半他打的我。

访：当时打您是因为什么？

马：就为了这孩子哭，为了没有做熟饭，打的我真不轻呀，他拿机器用的宽皮带抽。我不愿意让我姐姐难堪，因为我姐姐脾气不好，我从来没跟我姐姐说过，我就自己抱着孩子到法院告他去，我想跟他离婚，后来可能是我姐姐托村干部说和去的。

说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说，我呢，也是不言语，就听大伙儿说。后来我姐姐背地里跟我说：“你跟他离婚，你上哪儿住去呀，家里头几个哥哥，恐怕你没地儿住了，又带着个孩子，得了，你就忍了吧！把孩子养大也就成了。”我这一忍就是36年，没少挨打挨骂。

后来别人走了之后，他才说：“我可告诉你，我是冲着大伙儿的面子，我要不冲着大伙儿的面子，你跟我离婚，我就跟你离婚。”当时我一句话也没说，我这人就是这样，我能忍。

访：当时你告到海淀法院了吗？

马：到了，是一个女的接待的，让我拿传票给他，让他去，我记得说和那天还是五月端午。

访：在这次打你之前，他骂你？

马：净是骂了。现在街坊邻居一瞧我能站出来都说：“你跟他过这辈子真不容易呀，也就是你能忍，换个人谁也忍不了。”

访：就在36年里一直持续地小打大打？

马：对。这是头一回最重，第二回打得重，我记得不是1994年就是1995年，把我左耳朵都打聋了。

那次是大儿媳妇单位献血，早上吃饭，我这孙子跟我们说了，我说：“你妈又黑又瘦，平时都舍不得吃，这一献血不更麻烦吗？”那会儿大媳妇跟我们还不说话。孩子又说：“我妈买了席梦思，给我买一个，他们买一个，买两个。”鲁保南说出这话特别不中听：“你妈今儿个为了这钱卖血，明儿该卖肉去了。”我说：“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不管儿媳妇现在理不理咱们，她是咱们家的人，甭说是咱们家的人，亲戚朋友、街坊四邻都不能这么说。”当时，他就骂得我不可开交，我不言语。我把这孩子打发走后，他说：“你呀，从来没跟我顺头顺脸一条腿说过，老跟我反着、拧着。”

我想，他骂完也就完了，没想到骂完这一顿他还不解气。出去把这铁门就给插上了，把我从屋里拽到院子里，按在泥坑里一顿臭打，骑在我身上往我上身打，打我脑袋。大伙儿听见了，我家出门就是马路，拍着门，让他开门，这门就是不开。最后，还是我们旁边邻居的孩子跳过墙来，把门打开，3个老爷们儿才把他给拉开。

打完我就起来了，出去在外边石头上坐了有半个多钟头，回去冲完澡，把衣服给换了。那会儿不觉得，就觉得耳朵有点响，别扭，慢慢它就聋了，不是说当时就聋了。

访：您那天没上医院检查？

马：也没有，我也不瞧了，就买了点小药，我还没说是给打的，我跟大夫说了症状，给我药吃，吃也不管事，这样我也就不瞧了。说实在的，两个儿子没娶媳妇，我也舍不得这钱。那会儿我也不讲究找街道。为什么说不找街道呢？我如果要找了街道，居委会的人也就是说说完了。按他的脾气，他骂人家！因为他骂过居委会主任，我不敢找到居委会，我再找人家不是给人家找骂吗？何苦呢！

我为什么要跟他分居？他从来不尊重我

访：平时鲁大爷干活儿怎么样？

马：我跟您这么说，家里活儿他根本不干，都是我。一开始他种田，后来转到厂子里，公社这些个厂子他都跑到了，哪儿都呆不长！我从到地里干活，就跟他挣一般多，1983年开始调到公社去，一到公社我挣他两人的钱，有几年挣他两个半人的钱。

那他也要摆出他大男人的架子。跟他外甥就这么说：“你们怕媳妇？我告诉你，你问你舅妈，我打她她连个屁都不敢放，我让她干什么她就得干什么，不给我干一个试试。”当着他姐姐这么说，他姐姐就说：“你别这样，他舅妈这辈子不容易！”他不听她的。

访：他打孩子吗？

马：不打，就骂孩子，打就打我，我就成了他的出气筒似的，今天不高兴今天就骂你，喝完了酒也骂你，这一天老骂你。

骂我也不还。为什么我现在站出来？确实是，有时候电视也演妇女受了折磨就怎么忍，说现在有的家庭，男的打了不敢言语，就这么忍着，为了什么？为了这个家，确实是为了这个家。忍，忍什么呢？忍儿女，忍这个家。我老说这话：作为一个妇女，你如果不忍的话，要拆散这一个家特别容易。拆散一家容易，可是你要维持一个家就难了。作为一个妇女，我本人这么想，就得有一个忍字，我跟我们家孩子也这么说：忍字心上一把刀，为什么中间一个点，这就是你要忍，心里头不流血你就得要流泪。这回说：“那你这么忍，为什么不忍了呢？”确实我忍不下去了，他把我胳膊都打折了。“爷们打媳妇天经地义，你牙疼去告去。”确实没有一句安慰的话。

访：就从胳膊打折了开始，觉得不能忍了？

马：觉得不能忍了，胳膊折了，脑袋还缝了6针呢！

访：这是哪一回？

马：2001年3月25日下午3点半。

大儿媳妇爱较劲。有什么事我都跟大儿媳妇商量，在我心目中你是老大，你再较劲，我做婆婆，我跟你商量，她历来不跟我商量。

我这3个儿媳妇都是结婚单过。我给你们创下财富，我给你们留下，分的楼我给你们一人一套，你们不住租出去，那是你们的事情，多少人都说，你这步棋走错了，分的房不应该给她们。我说我盖房子为什么？给儿子盖的，分了的房就得要给他们，他们孝敬我不孝敬我，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合着大的（大儿子）他们把房子都给租出去了。

2001年3月25日早上8点多钟，大儿媳妇来了，三儿子还没起床呢。三儿子在家刚住了有一个月，为什么在家住呢？三儿媳妇上班走的早，他们住的地方特别背。从我这里上班近。我说，你们要在家住，要跟你嫂子打好招呼。按道理说不应该跟她打招呼，可是我知道她较劲，你别说我不跟你商量。这俩孩子就跟她商量：“顶多住上3个月，天一长就走了。”我还跟她说了两回，她也说成，这么着我才同意（三儿子在家住）。这天，她就到家找我来了，说要搬到我这儿住，我说不成。三儿子听见就起来了：“妈，我搬走吧，我别给您找气生。”二儿子一瞅我：“不搬，我看她能怎么着。”她上她公公那屋，我也不知怎么说的，说完她就走了。我想，老二两口子都没有正式工作，日子挺苦的，我就骑车上早市买了点菜，给他们弄点吃的。

我买回菜之后，三儿的媳妇就给做饭，二儿子硬要找他爸说说，他大哥也在那儿喝酒呢。我和他爸爸分居着哩。老三一瞅他二哥去了，他就走了：省得回头你们吵起来我生气。二儿子过去也不知怎么说的，我就听见有砸东西的声音，我这一回头，看见鲁保南拿着一个盆举起来就要打老二，他哥哥就在当前拦着，我

赶紧叫二儿媳妇把老二给拉回来。拉回来他又胡骂，历来骂孩子，骂这两个小的，因为他们俩生的是闺女，大的生的是儿子，他历来偏心眼：“告诉你，你是你妈卖身来的，你他妈不是我的骨肉！”老二跟他急了，进来就拿刀，我出去给他抢过来，我说老二，你们俩走，我也走，我得去看鲁丹（三儿子的女儿）去。他们俩走了，我也就走了。

订到3点半，我太困了，想躺一会儿。进家连15分钟都得不到，他一瞅我进门来就骂，骂得那个寒碜，我就不理他，因为历来都这么骂，骂惯了，没想到他敲着玻璃，点着我的名骂我，这么着我接受不了，我出来跟他嘟囔，他握起拳头一逮我，抽起一个沙发板子冲我脑袋来，我用手这么一挡，砍了我一下，当时我胳膊就肿起来了。第二下我这胳膊就挡不住了，板子打在我脑袋上，把我脑袋打了一个口子，就这样！谁都不敢管他，特别混！

1999年盖房子都是我盯着，把这房子给盖起来了，他逼着我扒一门，不让我走院子。1999年我就跟他分居了，我为什么呢？作为一名妇女，做夫妻关系是不是要两个人都同意才行？他从来不，他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他姐夫是1999年4月23日死的，我还去了，第二天我跟我三大姑子说：28日就要拆房了，我回家归置归置，就不来看您了，等房子盖完以后，我再接您过去住些日子。我说房子被几个外人给整坏了，我找了他们半年多了，赔了3000块钱。我这大外甥说：“舅舅，要没有我舅妈这阵子跑，一分钱谁赔您哪！”就这一句话，惹起火来了，他当着全村的人骂我。我说，你家里家里骂，外头外头骂，你家里头我不言语，出了村当着这么多人你还骂我，我做什么错事了，我哪样事对不起你？我还跟他理论了几句。回来之后，到了晚上，睡觉了，他历来都这样，不经我同意，一下把我脑袋顶在铁床上，顶得我挺疼的，边做这事，边骂我，所以说我下定决心跟他分居，我别再受你的气了！

访：当时觉得心里特生气？

马：特别生气，我还掉着泪呢！还有一年，给我这腿掰得我瘸了一年半，就因为过夫妻生活。他要一喝酒喝多了，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后来大伙儿说我身体挺棒的呀，怎么腿会瘸了呢？我跟任何人都说我受风了，我跟谁说去呀！您说我还能怎么跟他过？

我后来也看电视，电视上没有这个，一般的法律报上也没有这个。我后来花钱去找律师咨询去，从1998年开始，我就拿钱咨询，咨询妇女的事儿：妇女有说话的权利没有，在各种方面都有什么利益和不利的事儿。我不是去一个地儿两个地儿，我有钱不干别的，我拿钱咨询。我要不这么找，今天走不到这一步。通过我这胳膊折了，我更要找了！

访：您咨询的结果怎么样，人家怎么说？

马：打你也好，怎么着也好，按现在法律来说还没有这个程序，法律条文上没有。在我心目中没有给妇女做主的，我就还得忍。从我胳膊折了以后，我再也不忍了。

访：当时把您的胳膊打折了，您也没上医院去？

马：去了，不到医院不成了，胳膊从上到下全肿了，一照片：折了。我说事出有因是你老大，你老大必须要跟着我（去医院），如果没有你，我胳膊折不了，你必须要跟着我。到现在老大不理我，就因为没让他住这房。

他不去呀，他不去我二儿子不干哪！我这胳膊折了，我二儿子打一黑车，来回才20块钱，我大儿子不给：它是黑车。第二天，我在马路上等了足足40分钟，疼得我呀，就打这的打不着呀，黑的就是不坐，都到这份上，在我心中我最疼的就是他呀！

作为妇女，举证特别困难

访：上医院鲁大爷去没去？

马：他没去！回来连问都不问，还照骂不误。街坊四邻都去看我，把头打出窟窿还骑着打呢，人家是从我身上把他给拉起来的。我为什么同意您访问我，我就是要通过您的呼吁找回真正的妇女权益，所以说，区法院判我不服，我找到中级法院。

访：您当时在区法院诉离婚还是诉虐待？

马：刑事案哪！我挨了打，他（法院的人）要证据、要证人，街坊邻居谁给你作证啊？缺的是这证人。人家后来跟我说：“我们怎么给您作证啊？都街坊四邻，出来进去磕头碰脑的，回头我们孩子大人得跟这儿过，要是天天骂我们，我们受得了吗？”所以说没人给作这证，缺少证据，人家就这么说，医院的证明都有，我还到区里高级鉴定中心去了，鉴定书我都有。

访：就是3月25日打了之后您还到鉴定中心去鉴定来着？

马：我呢，说句实在的，第二天我到的妇联，人家看门的就说：“老太太，您等着吧！”我这么一说，人家说：“哟，我可跟您说，您要告您家老头儿，老头儿得能圈进去！”我心里“咯噔”一下子，我就想跟他离婚就算了。

后来到了下午1点多钟，我一通电话，电话说您有什么要求啊，我说我就想跟他离婚。“啊，您要是光跟他离婚，您就直接到法院就行了。”我又回来了。就没到妇联去，人家不让你进，人就让你通电话。这样，我回来之后，我到的法院，后来还不错，有一小伙子接待的，说：“您这个事儿呢，得通过您所在的派出所，得有这个法医鉴定。”还是法院提供给我找法医鉴定的线索。我又找派出所，派出所说了：“两口子打架，鉴什么定！”没有这个派出所证明，人家那儿不给你鉴定。我请的俩律师又去跑，算把这证明给开来了。到法医鉴定那儿鉴定，鉴定轻伤。法院就判他半年，不监他，监外执行一年。我不服，又到中级法院，到中级法院他还是按那个原来的判，还说你缺少证据。

访：要是证据能判得公正点儿？

马：对。如果要有证据可以。判决书不是这个吗？都带着呢。

访：你这是刑事附带民事。

马：所以作为一妇女来说，找证据都是街坊四邻，你找不着。你作为一个妇女还是没站起来，没真正解放。

我横下一条心了，我要到高级法院去。我为什么不去呢？三儿子跟二儿子确实是央求我，儿子不让去。儿子说，他再不好也是我父亲，要真给他圈进去，他退休费就没有了，是不是您就给我们找负担呢。现在我们就没工作，您就替我们担着心，那他回来没退休费了，我们得抚养他呀。我劝您呢，您就别到高级法院去了。

访：这个判决书上面说，鲁大爷要给您赔偿这么多钱，后来他给了吗？

马：他没给，这不我到执行庭去了吗？他跟执行庭下的保证都签字的，全都按了手印也都盖了戳了，说到2002年12月底给我。

他说没钱。他就跟大儿子要啊，他跟我这两小儿子要，俩小儿子说了，我给您这钱是什么钱，您得说出道理来，我要给您这钱，那我就支持您打我妈打得对了。说您要是有病到医院瞧病，您花一万，我们哥儿俩外头借去给您瞧病，这个钱，不给您拿！

访：这么些年来，他的经济和您的经济合着的吗？

马：我跟您这么说，1999年我跟他分居，没分居之前，别看我比他挣得多，他一个月给我200块钱的生活费，其他什么都不管，钱他都拿着，还告诉他大儿子他们：“你就来吃她的，吃她喝她的，她没钱她爱哪儿借哪儿借去，反正我一个月给她200块钱，不管！”我为什么要跟他分居不管他了呢？1998年我感冒，我确实起不来呀，我说，我给你钱，你自己买口吃的。“我他妈给你200块钱生活费了，你他妈不管，装什么孙子呀，爬起

来你也得给我买去！”您说我还能有什么跟他过的呀！

访：跟他过这么多年，都是您做好饭给他吃？

马：历来就是这样，吃一碗盛一碗，后来我为什么不给他盛饭了，两个儿媳妇已经进门了，你还让我吃一碗盛一碗，我说这个饭锅就搁你跟前呢，你自己盛，我也不是小孩儿了，你有儿媳妇有儿子，为什么不让你儿子、儿媳妇盛呀？你老指使我，我也是人！

访：他有退休费，另外他应该还有点积蓄，这是法院判的，他应该给您支付……

马：2157.9元，我不是委托执行庭花了50元，也归他，他给了我107.9元。剩这2000元他说等2002年，他说：“咱们夫妻一场，你真正一点感情都没有啊？”我说我确实对你没有感情，已经没有夫妻感情了。从中级法院回来之后，这是第一回跟我说这种话。他没想到我会走到中级法院去，我就这么说：中级法院不服，我要到高级法院去。我就必须要找回我自己做人的权利来，作为妇女怎么就应该受（忍受）呀？！

访：1999年开始和他分居的吗？

马：1999年，街上骂完回来非得要做事那回，把房子盖完之后，从那儿开始。因为这房产的事儿，我也找律师呢。

因为他是户主，所以房产证上写的是他的名字。现在主要是什么呢，我二儿子也这么说我：“妈，您要跟他离婚，我可跟您这么说，是您提出来的，我爸说给您就给您，不说给您就不给您，因为是您提出来的，不是他提出来的。”

这事儿我早咨询过了，我说你甭管了，我到法院，法院判我一米，我要一米，法院不判我，我都认了，还甭说现在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不管谁提出来的。

访：您儿子是不是不同意您离婚？

马：确实是不同意，我就这样也好，到海淀法院也好，到中

级法院也好，我三儿子不参加意见：“您说要没钱了，我给您钱成，说要离婚，以我心里来说我也是不同意。”

访：他们也知道他们父亲打您打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同意您离呢？

马：我那大儿子到中级法院当堂给我作证，说我这辈子没挨过他的打，做反证！开庭时他跟着他爸去，我就一个人去，除了拿判决书的时候，我让二儿子跟着我，因为那回我感冒。

他也请了律师，说他有证据，这么着，法官让他起来作证，他说：“我妈这辈子没挨过打，非要说小吵小闹的倒是有。”大儿媳妇给我作证说我这一辈子都是我做主，他从来没做过主。回来我跟二儿子一说，我二儿子跟他说：“你没有做我哥哥的权利，我不把你当大哥！”

他对我有意见，好像是1989年还是1990年，正好那年办房产证。大儿媳妇背着我们找原来的生产队队长，让人家签字把这房子改成他的名，人家没管，回来请他爸爸喝酒把这事儿说了。您说要商量这家产的事，是不是公公婆婆都得叫上啊，他们从来拿我不当回事：“户主是鲁，他怎么说怎么是，你靠边站，没你说话的权利！”大儿媳妇就这么说，所以说他商量这些事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我正织毛衣呢，她来了，说：“妈，我找您来了，这有笔有纸，您给我写个申请。”我问她写什么申请，“我昨天跟我爸商量好了，让您写一申请，我们去办房产证，您就甭管了！”我说你爸回来没跟我说呀。中午他回来了，“爸，昨天您没跟我妈说呀？”“没说，昨天喝多了，你给他们写一申请，这房子都给写上大儿子的名字。”我说你可不是一儿子，你三个儿子呢！要是给也得把三个儿子叫到一块儿，开个家庭会议。两个小儿子不同意，说：“妈跟爸都才四十多岁，就把房子都给分了，妈跟爸哪儿住去呀？”就因为我不同意，大儿媳妇骂了我两天两宿，就从那事儿有了隔阂。

访：那您二儿子、三儿子没上庭作证说您挨过打？

马：我不让他们去，我说我一个人的事儿，我不牵扯你们儿女。而且家里人作证不成。所以说我为什么同意您今天访问我呢？在法庭上，街坊四邻的证据根本不好做，做笔录人家都不去，法院有权力下来调查，他们就不调查，光让我举证。作为一个妇女来说，在家庭暴力上举证特别困难，如果到街坊四邻去访，肯定不是这个结果。

我要找我不生气、不挨打的幸福

访：您现在离婚的程序上来了没有？

马：还没有，牵扯到家产，法官让我先撤诉，先把家产弄好了再提出离婚。就这房子，别的我什么都没有！人家搬迁了我跟人家要一旧衣柜，没这旧衣柜之前，我的衣服都搁纸箱里，他有衣柜不让我使。

访：没跟他分居那会儿也那样？

马：就那样，不让你使！

访：那现在关键就是这房子，房子有希望跟他分清楚吗，你住两间他住两间？

马：我估摸不成，因为我 1984 年翻盖的时候有 3 个孩子的名，这回法院说分割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仨孩子的，如果仨孩子不要，还得到公证处去，回去我一问，仨孩子都要。我说那就法院解决吧！

访：从 1963 年到现在，39 年里挨打的次数您记得有多少次吗？

马：就说最厉害的：1965 年第一次打我。1965 年分白菜的时候又打了我一次，因为借车，没通过他同意我把车借出去了。就因为这个当着大伙儿的面拳打脚踢，大嘴巴扇你，那会儿我怀老二已经怀了几个月了呢！

还有一回，是老三没结婚之前，我就跟他说：“今天家里没人，就剩咱们俩人了，咱俩谈谈，你看，老三也要结婚了，有什么事你摆在桌面上，哪件事做得不对，你跟我说，别老骂我。骂不好，为什么呢？你看，现在大儿媳妇为什么不尊重我，就是你当着她骂我。这三的进门你可千万不能再骂了，老伴老伴，老了就是伴，儿媳妇也好，儿子也好，他们都在效着你呢！咱俩互相心疼。”我跟他说完了，晚上儿子儿媳妇回来了，全都一五一十暴露了：“你妈怎么跟我说的，说她离不开我，有病我伺候她，下蛆我都不伺候她！”您说我还能怎么跟他说呢！所以说幸福也是自己创造的，痛苦也是自己造成的，我就自己走我自己的路。

访：他对这几个儿子也都不管不问哪？

马：他就管他大儿子大孙子。那俩儿子生的是孙女。为什么大儿子同意我跟他离婚，他有他的想法：他爸名里的家产整个都是他的，人家说过：你生姑娘，没你家产！所以说我二儿子、三儿子不同意我走离婚这条道。说实在，我走区法院、中级法院，我二儿子没掉过眼泪，就管背地里劝我。就从我一起诉跟他爸爸离婚，这孩子确实是掉了眼泪了：“妈，我不同意您离婚，您要离婚这家就散了！”我说散也好，不散也好，你妈的道儿你妈自己走，我要走我自己的路，你们也都大了，都有你们自己的家庭了，我也找我自己的幸福，找我不生气、不挨打的幸福，我这一辈子挨够了！

访：现在您再回想您过来的这几十年，每一次挨打都是劝自己忍？

马：你就得劝自己忍，为了这个家！你要不忍，这家就得要散了！

访：当时有没有想，要是离了就不再挨打了？

马：我呢，确实是想。1999年分居之后我想跟他离，起诉书都写好了，跟三个儿子一商量都不同意，我也跟他们答应

了，当时我眼泪确实是掉了下来，我到圆明园大哭了一场，就因为不离开了我还得要忍！没想到，转过年来把我胳膊给打折了，我这一辈子都是付出，没有回报，回报的是耳朵聋、胳膊折、脑袋漏。我现在已经是半残的人了，我就这种回报？所以说我现在提出要跟他离婚，我跟他一点感情都没有。我确实是下定狠心到高级法院去，这俩孩子跟儿媳妇央求我两天。要不是这俩孩子，我，我饶不了他！分完家产我再跟他离婚。

访：您经历了这么几十年的过程，您怎么看妇女挨打这件事？

马：其实啊，按现在开放的年代，可以躲，不像我们那会儿，可以说是半封闭式的，一说离婚，娘家人起码脸上不好看，本人脸上也不好看。

访：另外是不是也有实际问题：离了婚之后您没处可去。

马：我姐姐不是说了嘛：“离了婚你上哪儿呀，你又没地方住，忍着吧，孩子大了就好了。”

访：就是从抱着孩子那次想离过，接下来这么几十年一直到这中间就没再想过离婚的事儿？

马：对，绝对没有想过！

这档子事儿我都忍了，还有什么不能忍

访：这么多年，他平时对您有过关心，表示过好的时候吗？

马：（略顿）还真没有，今儿个没骂你，给你个好脸色，你就算上了天堂了，逮谁跟谁说我靠人（外头有人）了。我二儿子犯过错误，进去这三年，家里什么情况他也不知道。回来，我说这孩子怎么这几天说话这么不顺溜，没有过啊！那天，他跟我带了一句“他妈的”，我就问他，他跟我态度特别生硬，最后跟街坊说了实话：“我爸跟我说了，我妈靠着人呢。”“哟，你妈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他是哪样的人，他怎么不说说呀？”我跟您

这么说，他领着人跟家 5 年，一锅子吃饭，一炕上睡觉，我都忍！

访：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马：1986 年 11 月。现在那女人死了，不死还断不了呢，早死了！

访：他对那女的好？

马：特好，吃什么给什么，骂他怎么着都成，我还得伺候着她，今儿个说吃饺子就吃饺子，你还得捏小了，捏大了不成！

访：那您住哪儿呀？

马：我也跟他一床上睡啊！

访：3 个人睡一床？！

马：那是！

访：那他俩做事你也在边上啊？

马：我上哪儿躲去呀！我躲哪儿去呀！我不忍成吗？俩孩子都没娶媳妇！

访：村里街坊邻居都知道吗？

马：怎么不知道，天天来，天天捂着？

访：那女的是年轻啊还是怎么着？

马：那会儿才 30 多岁。她两口子都是残疾人。女的长的还凑合，就是腿走道跟鸭子一样。

访：他把人家女的领家来，她丈夫怎么办？

马：天天上班，下了班上这儿来，那男的有点缺心眼。一分钱不给我，我还得管人家的吃！

男的有夜班就上夜班去了，不是夜班就回家了，反正一礼拜这女的得在我这住 3 天。

访：那会儿您 3 个儿子不都大了吗？

马：谁管呀，哪个儿子敢管他呀，谁都怕他骂。

访：5 年的时间，您忍这档子事儿可是时间不短！

马：您就想想，这档子事儿我忍了，还有别的什么事儿我不能忍了？

访：他领家来，您一向也没反对过？

马：还确实没反对，为什么呢？我也怕他，从心里头怕他，回头为这事又打你，你上哪儿去求饶去，所以说我也就忍了，爱怎么着怎么着。

他退休后，在一个大学干临时工的时候，他跟大儿媳妇大儿子说，要跟我离婚，说：“我在单位搞了一个女的，比你妈漂亮，也比你妈利落，带一个15岁姑娘，商量好了，你妈要跟我离婚，她就嫁给我。”隔了两天，儿媳妇跟我说了，我说：“他要提出来我就跟他离，他要不跟我提我也不提，你也没瞅见，我也没捉着，瞅见了捉着的我都不管，瞅不见捉不着的我更不管。他要提出来我就跟他去。”我这儿媳妇说：“您可千万别去，她带了一个15岁姑娘，明儿这家产又多分一份。”过了好些日子，他才跟我说。我说，你要提出来你有这种要求，我达到你的要求。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跟我儿子说，你爸怎么跟你说我不管，街坊四邻眼睛是亮的，你妈是一条大道走中间，一张白纸就是一张白纸，绝不能让它有黑点！

访：现在您这个胳膊能使唤了吗？

马：现在也就转成这样了（只能转到侧面），再转就不成了！我还是受了一个二回罪，第一次骨头没接上，直接打的石膏，40天呢，里头疼，我又去照一张相，还是没接上，后来重新接的。他连问都不问，还骂呢，从中级法院回来不骂了，算是老实了！到区法院回来不服还骂呢，他没想到我到中级法院。大儿子说：“也没把我爸圈起来，该吃还吃，该喝还喝，两口子的事情，法院管得了吗？”

按老百姓的眼光看，我官司输了，可是按法律来说，我不承

认我输，总而言之，监外执行也好，但他总算判了。我就呼吁，以后，妇联也好，开会也好，反映反映，重要的就是证据。输，我就输在作证上了。

他请的两个律师，在法院跟我干起来了。那律师说：“原告你是不是有一个名叫虎太太呀？”我说对，没错！当时他就说：“那你在村里是不是特别霸道，一个泼妇啊？”作为一个律师，该怎么解释“虎太太”的意思吗？我说我告诉您，鲁保南的小名叫小虎，大伙儿叫我虎太太。作为律师来说，不管是被告告诉你的，还是你查访知道的，你不该这么解释，你必须问“虎太太”这名怎么得来的。

法官说他那样解释对，我跟法官说不行，法官说为什么不行，我说，他应该问别人为什么叫我虎太太，他得听解释，在法庭上应该怎么用词？应该用泼妇吗？应该说霸道？

后来呢，法官不言语了，他认为有道理了，那律师侵犯我人权了，他侮辱我人格了。我说你去打听打听，我进门30多年，我没跟任何人吵过一回架。

访：娘家人也不出来给你主张？

马：不让他们出头，不想牵扯娘家人，人家有人家的家庭，对不起他们，我大哥80了。

访：他们知道您在这边受气，他们什么态度？

马：嫁出去的闺女，娘家也管不着了，所以说这妇女受气，没有谁管。我就得自己管自己，离婚的事，我还得办。

后记：2002年12月，我和马大妈通电话，她告诉我，离婚的事儿办完了，她分得了一间住房。希望她能过上“不挨打、不受气”的好日子。

点评：

她为什么忍耐

宋美娅

马月香老人在暴力的生活中忍耐了36年，是她软弱吗？是她愿意挨打挨骂吗？

肯定不是。关键的问题是，她不耐又该如何？尽管我们明白，离开施暴者，是防止再次受暴的最好方法，但是，我们也非正常理解马月香忍耐36年的无奈，因为她的无奈不是她个人可以克服的，而是社会结构造成的。

首先，如果离婚，她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马月香在第一次挨打后就抱着孩子去离婚，她的姐姐说了一句话，一语道破了她的困境：“你跟他离婚你上哪儿住去呀？你就忍了吧！”事实确实如此，许多受暴妇女像马月香一样，不是不想离，而是不能离，离不了。尤其是在农村，妇女如果想摆脱家庭暴力，首先面对的是生存的困境。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土地也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的，她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附着在婚姻中，不管她们如何终日劳作，一旦离婚，她们立刻居无所，食无饭，还会失去孩子。所以，她们不得不忍耐。

我们的社会依旧是一个男权社会，为了确保男性权利，女性曾被剥夺受教育权和公共事务参与权，经过几十年大力推进男女平等，现在虽然已大大改观，但这种组织构建的痕迹依然存在，比如从夫而居，就是巩固男权的家庭构建形式，老婆是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打她她都无处可去，如此的不付代价，让打老婆的男人无所顾忌。

不仅是实体的组织形式，文化观念、思想意识也在巩固男权

方面有更加丰富的内容。马月香多次说到，“他十顶十的男子气”，“维护他男子汉的尊严”，什么是男子气，男子气的内涵是研究家庭暴力时的一个关注点，本案所体现出来的不外是霸气，是家庭统治地位的不可动摇。男女还有不同的道德标准，男人领女人回家同居不算什么，女人离婚都会被非议，这些旧的观念意识也是女性追求合法权益的障碍。

因为得不到有效的证据，马月香老人的官司不能如她所愿，她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让妇女举证太困难”，“我就输在作证上”。在这个问题上，也反映出社会结构对女性权利的削弱。从夫居以后，妇女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脱离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到男方家，当家庭暴力发生时，不管是家庭中还是社区里，都是男方的亲人和关系网，妇女难以找到庇护，这是家庭暴力滋生和恶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一旦妇女想打官司，如马月香老人，左邻右舍权衡得失，离了婚，女的就走了，男的走不了，而且得罪一个男人，连带着所有他的亲戚朋友，不愿作证也是自然的。希望马月香老人的呼吁能给司法机关提个醒，尽快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处理家庭暴力案件。

在马月香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她可贵的抗争精神，“必须找回我做人的权利”，“我要找我不挨打、不受气的幸福”，她有就去咨询妇女权益的事，这种不屈，是她最终走出暴力家庭的重要原因。

26. 发生在警察身上的家庭暴力

叙述人 杨玲美
访谈人 宋美娅
访谈时间 2001年9月22日
访谈地点 反家暴资料中心
录音整理 宋美娅 徐翠香
文稿编辑 宋美娅

杨玲美，某派出所警察，曾是名军人，军事院校毕业。如此的身份和经历也没有阻止丈夫对她施暴，她两次被打成耳膜穿孔，多次面临生命的威胁。她曾非常害怕离婚，为挽救婚姻对丈夫百依百顺，但她最终改变了态度。在她的诉讼过程中，她得到了北京市妇联的支持和帮助，经法院审理，施暴方被判一年徒刑，缓期一年执行。

杨玲美清秀，纤细瘦弱，可能与遭受暴力伤害有关。

参军到北京

访：你是哪一年出生，哪一年参军？

叙：我是1971年出生的，属猪，1989年当的兵。我生在内蒙，十四五岁到的石家庄，家里姐妹四个，没有男孩，我是老二。

访：当时你父母没想生一个男孩？

叙：想，就因为一直没生到男孩，老四都属于超生了。

访：你父母亲在哪里工作？

叙：我爸原来是飞行员，飞了没多久时间，就到民航下面就地勤人员，退休时是高级工程师。我妈是粮食局的。我妈随我爸到石家庄来的，因为当时我爷爷身边就我叔叔一个儿子，我姑姑也是当兵的，在北京。我叔叔三十六七岁得癌症死了，老人身边没人照顾，就我爸一个儿子了，再加上我爸的身份，没到一年，我们全家就从内蒙迁到河北石家庄。

其实当时我个人没想过要当兵，我上高中快毕业那会儿正好赶上招第六批飞行员，因为我爸是部队的，他希望我们也能走这条路。我想我身体在我们家还算是比较强壮的，很少生病，我就试一试呗。毕竟飞行员对于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是比较向往的。因为第三次体检不合格，没招上。那会儿我已经耽误很多课程了，后来我爸说看我那么喜欢当兵的，天上飞的不行，地上跑的总可以吧，就让我去当陆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总参到河北招兵，经过第二次体检，把我招上了，在总参机关工作，那个大院相当正规，相当严格。因为它属于试点单位，而且我们同一个团的前面一个连队，是1995年江泽民授予集体荣誉三等功，很有名的。

在部队两三年我又去上的学，当时我也比较犹豫：是考学呢还是回到地方，因为一考学，肯定就留在部队了，我当时可以回去直接进民航的，因为我爸那儿有指标，民航子女都可以进民航，安排工作时照顾，所以我也比较矛盾，但后来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部队的，毕竟我父亲他们都是当兵的，包括我叔叔、我姑姑，还有我爷爷，我爷爷算是老军人了，是长征时的小通讯员。包括我表哥堂哥都是当兵的，不过他们都复员回去了。我比较喜欢部队这种生活：特别正规化，整齐划一，周围的人也比较单纯，都很年轻，有朝气，所以我后来还是准备考学，1992年去学的，学完分配又回到了北京。

访：考学是你自己想去考的吗？

叙：想考你也得有资格，不是说你想去考就能考，我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当时在我们那儿一说杨玲美都知道，表现特别好，都说我这人不错，素质比较高。推荐加上应试，好几批筛选以后，我的文化课成绩比较高，在团里排第三名，考上了西安通讯指挥学院，那是个部队院校。

还没办喜事他就开始打

访：你在认识李卫之前有没有谈过恋爱？

叙：谈过，也有条件比李卫好的，就因为人家不理解我，觉得见面时间太少了，我请假出去 10 点半就必须回来，人家肯定受不了呀，觉得没法了解你这人。

原来自己谈过一个，但后来吹了，他回到南京军区，我在北京，不在一块儿。到北京以后就都是别人给介绍的，在李卫之前谈过两个，都是别人介绍的，第一个是律师，比我大四五岁，很有钱，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时间长了，觉得我们俩沟通上比较困难，不合适就吹了；第二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分到北京当老师，跟我一样，也是外地人，谈过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我们俩性格不太合，他什么都不顾，一点不在乎你，也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两个人都感到很不舒服，我想算了。后来找李卫，他也是当兵的，当过 4 年空军，跟我的经历多少有点相似，我觉得我跟他有共同语言，他能了解我这种部队管理的方式。介绍人选在 2 月 14 日情人节这天让我们见面，她跟我说是李卫约好这个时间见面，我当时觉得这男的还挺浪漫的。我们俩见面以后，他对我印象还可以，我对他印象就是觉得挺高的，他 1.84 米，长相一般，挺精神、挺壮，也很显年轻，飞行员嘛，一个月飞两次，一次 3 天，其他时间就都是自己的了，而且工资也高，一个月三四千，父母身边就他一个儿子，我认识他之前他姐姐就出国了。

访：他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叙：我看户口簿上写他爸是北京一家工厂的车间主任，后来退休了；他妈妈原来在杏花村当中学老师，教语文兼班主任，教了9年以后，到一个区的科委，退休时是区科委的什么科长。他母亲关系网比较大，而且她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2月14日见面之后，他说我“挺实在”，就这么一句话。后来他经常到我们部队去找我，跟我们领导谈话，我们周围的同事呀、小战士呀、小干部呀都接触，因为我出来的机会少，只能到我这边来。因为我以前谈的朋友都觉得没机会跟我接触不了解我，我认为他这么主动找我们领导谈无可厚非，他对我了解了才能决定能否跟我结婚，同时我们领导也可以了解他，所以时间长了，他对我特别了解，而我对他却不怎么了解，领结婚证之前，他的朋友我一个也没见过，就见过他父母。领结婚证之前，不是要照照片吗？照完照片不知什么事儿我们俩吵起来，不太高兴，我觉得当时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不是很舒服，我就说，领结婚证的事儿往后再拖延拖延。

李卫在北兵马司那儿有一套住房，我有时去他北兵马司胡同那边，晚上六七点钟来电话，他不接，那时正谈恋爱，我不可能去接，有一次他接了，可能是他哥们，人家可能问他我在哪儿工作，他说“在外企”。就这样骗人家，不知道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职业不太好，他这人特要面子，特别内向。后来我慢慢觉得李卫不像我原来接触的那种感觉，原来觉得他特别开朗、爱笑，挺快乐的一个，而且他以前也当过兵，跟我有相同的经历，我想跟他生活在一起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他老是把我和他以前在外企谈的女孩做比较，一方面伤害了我，另一方面，他越这样比较，他就越觉得某些方面我不像他喜欢的那种女孩，他以前谈的都是地方上的，没跟部队的女孩谈过。我也没想太多，我觉得可能某些方面他喜欢我。

访：你能感觉到他爱你吗？

叙：我谈恋爱也没太多经验，我觉得应该是喜欢我的吧，要不然怎么会跟我结婚呢？而且那天我们吵完架，我说需要考虑一段时间再结婚，因为我们家比较保守，我不希望结了婚又离，后来他就哄我，把我哄好以后就要跟我拉钩：不管11月18日那天发生什么事都要去领结婚证。我觉得他有点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大了，那会儿他都快31岁了，还是怕失去我，好多方面我都想过，但我想既然他决定跟我结婚，肯定还是爱我的，不可能不爱我还跟我结婚吧，所以我就没多想，跟他领了证。我父母也见过他，觉得这人还行，就结婚了。12月1日我们有了第一次性生活，当时他觉得挺奇怪的：是个处女，觉得没看错人。

访：他表达出来了？

叙：他说了，他觉得这么大岁数了不可能，我当时想不通，觉得很正常呀，他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很奇怪，他也没多解释，特别高兴地搂着我。但事后时间不长，他就出现打我的行为了。

12月中下旬我们去逛燕莎商场，因为我在部队里呆的时间长了，比较朴素，我什么也没要，就让他给我买了个冰淇淋，我觉得他特别瞧不起我，好像是觉得这人怎么这么不优雅呀，没品位呀什么的，跟他以前女朋友一比，太俗气了。他特别不高兴，赌着气扭头出门就走了，把我一人扔在燕莎。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害怕把我弄丢了，我就在后面追他，在外面我们吵了一架，不太高兴。晚上半夜不知什么时候我碰了一下他，把他弄醒了，他坐起来把灯开了就开始跟我闹，说后悔跟我结婚，说我不如他以前的女朋友，还让我照镜子，我觉得当时特别羞辱我，特别不高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让我照镜子，我没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我很气愤，问他为什么不找他以前的女朋友结婚，要跟我结婚，他就不高兴，嫌我顶他，马上脸就翻过来，又说又骂的，还狠狠打了我一耳光。我当时哭了，我说：“离婚离婚！我父母

都没这么打过我。”我抢着电话要跟我爸妈打电话，我刚拿起电话，他抢过电话就往铁门上砸去，我头一回发现他脾气这么大，把我吓坏了，穿上裤子，我说我要走，出去打电话给我爸妈，我也是赌气，只不过想吓唬他，不可能真做。这时候他听到外面邻居起来的声音，害怕把事情闹大，因为周围都是他父亲的同事，把我拽回来，安慰我半天，这才没事，这是第一次风波。

紧接着1999年2月6日办喜事之前，我们俩又闹了几回，闹的最大的一回就是我们俩去买喜糖，在路上不知道怎么想起来，非说买喜糖是我们娘家的事，找茬跟我闹。后来我们俩又打起来，我哭着往回跑，我说，“我要告你爸去！”他上来从后面就踹了我一脚，我当时趴在地上，还没等我起来，他上来又骑在我身上，开始抽我，打我的脸，卡住我的脖子，我差点喘不过气来，就这样在大街上打我。后来又拽着我说是要去法庭离婚，周围那么多人劝他都不听，后来我的呼机响，我说我姑姑呼我，因为当时她要给我们办事儿找车，他也就不打我了，我乘这个机会打电话给我姑，我说：“姑姑，李卫找你。”他们俩一通电话，乘这个机会，我扭头打车就跑，我跟出租车司机说，你愿往哪儿带就往哪儿带，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后来我跑到贵友大厦去了。他后来可能也觉得不对，呼我让我回去，说对不起呀什么的，我不理他，第三遍呼我说要来接我，我一想，还是算了吧，毕竟还没办事，我们俩就闹成这样，他父母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吃午饭呢！万一出了什么事也挺不好意思的，这一闹肯定知道我们又打架了，因为以前我们俩打过架：1999年1月有一回打我，把我鼻梁骨打歪了，当时鼻子一下就鼓起来了，他也吓坏了，赶紧给他妈打电话，所以他爸妈在这方面挺敏感的。既然他呼我，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爸妈把我们俩训了一顿，尤其是他妈，反正他妈就特挑、事儿多。咱就是一直把他家看得比较高，他母亲又是老师，教育出的儿子肯定是好儿子，我就是因为这样想，所以没想

过李卫会坏到哪儿去。李卫第一次打我耳穿孔的时候，我说再这样下去，一定要告到妇联去，其实我也只是想吓唬他一下，你猜他妈怎么说：“走，儿子，咱们散步去！”就这样，不认为他儿子有错，纵容他儿子，所以李卫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我，他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办完事以后，我们在他妈家住了一个月，他妈就嫌我起来晚了、懒啦、不干活啦，我说，我没有不干活，只是起来晚点，毕竟我们是新婚呀！李卫后来安慰我说：“老人嘛，你听听就完了，下回注意点就行了。”我想李卫这么支持我，我也没必要跟他妈计较这事儿，跟她处好对我肯定没坏处。我就哄着他妈，反正他妈就是这事儿那事儿特挑。

访：李卫的爸妈关系怎么样？

叙：还行，但是后来他三姨透露他们以前也动过手，他爸妈以前也跟我说过，他们年轻时也闹过，他妈一扭头，骑着车就回他娘家了。我在北京哪有娘家？每次李卫打我都要把我的钥匙没收，一脚把我踹出去：“滚蛋！这是我的家。”特别霸道，结完婚我们打了几次架后，这种面目就暴露出来了。包括我们每周六、日去他父母那儿，我去了肯定就是帮他妈干活，他和他爸就坐沙发上看电视，他们家就习惯男尊女卑。他爸很少干活，所以，从他父母那儿对他的影响，我们结完婚就是我干活，他要干活就不正常了，他觉得结完婚以后，媳妇就得给他干活，他就有这种观念，但相对来说，比他爸还好多了。

访：他爸是什么文化？

叙：农村兵，河北一个农村的，当了兵复员跟他妈结的婚，那个年代觉得找当兵的挺光荣的。他妈是技校毕业的，后来又进修了。

访：那天你婆婆那么训你，你有什么反应？

叙：我没吭声，我能吭什么声？我们家我爸妈说我什么话，我肯定不能顶嘴，那你能说什么呀，老人说话，你只能听着呗，

我们俩打架是我们俩的事儿，回头我们自己慢慢解决，到现在我也是这种观点，父母训你也好，高兴也好，那是老人的事儿，毕竟是你们俩打架，跟老人没关系，毕竟李卫是他的儿子呀！

访：但是她并没训他儿子呀！

叙：是呀，就训我，觉得肯定是我的错，她肯定是说我，不会说他儿子，而且他父母觉得我跟他结婚是我迈他们家高门槛了。条件上我们家不比他次，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再怎么说我也是外地人，关键就是觉得你是外地人，跟我们北京人差一档次，他们就是这种观念，而且觉得我落户到北京是他们家的功劳。他们家觉得这北京户口不知有多了不起，好像给了我多大恩惠似的，觉得“什么事情都得我们家说了算，你就得俯首听从”。

访：他妈给过你这样的教训吗？

叙：有啊，我们俩打过几次架，他妈就说：“小杨，我以后得给你上上课。”说李卫是飞行员，不能跟他闹。我心想：我们俩每次打架都是他主动挑起头来，我每天都哄着他，我还害怕打架呢，每次打架吃亏的还不是我？！说点势利的话，你们家条件好，我还巴不得攀你们家好，好好过日子，而且我本身也特别爱李卫，他打我这么多次，我也没跟他闹过离婚，都是他跟我闹离婚。1999年我们俩结婚第一年，就跟我分居过三次，一打完架就出去住，一住就是一个月。1999年3月8日，我爸大老远从外地来看我，他连面都不见，我爸问我：“李卫怎么不回来？”我说吵架了，我爸就让我买二锅头跟李卫喝两盅。酒买回来打电话找不着李卫，后来他妈可能跟他通了电话，我再打电话给他他接了，我告诉他爸来了，他不接这个茬，来了一句“以后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你别管我，我也不管你”。说完电话就挂了，连电话也不给我爸打一个，他爸妈也没过来看我们，都是我跟我爸去看他们，我们家太抬举他们家了，所以他们家从头到尾就压在我们头上，觉得比我们家高一头。

打得我耳膜穿孔

访：他第一次打你耳膜穿孔是什么时候？

叙：1999年5月2日。4月中旬他们单位让他们带家属去厦门疗养，我好不容易把他从北兵马司劝回来，我当时看他床上有一个女士裤头，沙发上还有香水，我们俩都不用香水，但当初我想跟他好好过，刚结婚有一个磨合期，我就别把那些当回事，把他哄回去了。4月份我跟他一块去厦门疗养去了，途中他就不高兴，吵了几句。到了疗养院，第二天晚上又找茬和我吵起来，9点多的时候我们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到床上又是抽又是打的，足足打了两个多小时，抓着我的头发往墙上狠狠地撞，他骑在我身上，我根本动不了，我直哭，挣扎着喊“救命”，因为隔壁是他同事，他就用枕头捂着我的脑袋，不让我哭出来，我都快窒息了，他们同事都是男的，在门口堵了半天，直喊“李卫别打”！李卫边打边说我们没穿衣服，不让他们同事进来，足足把我打了两个多小时。后来他们同事找了一个女的进来把我拽出来，我浑身是血斑、淤血，伤痕累累。在那里，我天天看病，做理疗，他天天疗养、玩牌、游山看景，根本不管我。这次打完以后，没过两三天又打了我一次，那次不如这次严重。后来他们单位领导向北京汇报了此事，提前把我们带回来了，影响特别不好。当时李卫就特恨我，觉得是因为我而起，我给他丢脸了。

就因为是在轮渡上我想用他的手机给我妈打个电话，他就不高兴，不让我打，说到岛上再打，我有点不高兴，撅着嘴，他们同事说“打就打呗”。到了岛上，他就直生气，嫌我这不好那不好，说我在他同事面前不给他面子。

厦门打我这次以后，他还当着他们同事的面跟我妈说对不起，保证以后不再打我。回来以后，4月27、28日又打我一回。可能那天下午他们领导找他谈话了，路上他们同事说他不对，他

觉得同事贬低他，没面子，领导说他就更不高兴了，回去找他爸妈说这事儿，他妈来火了，说他笨，连个女人都摆不平。他直到晚上9点多才回来，我问他吃饭了没有，他不理我，我也不敢多说话，便洗漱睡觉了。

刚躺下没10分钟，李卫也上床了，上床后，他躺在那又唱又晃，我想他又要闹事儿了，折腾到晚上1点了还不睡，我困得不行了，刚迷糊着，突然被他推醒，非让我上厕所，他说你每天就是这时候上厕所，其实我根本不是每天晚上上厕所。我想他又要找茬了，为了不出事，顺从他的意思上了个厕所，结果我刚一躺下，他便把灯全打开了，坐在床上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什么我给他丢脸啦，这个那个的，我当时很气愤，说了没两句，他上来就骑到我身上，开始揍我，两脚在后面卡住我的腿，我根本动不了，把我两只手攥着，捏得上边都青了，使劲抽我的脸，抽得我整个眼睛都看不见，直流眼泪，后来我恶心得把东西都吐出来了，他却攥着我的脖子让我咽进去，就这样虐待我。我就哄着他，我说：“李卫，我这么爱你，你不能这样对我。”他一看也是，发泄得也差不多了，觉得好像不对，才从身上下来。下来以后就非要跟我闹离婚，我就哭，希望别离，他有点不高兴，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4月最后一天下午，我跟他去他父母那儿，他父母知道疗养时发生的事儿，但不知道回来又打我这事儿，他妈的意思是让我们过去住。说心里话，我特别不愿跟他妈一块儿住，他妈老爱训我，看我不顺眼，特别不舒服，而且每天累死累活给她干活儿。后来李卫问我5月1日到父母这边住行不行，我说“随便”，他妈就不高兴了。李卫一看他妈不高兴，就对我来气了，晚上我们俩吃完饭回去，就不停地跟我嘟囔，嫌我说“随便”了，两个字就把他给得罪了。第二天上午10点，李卫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想去。然后他就给他爸打电话，他爸嫌他窝囊，连个女的都摆

不平，电话一放下，他就来气了，又开始闹，跟我提离婚，让我写离婚协议书，给他签字，我就不写，他就打我，还咬了我两口，拿菜刀架在我脖子上，我说你弄死我我也不写。他一看没招了，把我按在沙发上就开始揍，拽着我让我出门，把我钥匙没收，“滚，滚出去！我不让你在这儿住，这是我的家”。后来电梯女工听到了，劝了半天把我们劝好了。可是他已经一天没让我吃饭了，我就想做饭去，他不让我做，我说出去买点吃的也不让，拿个凳子堵在门口。晚上，困得我实在不行了，他躺床上睡了，我想上床睡他不让，没办法就在沙发上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来了，又让我写离婚协议书，5月2日跟他离婚去，我说我就不离，他就把我按在地上，像卷麻花一样把我脖子往里卷，使劲抽我、踹我，把我钥匙没收，连踢带拽要把我拽出去，不让我回家，让我跟他出去离婚，“不离婚就滚出去，不要回来”！他要锁门，我想抓他胳膊，不让他锁门，我还没抓上呢，他扭头就一大耳光，当时耳朵就听不着了。我哭着去抓他，说我耳朵聋了，在楼底下他又打我，嫌我缠着他，他打完我就要跑，我拽着他不让走，他又冲过来要打。正好当时我拎了个包出来，我一摸里头有一把削苹果的小刀，我拿起来说：“你再过来我就自杀。”这时候，我们俩已经折腾一天多了，这时来俩他的同事，把我的刀抢过去，让我赶紧跑，我下楼以后打电话给他妈，我说我听不着了，你必须陪我去医院。一查，耳穿孔，身上还有很多外伤。他妈也很害怕，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说她儿子不对，你这媳妇做得对，这是没见她儿子的时候说的。等晚上，他妈告诉他把我打成耳穿孔，他才害怕。当着他们的面，我说：“你要再这样打我，我就告到你单位，告到妇联去。”他妈就笑着说：“走，儿子，咱们散步去。”不理不睬就出去了，我回头跟他爸说：“爸，我不是真想告他，我就想吓唬吓唬他，下回别再动手打人，他这样打我我实在受不了！”他爸说：“没事儿，你

愿意告就告去吧！”人家不怕，他妈有那么大的关系。

没办法，李卫他爸妈让我跟他们一块儿住，让我们俩分开，我在他家住了10天。这中间，他妈还让李卫跑我们单位倒过来告我一状，说一转业就开始跟他儿子闹离婚，说希望我们领导让我不要转业，或转业直接回河北，我都不知道有这事儿。后来过了两三天，我们领导赶紧呼我，因为我当时处于待转状态，不去部队工作，找我谈话，听我一讲，我们教导员说那是李卫的错，而且李卫还说下一步要往政治部告我，教导员说：“他不可能告到政治部！”我一说打耳穿孔了，他说李卫做得绝对不对，我那时不知道可以判刑，他当时也没告诉我。

访：你在他父母家呆的那10天，他爸妈照料你了吗？

叙：反正他们对我不好，原来我们俩在的时候，最少四五个菜，给他儿子夹菜，我们俩打完架以后，每天就是吃咸菜喝稀粥，顶多炒一个素菜。他爸还跟我谈心，让我跟他儿子协议离婚。后来他爸找了个借口让我回去，我爸妈和我妹妹偷偷摸摸来看我，第二天正准备走的时候，李卫进来了，他愣了一下，心里有点发憷。我爸把他拉到阳台上，跟他说：“夫妻打打闹闹过去了也就算了，重新开始吧。”他胆子又大了。我爸妈说要去看他父母，他父母说身体不好，不愿意见我们家人。

我不愿意离婚，跪着求他父母

访：你当时是不愿和他离婚吗？

叙：我当然不愿意，要愿意我当时就可以离，离了婚跟我转业什么关系也没有。

访：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愿意跟他离婚？

叙：现在想，我觉得是爱他。

访：当时你是觉得离婚面子上不好看？

叙：不，我觉得痛苦，我不觉得不好看。在北京时间长了，

我觉得离婚是正常现象，我也见过离婚的。但我不能接受，很痛苦，离了他我找谁去？离婚对我来说是个特别大的打击，而且特别痛苦，一是没地方住；第二就是没家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家，我希望能珍惜它，我们俩之间也不是因为特别大的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访：他把你打成那样你心里没有恨吗？

叙：我现在是恨他多，但对他也还有感情。

访：买糖是12月6日的事，那时还没办喜事呢，当时他打你，你心里对他有没有生气或别的什么？

叙：就生气，没别的，我觉得夫妻打打闹闹很正常，我就没想过他能判刑，我觉得夫妻打死了可能都判不了刑，在部队呆了这么多年，我在法律上没一点观念。

访：你现在一直在派出所工作，打了人就是犯法，不是吗？

叙：对，但是什么情况下可以判刑我不知道，比如说打耳穿孔是轻伤，鉴定结果出来了，我才知道这就构成轻伤了，他比这打得严重的多了，这算什么呀。但是到后来，每次打完他就哄你，因为5月2日打完耳穿孔，不给我钥匙，到他们单位跟我闹离婚，他们单位同事把他拉一边，告诉他打耳穿孔要判刑，但这事他们单位只跟他说了，大半年后第二次打耳穿孔的时候，他们同事才跟我说。所以后来他每次打完就哄你。

访：他怎么哄你呢？

叙：他不是说对不起，打完后他还是不理你，我也不理他，要不他就自己出去住，他知道我害怕跟他分居，我特别害怕他跟我分开。

访：你为什么害怕他跟你分开？

叙：第一，我们俩刚结婚，我一个人在那儿住，孤零零的；第二，他自己出去住，万一其他女的跟他在一块儿，我们就因为这离了，我觉得不值得，还不到半年，两个人需要磨合，我

不希望在我们俩打的这中间让别人插进来，所以我就害怕他跟我分居。我们俩打架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希望能把他的心挽回来，而且时间长了，他可能慢慢爱我的，或对我更好，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就尽量忍着点，让着点，但是他好像越来越来劲，而且他怎么哄我呢，分居是一种方式，逼着我去找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打完我他就说他心脏不舒服，因为他妈说了，飞行员身体最重要，我因为爱他才去关心他，希望能感动他。他一说心脏疼——当时我认为是真的，但后来我觉得是假的，我就安抚他，带着伤去给他做饭。到后来逼急了，我两三天不理他，他趴在马桶上告诉我吐血了，当时我吓得都哭了，我们也就没事了。是不是真的吐血我不知道，但后来跟我们同事一说，人家说“谁早上刷牙不吐血呀”。

要不就是有时候买个糖葫芦，要不就是买酸奶，我一想，夫妻打架肯定都有错，我可能也有错的地方：说话不会说呀——他觉得我不够温柔嘛，不会打扮呀，我说慢慢改吧。后来我妈都觉得我有很大改变。

访：他这样打你，你爸妈知道详情吗？

叙：几次大的知道，小的我都没跟他们说。

访：你爸妈知道他这样打你，他们怎么说？

叙：反正第一次打耳穿孔，我妈说要离婚，我不想离，我说可能也有我的错，这中间我还求过他父母，给他父母跪在地上半小时。

访：就是第一次打耳穿孔的时候？

叙：那之后我们又闹了一次，当时他爸说：“李卫，你要是再跟杨玲美过下去，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我一听挺害怕的，第二天拽着他同事孙大姐买上水果去求他父母，他父母还是要我们离，后来我就给他父母跪在地上，我说全是我的错，当时甭管说是谁的错，我都全揽在身上了，跪了半个多小时，他爸妈才答

应说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访：跪在那儿的半小时，他父母也没表态？

叙：没表态，后来孙大姐都急了，当时李卫和他爸妈一块儿指责我，说我这不好那不好。说什么打电话时间长，因为3月8日他跟我吵完后分居了28天，我什么钱都没花，就给我们家打电话了，一个月花了400块钱。

访：那个时候你父母怎么说？

叙：安慰我，刚开始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想跟他过，我们俩吵闹可能也有我的错，我爸妈说：“既然这样，那你就认个错，好好哄哄他。”我们家还是比较保守的，不愿意让我离婚，包括我这次告他，我爸妈都说离了就完了，别惹是生非，怕他会报复，都是说要为将来着想。

访：说你这不好那不好，打电话长算是一个，还有什么算不好？

叙：说我没事儿找事儿，我们俩打架都是我找事儿，还说我怀疑他，你说我能不怀疑他吗？结婚第一年就分居三回，每次都一个月，我找又找不着你，打电话你又不接，那边的钥匙我也没有，而且我看见床上有女士小裤头，再加上沙发上的香水，家里来电话，我接时对方不说话，这种情况下，我就跟他妈说。我刚说完那话，他妈就恨死我那种感觉，说：“你不能这样说我儿子，我儿子不是二流子。”从那以后，他妈就更认为我不怎么样了。而且我们俩打架，我有时抓过他或咬过他，他妈骂我是条狗。

访：跪那半小时就罗列你的不对？

叙：就说我不对，他也说不出具体什么原因打架。我觉得他是真心想离，他们同事帮我分析也是这么说，认为李卫娶我是想让我当他们家保姆，你看我给他干活他就高兴，我不干他就不高兴。我原来跟我爸分析，我爸也觉得是娶了个高级保姆，进了他

们家的门就得依从他，我也就认了，就顺着你，刚开始有一段时间确实不错，后来时间长了，他又不满足，又开始以前的那种做法。有一段时间，我把我的工资都交给他管，因为原来根本就是我在养家而不是他在养家。我需要花钱跟他要的时候，他顶多给你一张100元的，我用钱的时候特别困难。

访：是他要求你交，还是你自己主动要交的？

叙：他找了个借口说：“咱俩以后好好过日子，钱我来管。”我就听他的。但是两三个月以来，我发现我越听他的，他就越来劲，包括后来他停飞，因为他无数次没收我的钥匙，他家里父母又不管，我只能找他们领导，他们领导让他停飞了几天，在大会上批评他。这一控制他对我好了几天，但他记恨我，过了这段时间变本加厉地打我，而且抓住我的弱点：怕跟他离婚。我们家也卑躬屈膝，求他们家不要离婚，他抓住我们家人的弱点，所以不打倒不正常了。

访：后来你怎么又不把钱给他了呢？

叙：我说我花钱太难受，他也不在乎我那点钱，还不够他的零头，他父母也有钱，所以后来我也找个辙，干脆不给他。后来他跟我说过，想让我父母给他调个工作，从邮政航空公司调到正规民航。我父母也曾经答应过。2000年元旦买房，上我父母那儿拿钱，他说的特好听，从我们家拿了4万多块钱，他们家就只出了一两万。但钱的问题他后来根本不承认，我那时根本没没想到要打借条，因为1999年9月，我进公安多少对他也有点压力，他不敢轻易动手打我了，9月份以后基本上没怎么动过手，我想感情磨合期也过了，没想到更严重的还在后面。

又把我打成脑震荡

叙：1999年11月15日到2000年4月1日，我一直在顺义集训，回不了家，顶多半个月回来一趟。我回来几次他不高兴，不

愿让我回来。2000年2月，有一次我们朝阳分局几个人没请假就回来了，正好半路上倒300路时，碰上李卫，我特高兴，跟他打招呼，他不理我。等下了车倒607路，他还是不理我，我靠着，他嫌我烦。我说我大老远跑回来一趟不容易，你怎么这样对我。“谁让你回来的”，就这么句话，说着就吵起来了，他扭头就要走，我急了，骂了他一句，他扭过头回来就打我，抓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把我警服都给撕了。这时，正好一辆小面包车路过，下来几个民工，把他抓住，问我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小偷，我说，他是我爱人，他们觉得很诧异，后来他们把我送回家。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我不开门，他骗我说，他不打我了，但得拿东西走，我特相信他，把门开了。一进来，他又跟我闹离婚，扭着我的胳膊，按在沙发上，就打我，骑在我身上，抽我，揍我，脸上抓了好几道，衣服也撕破了，结果打得我脑震荡，头上一大包，我哭了，又去抓电话，我们家电话摔了三四部，都是他摔的，因为每次打完我我就想打电话求助。

访：你打电话一般打给谁？

叙：有时打给他父母，但他父母连管都不管。

访：你有没有想过打110？

叙：开始没有，但这次打成脑震荡之后打过，至今打过三回。

这次把我打成脑震荡，第二天我也回不了部队了。当时我打电话打通了，不记得是他妈还是他爸接的，我还没说两句，他抢过电话说是我打他，他爸妈赶紧给孙大姐打电话，让她上来劝劝。他爸妈来了以后，一看不对，我想解释他也不听，我当时说我来例假，他还强行跟我过性生活，他妈一听：“别说了，你们俩分开住，谁跟我回去？”我肯定不可能跟她走，她带着她儿子走了。

访：那这天晚上他们走了你是怎么过的？

叙：我迷迷糊糊给孙大姐打了电话，人家家里也有事，劝我赶紧离婚。

访：你来例假他强行过性生活，这种事情发生的频繁吗？

叙：已经有两三回了，我原来不懂，后来一跟我妈说，她吓坏了，之后我把我妈说的跟李卫说了，慢慢就好点了。

访：除了在来例假的时候强行过性生活，其他的时候有吗？

叙：也有过。耳穿孔之后那段时间，一天恨不得做三回。1999年这段时间，特别频繁，再后来一个月做一回就不错了，特别奇怪，我妈说这是一种发泄。反正我觉得不舒服，特别不正常。

访：他要是跟你这样要求，你拒绝不拒绝？

叙：我拒绝呀，但他说：“你是我老婆，你不跟我做，那我找别的女人做去。”而且他怕我怀孕，让我带什么环。我跟我姐说，她特不理解，说这样对我不好。

访：当时他妈把李卫带走了，把你一个人丢在房间里？

叙：我们楼里一人带我看病去了，回来就想睡觉，等我醒来一看，呼机上显示已经过了两天了，呼机全满了，是我妈呼的，因为我们家电话被他摔坏了。我妈吓坏了，打电话问他父母，因为我妈知道我还想跟他过，不敢轻易下结论。她大老远从石家庄赶过来，来了以后我给李卫打电话，告诉他我得了脑震荡了，李卫不相信。多少次打完，都是我自己花钱去看病，他不陪我去，有时打的特别狠的时候，拦在门口不让我去看病。

访：你自己的单位知不知道你处的这种状况？

叙：2000年12月打耳穿孔以后报“110”把他抓走，我才跟我们单位说，因为我刚转业到地方，我爸叫我别说，对我影响不好，所以我一直也没说。

访：在他打你打成脑震荡的时候，你也一直没想过要告他？

叙：没想过，打成脑震荡以后，还有一次打得我浑身是伤，

我当时拨了“110”，电话回过来，我还是让他们别来了，他恶人先告状说警察打人，说我的警号是多少多少，比我记得还清楚，我心里忐忑不安，怕他们真来。

访：你报了警，为什么又不愿警察来？

叙：我就不希望公开这事，对我影响不好呀，我是个警察，而且是刚转业，才来没几天就被老公打成这样，特没面子。没过多久，“110”警察来了，我求他们别声张，他们给我做工作，劝我跟他离。这事过了以后，我赶紧跟我们所长汇报，我们所长说“别声张了”，可能是影响不好，后来我也不敢说了，再后来两次打“110”，一次是打脑震荡加牙齿打掉一块儿，一次是12月8日这次。

访：第一次把你打成脑震荡那天，你妈来了以后和他们家交涉过吗？

叙：交涉过，我妈来了以后，先照顾我，下午李卫就过来了，他上来就跟我谈离婚，当时我特别害怕离婚，第一年就跟我闹过三回了，我真的受不了，跟他求饶。他知道我害怕离婚，拿这个东西做条件老威胁我，后来我爸妈都害怕了。

访：你怎么求他？

叙：我说，李卫咱俩还好好过，有些地方可能我做得不对。那时肯定检讨我自己，不能说他不对吧。想来想去，我也没觉得自己有太多做错的地方，只能找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李卫说：“咱俩是两棵嫁接在一块儿的树，开不了花结不了果。”弄来弄去不行，我妈说去看看他父母，这一说他同意了。我花钱买了东西去看他父母，他爸连理都不理我妈，他妈还算不错，跟我妈简单说了两句，晚上吃饭也是我妈掏钱请的他父母，我给他父母敬酒，赔礼道歉——其实并不是我的错，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是我错，只是当时陷入那种泥潭，就是想跟他过，他爸妈才给我妈一点笑脸。回去没多长时间，李卫说不舒服，我们哪敢多待呀，我

给他做了个小米粥，之后我跟我妈就走了，这段时间他一直跟我分居，连我妈走都不管。我妈前脚刚走，后脚我就去顺义集训去了，我补了个假条，跟领导说从楼梯摔下来了。

这事过了以后，中间回来一次又打，脖子上挠了深深的两道道子，精神状态一点都不好，我们同事问我怎么了，开始我一直没跟人说，后来回去我就想通了，离就离了，就这时候我想通了，我以前从来没想通过。因为我们俩打架太频繁了，现在想好多原因都不知道，莫名其妙，看你不顺眼就跟你闹。2000年夏天有一次，我差点跳楼了，因为他又打我，我说我要出去，他不让，逼得我没办法，那会儿他也害怕，头一回跪在地上，跟我道歉，我前脚刚迈下去，身子已经快出去了，他一把把我抓下来。

访：这次你怎么想通了？

叙：我在顺义集训时，跟我一屋的一个大姐跟我关系不错，人家给我讲开了这事：“你看你现在刚结婚一年多不到两年，他就这样对你，而且他父母也这样对你。”旁观者清，人家一看就知道他不把你当回事，没把你当人，最起码跟你不平等，从结婚之日起，就觉得你人格比人低，进人家高门槛了，这话都是别人给我总结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点。我原来一直觉得很正常，没想过这有多严重，我还想不明白他怎么会跟我提离婚呢，而且提了一次两次，后来又没提，是不是假的，吓唬我，现在我觉得可能是他想通过我父母进民航，而且他们周围的人都说他不对，他们大队长停过他飞，大会上点名批评他。后来吓唬不住了，领导说也不管用。领导说要停他飞，停两天，没事，过两天不停了，又开始了，到后来属于恶性循环了。

访：他在外边对别人脾气暴躁吗？

叙：不。玩麻将，人家斥他，难听呀，他就只是笑笑，我报“110”，派出所把他抓去，人家说他“老实着呢，说什么都承认”，在他爸妈面前，他也挺牛，他妈特别顺他。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拨了“110”，电话回过来，我还是让他们别来了，他恶人先告状说警察打人，说我的警号是多少多少，比我记得还清楚，我心里忐忑不安，怕他们真来。

注：你报了警，他们就不来了。

对我就这么恨，我集训期间就打过两三回。4月我回来了，2000年5月中旬李卫又一次无故打我，抓着我的头发按在地上给他磕头，骑在我身上，擗着脖子让我吐东西。不但打掉我一小块牙齿，而且使我再一次被打成脑震荡，跟卷麻花一样把我往里卷，我想往外跑，他不让，把我衣服都撕破了，我穿一件他撕一件，我也不跑了，他让我穿着胸罩裤头，把我拉到楼底下，押着我游行，然后他就出去了，我没穿外衣，又没钥匙，回不去，后来，我看里头门没锁，就把防盗门纱窗捅破了，李卫到第二天下午才回来。

我开始想到要离婚

访：他这么对你，你也不反抗？

叙：我想离了，一旦翻过来我提出离婚，开始有反抗的苗头的时候，他倒对我另眼相看，好像还挺欣赏我的样子，所以后来你说得不对我也敢跟你顶了，但他还打，这打的毛病改不了，恨不得把你弄死，我害怕了，跟我爸妈说，我妈说绝对要离，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我爸让我到外面找间小房，再打我就到那儿住，我没想过要到外面找房，我一直忍着。最让我忍无可忍的是2000年12月8日晚上，因为自行车坏了，6点才到家，他就不高兴，嫌我回来晚了，不给他做饭了，为做晚饭这事儿我们俩发生口角，他动手打我，打得甬提有多狠了，拿拳头往你身上擢，抓住你跟麻花一样，从沙发上把你扔到客厅，上来就一脚，踹到

家当人，包括流产的事也是他的原因。当晚做笔录，他就跟民警说，“我就想跟她离婚，她就是赖着不离”，民警都反过来跟我说，我也明白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应该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时我们同事说应该拘留他。这时候我也比较犹豫，我就说：“算了，等法医鉴定出来以后再说。”回头我就把李卫给弄出来了（人家当时不是要拘他嘛），回来以后看病中间我们又闹别扭，他又到外头住去，后来我发现怀孕了，当时我都觉得不敢相信，一查果然是怀孕，但是先兆性流产，我把这事儿跟李卫说，他根本不管，我一人没办法，给我妈打电话，2000年元旦，我妈来照顾我，大概有半个多月（李卫还没回来），这中间李卫来过，问他怎么办，李卫说还是想离婚，小孩想让我流了，但是到妇联他又恶人先告状，说他想要小孩，是我要打掉，这事儿咱又没旁证，有谁能给证明这事儿，吃亏的就是女人，后来我流产了，李卫管都不管。

访：流产是他打的吗？

叙：怀孕流产中间他又当着我妈的面打过我两次，第二次我妈要拦，他把我妈推倒。这种情况下，我看已经没戏了，我觉得我们俩绝对破裂了，我说我绝对要离婚，小孩流产，1月16日流了。这时要过春节了。我妈问他我在哪儿过年，他说“随便”，还说他父母身体不好，过年他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那我就回石家庄了，休了半个月产假，呆到2月1日，我在家这段时间，他连个电话都没打，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派出）所里住，2月中旬法医鉴定结果出来，一看是轻伤，我一翻法律书够判刑，既然孩子我都决定不要了，我就决定告他。

访：什么时候开始正式起诉的？

叙：反正是2001年3月5日抓的他，因为我们走的是公诉案件，不是自诉。根据他的情况，肯定够判刑，所以才对他进行刑事拘留，3月5日晚上就把他抓了。3月16日放出来取保候

审，一直拖到现在才把他判了，这中间他们家找了不少人，到处批条子，找关系。

访：当时就是在你工作的那个派出所告的吗？

叙：对呀，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判刑不判刑是法院的事，跟我们公安机关是两码事，所以我们之间也没任何联系，一步一步往上走，能告到哪儿是哪儿。

访：最后判的是什么？

叙：判一（年）缓一（年），目前不是还没完，10天以后（9月28日）才能正式执行，暂时这么判。

访：你们俩还是婚姻关系？

叙：对呀，先刑事后民事。婚肯定是离，抓进去那天，李卫跟民警笔录时就说我毁了他，民警问我说：“将来李卫会不会报复你？”怀孕以后他第二次打我的时候，我说：“本来我不想告你，还想把小孩生下来，咱俩能好好过下去，现在我绝对要告你。”他当着我妈的面说：“你要敢告我，小心我弄死你，我不弄死你也要找人弄死你。”我们家当时也比较犹豫，告不告他，怕给我造成威胁，在这种压力下，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该站出来，我自己是个女人，最起码我是个人，我不能再这样容忍，我这样也许是救了他，再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他会犯什么罪呢？

访：告了他，他们家是不是觉得挺意外的？

叙：对，他们家觉得特别诧异，没想到6月二十几号吧，取保候审期间，他先到区纪检告我，人家没理他，又到区分局我们局长那儿告，局长那儿也回绝了，最后没招了，他和他妈又到我们派出所告我，说我人品不好，挪用公款，背后说我们领导坏话。根本没人相信，我们领导说：“李卫，我知道你现在什么心态，你就是觉得她告了你，你恨她，现在想回过头来把她毁了，让她脱掉这身衣服。你放心好了，你说这话，第一，没证据；第

二，你死了这条心。”在我们派出所告我不成后，紧接着又跑我们街道办事处，当时街道办事处对各个民警民主评议，要是办事处对我评议不好，我有可能下岗，最终结果我还不是在派出所干得好好的？

访：现在他还工作着吗？

叙：从取保候审开始，一直就处于停飞状态，因为现在还没到9月28日，要是这10天之内我们俩谁也不上诉，就是这结果，如果这10天之内我们俩有一方提出上诉，就得等另外的结果，还得再看一段时间。至于这个结果对他来说工作有没有影响，那是他们单位的事，他们单位始终在保他。

访：在法律处理过程当中，法院、检察院的态度怎么样？

叙：不好！我去检察院批捕科，逮捕处那两个女的说我影响他的前途；到法院，主审法官都说，“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影响他的政治生命和前途呀”，身为执法，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包括区妇联都向着他们家。市妇联不是一直盯着我们这事儿吗，好多事儿人家也有反馈信息呀，我们家算是比较善良的了，判到这个结果就算完了，没再往下追究。

访：市妇联是你自己主动去找的吗？

叙：对，我觉得妇联肯定会为我们女人做主的。

访：区妇联去过吗？

叙：没有。

访：区妇联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叙：他们家找的，他们家哪儿没找？包括市妇联也去找过两三次。

访：市妇联还是起到了保护你的作用，是吧？

叙：可以这样说，要不是市妇联一直在旁边压着我们派出所，我们公安局不可能把我这个案子往上送，这个案子早结了，根本不可能到现在这一步，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还是再一般不过

了。就这么难，要是一般案子早完了，都半年了，才弄完这么一个案子。我还是穿着警服的执法人员，我被丈夫打了，还这么个结果，更何况一般的妇女呢，所以说我觉得社会应该呼吁一下这个方面，把这事儿登报，我不怕，这事儿本来就是公开的。法院就是倾向他们家，不公告出来，而且，那个区的副区长，批字“酌处”，就是让酌情处理。

访：一方面可能是他们家走了关系，另一方面是不是他们认为男的打老婆不算什么事？

叙：对，每次我这东西（卷宗）到哪儿，妇联都到法院或检察院过问过问，他们那儿的反馈就是很反感妇联这帮人，觉得都是女的，来瞎掺和什么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老公打老婆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话没这么直着说，但意思当时让人感觉就是这样。

访：市妇联还过问过问？

叙：红头文件都下过四五回，还这么个结果。

访：从18日至今，你和他们家里还接触过吗？

叙：没有。从我说怀孕到现在，他父母跟我一句话也没说过，也没给我爸妈打过电话。人家认为他们家有本事，这是他们家的地盘，而且检察院一直在庇护他们家，他更觉得没问题，目前不是也算是得到一定的结果了吗？

访：当时你有医疗鉴定吗？

叙：肯定有啊，没有医疗鉴定怎么会有法医鉴定，他又怎么会判刑呢？

访：现在你对他还有感情？

叙：我在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可能会触景生情，我们肯定也有好的时候，女人跟男人不一样，男人可以离了婚，投入到第二个，过去就过去了，女人不是那样。

访：他对你好的时候是怎么个好法，好到什么程度？

叙：比如说打耳穿孔了，他带我游泳去了，说“你别游了，看着我游，要不对你耳朵有影响”，这也是好的呀，说明他还是爱我的，不爱你会管你这一套吗？也有对我好的时候，比如说高兴的时候带我去吃麦当劳，满足我的要求，那也是好呀，这不叫好叫什么？只不过人和人要求不一样，我的要求就这么低，如果我要求特别高，也不可能打到这个份上我们还没离婚，我觉得我要求就这么低，夫妻间这样就够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问题是他不是这么回事，两年多了，我一直在努力，但最终结果是这样，我已经寒心寒到极点了，但我已经尽了力了，我不后悔。

访：最终下决心要告他，和你流产有关系吗？

叙：一个是打了我两年多，我实在忍无可忍，而且把我母亲打倒，在流产期间打我，还打我母亲，我本来先兆性流产你还打我，当时要报“110”，我妈不让我报，我父母就是天大的事也是往下压、压、压，我觉得应该是我反抗的时候了，再这样下去我都不是人了，他们领导、同事都说我“贱骨头”，就这样我还忍了半年。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包括我们家也是，就这种情况下，我父母还劝我别告他，我坚持了我自己的意见。

访：他打你的时候，你和他在一块害怕不害怕？

叙：有时候害怕，过性生活的时候还好点，过完他可能舒服了，心情比较好。我觉得你们的心态和我不一样，我在部队闯荡了11年，什么苦没吃过？也许这种东西我能忍受，你们可能早就忍受不了了，这胆量我觉得不是一般人的胆量，但是我还是以我的柔情去换回他的真心，可是没用，他这样对我，我是害怕，但是在恐惧的情况下，我也还是这样对他，这并不是矛盾的。

访：你17岁当兵，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部队，经受了很多锻炼，各方面的能力也很强，按理说应该不害怕自己单独过日子。

叙：但是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人和人的生长环境不一样，我认为结了婚就不离婚，这一辈子就是他，再打再闹也是夫妻，“床头打，床尾和”，我就这么认为，我父母也是这么教育我的。而且我认为我们俩打架也不是因为什么特大的事，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是某些方面没调和好，我们俩刚结婚两年，不是说夫妻好多年了，我希望我有能力把我们俩的关系调整好，但结果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样。而我不愿意离婚，这是最主要的，我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我不希望在我们家我成为离婚的头一例。离了婚我肯定能生活下去，但是我不希望离婚这事出现在我的身上，发生这事，对我妈肯定是个打击，我父母肯定会为我担心，因为我一个人独身在外，我没地方住，生活上没有保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家，回头离了婚又成了单身，而且现在社会对女人离婚并不是很理解，所以说并不是单纯一方面我害怕离婚，是因为各方面因素导致我不想离婚，而且话说回来，谁当初结婚为了离婚呀？

访：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他刚结婚就打你，你认为他爱你吗？

叙：李卫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咱俩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现在社会上确实有这种现象，所以说我不认为我们结婚有什么仓促性。

访：那为什么刚结婚没多久就那么下死决心要跟你离婚？

叙：也说不上来，反正觉得我这人有些地方他不太习惯，而且我给他父母跪在地上的时候，当着他们同事的面说我从恋爱到现在就没温柔过，说我不温柔，我没法接受，这是不是理由？我问过他，他不告诉我。但是我跟他爸探讨过一次，晚上谈到1点多，他爸跟我说，他以前谈过好几个女朋友，其中有一个他特别满意，很想跟她结婚，但后来那个女的把他甩了。那个女的比我还小好几岁，他爸说她特风流，而且比我们俩早领的证，但领完

证以后就后悔了，反过来又找李卫，死活纠缠李卫，这些都是他爸说的，那会儿我们可能正谈恋爱。确实有一回在北兵马司，早晨7点多那个女的给他打电话。

访：他这么多次打你，对你身体有没有造成什么后遗症？

叙：恢复了，但是耳鸣，时不时耳朵听不着，我觉得还得恢复一段时间，到底有没有后遗症，长时间才能发现。

访：精神上的呢？

叙：你也看出来，我脸色特别黄，特别憔悴，而且脸上长了雀斑，因为他怕我怀孕，让我吃避孕药。

我现在觉得我已经跳出那个圈了，原来好像走火入魔一样，就是要跟他好好过一辈子，除了他谁也不要，包括现在我觉得我都不想结婚，第一，我对婚姻特别失望；第二，我这人也比较要强，我希望能找一个比较杰出的男孩结婚，但是我现在这种状况不可能再找一个男孩，我只能再找一个离婚的，而且有这么大的阴影，所以我不太想这个事，我为什么不愿意离婚，我觉得一辈子还是第一次好，我希望我不离婚。但是现在我还是要离了，这是逼的。

后记：2002年上半年，杨玲美办理了离婚手续，法院把住房判给了她，她开始了新的生活。

点评：

暴力有其自身的规律

宋美娅

就杨玲美案，我们分析一下家庭暴力的规律。

家庭暴力以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为出发点，暴力在发展的过程

中，有内部的规律，也有外部的条件，这两个方面在杨玲美的个案中都有表现。

关于暴力的内部规律，瑞典社会学家艾娃·拉登格雷教授在做了大量调查访谈的基础上，提出了“暴力正常化”理论，这个理论概括了家庭暴力的两个基本规律，一个是暴力的周期性；另一个是暴力和安抚的交替使用。暴力的周期性是指，家庭暴力一般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矛盾”的酝酿期，二是暴力发生期，三是蜜月期。和暴力的周期相适应，施暴者交替使用暴力和安抚的手段。施暴者在暴力发生期大打出手之后，一般都会表现出忏悔，他承认错误，做检讨，求饶，想方设法讨妻子的欢心，如给她买衣服，送鲜花，买她爱吃的东西，说一些甜言蜜语，这就使妻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他，是她当初所爱的那个人，妻子原谅了他，打消了离开他的念头，两人进入蜜月期，在这个期间两个人会有相对平静的生活。接下来又会回到“矛盾”酝酿期，施暴者动辄发火，经常发生轻微的暴力，受暴者为了避免挨打，尽力迎合他，按照他希望的那样去做，这就使男人看到了他施暴的“良好”效果，暴力不断加剧，直至某次偶然的事件引发至第二个阶段，暴力再次恶性暴发。如此循环往复。

比如李卫，他在对杨玲美施暴后会表示对她的关心，如买她爱吃的麦当劳，关照她游泳时别往耳朵里进水。虽然我们认为这样的关心太微不足道，但杨玲美认为这就是丈夫爱她的表现。在本书的其他案例，如胡凤玲案、于小霞案、董迎花案中，我们同样能看到施暴者求饶、写保证的情节，但这些保证通常都不管用，施暴者还会再打的，他用暴力让妇女不断改变她所容忍的界限，一点点地加强对她控制的力度和范围，这是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在改变的过程，男人逐渐让女人接受他打人是正常的，女人也会在长期的暴力中逐渐丧失自信，丧失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她甚至会认为丈夫施暴确实是因为自己太没用了，她也把暴力看成是

生活中一种正常的事情，这个过程就是暴力的正常化过程。

从杨玲美的经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暴力发展的外部条件。在这个事件的几方当事人的头脑中，都非常明显地显露出封建文化机制的作用。比如杨玲美，她的个人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她完全有能力独立生活，但她特别怕离婚，婚姻对于她比自由更重要，这种观念与我们历来对女性从一而终的教育有关（可喜的是她最终觉醒了）。李卫的父母有严重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们对女性的蔑视毫不掩饰；杨玲美的父母对李卫的暴力行为从没有提出过反抗，而是一味求和，除了善良，在他们内心里，同样承认丈夫对妻子的特权。在社会上，人们的观念照样如此，文中所述检察院的两位女检察官，说杨玲美告丈夫是“毁了他的前程”，身为女性，身为检察官，都流露出对女性权利的漠视，对男性权利的推崇，这种观念在社会上有普遍的代表性。

27. 后半生我就是残疾人了

叙述人 向敏华
访谈人 宋美娅
访谈时间 2002年3月7日
访谈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银海宾馆
录音整理 宋美娅
文稿编辑 宋美娅

向敏华，1963年3月出生，高中肄业，原是个体职业者，婚后长期遭受丈夫的殴打。2000年3月11日，丈夫在又一次殴打她时，把一壶正在滚开着的开水浇到她身上，因丈夫不给她医治，创伤发炎恶化，法医鉴定为重伤。2000年8月，向敏华在无奈中把丈夫告上法庭，2000年11月8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准予向敏华离婚，2000年11月16日，判向敏华的丈夫5年有期徒刑。

向敏华已是8级伤残，她的左臂抬不起来，累累疤痕把她的胳膊和后背连在一起，本来很能干的她，现在什么也干不了。

婚后受虐

我娘家是（湖南省）桃源县的，父亲原来是铁路职工，在株洲市工作。1959年，湖南省有3人参加全国劳模会，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1962年他响应号召下放农村，就没让我们再回来。后来我妈去上访，要求给我爸落实政策，小偷又把装材料的包给

偷了，省政府说，没有材料没法办。这就安排我爸在省疗养院做临时工。我考取高中的时候家里没钱供，我还有4个姐弟，那时我爸还没工作，爸爸的一个叔叔在长沙，安排我到五里排（一个地名）一个餐馆里打工，这时是1982年。

翁新平那时停薪留职在五里排做水果生意，他每次到我老板这儿来，老板都说请了一个很好的帮工，他就注意我了，没事就来献殷勤，晚上我们就住在餐馆，他来帮我拉桌子。他第一次说要和我好的时候我说不行，我是农村人，我晓得那时户口很难搞。他又找我老板，老板对我说：“你这么能干，做自家的生意多好，女孩子在哪儿都是嫁人。”他领我到他家去，他家人好喜欢我，1988年，就和他结婚了，他大我7岁。

嫁给他以后发现他脾气不好，1989年，有一天突然停电，我小孩睡觉要点灯，灯灭了他就哭。他就怪我哄小孩没哄住，一脚就把我从床上踹下来，我看不见，伸手往床上扒，摸到了他脸上，他就下来把我拳打脚踢，这是他第一次打我。

第二次是他修自行车，孩子两岁了，他一边修车，一边望着小孩，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给砸着了。他喊我给他拿布和线来，我拿着布和线还有纸，他一看就怪我怎么没拿布和线拿了纸，拿起修车的大砢子，四四方方的，一下子打在我的大腿上，有半个月我不敢走路。上床都得用手搬着腿，我又不敢说，我婆婆来了看我走路一摆一摆的，一看我的腿，全是青的。

第三次也是在1989年，那时候我卖盒饭，早上5点钟起，菜市场买猪脚，回来把毛搞掉，煮一大箩筐饭，我踩着自行车去卖。我租的房子在一楼，住在三楼，都10点多钟了他还不起来，他总是这样的。那天，我擦了一下他的被子让他起床，一会儿他掂着一壶水下来，上前把两个炉火都浇灭了，烟子好大呀，把客人全吓跑了。他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撞得我眼前一片黑，直冒金星。好不容易我挣脱跑了，跑到大路上，我就不跑了，我不

跑的原因是路上有娘家的熟人，让人看见不好意思，没想到他追了上来，他拿了个塑料洗衣板，从后面一洗衣板打下来，我一下子昏倒在地上，被娘家人抬回家。

我在床上躺了4天，动都不能动，不能吃饭，听不得说话，听不得噪音，一听头要裂开。他根本不照顾我，我婆婆赶到我家，叫我妈来伺候我。我妈要我离婚，说不然会被他打死的。我婆婆跪着求我妈，说不能离：“有我在一天，保证我儿子不再打她。”她让我妈答应，不答应不起来。我想，他年纪一年一年大了会好些，离婚名声不好听，我不愿让别人瞧不起，他一次一次打我我都不想说，不想让人笑话，就是往娘家跑。

从1990年到1993年，我在长沙火车站开餐馆，我做了3年事，他玩了3年，他吃饭穿衣靠我，婆婆病、孩子病、人情来往、孩子上幼儿园，都是朝我要钱。1993年下半年，婆婆死了，没人帮我照料孩子，我就关了餐馆又回到家。这段时间，我们靠租房子有点收入。婆婆在的这几年，他好了一点，婆婆一死，他又老样子。

他把房子租给一个单身的女孩子，我说，租房子要签合同的。他说3天后再签，3天后问他，他又说6天，6天后我又问，他说不要钱了。我说不收钱她不能在这里住。他就把我赶出去了，我敲门，他掂着菜刀出来说要砍死我，我跑回了娘家，住了20多天，后来我小叔子来，敲门时，一个陌生女人穿着内裤来开门，我小叔子吓一跳，他到居委会去问，居委会批评翁新平：“你不能把老婆赶出去，租房子给别人。”翁新平才把我叫回来。

几天后，我去菜市场买菜，见到了那个女的，我说房费多少你还是要给一点的嘛，我老公也在场，他说我不会说话，打倒我之后，就在我肚子上踢，菜市场不是有卖鱼的嘛，他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到卖鱼的池子前，按着我，把头沉到水池里，差点没把我淹死。别人扯开来，我跑回家。他回来说要离婚，还要我每个

月给他 300 元钱，我说没钱给他，他又不离了。为这个女的，他打了我 3 次。

1996 年，他做古董生意，那东西都是假的，有一天半夜一两点他从外面回来了，我说，不管真假，古董生意都不能做，真的犯法，假的让人家找上门来怎么办。他说我蠢，说：“我没做事你说我，我做了事你还说我。”我上床睡觉时，他 1.76 米的个子，从对面一脚踹到我的下身，把我疼得受不了，我捂着肚子下床，他拿起一个铁棍打在我头上，铁棍上有那么大一个梅花饼，打得我头上、身上全是伤，我大声喊救命，想往门那儿跑，他一把抓住我按在地上，卡住我的脖子，我死了过去。我一共没叫两声就没气了，邻居们说我的叫声好恐怖，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他们来救我，翁新平不开门，后来我看门烂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邻居把门砸烂救的我，我们家的门现在是用木条钉着的。这一次，我躺了 7 天。

他说要烫死我

这一次烫我，是因为 3 个饭盒，这时候我又做上了送盒饭的生意。

2000 年 3 月 11 号晚上，他发现少了 3 个铝饭盒，大发脾气。帮工小黄对我说：“向姐，你跟他说是你弄丢的嘛。”我就说：“算了，3 个饭盒是我弄丢的。”他正吃饭，把碗往地上猛地一摔，起来就打我，我说我承认了你还打我。他恼了，抓住我拖到另一个房间里打我，他骑在我身上，我使劲往后缩，缩到了床底下，他没了骑了，头在床边磕了一下，他用脚踩我的肚子，一下一下地使劲踩，我想扯他的裤脚，他一抬一抬地我扯不住，后来他又踩住拧我的肚子，我就扯住他的裤脚使劲一扯，把他扯倒了，我想站起来跑，可是肚子太疼了，站不起来。我捂着肚子、弯着腰往外移，这一天没跑脱，就是因为肚子疼，差一步就要到

门边了，他跑过来抓住了我。炉子上烧着一壶开水，吃饭前烧上的，后来我做事情去了，忘了。他有个同学来了一下子，没有坐，要是坐一下子嘛，给他沏茶也会把壶拿下来了。这时壶水“哗哗”地开着，他一只脚把我踩在地上，说要烫死我。

话落音，水就到身上了，正滚开着的水浇在我身上，当时疼得我满地打滚，他用力踩着，开水浇在我的左肩后侧，你想，他不是拿开水泼一下，而是掂着壶浇着烫，泼一下烫的是表面，后来，医生说里面的肉都烫熟了。帮工小黄听见我喊救命，赶快往楼上跑，小黄进来时壶还在他手上。小黄把我扶起，我站起来正好和他对面，他又把壶里剩的水浇到我大腿上，小黄说：“翁哥呀，要不得呀，你拿开水烫她！”

我把衣服全部都脱了，对着镜子一看，全身都是红的，我一看就哭了。浑身疼得厉害，我想盖着被子睡一下，可是烫了的皮开始往下掉，干被子，把肉扯得疼。没办法，只好又起来。当时3月里，还冷，我身上的皮往下拖着，不能穿衣服，帮工也没法进来，翁新平在床上睡得打酣，我打电话给翁新平的妹妹，他妹妹来了一看我的样儿，跳着脚哭：“天哪，怎么烫成这样呀！”他妹妹叫不醒他，打电话给他妹夫，妹夫来了，拿笤把子把翁新平的被子挑了，他说：“翁新平，你赶快起来，快送小向去医院。”

到医院，人家要15000元，我只有500元，3天就回来了，没钱了。翁新平该玩还是玩，不管我。我妈、我妹妹来伺候我。回来还是不能睡，我妹妹找收废品的要了点泡沫，给我支了一个像温室一样的架子。在家10天，烂了10天，满屋子都是臭味，浑身肿。我妹妹又去借钱，送我到消防医院，进去先消炎，6天后才开始剪皮，一天剪一小块，剪了11天，才把臭了的肉剪完。上午剪完，下午没钱了，没药了，只好又回家。翁新平被他妹妹骂着来医院看我一次，来了还找医生的麻烦，第二次都没去，他在菜市场打麻将给人家打破了头，缝了15针，他家的人还以为

是我们家干的呢。

回到家又继续烂，妹妹拿万花油给我擦，我妈给找了个乡下医生，也不行，妹妹弄点消炎药给我打针，越打越厉害，整个人都肿了。后来医生说，如果是开水泼的，烫的是表面一层，我是被开水浇的，里面深层的肉都熟了。到了6月，烂得厉害，里面生了蛆，又疼又痒，难受得我满屋子跑，因为没有表皮，身上的水像山洪暴发一样，全部流下来了，流得满地都是。人肉烂起来好臭啊，人来看我都用手捂着鼻子。好多人看见我都哭了，男的也哭，他们10块、20块的给我，让我吃个药。我爸一个月才二三百块钱，要养一家人，根本没有治病的钱。我妈我爸急得哭，他们说：“我们陪着你到火车站去讨钱吧，看你烂成这样，人家会给你的。”我说，我又不能晒太阳，都是要死的人了，还再去受那个罪。我想，跳楼死了算了，几次想死，城里也不像乡下有个水塘什么的。我妹妹去找翁新平：“你快去找钱给我姐姐治手，要不她的手要割掉的。”翁说：“不关我的事，死就死了。”我爸妈打个的，把我送到居委会，居委会主任说：“你二老住在这里，可是你女儿不住在这里，我可不能处理这事。”我妈又打车去找我们住地的居委会，唐主任去找翁新平，唐主任回来说，翁新平对她也是说“不关他的事”。

我们只好打“110”了。派出所来人把他带走了，问他：“你是想给你老婆治病，还是想呆在这里？”翁新平说：“当然是治病。”他们又问我的意见，我说：“我就一个目的，叫他借钱给我治手，好了我再还。”他从派出所回来，打了个送我去湘雅医院，半路上联系借钱，联系医生。到医院，医生一看挺厉害，一个医生拿双氧水给我冲，冲出来好多蛆，我妈说：“难怪她难受起来跑，像发了毒瘾一样。”医生说我需要植皮，但是没有那么多钱，治了一段时间，又把我拖回家，我妈请了个乡下医生，花了7000块钱，慢慢好起来。

我妈住的是筒子楼，我每天都要洗澡，要不肉很臭，我妈家没有淋浴，我只能在盆子里洗澡，很不方便。我妈那么大年纪了，每天给我倒水，我看着心疼，就想回家去住。我妈说，你回去他能照顾你吗？果然，别说照顾我，我一回去他就把他和儿子的脏衣服堆在我面前，命令我：“洗衣服！”他说：“别老在你娘家住着，你不回来做事情，我和儿子吃什么？”我说：“你把我弄成这样，我怎么做事情？”他说：“那我不管，我不养你个残疾人。下半辈子莫想我养你。”我听了这话好伤心，流了好多泪。我想回妈妈家，只能等天黑，我不能晒太阳、不能蚊子咬。把他们的衣服洗完，我又回了娘家。我妈说：“离婚吧。”本来我不想离婚，又想，离了婚翁新平的负担可以轻一点，他只养儿子就可以，两个人他确实养不活。他干不得活，不会做买卖。我做盒饭一天做60多份，我一个人卖30多份，他和帮工每人卖15份，他性格不好，很难卖掉，我卖完了还要到处找他替他卖，他只能卖几份。我这边买的人排队，一会儿就卖完了，我说我老公那儿还有，你们上我老公那儿去买吧。别人说：“不买你老公的，你老公说话太难听。”我回来说他：我们的生意都是回头客，态度要好一些。做盒饭的有好几家，有的到处转圈都卖不掉，人家都是排队买咱的。我总是问客人：“下次想吃什么呀，给你们换换口味。”一份饭我只卖3块钱，一钵饭、两个菜，还有两个小菜，薄利多销。每天我都是5点钟就起床做事情，赶中午去卖。他就是把饭用车给我踩去，我卖完再把空车踩回来。他不干活还爱花钱，我经常得给他还债，别人找上家来要。我想，我不能总做不了事，离了婚，他只养孩子，我给他减轻负担。我们没想的那么严重，没想到他去坐牢。

是他自己做的事让他坐的牢

我提出来离婚，他不肯。别人有知道我的情况的给我妈说：

“你可以找妇联，让你女儿把离婚报告交到妇联去。”我们说：“不知道妇联在哪儿呀。”后来找到市妇联，妇联刘主席问：“3月份烫的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她一看我的伤，说：“哎呀，怎么烫得这么严重，给你开个证明，你去做个伤情鉴定。”我说，不去了吧。她说：“你的伤这么严重，不做给你做不了主。”我只好去了。7月24号在湘雅医院做的鉴定，28号拿到了结果，鉴定书说我是8级伤残。鉴定拿了我就放在家里了，我老公看见了，还有两份离婚报告，一份给妇联的，一份给法院的。他骂我：“别人谁吃了饭没事做管你的闲事，马路上轧死人都不坐牢，我用开水烫自己老婆还有牢坐？”他又说：“你若是去离婚，我杀了你，杀了你全家。”本来我不想交这个报告了，就想算了，他这么一说，我又去交了，翁新平最后去坐牢，也是他把我逼的。8月8号妇联把鉴定交上去，8月15号上午，我去买豆腐，有个派出所的人问我：“你是向敏华？”我说：“是。”“翁新平呢？”“还睡呢。”“一会儿你到居委会来一趟。”我把豆腐送回家，翁新平还睡着，到居委会，他们说：“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伤是你老公烫的？”我就一五一十地说给他们听。他们说：“你回去不要告诉你老公我们来找你谈话。明天我们到你家去，你想办法留他在家里。”

第二天，翁新平要到乡下去，原来有人劝他出去躲一躲，他看到我的报告在家里，就以为我没再去告，就不去躲了。这一天是有事要到乡下去。早上起来，我问他：“你吃饭不？”我想拖延时间。他说：“吃。”我就去给他做饭，菜炒好了，我妹妹来了，说：“姐，下面有公安局的人。”我就催他快吃饭，怕公安局的人来了他吃不上。碗刚端在手上，公安局的人进来了，把逮捕证给他看。他说：“为什么抓我，我又没犯法。”居委会、妇联、办事处的人都说我：“上回110把你老公抓走，你又把他搞回来，这一回不要再去搞他了。”

翁新平不承认他有错，他说法医鉴定是假的。说了几个烫我的理由，一会说是他没吃饱饭，又说是我做了丑事他才烫，又说烫我是为我好，他要让我做贤妻良母。我说你们随便哪一个去打听，我每天从早到晚做事情，他妈瘫痪，大小便失禁，4个媳妇只有我一个人伺候，他妈所有的衣服都是我洗，还要怎么贤妻良母？翁新平又不承认是他烫的，一会说是我自己碰掉了壶，人家说，自己碰的应该是烫着腿或者脚，不会烫到肩或者后背。一会儿又说是两个人抱在一起打碰倒了壶，人家说，那应该两个人都有伤，为什么你没有伤。又说是我自己伸手打壶，把壶打侧了水流出来了。就说是我自己打的，只能烫前面，不能后背上全是。反正他说的理由都和伤情不一致，法院没有听信他的，他到现在还说是我冤枉了他，公检法全冤枉了他，回来要报复我。

11月16号，区法院第一次开庭，11月25号第二次开庭。这期间就找我那个帮工小黄作证人。公安局四处找小黄，找到他之后，录了他的证词，他就是把那一天看到的情况说了一下，他说，他把我扶起来后，翁新平还把壶里剩下的开水浇在我腿上，这是他亲眼看到的。法院判了翁新平5年有期徒刑。

把他抓起来时，他家人都不理他，他让队长给我打电话，还是我送衣服给他。往监狱送时他们家人都来了，他大哥说了一句话：“小向，我看了电视，知道你说的是真言。我妈在世时就说，她不在了让我看住三伢子，不然小向要吃亏。我们也不能总看着他，他去坐牢我不怪你。”但是他们几兄妹还是有想法的，他妹妹就认为我不该让他去坐牢，离婚可以，他们同意离婚。他们认为是我说了很多的坏话才让他坐的牢。我说，不是我说他坏话，是翁新平自己做的事让他坐的牢。

我这后半辈子就是残废人了，以前都是别人上门请我去做事，现在去找人人家都不要了。去年还是有人请，一个月给800块钱，但我不敢去，怕拿了人家的钱做不好事。中午餐馆客

人多，出菜要快，慢了客人不满意，我的手臂举不起来，炒菜不行了。翁新平的事上了电视，我原来在五里排的老板娘看了电视跑到我家哭了一场，她也说让我回去做，我说不行，我做不好，你再请个人不合算，我要为人家着想。现在我在这一家做，就是收收碗，洗洗碗，开始说一个月给我300块钱，不管吃。我跟老板说，我给你打个商量，让我的孩子在这里吃饭，我不要你的钱。人家答应了。现在妇联和居委会给我和儿子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金，两个人有360元，供孩子上学，我吃药。可是儿子学习不好，他说，他的爸爸在监狱里，同学们瞧不起他，他老不愿去上学，前几天老师还叫我到学校去谈话。

翁新平被抓起来后，我申请离婚，法院判离，孩子判给了我，房子也判给了我。他到监狱之后，我收到了他7封信，每一封信都是让我给他寄吃的，要花生米，要油炸辣子，要我去超市给他买腊肠，要我给他送衣服、送鞋，他好像不在乎我已经和他离婚，还认为我是他妻子。我给他寄过几次。

再有3年他的刑期满，他就要出来了，别人说，他出狱后没地方住，还是得回来。如果他说这里有他儿子，要来住，我也没办法。再说，他也真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肯定还是回这里来，我不知道到时候我该怎么办。

2002年3月，访问完向敏华，访谈人又赴茶陵，在茶陵监狱见到了正在服刑的翁新平。

附

他为什么对妻子下毒手

叙述人 翁新平，男

访谈人 范爱莲 张捷明

访谈时间 2002年3月10日

访谈地点 湖南茶陵监狱

录音整理 范爱莲

文稿编辑 宋美娅

问：在长沙我们见到了你的前妻向敏华，听说了你和她的事情，也看到了法院做出的刑事判决书，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想对你进行访谈，请你从头给我们讲讲。

翁：我叫翁新平，是湖南长沙人，1957年出生，我的父母都是工人，建国初期我父亲就患了肺病，不能做事，我家的经济很困难。记得那一年我8岁读书上一年级，家里连学费都交不起，我妈妈又生病住院动手术，是单位给出的钱。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乱了起来。就这样我就没有读书了，所以我的实际文化水平是连小学毕业也没有。我是家里的老二，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1971年我就参加了工作，当了林业工人。开始我的工作的积极性很高，头一个月单位发给了15元钱的生活费，第二年又给长了点儿钱，发给了21块钱，第三年又给长了一点儿，发给了29块钱。1973年我又做了建筑工人，一次干活，我从四楼掉了下来，受伤了，手骨都摔断了，就在家休息。伤好后，因为原来的工作做不了了，我就找原来的区委的同志，他们就把我分到电器开关厂，搞了食堂的炊事员工作。后来，有些干部把那个厂子搞跨了，我也就失业了。我就到我们芙蓉区办的集贸市场上租了一个摊位，卖起了水产，就是卖鱼，干起了个体。

在农贸市场最早我还卖过水果。1985年的时候我认识了向敏华，当时她是在一个饭馆里给人家打工。我们俩人的老家都是在湖南常德，我当时看她个子不大，人很勤奋，有时我们坐在一起谈谈，我发现她人不错，我想我找对象也是要找勤奋的。认识

了几年以后，我们就结婚了。后来就生了一个儿子，一家子就喜欢的很。我们结婚的时候她还是农村户口，婚后我们就打些短工维持生活。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打架是去她老家常德谋生时，那里有一个供销社的房子要出租，我们就租了那儿的房子，做起了饭馆生意。在开小饭馆时，也存在了不少的矛盾，我们当时跟供销社的人签合同租房子，后来和我们签合同的那个人调走了，供销社的人就不按合同办事了，就对我们不利了。在这时，向敏华就很生气，就怨我了，当时我也很生气，她埋怨我说我不该签这个合同。当时想着去她老家谋生是她提出来的，她老家还有个弟弟，我就去看了。经过一个月的调查，认为还行，可是因为没有开过饭馆，也没有经验，就把合同签了。开始头一个月生意还可以，马马虎虎，后来就不行了。有时我把饭卖的便宜了，比如说该卖8毛钱，我卖成了5毛钱，她就不同意了，我一急就骂她。她还有一种想法，认为我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认为我去了那里后就不爱她了。我当时有一部买菜用的小三轮车，有个妇女总搭我的车，她知道了，说我们有男女关系，这样我们就开始吵架。我就动手打了她，她也还手，她当然打不过我的。我们就是这样每天瞎吵架，每天动手打架。这就是我们婚后发生的第一次大的矛盾，也是我第一次动手打她。后来她就回长沙了，那时我妈妈还在世，她就带着孩子向婆婆告状，她跟我妈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继续在常德经营那个小饭馆，她走了之后，我那个小饭馆又开始有了好转，保持了营业额没有亏损。一个月后，她又回来了，我妈妈劝了劝她，儿子就由我妈妈给带着。后来生意不好，我们就不干了，我们在那里总共干了有一年。我们又回到了长沙，我就又干起了水产买卖。后来我妈妈生病了，没有治好就去世了。我的父母去世后，我们就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里，房子总共有60多个平方，这时我们就在家里做盒饭，拉出去卖，又请了一个

帮工。

问：你认为向敏华怎么样？

翁：她人挺能干的，也很勤劳。后来我们的生活就有了好转过，也开始置办了一些电器，买了彩电、冰箱，还安装了一部电话。这些钱都是我们干活挣的，那时长沙的经济发展得很快，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进 300 斤的货物，每天早上 3 点起床开始干活。可是有次我干完活回来，发现她在家没有干活，在跟别人说话，我就很生气，就动手打她。她讲我经常打她、骂她，她很怕我。其实我这个人心里也很苦，我打她骂她都是有原因的，我认为她比我读的书多，有文化有见识，比我懂道理，但我做的事也没有越轨的事，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包括开这个小饭馆，也是我的老妹，她在商场做服装生意，对我说：“那里的人要吃家里做的饭，你们就给他们做吧。”之后我们每个月就给他们做盒饭。生意很好，他们都喜欢吃，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会做，不用请师傅。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经常打架。比如我买菜回来晚了，她就说我，我买的东西多了，她也说，我的心里就烦了，就动手打了她的嘴巴，我嫌她的嘴巴像老太婆一样啰嗦唠叨。

问：你们有没有闹过离婚？

翁：有过一次。向敏华对妇联对政府都讲我虐待她，讲我一无是处，我个人认为我是脾气暴躁。反正我们在此之前也闹过一次离婚，那时是在我母亲去世时，我小孩七八岁了，她总是对我不放心，我就跟她急了。我写了离婚报告书，交给了办事处，我就出门干我自己的活儿了。她一气之下就跑回了娘家，孩子我只好交给我哥哥他们帮我带。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愿意离婚，她跑到办事处把我写的离婚报告和我交的离婚手续费都拿了回来。

问：你记得你当时在你的离婚报告书上的离婚理由是什么吗？

翁：就是因为双方的性格不合，但是这次没有离成。另外，

她总说我在外面有了女人，我就动手打了她。我们结婚 13 年了，我今年 40 多岁了，我觉得她应该了解我。我在监狱里给她写过 7 封信。她认为我是惨无人道，残酷地迫害她，还认为我没有改造好，顽固。

问：那么她认为你伤害她是怎么一回事？

翁：那是 2000 年 3 月 11 日的下午，我从菜市场采购了菜、腊肉和小菜等回来，大约在 4 点，我的一个同学来了，带着他的爱人来我家看我，我很高兴，就做饭招待了他们，我们在一起喝了酒，后来同学走了，我就开始吃饭。我就问那个帮工的，他叫小黄，说：“还有饭吗？”他说：“没有了。”我就说：“那么多的饭怎么就没有了？”向敏华也说没有了。我就很生气，就把手上的饭碗向地上一摔，我一急就走过去打了她两个大嘴巴，我们就开始打了起来。向敏华就往里屋跑，我就追进里屋，把她按在了床上打，这时，那个帮工黄春根也跑进来拉架，被我一脚踢开，他就下楼去叫人去了。这时向敏华就又跑向厅里，我们就又打到了厅里。

问：你是怎样用开水烫的她？

翁：当时我们打到了厅里，厅的面积很小，只有 7 个平米，还生着一个火炉，炉子上有一个开水壶。我和向敏华就打得滚到了地上，就倒在了火炉的旁边，由于双方扭打在一起，我的手碰倒了开水壶，水流出来烫伤了向敏华。向敏华被烫后就跟我回到房间给我老妹打电话，要我老妹送她去医院。当时我妹和我妹夫都来了，我老妹就骂我说：“你怎么搞的？你用开水烫她？”我就说：“我没有用开水烫她，是碰倒了开水壶。”

问：向敏华被开水烫伤，你送她去医院了吗？你去看过她吗？

翁：当时是这样的，我老妹和我妹夫把她送去医院，当时我是喝了不少的白酒，觉得头疼头昏，就回到床上昏睡过去了。我

老妹晚上 12 点钟后回来了，她跟我说：“你把她烫的浑身都是大泡。”第二天我起了床，因为还要做生意啦，我就说：“我不去医院看她了。”结果她就出院了。

问：是不是她没有钱了？

翁：去看病时带了 1000 多块，当时她不在医院里住，她妈妈来了，她妈妈一看，这个烫伤怎么都包起来了，全部包起了伤口，里面都发烂了，这样就不行了，她妈妈就让她出院了，也不让她回到我家来，于是回到了她妈妈那家里去了。过后我就到了她妈妈家里去了一趟，还有别人给我的土方药，我也带去了。

问：你看她被烫的那么厉害，那么可怜，你怎么想？作为丈夫你就不心疼吗？

翁新平对实质性的问题的回答都是避重就轻的。

翁：当时我看到她，她就对我放声大哭，我就对她说：“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一辈子都帮助你治好。”我就把这个药给了她。

问：她烫伤以后，你就没有让她回到你们自己的家里去住吗？

翁新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慌乱，而且是所答非所问。

翁：你听我说，她用的那个药不行，没有用，反而更加不好了，许多地方都烂了。

问：为什么烫伤后不去住院治疗，你有没有给她治病用的钱？

翁：去过一个武警医院的烧伤科治疗，她的整个治疗方法不行，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她妈妈找了一个私人医生治疗，跟我要 2000 块，我跟那个私人医生见了一面，我讲钱不能一次给你。

问：她在烫伤期间始终都没有回家去住吗？

翁：她后来回来了，当时她又不放心儿子。

问：她被烫伤的这事儿政府是怎么知道的？

翁：有一天她对我说：“我这个烫伤的事儿，我上告了。”开始我不相信，我还以为她是在开玩笑，我还对她说：“你怎么上告了？我告诉你，法庭是不会管我们的家务事的，你告了也是白告！”那时我已经不做盒饭生意了，又去做水产生意，我就又对她说：“我马上要到洞庭湖去做生意，那里搞好了，我就带你去。”

问：你是怎样被捕的呢？

翁：那是我从洞庭湖回来，2000年8月16日，那天的早上，我正在家里吃早饭，派出所的警察就来到了我家，把我从家中带走了。他们问我是不是我用开水故意烫向敏华，将她烫伤。我根本就不承认是我用开水故意烫的她，是我们双方扭打在一起，水壶被碰翻后开水洒向向敏华的。我承认我的脾气不好，打架骂人的事都是有的，而且我的文化水平低，虽然生活好了，但是思想跟不上，不能真正认识和珍惜我们夫妻13年的感情和爱情。

问：当你被捕时，你是怎么想的？

翁：当我被捕时，我的脑子都炸开了，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们是13年的夫妻，怎么去告我呢？我感到是五雷轰顶一样。

问：你在法庭上一直不承认你是故意用开水烫伤的向敏华，是不是这样的？

翁：是的，我一直不承认。

问：但是法庭经审理查明：事发的当时，帮工小黄听到向敏华的呼救跑上来后，看到你右手提着水壶站在向敏华的旁边，小黄上前将向敏华扶起，这时你又将壶里剩余的水淋到向敏华的左腿。

翁：是的，就是那个帮工作伪证，他根本就没有看见！

问：可是你拿不出你没有用开水去烫向敏华的证据，是不是？

翁：是的，我想，算了，我是被迫的，我没有办法，现在我一直都没有收到家里的信。

问：被捕后你有没有想到你会被判刑？

翁：没有想到。在我被押的日子里，我多次写信给向敏华，求她不要告我。我想你向敏华告我就是为了治伤，你向敏华就是不告我，我也要给你治好伤的。我在被捕后的一个多月里，我在监狱里给向敏华写了一封信，我跟她说：“我经过坐牢一个多月来认识了错误，以前没有好好关心爱护你，从今后，重新做人，改造思想，爱护关心你。关于以后的治疗和生活都由我负责。”我要她相信我，我会对她负责。我一直都向她认错，求她原谅我，求她不要再告我，求她撤诉吧，我认为（如果）她能原谅我，法院就不会判我了。我是个法盲，长了这么大了，一点儿也不懂法，我也没有文化，小学只读到二年级，的的确确的文盲。她告诉我要告我，我还以为她在开玩笑呢！

问：你后来是以什么罪名被判入狱，判了多少年？

翁：法庭判我是故意伤害罪，判了我5年有期徒刑，之后我就被送来茶陵监狱服刑了。

问：你始终不承认是故意用开水烫的她，既然你不服法院的判决，那么你为什么没有上诉呢？

翁：我没有上诉，因为我老妹讲：“哥，算了，你不要跟向敏华计较。”我一想，我也没有代理人为我上诉，所以我就没有上诉。后来向敏华又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我当时也没有同意离婚，但是法院就判离了。现在我很想念我的儿子，可是儿子也没有来看过我。另外法庭还有一个判决，要我赔3万块钱给向敏华，但是我现在在坐牢，也没有钱赔给她。

问：那么你跟向敏华是怎么离婚的呢？

翁：我在看守所里被关押的时候，收到法院转来向敏华的离婚书，我本人接到她的离婚书后，内心实在是受不了，加上两个

多月的看守所生活，举目无亲，日子难过，我非常想念向敏华，我又给她写了信，我求她不要离婚。我们夫妻俩人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没有做到真正爱护和关心自己的妻子，就是有罪，还造成了妻子的心灵伤害，对自己的过错悔恨不已。为了儿子的前程，我出自内心不想离婚，希望她看在儿子的前程上，放过我，我一定改过自新。她向敏华之所以要跟我提出离婚，我认为她的内心里是不想这样做的，是因为面子上过不去，听了别人的话了，我也不怪她，我请求她撤回离婚报告。

后来法庭开庭了，判决离婚书是在法庭上收到的。我心里好难受，法官问我上不上诉，我根本没有看就对法官说：“我不上诉。”就把字签了。我好像喝了忘情水，我们十多年的夫妻，风风雨雨走过来的，签了个字就离了？法院把我们住的房子也判给了她，儿子也归了她，钱也归了她。

现在我开始冷静下来了，我决心改正自己过去的暴躁脾气，全心全意地关心她，安慰她，原来我是个酒鬼，现在我是滴酒不沾，抽烟也很少了，我决心改掉这些不良的习惯。

我被判5年徒刑，如今入狱已经一年多了，我很想儿子，也想向敏华，我心里还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个家还是我的。刑满出狱后，我重新开个小饭馆，挣钱给向敏华补充一些。

问：你出狱后，准备住在哪里？

翁：我还有兄弟姐妹，我会去他们那里住的，他们有多的房子，我还可以在他们的帮助下，开个饭馆，做点儿小生意。我只是想如果我挣了一点儿钱，就想法补贴她。

我决心安心在这里好好服刑，好好改造自己，服满刑期后，回到社会上我就一个人好好干，重新做起。

我给向敏华写了7封信，希望你们也去看一看，我写得不好，错字多，希望你们告诉她，我想见见儿子。

附

翁新平在狱中给向敏华写过7封信，这些信中流露出他内心的痛苦，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施暴者施暴的目的不是离婚，而是为了巩固他对妻子的控制，但是他从施暴中获得的并不只是权力，他也在丧失自己的幸福。现将其中的两封附上。

(之一)

妻：你好！

12月11日，你带着儿子在法庭上和我见面，带来了好多蒸莱好吃的，可息（惜）我没有口福，我又惊又喜，我和你谈了家里的情况，听你说小五小高他们买来东西送我关心我，我本人感到无比高兴，并写一封回书表示忠（衷）心感谢，我说上千言万语，离不开亲人的情和义，我是个（文）盲人，说不出好听的言语，所以我亏（愧）对你们，亏（愧）对这个家，最后本人忠心忠意（真心真意）说声对不起全家人。

当时我和你在法庭接判决离婚书后，我心里是好难受，法官问我上不上诉，我根本没有看并说不上诉就签个名离了，我的心里在流泪，心情不能平静，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刺激，我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打激（击）和失望，加上我有病的身体还要服五年苦牢之期，想着自己的孤独衰老，含泪望着天边，走着重重的脚步，我直想再和你见一次面，说一说心里话，我就要到远地方去牢（劳）改，以后难得见面，敬请你帮我送东西，是旧毛毯，旧罩衣，西服，夹克，没有写字的旧书本、日记本，材料纸，好一点的钢笔，买个蛇皮旅行袋装好带来给我，并带上你本人的身份证和我的判决书，说出我的名字和监号，可以接见。见面再说我的心里话。

望你接到我的信后马上来见我。

祝全家人元旦快乐!

翁新平

(2000年)12月14日

(之二)

向敏华、儿子，你们好!

我于本月19日收到家书两封，信中提到你们母子现已解决基本生活费，家庭经济有保障，服刑人翁新平万分感谢人民政府。

当我看书信，已知儿子现在没读书上学，说我们的儿子不愿意上学读书，因小学基础没打好，同学们知道父亲进监狱服刑的事耻笑他。你信告我儿子不读书的理由，我们的儿子只有14岁，年小不懂事，他自己不会去想将来，更不会知道面对社会高速发展要有高文化高学问，到那时还是文盲白痴一个，你这个做母亲的也跟孩子(一样)不懂事，事情到这步还不早点告诉我，要我写信于你才回信说家中情况。我记得开庭宣判那天是你向法官说领养孩子，好好培养儿子成长，当时我相信你，心中托付于你我才放心，服刑期间总是思念你们，并在7月份写书信给你，并在8月份第二次写书信给你。以前写信给你和儿子都是问你伤好不好，我再三要你好点培养儿子，儿子上学条件非常好，到校只有100米，今天收到你回信，本身我翁新平是一个文盲白痴，今天我不希望看到儿子象父亲一样，见信后本人感到全身重痛，心如刀绞。

今天我翁新平再三特写一封信给你向敏华，你见信火速带儿子来监狱接见中心，我要和儿子谈心，和你谈话，共同商量，要让他读书上学，大问题共同解决。

一、把家里的大小事安排好，打电话告小高有两天时间

离家到茶陵。

二、我需要的东西一路带来：皮马夹背心，红回力鞋，黑色衬衣，毛巾一条，好点的钢笔一支，吃食朝阳市场有卖，小包装一斤一斤的饼干系列，加力士香酥饼，花生糕，夹心饼，香烟红包的芙蓉两条，在家做点豆豉、辣椒油，炸花生米4斤，卤点鸡爪鸡翅膀南花干子，要儿子背上火车。

三、旅行从家出发上火车至茶陵火车站行程有千把里，到茶陵火车站下有汽车开往监狱接见中心，开票等候接见。

四、接见要的证件，你要带好你自己的身份证和判决书、残疾证，我需要人民币200元敬请你转告我妹妹。见信敬请火速赶来，天气温和，对你的烫伤没有坏处，祝你们母子俩旅行愉快，安全到达。

爱你们的人翁新平

(?) 10月20 灯草

(注：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已把其中的错字改过。)

点评：

施暴者的悲剧

宋美娅

翁新平到了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认是他烫伤了向敏华。许多施暴者都不肯承认自己的施暴行为，其中的原因大致有：

第一，他们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妻子的虐待，他们会说“打她是为她好”或是说“让她明白做女人的道理”，翁新平就说他打向敏华是为了“让她做个贤妻良母”。男人确实是在用暴力告诉女人，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在用暴力控制妻子的行为。但可怕的是，男人的这个界限永远没有一个标准，妻子

永远不可能让他满意，因为他的标准是在不断游移的，今天他满意了的事，明天就会成为他打人的新理由，他们对妻子限制的界线，在这种游移中不断紧缩，所以，他对妻子总是不满意，而不满意的后果是他进一步用暴力告诉她该怎样做。

第二，男人总是把施暴的过错怪罪到受害人身上，他们会说：“是她惹恼了我”，“她饭都没做好”，“她把我唠叨烦了”等等。他们有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总认为是妻子不对。甚至真的感到自己很委屈。

第三，怕承认了之后失去自己的利益。施暴者敢于肆无忌惮地对妻子施暴，在多种原因中其中有一条，就是他不必为此付出代价，并获得了他想要的东西。一旦他明白将要付出代价时，他会极力逃脱。所以，有研究者指出：“来自施暴者的信息的可信度最低。”

从翁新平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男人通过施暴巩固了权力，但他们也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翁新平，他从来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夫妻之爱，没有得到过真正温馨平和的家庭生活，他在狱中写的7封信，每一封都反映出他内心的孤独凄楚，也反映出他对妻儿的思念。和其他大多数施暴者一样，他毒打妻子并不是为了离婚，而是为了更牢固地控制她，显然，离婚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说他还爱着妻子，但残酷的暴力早已摧毁了妻子对他的爱，他特别盼望儿子有出息，但他给儿子带来的伤害很难弥补，他对别人施暴，同时他也亲手毁掉了自己本来可以很幸福的家。在度过数年的牢狱生活之后，他还将面对孤身一人的凄凉。

每一个施暴者都是生活的失败者。

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性别文化对男女两性都有严重的戕害。我们的传统文化鼓励甚至欣赏男人使用暴力，比如我们常把粗鲁、野蛮看成是有男子汉气，把主观、武断、喜欢统治别人看

成是有能力的表现，暴力倾向时常还会被认为是一种英雄主义。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究所的陶来恒教授在分析男性施暴者的心理时谈到：“很多情况下，男性可能视暴力为一种回应他人威胁的可以接受的方式，一种维护自己尊严的有效措施、证明自己的力量的可靠证据。所以，男性的社会化潜含着暴力倾向和行为的养成。”^①但是暴力并不是只带给男人耀武扬威的快感，翁新平的故事就让我们看到了他害人又害己的悲剧，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失落和孤独。在瑞典，有专门为施暴男子服务的男子危机干预中心，那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有些男性施暴者打电话向他们求助，他们诉说殴打妻子之后，他们也有深深的挫败感，家庭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们认为搞不好家庭关系，不能正确向妻子、家人表达自己的内心是自己的无能。所以说，我们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并不是向男性讨伐，而是力图促进社会改变产生暴力的性别文化结构，使男女两性都得到更符合人性的发展。

西方一些男士早已认识到了这样做的意义。1991年，加拿大一位叫做霍夫曼的先生和其他一群男士，认识到自己有责任敦促男人站出来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他们决定将佩戴白丝带作为男人反对对妇女暴力的象征。

佩戴白丝带是一种个人宣言，表示佩戴者承诺本人决不参与对妇女施暴，并且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决不保持沉默。很快，“白丝带”运动在欧美等国广泛开展。每年的11月25日，“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这些男士都会在胸前、在自己的汽车里佩戴白丝带，它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为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而开展的以男士为主要宣传对象的反暴力活动。

^①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28. 在焚烧中幸存

叙述人 童春花
访谈人 宋美娅
访谈时间 2001年2月25日
访谈地点 北大妇女法律服务中心
录音整理 宋美娅
文稿编辑 宋美娅

童春花，1965年出生，高中毕业，北京人。1988年结婚之后，她便开始遭受丈夫和婆婆的暴力，童一再忍耐，其间数次提出离婚，但终未成功。1997年6月12日，丈夫趁她不备，将一种混合易燃物泼到她的身上，随即，他打着了打火机，童被大火吞噬。后来，幸而抢救成功，但已严重烧伤。2000年3月19日，在童春花的顽强申诉中，施暴者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第一次见到童春花的时候天还冷，那天，她穿了件半大的灰色棉衣，进门时我就看出来她的两只手尽量缩在袖子里，尽管事先我知道她被丈夫焚烧后留有伤残，但当她伸手接我递上的一杯热水时，我还是吓了一跳：她的一双手完全变了形，5个手指粘连在一块，红色、疤结累累，没有一点正常颜色的皮肤。下午，我们谈得彼此熟悉了，我又看了她身上的伤，大面积的疤痕缠着她的躯体，疤痕上还打着结，揪着肉条，好似一个丑陋的魔鬼附在她身上。她的身体摸起来坚硬，像一块甲板。她说伤疤要每天洗，要不然皱折

处就会发炎。所幸的是，她的脸上伤不太重，还能看出当初的眉清目秀。

结婚时也曾相爱

我叫童春花，出生在1965年1月15日。在我不到3岁时，我母亲去世，我是跟着父亲、哥哥、姐姐长大的。

198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一个同学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就是李军（化名），见面那天晚上，他骑了辆破车，没有闸，真像相声里说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我看他的衣服上大补丁小补丁的，裤子上净是窟窿，心想，这人怎么这样啊。同学说，刚下班，没来得及回家换衣服，直接来了。接触过几次之后，觉得他还挺实在。但到他家一看，心里凉了半截，家里又脏又乱又穷。当时我想起来一句老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想，他是长子，应该是特别自立自强，也就没说什么。那时他爸他妈对我特别好，他妈还愿意给我们造成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可是不久她妈就变脸了，管我要嫁妆。那时我父亲已经70多岁了，我爸养我们不容易，我母亲去世时我大姐还不到15岁，我爸怕我们4个孩子受委屈，一直没有续娶。我说我不能管我爸要东西，我有多大的力使多大的力。她妈一听就急了：人家都是彩电冰箱都置办齐了。我说，你儿子是跟我结婚还是跟电器结婚？她妈就跟我吵。那时我想，他妈这么不讲理，干脆吹了算了。我不再上他们家去了。

但是有一件事感动了我。那是1987年冬天，那天晚上，8点半我下了班，走到六里桥时，看见李军冻得瑟瑟地站在桥头等我，身上就穿一件毛衣，还是我给他织的。那天特别冷，头一天下了场大雪，风“呼呼”地刮。我一看就问他：“你怎么不穿上个大衣呢？”

他说：“我妈不让我来接你，我说上厕所，偷跑出来的，不

敢穿大衣，也不敢骑自行车，从家走来的。”当时我挺感动的，真的，挺感动的，马上眼泪就下来了。从他家到六里桥，得走两大站。我从小没妈，哥哥姐姐没少给我爱，但男朋友的爱还是第一次。有了这份情，别的什么我都认了，但我还是不上他们家。

1988年元旦，我们俩领了结婚证，李军是把他的户口本偷出来登的记。他妈知道后，又惦记东西，李军拉着我的手哭，他说：“不行咱借点钱，先把婚结了。”实际上这时我们家已经把东西都给我预备好了，沙发、电视、冰箱、毛毯，所有家里的东西全是我娘家的，拉了整整一汽车。

他妈一说什么他就打

结婚后我们住在新房子里，但和他父母一起吃饭。他们家让我把工作辞了，给他们家干活，他们家有5亩多地。李军的工资全部交给家里，他妈每个月给我们5块钱。头一个春节他妈就挑我的不是，说我没有给她磕头，你说都那个年代了，哪还有媳妇给婆婆磕头的？为了平平安安过个年，有什么委屈我忍着。我就跪下给她磕头：“妈，您过年好。”

李军第一次打我特别重是在1988年的“五一”。刚结婚的时候他还可以，他妈不给我聘礼买衣服他不干。结婚后他妈老挑拨，看见我们俩好她就生气，李军听了他妈的话就骂我，有时也动手。“五一”节她妈说我没给她买好吃的好喝的，那天不知道他妈给他说了些什么，下午李军回来就骂骂咧咧的，我说：“你说，咱拿什么买？一个月5块钱，还不够买手纸的。”他突然跳起来，一脚踢在我的腰上，当时我就动不了，疼得我在地上打滚，他转身走了，我自己爬到了床上。晚上10点多钟他才回来，一点吃的没给我带。

第二天，他上班走了，反锁着门。他回家吃饭，高兴了用塑料袋给我装点吃的，连碗都不用，拿半个馒头，夹点咸菜。过了

三四天，饿得我实在受不了，我动不了，大小便也解不了。那天，我听见外头有喊卖豆腐丝的，我爬下去，爬到门边，“大哥，大哥！”好不容易人家听见了我的声音又找不着我人，“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我根本起不来，只能拍拍门：“大哥，我饿，我身上有三毛钱，买点豆腐丝。”

李军的大姨和我住隔壁，她听见动静过来了，我把钥匙递出去，大姨和大哥把我托到床上，大姨问：“怎么了？又是李军打你了吧。”我也不敢说呀。打了我之后，他妈没过来，话倒是捎过来了：“妈说了，你丫敢说出去！”大姨端来一小碗饭，我狼吞虎咽地吃了。那天晚上，我小便还是解不了，肚子疼得很，我求他：“李军，我求你了，带我上医院瞧瞧吧，我什么也不说。”到了医院，我说是掉下来摔的。医生说：“是摔的吗？别说了，我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医生挺好，我还喝了他两付祖传秘方，但是瞧晚了，现在我还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后来我注意到她走路果然有点跛。）

转眼到了7月份。他们家人老拉着李军打麻将，给5块钱吧，还得玩麻将输给他，他们家人输了谁也不给，说欠着欠着。李军玩麻将玩得不上班，老缺勤，到年底长不了工资。我说，不就是那5块钱吗，干脆掏出来给他搁那儿。李军还不干，老惦记赢点。那天他们又玩，我说他：“明天又不上班，这么大人了老拿75块钱，寒碜不寒碜。”他爸一听不高兴了，把牌摔了，李军上来就给我一大耳刮子，我一闪，打在耳朵上，气得我哭着回了娘家。

回家后，我姐找了我舅和舅妈上李军家去，挺婉转地问是怎么回事，舅舅、舅妈说，你们分家吧，和父母分开过会好些。分家他妈给了我一块钱，我买了个菜墩子，别的都是我娘家拿来的。我们分了家各过各的吧，不，他妈老是挑事，他妈一挑，李军就上，不是打就是骂。

1989年春节，我弄了点炮，给他两个弟弟拿去些。那时我做点小买卖，批发点卫生纸什么的。我说，给我侄子也拿去点。他妈说：“别拿！等初二再拿，就不用再给他钱了。”我说：“我哥又不缺那点钱，都是自家人。”就为这点事，不知他妈怎么给李军说的，李军差点没把我掐死，他把我按在地上，两手掐住我脖子，租我们家房的房客听见动静不对，就喊：“小李，小李。”当时我喊不出来，人家来敲门他才松手，半天我才喘过气，哭出声来。我不上他们家去了，他爸来了，劝我说：“我回头说他，先过年。”我在家时，我父亲和哥哥都教育我要孝敬老人，我就跟他爸去（他们家）了。到那儿我才知道，是让我去做年货，炸排叉、煮肉，我一边掉眼泪一边干活，他妈什么也不干，在一边看着还说这不对那不对。

月子里饿得我直发昏

春节过去了，我怀孕了，反应大，喝不了水，吃不了饭，李军照样什么也不干，地里的活儿都是我哥、姐、姐夫，连我爸帮我干的。这期间，李军听他妈的挑拨，说我不去给他妈干活，还是又骂又打。怀孕时，难受得很，挺着肚子弯不下腰，怎么去给他妈干活。我觉得实在跟李军过不下去了，不如离婚算了。以前我提出过好几次离婚，大队妇联也叫过他好几回，批评他，他老保证，以后不打了。把我接回去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我为什么一次次原谅他呢，是因为我想，他和他妈一起生活了23年，跟我才几年，他听他妈的也是应该的。我想，时间长了他就明白了。

怀孕3个月时，他又把我的眼睛打青了，我请人写了状子告到法院，要离婚，我想去做人流，妇联主任说，太大了，做不了了。李军又让我原谅他，就这样，1989年11月12日生下了女儿晶晶。

生孩子时，他妈不让我上医院，在家生了三天三夜，生不下

来，疼得我三天三夜水米没沾牙，睡不了觉。他大爷家的大哥大嫂来看了说：“再不赶快送医院人就没有了。”这样李军才送我上医院，还是让我自己走着去的。到了医院，体力不行，只有剪了（侧切），好多人帮着我才生下这孩子。

生下孩子我就失去知觉了，给打了两针才醒过来的。等我回到病房，人都走了，我想喝口水都没人给倒，一个小护士给我找了两个鸡蛋，找了个一次性杯子。第二天，病友看我可怜，用人家的杯子喝了三杯红糖水。头一天12点40分生下孩子，直到第二天10点多李军才送来饭，在家我都三天三夜没吃过东西了。送什么来了呢？我姐送来点新小米，就吃粥，二米粥，连点肉渣都没有，更没有鸡蛋。别人都说：“给送点鸡蛋来。”根本就没有，李军每天送两次饭，下午3点一次，晚上9点一次，全是粥。有过一两次包子，面都是褐色的，碱太大，涩的，馅咸得没法吃，我整天饿得眼前冒金花。我对李军说：“你给我在这儿订饭吧。”他妈这就来医院了，一来就吵：“就不让男人歇会儿，月子里就得喝稀的。”我听见他妈的声音就晕了，感觉自己飘起来了，什么也听不见了。还是没订饭，心里整天空荡荡的。

出院了，他妈不让我回自己家，让上他们家。我姐姐来看我，送来十来只鸡，我一只也没吃过，全让他们家人吃了。我娘家人、同事、街坊来瞧我拿点吃的，人家一走他妈就过来把东西全拿走。我姐再来，把鸡蛋糕包打开：“多吃点，你得好好补补。”以为打开包了她就不拿走了，我姐一走她还是过来拿走。月子里她就骂我，嫌我不干活。出了满月我就回来了，我这一月子，光鸡蛋收有二三十斤，他妈一点都没有给我。

他越打越厉害，还有了外遇

这就到了1989年的五六月份。李军单位不景气，他跟他爸妈做猪头肉，每天醒来就走，晚上才回。我又要带孩子，又是地

里的活儿、家里的活儿。

有一天中午他爸来了，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回去跟他妈说：“李军得说说他，回去什么也不干。”他妈就说了一大堆我的不好。那天李军回来还挺高兴，我给他包了饺子，我吃方便面，我从来都是好吃的尽他吃，在他们家，做饭炒菜全是我一人，等干完了，别人也吃差不多了，我好歹吃点，再刷洗归置。那天吃完饭后，李军说：“我去个厕所。”我就听见有人在外面嘀嘀咕咕。我刚把孩子放下，李军一脚把门踹开，特别厉害：“你今天跟爸说了什么？”“什么也没说呀。”这时他妈也进来了：“你再想想，说点什么了？”他妈添油加醋地说了好多。我说：“爸一共在这儿呆了不到10分钟，我能说这么多东西吗，你们不信，可以找爸对证。”他妈就骂：“对你妈个×。”我说：“我妈死的早，我就你这一个妈。”他妈就喊：“李军，还不给我打！”李军上来就没头没脸地朝我身上打。孩子被打醒了，我去抱孩子，他妈来抢，我说这是我的孩子。她又喊：“打这个丫挺的！”李军一拳打到我脸上，鼻子立刻哗哗流血，牙一下子立了起来。我把孩子放在炕上就往外跑，他妈说：“把她身上的钱抢过来，别让她跑出去！”李军追上来抓住我，我说我要去医院。他看我一脸的血，就进去和他妈商量，然后过来说：“上医院不准说是打的，说了加倍地打。”我不知道打的怎么样，只觉得头蒙蒙的，我说行，不说就不说，先让我瞧瞧病去。到医院我说是磕的，拿了点药回来了，牙也掉了。那时李军看把我打成那样，有点后悔。

李军厂子不景气，我看他整天吊儿郎当，就拿出2000元钱让他去学开车，学完以后，找我哥我姐借了4000元买了辆旧车，让他上我姐那儿去干，我姐和别人合开了个公司。

1993年我转成了工人，月工资1000多块，我还做点生意，早上5点多钟就拉着东西出去，回来给他们弄吃的，送孩子上学；中午人家休息，我又去送货，赶2点半上班我就回来了；下

午接孩子，给他们做饭，让他们吃饭的空儿，我又去送趟货。我做买卖实在，收益不错。我把家里重新装修，买了录像机、吊灯，把家里弄得很漂亮，东西配房也盖上了，出租房子也有收入。我结婚时就想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这一点我做到了，我家的摆设比谁都不差。我给李军买好衣服，从来都是在正规商店里买。

没想到，这时李军又跟女人混上了。开始是个四川的，他一个月挣的几百块钱全给了那女人，让她去做美容——那女的脸上有块疤；给人家的孩子交学费，那孩子没爸，是那女人瞎搞搞出来的。后来那女的摔坏了腰，回老家去了，他又跟了一个东北的。

他妈在这里没起好作用。有一次，他妈让我看片子，说：“可好看了。”我问：“什么片子，枪战的？”“不是。”“武打的？”“不是，是带色的，可好看了。”我说我不看。他妈说：“我让你学技术你不学，以后有你吃亏的。”他妈又让李军看，我说李军，你要看，我把电视砸了。他不敢看送回去了，回来就骂我。有一次，我看见他和他妈一起看这种片子。

我到厂子上班之后又提出过几次离婚，我们领导说：“小童，你刚来，我不能给你开离婚介绍信，你一来就离婚，跟咱单位风气多不好似的。有矛盾尽量调解，一起过日子。”谁都是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个观念确实害了不少人。

1996年春节，他说厂子没人，他要值班。初三这一天，我带晶晶去看他，就见窗帘拉的严严的，从窗户缝一看，他正和一个女的干坏事呢。晶晶嘴快，“爸爸，爸爸，”那个女的披着衣服跑了。我问他：“谁在里面呢？”他说没人。我说要有怎么办？你们在床上干什么呢？他一听又要揍我，晶晶抱着我说：“妈，咱回家吧。”他回来后，又是写保证又是写决心，那时我想用我的善良和真心感化他。

一眨眼到了1997年的6月。6月初的一天，我去找我三弟媳妇：“你有工夫吗？”我说，“该买换季的衣服了。”不管李军对我怎么样，我要尽到我做妻子的责任，我不想让他像我一样穿的破破烂烂的，丈夫出去要体体面面的，我给他买衣服从来都是在正规商店，买有牌子的，我自己的都是在小摊上买。那天我在商场给他买了T恤衫，给孩子也买了，又上浙江村花25块钱给我自己买了件小坎儿，下午不到3点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发现院子的门锁得特别紧，屋门也锁着呢，这是怎么回事？趴门上一看，李军和那个东北女人正在一边看黄色录像，一边干坏事呢。

我一看就急了，开了门就进去，他俩赤身裸体的，我说：“李军，你不是人，白披了一张人皮！”我哭着跑出去，上他二弟家给他厂子打电话，他爸也在他二弟那儿，我把这事儿给他爸说了。我姐在电话里告诉我，李军上午11点多就走了，到我3点回来，他们鬼混了那么久。

我打完电话回来，俩人走了，我撵到厂里，那女的比我还厉害，骂我骂得特寒碜。李军说：“你给我丢了脸，没完。”他穿着皮鞋，就前胸后背地朝我身上踹，把我头上踢的是大包，打得我没有还手之力。当时不知谁喊了一句：“你还不逃命去！”好多人围着他，我才跑出来。回来后我抱着孩子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第二天我回去拿衣服，他看见我，一下子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央告我，说他错了，以后改邪归正，不再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了。他跪在地上给我写保证书，一张一张地写，写了一打子，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其实当时我就不信他了，可是又想，不管怎么说，有孩子，如果他真的改邪归正，还是在一块儿过。我不为别的，就为孩子，不愿让孩子受到任何伤害，就这样，那天他把我接回去了。

没想到惹大祸上身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吧，1997年6月12日，那天晚上我带孩子去看我爸，我爸病了，打吊针。我哥说，爸没事儿。这时候李军来了，我哥说：“李军，坐那儿吃饭吧，吃完饭你们一家子一块回去。”李军说：“不了，我吃了。”那天他表情特别不自然，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上我爸屋里转一圈，就走了。我哥就说：“李军可能有什么事，你赶紧吃，吃了赶紧带孩子回家了。”我就赶紧骑自行车带孩子回家了。

但是我到家他还没到。孩子说：“我作业写完了，想唱一会儿卡拉OK。”我说行，我就给她插录像机。天挺热的，我把衬衣脱了顺手放在沙发后背上，只穿了一件小背心。这时，李军回来了，恶狠狠地问：“你上哪儿去了？”我特纳闷，他不是刚才知道我去看我爸了吗。这时他一屁股坐在我的衬衣上了，我说，我拿一下我的衣服，他不搭理我，我轻轻碰了他一下，他特别狠毒地剐了我一眼，他那眼神想起来我就害怕，他一抬屁股，拿起衣服“啪”扔在房门口，我没言声。他又转身一把把孩子推到屋地下中间去了，他拿起一双鞋，一下打在孩子前胸上，孩子一声尖叫。这下惹恼他了，抓住孩子的头发拉到西屋门口，叮咛五四地揍，孩子真是哭啊，嚎嚎地哭。我坐在门口看着，我想，他总归是孩子的父亲，甭管他做错了什么，我得在孩子面前树立他的威信。他又进厨房转了一圈，我不知道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我实在看不过去，就过去说，孩子招你惹你了，大夏天的。我就这么一扭头，“哗”，有东西泼过来了，泼得我身上都是，他又把瓶子扔过来，泼了好几下，我只穿个跨栏背心，觉得粘粘乎乎的，我捡起瓶子想看看是什么，拿起瓶子特别呛人，我又把瓶子扔了，赶紧往自来水那儿跑，我刚要拧自来水，他往前上了一步，我只听见打火机响，感觉什么东西猛撞我后背一下，顿时我成了个火

人，全身都着了！我在火里求他：“李军，求求你，救救我，我不想死，求求你，救救我！”

当时他点着了我，往后退了一步，把瓶子捡起来，又把瓶里剩的东西全倒我后背上了，我看到他的表情，就像电视剧里的人欣赏一个雕塑、一件作品一样那种得意的笑容，他就那么围着我转圈，欣赏着，说：“不许动，烧死你！”我们家孩子大声喊：“快救命啊！快来人啊！”没有一个人来，人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火烧了我好长时间，地下都是火，孩子喊：“妈妈，快在地上滚！”我当时没听见，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人就要不行了。

这时，他们家一个叔伯婶两口子来敲门，晶晶“蹭”一下跑去开门：“妈，门开不开！”我想起来了，李军回来把保险给锁了，我就喊，晶晶，快开保险。我在慌乱中把裤子拽下来了，腿上就烧不着了，身上的背心烧完了。人家一看，大吃一惊：“小童，你这是怎么回事？快救火，快上医院！”李军这时过来对我说：“你要说出去，要你的命！”我的手当时烧得都硬了，只能这么举着，身上的皮滴里嘟噜地吊着，都烧焦了。我说：“李军，我求求你了，我什么也不说，你快点送我上医院！”晶晶哭着说：“妈，你疼吗？快上医院吧。”我当时心里想：孩子没事就好，孩子没事就好。这时李军慢慢悠悠地说：“婶，别找车了，我这儿有车。”我一听，特奇怪，有两个多月了，我姐不让他开车回来，那天怎么开车回来了呢？

他是想要我的命

上车时，他不让我们街坊和晶晶上：“你们甬去了，我一人就行了。”事后想，他就没想把我送医院，指不定扔到哪儿呢。晶晶哭着喊：“爸，求你了，我给你磕头了，你让我跟着我妈吧。”婶子也说：“不行，你一人弄不了，我也得去。”最后他没办法了，只好让她们上车。他爬到我耳朵边说：“你要敢说出去，

跟你没完！”我当时只穿了一件三角短裤，光着脚上的车，邻居给我拿了件衬衣披着，我疼得很，他却老是走错路，还想跟人家撞车，后来想，他都是故意的，他常在这条路上走，能不认识道吗？他是在拖延时间，想要我的命！

到了304医院，我还挺清醒，医生护士瞧见我都说：“这病人哪能让她自己走呢，赶快弄担架。”担架抬我进手术室，插了导尿管，打了一针破伤风，医生问我是怎么回事，李军一直在威胁我，到门口还说：“你要说出去，我杀死你全家，杀死这孩子。”我不敢说实话，就得编瞎话，我就按李军教我的说：“他吸烟了，烟头扔到酒精瓶上，我往外扔，烧着自己了。”304医院没有床位，又转院。在转院的半道上，李军趁别人看不见，拔我的导尿管，拔了三次拔下来了。救护车上有个医生，她老拍我这半边的好脸：“不许闭眼，使劲睁着！”导尿管拔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已经是在积水潭医院的急诊室里，这中间已经过了一天一宿。他们那天从304出来把我拉到城建二院，第二天早上7点，他们看我不行了，给我大姐打电话，说我烫着了，需要钱。等我大姐来看我时，我的头肿得像猪头似的，眼睛睁得特别大，我姐围着我转，叫我也不知道答应，就是说：“害怕，疼！”我姐问怎么回事，他妈就按李军的话说了。我姐也不信呀，但我大姐当时说，不管怎么样，现在救人要紧。我大姐说城建二院的条件不行，得转到积水潭去。我姐出来时没给厂子说，就说要回去交待一下。不到下午2点，李军就给我大姐打电话，说医院要5万元押金，他们家一分都不拿。我姐找我三姐，找我姐夫，凑齐了钱直接把我送到积水潭医院，我姐对医生说，一定要救活我妹妹，倾家荡产也要救。

我醒过来看见我们家人，但我说不了话，没底气，只能说：“大姐，我怕！我害怕！”我大姐问我是怎么烧的，我说：“大姐，

我不能说，我不想给咱家招灾惹祸，我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多少苦多少罪，我全都忍了。”大姐说：“咱妈死时46岁，我今年也46岁了，死了我也值了。”但我一直没说实话，因为孩子在他们手里，李军对我说过：“你要敢说出去先把孩子弄死。”别看她亲父亲，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有一天，我姐来看我，李军便说：“我上厕所去。”等我姐一侧身，我看见李军在屏风后蹲着，在偷听我和我姐说什么，所以，我在医院什么也不敢说。

在医院里他几次下手

我们家人晚上来看我，早上走，李军他根本不管我，吃好的喝好的，我们家给弄点吃的，他都给吃了，他妈还吃斋念佛呢，我们家给送的鸡腿、鸡翅、猪蹄——这不是吃皮长皮嘛，全让他们给吃了，街坊邻居来看我，拿的奶粉、水果，包括我娘家的东西，全都拿走。我就吃订饭，每次都是打饭的姑娘来把我的盆儿拿走，别的陪床喂喂我。

我的邻床有一个老头，也是烧伤，当时医生说 he 感染上了败血症，必须把腿锯了才能保住生命，可是锯了之后一礼拜，老头还是死了。从那以后，李军天天把我伤口上结的痂给揭下来，揭了就流血，我疼的吱哇乱叫，别的人看不过就去找医生护士，医生护士过来他坐那儿不动了。后来他买了一把剪子，铰，刚长出痂来他就铰，我在人工翻身床上，翻身都得医生护士捆好了翻，根本动不了。揭纱布时，他不等护士揭，“嚓”，一下子就揭了，新长的皮全都掉了，露着鲜肉，疼得我倒吸凉气说不出话来。旁边的陪床看不过去，说：“李军，我来吧。”人家拿棉签一点一点按着伤口揭。医生护士也说他。当时我没想到他是想让我死，他就是让我感染。有一次，他告诉我姐：“童春花得败血症了。”后来，他妈给他找了个女人，让他回家陪那个女人，他妈陪我老拿嘴吹我，哪儿有伤吹哪儿。

但我还是一天天好起来了，医生都说我活下来是个奇迹。他们看我老感染不了，就拒绝医生为我治疗。1997年8月18号，李军给我哥打电话：“哥，积水潭不给童春花好好治了。”我哥19号来的，还带了一个同事，找到了我的主治大夫，大夫说，李军在两个星期之前就拒绝我们为童春花做任何治疗了。那个时候我也纳闷，为什么老不给我治疗，只给我上点纱布条。那是我烧着了之后第一次见我哥，我就这一个哥，以前没敢让他来，都是嫂子来，我爸在家还不知道，告诉他我去远地儿出差了。我哥一看见我就掉了眼泪，当时李军和他妈就围攻我哥，说让我出院，花那钱呢，过去烧着了燃把灰一捂就行了。我哥含着眼泪问我：“小花，你是想死还是想活？”我也哭了：“哥，我想活！”“你放心吧，哥倾家荡产，一定给你治好。”当时我哥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走不了了，从那之后，好好的我哥就不能动了，到301医院去瞧，什么毛病也没有，就是两条腿不听使唤走不了道，脱鞋穿鞋都不知道，那年我哥44岁，到现在我哥没上过班，现在挪着能走，那天，是我哥带的那个人把我哥架走的。

20号一早，我大姐、三姐、我嫂子、同事都来了，她们另外给我联系了电力医院。李军不上我那去，他妈一来就骂我。我姐给我请了一个保姆，看见我就眼泪汪汪的。我们家为了救我的命真是不惜代价了，他们家一分钱也不出，李军一个月也不来看我一次。有一次我要手术，前三天就开始找他让他签字，我要进手术室了他才来，我还没醒他就又走了，根本不管我的死活，后来我说他：“你换个角度想一想，要是我把你弄成这样，你怎么想？”他说：“行啊，你不是没死吗，我车上多的是汽油。”我吓得喊保姆：“陈姐，陈姐快来，我害怕。”以后我告诉保姆，李军来了千万别让他进来。

有一次晚上10点来钟，李军来了，跟他过这么多年了，他身上有种气味，他要在这吧，气氛就不一样，他来了，就在外面

走廊里蹲着呢，我能感觉到，我不敢探头往外看。那天我胃疼，去叫医生，我对医生说：“大夫，我爱人说了，等我好了，请你上我家去做客。”医生觉得我挺奇怪，摸摸我的头说：“你怎么了？”因为他在外面呀，我怕他杀我，我得先稳住他。后来有人说：“不知道是谁，跳窗户出去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不想活了，嘴歪眼斜，人不人鬼不鬼，疼得厉害，过不来那个劲儿，我真想从8楼上跳下去。可孩子挺好的，每次来都说，妈，我学英语歌了；妈，我考100分了；妈，以后我挣好多钱，带你去美容。每次都觉得孩子有话不敢说，有一次，趁她奶奶不在，她刚说了一句：“妈，他们让我说谎”，刚说这一点她奶奶来了，孩子赶快不说了。

发现了13枚手雷

我是1998年元月8号出的院，我的手还没好，确实是没钱了。

在我烧着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家就知道了是李军点的我，是李军的姥姥说出去的。我大姐问我：“你告不告他。”我说：“大姐，要告，能不能一个枪子儿崩了他？能崩我就去告，崩不了我就不告。”我们家人看我的意思，我不说告，她们绝对不会去告。

出院后，他妈说我不伺候李军，我说，我的手还没好，我怎么成这样的？就为这，他妈大耳光子打，往我心口上踹，保姆直求她：“大妈，您别这样，您不瞧别的，就瞧她成这样，别打了。”他妈就把保姆赶走了，这保姆是我姐花钱给我请的。李军也不回家，在外面鬼混，有一次回来，又从沙发后面拿出一个瓶子，我不能再让他点了呀，我拿胳膊夹着瓶子，手拿不了，我说：“李军，你别这样，我求求你了，我什么也不说，我听你的。”老天不该绝我，他瓶子盖还没拧开，我们家租房的开门拿烟来了，一喊：“小童，回来了，怎么样啊？”他摔门就走了。

我在医院住院时，李军给我三姐打过电话说，谁跟他过不去他就炸死谁，给我大姐打电话说要炸死我大姐，跟租房的说谁也别惹我，我腰里别着手雷呢。我想他也不会凭空说，我就开始找，4月23号，在我们家一个旧的洗衣机里找出来了13颗手雷，吓得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4月30号晚上11点多，下着大雨，李军回来了，砸门，租房的问：“谁呀？”不言声。租房的壮着胆子开了门，说：“李军呀。”我一听，赶紧起来穿衣服，那时我的手还没好，穿衣服特别不方便，这时，他“啵”一下，把我们家房门撞开，撞得门上的木头都飞起来一块，真是杀气腾腾，比点我那天还厉害。我吓得哆嗦，直问：“晶晶，妈的秋裤呢，妈的秋裤呢？”他就骂：“你丫找死呀！”我一看不对，赶紧拿一盆：“晶晶，妈妈肚子疼，得解手。”我拿着盆上过道里，其实也没解。我又说：“晶晶，妈得去倒盆儿。”他堵着门，我过不去，东北租房的大个子，站在门口往屋里看，他喊了一声：“李军。”李军一扭头，我顺着门缝出去了，晶晶说：“妈，我给你打伞。”我们俩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晶晶哆嗦得站不住。到了厕所那儿晶晶说：“妈，快跑吧，来不及了！”我把盆儿一扔就跑，伞也不要了。

跑到路上，后面有一辆车过来了，晶晶说：“妈，是不是他追过来了，咱钻树林吧。”我想，钻树林里他弄死我们更没人知道了，我说不行，咱俩绕树档子跑。刚到高速路口，有一辆面的，我们上去了：“快点，我们家出事了！”李军怎么也没想到那天我们能逃跑，我到派出所报的案，不到20分钟，把他抓走了，我又带着所长和片警去把手雷取走，当时我多了个心眼，自己留了一颗，没想到日后还真有用。

当时我太老实，就在家等着，我这个案子是刑事案，刑事案是公诉案。过一阵子区分局叫我去做笔录，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一枪崩了他！”分局的人一拍桌子：“法律是你定的？他这

样的情况，顶多判三年五年。”这话跟李军他爸说得一模一样。李军他妈公开说：“我们就是花了钱了，托了人了。”分局那个承办人每次见我特横，他不按法律办事，光手雷他就有好几种说法。他说搜走的手雷是微型灭火器，没有杀伤力。我说不对，我们一邻居就是一枚微型灭火器炸掉的手指。我又去他又改了，说是公安机关抓捕罪犯的武器。我说，怎么到他手里了？他说，他是捡的。我说，丢失武器都有报告，你让我看看这个报告。他又改了，说是舞台小道具。我说，你拿着你的，我拿着我的，咱去鉴定。他说，销毁了。我说，案子没了结，不能销毁证据。他说，怕意外爆炸。我说，你不是说没有杀伤力吗，为什么害怕？关于手雷，我的卷宗里只有一张小纸条，没有鉴定书。

我这案子区分局是按虐待罪报的，还愣说我没毁容，重伤鉴定不让我看，我脸上、手上的疤都超过了毁容标准，脖子单独就造成毁容了，浑身有45%的烧伤面积，全是深二度、深三度烧伤，是一般重伤的3倍，我的双手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法院承办我案子的夏法官特好，她说，你这卷宗不清楚，关键问题都没有。

最后区法院判了李军15年。我不服，我要告，但公诉案必须检察院抗诉才行，区检察院不抗诉，我又找上一级检察院，我开始上天安门、中南海，到处上访，买法律书，看，天天夜里看，没饭吃也买书。恰巧李军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了，市二中院刑二庭庭长特别正直，我把事情前前后后都给他说了，他也说卷宗含糊，关键问题都没有，和夏法官说的一样，说明下面做了手脚。1999年7月份，二中院把我的案子发回重审，改变了地域管辖。由二中院作为一审。

我第一次去找这一次的承办人，他说：“不就是你抢衣服，他烧衣服烧着了 you 吗。”当时我就哭了，我说你为什么不看卷宗。他说卷宗就是这么写的。气得我说：“我不活了，你们不秉公执

法，对得起头上的国徽，肩上的天平吗？他们就又做了一次仔细的笔录，二分院和检察院也改了原来的卷。

1999年12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判决下来了，判李军死缓，2000年3月19日北京市高院核准。他手段这么残忍，应该是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书上明文解释，卸肢、焚烧，是最为残忍的手段。而且他有预谋，他是把我哄回家的，他要烧死我，他往我身上泼油时说“烧死你丫的”，孩子听见了，他应该是故意杀人未遂。抓他的那一天，为什么下着大雨他还回来，就是想把我们娘俩儿弄死，他开车跑走。判他死缓我不服。

后来为什么我放松了呢。他们给我做工作，说放他一条路，在刑事上松一点，在民事上尽量达到你的满意。我想，这个社会毕竟还是个金钱社会，他们家肯定也没少花钱，我也不能要求太高，死缓也为我出了口气。能把民事给我执行了也行，我带孩子远走高飞。没想到现在民事是长了点儿，判31万，但一分钱不给，法院就不管了。

现在我和孩子真是挺难的，李军一抓走，他妈就把我的房子锁了，把屋里的东西都搬走了，我工作没有了，每月从残联领100元，晶晶领240元，晶晶学校就要交300，剩下40元，我这浑身的大疤，每天都要洗，要上药，坐个车，买个药钱就没了。晶晶在学校有好吃的不吃，省着给我拿回来。这孩子心重，身体也不行。我要求不高，把房子还给我，再给我执行点。我的手再做一次手术能拉直点，这7万块手术费我上哪儿去弄，有房子的话卖房子我还能还点债。那房子里的东西全是我娘家陪送的，东西厢房都是我盖的，李军不务正业，一分钱没交过，他们家每年还要到我这儿拿几千块钱。我给他妈打电话让她把东西还给我，我要回去住，她妈说：“没门，除非我儿子回来。”他们家说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我把他告了，10年了，我逆来顺受，他太大意了。他们拿媳妇不当人，老二、老三都打媳妇。

李军的事儿出来后，他们家人还几次雇人追杀我们娘儿俩，是辆白色面的。她爷爷曾对李晶说：“看见车上有你爸爸，千万别上车。”因为孩子是惟一的证人，他爷爷还说点人话。他们威胁晶晶：说出去连你带你妈一块儿弄死。后来李晶看见白色的车就哆嗦。

李军不光是害我一个人，而是害了我全家人。我爸88岁了，身体特好，知道我的事儿之后，一头栽地上就死了。我哥半条命搭进去了，我三姐为我整天哭，头是木的，胳膊腿不听使唤，店也租出去了，每个月药钱得700多块。我大姐家的闺女正上高中，差点儿让李军家给绑架了，只好到外地去上学。现在我不上我娘家去，一个月也不去一次，他们不放心就过来看看，我不能再连累他们。

现在我连个窝儿都没有了，大队给我找了间房子先住着。今年3月全国人大开会，我还得去闯，如果你法律公正了，我为什么要去找人大？我穿的衣服上前面写着“讨公道”，后面写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访真难啊，派出所把我抓回去就关半夜，我说，孩子还锁在家里呢。他们说：“活该，上访时怎么不想着孩子锁在家里。”没有冤情谁上访？

我对家庭暴力还真没注意，谁家打架了，正常现象。我们邻居拿电把媳妇电得都住了院了，后来离了婚，也就得了，也没制裁。打得头破血流的，完了，还在一起过。

孩子有一次做梦梦见我死了，哭着找老师，老师说做梦是反的，你妈不会死。孩子跟她姨说：“我妈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我知道拿刀扎肚子能死，扎脖子也能死。”其实不是为孩子，我真是想死，孩子老说我：“妈，你不能死。”我这一身的疤，难受，夏天出不了汗，憋的张着嘴喘气。我想，可能好人死了真上天堂，在积水潭我死过几死，忽地飘起来了，下面花呀草呀，特漂亮，牛羊特白，那感觉一点不可怕，倒是活着挺难！

点评：

暴力对妇女的伤害究竟有多大

宋美娅

我们在做访谈之前，很难想象发生在夫妻或同居男女之间的暴力对妇女的伤害究竟有多大。美国在 1988 年做家庭暴力调查发现，针对妻子的暴力事件中，39%属于严重暴力行为，包括拳打、脚踢、嘴咬、抽打以及用刀枪攻击等。1993 年，加拿大统计局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调查，大约 12300 名 18 岁以上的妇女受到深入采访，这次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已婚妇女（29%）“在目前或过去的配偶手下”，三分之一受到过严重虐待，以至于她们“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几乎一半的虐妻暴力事件引致对妇女的身体伤害。^①

家庭暴力也是导致妇女死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美国一份资料中透露，1980 年至 1991 年，在妇女被杀的事件中，有 50%是被其丈夫、前夫、非法同居者或男友所杀。^②

从童春花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暴力对妇女伤害的程度是难以估量的。童春花几经生死，在大火中幸存。但是，即使在她丈夫的暴力行为停止以后，伤害对她仍然在继续。

首先，她的躯体永远被伤痛折磨。她需每天用药，否则累累的伤疤就要发炎，她的皮肤不能正常排汗，夏天她非常难过。

其次，她陷入了经济贫困。双手残疾使她丧失了劳动能力，

^① Eve S. Buzawa and Carl G. Buzawa (1996 年), *Domestic Violence: The Criminal Justice Response*.

^② 同上。

以前的她兼做好几份工作，收入很好，把家也打理得井井有条，现在她和女儿只有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虽然法院当初判决男方30多万赔偿金，但童春花至今没有拿到。

第三，她失去了家园，流离在外。当她开始起诉丈夫时，她的婆婆就把她的房子锁了，直至现在她有家不能归，只能领着女儿借居在外。虽然家里的厢房是她盖的，家里的东西全是她置办的，但她却一无所有。所以童春花说：“他是被判了刑了，可是我呢，我得到了什么？”

第四，她将永远处在暴力的威胁中。童春花心中最大的忧虑，是李军出狱后她该怎么生活，还有，担心李军的家人对她和她的女儿报复，她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她曾急急地给我打电话，说当初想撞她和她女儿的那辆白面包车在她门前转来转去，“来了几趟了”。我们知道，童春花的恐惧不是没有原因的，受暴妇女被离了婚的前夫，或是刑满释放的丈夫杀害的事例并不鲜见。

受到严重伤害的还有她的女儿，小小的年纪被噩梦缠绕，怕父亲出来，怕母亲死，经济的困窘也是孩子心头的阴影。

童春花的生活完全被改变了，暴力对她的伤害无疑要伴随她的一生。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那就是司法在面对家庭暴力时的态度。童春花的案子发生在1997年，法院审理是1998年，那个时候，人们对反对家庭暴力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认识，从童春花的叙述中看，她在求助法律的过程中，还不是那么顺利，判给她的赔偿她也不能如数拿到，给她的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影响。

看来，妇女要彻底站起来，除了她们自身的抗争外，还需要社会外力的支持，需要一个健全的保障她们权利实现的司法援助系统。

专家评估意见列表

2003年4月2日

评估内容	评 估 意 见
研究的学术规范性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作为口述实录从采访到整理、编辑,在学术规范上符合要求,值得称道; 2. 前言和点评比个案本身理论上显得弱些,应加强理论分析和研究; 3. 对访谈实录的真实性加强一些规范性,如访谈内容是否属实,如何鉴别其真实程度,最好有邻居、亲属佐证为好。
研究方法的可靠性、有效性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资料丰富、翔实、有效、可靠; 2. 在口述访谈的基础上创造点评的方法,使该成果具有一定的深度,但需要深入研究,加强点评的深度和针对性,避免从观念、概念出发进行点评; 3. 书应有一个全局把握的导言,口述实录部分正文之前应有的人物背景和必要访谈过程的介绍; 4. 在导言和点评中应加强社会性别视角和性别分析的运用,注意避免抛开具体材料套用空洞概念和使用套话的做法,要“把着材料走,论从材料出”。
学 术 价 值	
对科学认识的贡献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关于中国家庭暴力的第一手资料,对人们认识家庭暴力的存在、表现形态、成因和解决做出重要贡献,口述实录的认识价值将被更多的部门和人员所意识; 2. 发现了一个隐秘的长期被忽视的所谓“私领域”的丰富深刻的社会内涵,挖掘出了中国家庭中两性之间鲜为人知的深层的多重权力关系; 3. 点评中理论概念的运用和分析方面的贡献相对比较弱,但这个创意是很好的。
对分析视角的贡献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在设计口述访谈和分析中能够站在受暴力伤害的角度,比较全面地考虑到与家庭暴力发生、延续的各种因素和方面,以解决问题制止暴力为目的,这样的设计研究的视角是值得称许的; 2. 在具有导读和概括性的导言和具体案例的点评中,应该加强社会性别和其他分析范畴(如阶层、教育程度、城乡等)交错分析的运用,以进一步体现中国家庭暴力成因和干预等方面的本土特点; 3. 应从性别关系和女性权力角度加强点评的力度。

续表

评估内容	评 估 意 见
方法上的贡献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在口述实录材料上有探索和创新,如标题用叙述人的语言,使用点评的方式等; 2. 口述与点评相结合,加深了访谈材料的深度,对读者起到点睛和导读的作用; 3. 方法可靠有效,而研究方法上尚缺乏新贡献。
对社会干预的贡献或有效性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是社会共同干预解决家庭暴力的珍贵的实录资料; 2. 对促进制止家庭暴力立法的制定具有重大的、信度极高的参考价值; 3. 有益于社会与公众(包括决策者)认识中国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和对妇女、儿童的残忍与伤害; 4. 应在社会支持系统对家庭暴力形成、延续和解决上的特殊作用加强分析,以引起更多方面的注意。

注:2003年4月2日专家评估会之后,我们根据专家提出的上述意见对文稿一一做了修改。

后 记

“受暴妇女口述实录”项目的执行期为3年。从2000年7月到2003年4月，项目组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成员的选定和培训、制定口述操作标准和相关文件、调查案源、实地访谈、整理录音、编辑文稿、撰写点评、统稿。先后参加项目实施的人员有（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宁、王涛、王知理、刘京兰、陈敏、宋美娅、张捷明、张菊芳、范爱莲、薛宁兰。此外，郑荣昌、钱满素分别为项目提供了一个访谈个案，任振洪参加了后期个案点评的讨论工作。每个成员对项目的参与有多有少，但是，本书无论如何是集体协作、求同存异、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人都为它的问世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还必须提及的是，在初期寻找案源过程中，其他分项目，如“法律援助”、“城市和农村社区”分项目等，积极提供线索，向有关部门和妇女本人进行说服工作；我们还忘不了“司法干预调查”分项目，在本项目初期资金短缺之时，所给予的理解、关心和支持。今天，这本凝聚着许多人心血的项目成果的面世，使我们深深感受到集体的力量。

这是一本由妇女以自身的经历，用自己的理解，从自己的口中说出的有关家庭暴力（主要是配偶暴力）的类型、危害和社会干预状况的口述实录。这本以妇女的声音和视角，第一次揭示出遭受家庭暴力（尤其是配偶暴力）妇女生存状态的实录，是28位叙述妇女无私和无畏的奉献，是访谈人（我们）与叙述人（她们）一同研究的成果，而且，我们只是贡献出自身受暴经历和感受的28位妇女的协作者。虽然，书中隐去了她们真实的姓名，但是她们的贡献已经刻在中国反家庭暴力事业的历史之中了。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下述专家对本项目实施和本书出版的鼎力支持与无私帮助。项目总协调人陈明侠研究员，始终关心、鼓励着我们，为项目能够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积极筹措资金、提供案源、协调各种关系、组织专家进行成果评估，并最终审定了本书的相关部分。钟少华研究员、杜芳琴教授欣然接受邀请，分别为项目成员做了“口述史学的义定和方法”、“口述访谈的操作规范”、“口述访谈的跨学科性与社会性别视角”的培训。为项目能够进入访谈阶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具体操作上的切实帮助。夏吟兰教授以特邀专家身份，参加了项目后期自我评估工作，并向专家评估小组提交了项目实施状况和自我评估情况的书面报告。由李银河研究员、杜芳琴教授、李慧英教授、荣维毅教授、佟新教授组成的项目成果专家评估小组，对本书做了客观、全面的评价，并从理论上、方法上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

项目办公室刘小娟、资料中心乔威为本书稿付梓出版做了打印、复印工作。出版社的多位编辑同志在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注：未经许可，请勿以任何形式对本书进行转载、改写、改编。

本书主编

2003年6月

反对家庭暴力理论与实践丛书目录

-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研讨会论文集》
- 《受暴妇女法律援助案件研究报告》
- 《妇女热线家庭暴力个案研究报告》
- 《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行为状况调查报告》
- 《家庭暴力司法干预状况调查报告》
- 《受暴妇女口述实录》
- 《传媒监测网络社会性别及反家暴培训手册》
- 《警察社会性别及反家暴培训手册》
- 《社会工作者及公务员社会性别及反家暴培训手册》
- 《司法人员社会性别及反家暴培训手册》
- 《医疗人员社会性别及反家暴培训手册》
- 《受暴妇女社会性别及反家暴培训手册城市读本》
- 《受暴妇女社会性别及反家暴培训手册农村读本》
- 《施暴者社会性别及反家暴培训手册城市读本》
- 《施暴者社会性别及反家暴培训手册农村读本》
-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以下项目的研究报告及成果第二阶段出版：
 -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建议草案》
 - 《城市社区反家暴综合干预模式研究报告》
 - 《医疗部门反家暴干预模式研究报告》
 - 《农村社区反家暴综合干预模式研究报告》
 -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总报告

责任编辑：孔继萍

封面设计：王 华

本书收录了28位受暴妇女的口述访谈个案，每个个案都详细叙述了受害人经历的家庭暴力事件；生动地描绘出中国家庭暴力的现状；描述了家庭暴力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施暴者的暴力手段，以及受暴者应对暴力的态度；展示了社会各界，包括公检法机构对待家庭暴力的态度。本书旨在加深公众对家庭暴力危害的认识，提高公众反对家庭暴力的意识，并为政府及公检法机构制定反对家庭暴力策略提供第一手资料。

ISBN 7-5004-3988-1



ISBN 7-5004-3988-1/C·174 定价：28.00元